



目 录

中译者的话	1
前言	4
原书出版说明	11
“请你们称我为革命士兵!”	13
我的学艺生活	29
青年时代	54
拉施塔特碉堡里的三天	94
一个女子和一个男子汉	124
公元 1849 年瑞士流亡生活纪实	132
“恩格斯是我们公认的卡诺和毛奇”	186
“这里有我敬仰的一个人”	190
伦敦流亡生活一瞥	197
我的教书生涯	204
“并无怏怏不乐”	226
难堪的一刻钟	247

乔治·朱利安·哈尼·····	256
爱尔兰的历史——前仆后继的反抗·····	262
爱琳娜·马克思·····	265
罗伯特·施维舍尔·····	277
两位先驱者·····	284
人民的儿子·····	296
“社会主义提高了自己的声音”·····	305
寻访故地·····	331
社会民主党在汉堡港·····	346
后记·····	352
威廉·李卜克内西生平大事记·····	364
人名索引·····	369



中译者的话

本书选辑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回忆录二十一篇，大都写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那时，他已近暮年，还要主持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工作，日常事务十分繁忙。但是，他在同志们的催促之下，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充沛的热情，写下了这些德国革命工人运动早期历史的资料，给后世留下了一份极其宝贵的革命遗产。威廉·李卜克内西所以能写作这些回忆文字，是同恩格斯的教导、帮助分不开的。恩格斯曾在1885年再三勉励他和李卜克内西两人共同的朋友约翰·菲利浦·贝克尔撰写生活回忆录。恩格斯说：“这将是万分需要的，因为把一切都忘却了、或者什么都没有经历过的青年一代，现在开始想要知道过去发生的事；并且也需要在年轻的一代中，把许多以讹传讹的错误报道尽可能地加以订正。”*

* 参阅《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的信，1885年12月5日，日内瓦》，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391页。

今天，我们在本书中读到七十多年以前这位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对他亲身经历的记述，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充分地了解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有关人物的史实，而且还可以使我们从中学习革命前辈崇高的思想品质、顽强的战斗精神、坚苦卓绝的革命作风。从这些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威廉·李卜克内西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恶势力冷嘲热讽，对新事物热情颂扬；他临危不惧，遇事不苟，既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又富有斗争的胆识和策略；他对革命真理和正义从善如流，勇于改过；对革命导师和战友感情深厚，忠贞不渝。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有时对旧社会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对旧秩序敢于藐视甚至加以破坏。这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我们必须从当时的环境中来加以理解。

这本回忆录是由民主德国学者海因里希·格姆科夫(Heinrich Gemkow)选辑的，书名——《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也是他取的。中译本除了保留他所写的《前言》和《后记》外，还保留了原书的《出版说明》和《人名索引》。但需要交代的是：一、原书对所收二十一篇回忆录的出处，用《材料来源》为一总目，统载于书末附录中。中译本则将其分别载于各篇正文之后；二、原书中有两种注释，一为李卜克内西本人所注，一为原出版者

所注，其排列的位置殊不一致。中译本除上述两种注释外，又加了中译者注，共三种，现在一律排成正文的脚注。李卜克内西本人的注释用①②数码表示，原出版者的注释用①②数码表示，中译者注用*号表示；三、李卜克内西在写作中使用的外文单词和句子，除个别不便于处理者外，中译本尽量保存原样，而将中文释义用方括弧附于原文后；四、考虑到李卜克内西撰写回忆录时，往往叙至中途偶然想起过去或旁的事情而加以夹叙或倒叙，读者若对其生平缺乏系统了解，遇到这种情况，不免有头绪不清之感，因此中译本根据本书提供的现有材料，简要地列出一篇《威廉·李卜克内西生平大事记》，附于全书正文末，供读者参考；五、原书插图和环衬图均为冈特·莱尔希（Günter Lerch）所作，中译本全部加以译制采用。

最后还必须说明，书中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忆，过去已有一小部分摘译或经他种文字转译成了中文。译者在翻译本书过程中，曾作了参考，有的吸收了原译的片断，有的根据原文作了校正或补全。

译者深感学力浅薄，译文未能将原著谐趣的风格和隽永的文彩充分体现出来；个别疏误和欠妥之处亦在所难免，衷心希望批评指正。



前 言

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名字在他去世后的七十五年中^{*}，一直为人们所传颂。在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连孩子们都知道李卜克内西，听到过他的事迹，知道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奥古斯特·倍倍尔的战友、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为了使人回忆起他的革命活动，辟建了许多纪念胜地，并用他的名字给一些街道命名。他的许多文章已重新发表。他编的《人民外语词典》直到今天还陈列在许多书架上。他写的书信，汇编成厚厚的几卷。

他的朋友们怀着热爱而又崇敬的心情称他为“革命士兵”，或简称为“士兵”。这并非偶然，是他自己最早自称为“革命士兵”而引以自豪的。他第一次用这个名称是在1872年，当他在莱比锡由于所谓“叛国罪”被资产阶级一容克的阶级法庭审判的时候。

* 本书出版于1976年，距李卜克内西去世之年为七十六年。这篇《前言》显然写成于本书出版前一年，故有此语。



“革命士兵”这一称号，符合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历史上的形象，同时也成了每一个刚毅而又无私的无产阶级战士的象征。这一点甚至可以在几十年以后发生的一件小事上得到印证：当恩斯特·台尔曼被法西斯监禁和折磨了十来年之后，在他给一个年轻的难友回信时，还用这一光荣的名称来称呼无产阶级战士。他写道：“因为革命士兵意味着对事业忠贞不渝，在生死关头表现出忠诚，同时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出绝对的可靠、充满信心、具有战斗的勇气和力量。”^①

威廉·李卜克内西达到了这种对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的最高要求。他把一生献给了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献给了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事业。他的一生的意义和所完成的业绩是无法估量的。威廉·李卜克内西于1826年3月29日出生于一个旧式的学者兼官吏的家庭，似乎从幼年时起就确定了他那完全是另一种的生活道路。他的表亲外祖父弗里德里希·魏迪希*是一个具有共和思想的教员与牧师，后

^① 恩斯特·台尔曼：《给一个狱中难友的回信》，柏林1961年德文版，第80—81页。

*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魏迪希 (Friedrich Ludwig Weidig, 1791—1837)，教师，后来是布茨巴赫(黑森)的校长。30年代领导黑森的民主运动，后因奸细告密被捕，在狱中受到残暴的严刑拷打，最后自己用碎玻璃割断自己的血管致死。当时威廉·李卜克内西年仅十一岁。详见弗·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卷，第82、84—85页。

来受反动派迫害致死。虽然表亲外祖父的死给这个天资聪颖、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威廉·李卜克内西以很大震动；虽然他在年轻时就慷慨激昂地反对过德意志同盟中诸侯们的所谓“追究煽动者”^{*}的迫害活动，反对过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的卑躬屈膝，然而仅从表面上看来，在他念完中学和大学之后，按照一般传统，在他面前仍然摆着一条去当官吏或当学者的道路。但是当他在吉森、柏林、马尔堡的几所大学里学习语文学、神学和哲学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些德国的和波兰的民主主义者，并且结下了个人的友谊。这种个人友谊，以及最主要的是他的那种热烈的自由平等的思想，把他这个大学生引进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反对派的行列，使他成为一个激进的共和主义者。

他初次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他十九岁的时

* 1817—1819年间，德国青年大学生为建立统一的德国而斗争的运动空前高涨，德意志同盟中的诸侯们惊恐万状，俄国沙皇和法国政府也参与镇压。在俄国沙皇策动下，由沙皇的代理人兼作家柯采布埃主谋，写了一件关于在德国大学生中危险的革命情绪的备忘录。1819年3月23日，柯采布埃被大学生桑德作为民族败类杀死。反动派以此为借口，不仅镇压爱国的大学生运动，而且完全压制一切自由。反动派把进步人士诬蔑为煽动者(Demagogen)。1819年9月20日同盟议会批准了以“追究煽动者”(Demagogenhutz)为名的所谓卡尔斯巴德决议。根据这个决议，德意志同盟能在所有德意志国家中对民主人士进行迫害。威廉·李卜克内西年轻时曾热烈参加反对这种“追究煽动者”的斗争。

候。李卜克内西后来回忆时写道：“我第一次在柏林听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姓名，是在1845年。一个莱茵省来的大学生要我注意恩格斯这个人，于是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这之前，我曾经算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共产主义者。我读过和研究过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中最富于实践的人物罗伯特·欧文的著作。但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却以它大量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性，替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本书为我的生活之路奠定了基础。”（见本书第190页）

年轻的大学生李卜克内西当时遇到的情形，也跟那些与他年龄相仿、志趣相同的人的经历一样：他从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或空想共产主义的想象和希望中，迈开最初的探索步伐，走上了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问题的意义作科学地探讨的认识途径。当然，在他有资格称得上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前，他还面临着一条漫长的路。

首先，他在1846—1847年间，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作出决定，要象卡尔·马克思几年以前所做过的那样，在德国各邦都处在反动的封建专制的情况下，不担任任何形式的国家职务，哪怕那是一条通向大学教师的必由之路。他希望能在大西洋的彼岸，在美国，找到一个新的自由的境地。他这次从马尔堡出发的旅行

等于是—次流亡，为的是要避开那逮捕他的威胁。但是这次旅行并未在北美终止，而是在共和政体的瑞士结束。因为在他去莱茵河畔的途中，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瑞士教师曾使他确信，他不应该在美洲的丛林里去寻找他的出路，而应该在不停地奔向革命的欧洲去寻找。

于是，李卜克内西成了苏黎世—所进步的卡尔·弗吕贝尔模范学校的教师。他能在这里—边对那些信赖于他的青少年进行人文主义教育，—边从事他的革命活动，把两者结合起来。他在这里第一次与工人们有了更密切的接触，参加了在苏黎世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举行的集会，了解到工人们的思想、要求与生活状况。他也在这里开始他的作为新闻记者的活动，为民主的《曼海姆晚报》撰写通讯报道。从此以后，记者的生活也就伴随着他的一生，成为他的第二职业。

在这以后，有两件事为威廉·李卜克内西以后岁月中的生活道路确定了目标和方向，并且丰富了他的阅历，在他的思想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这就是：1848—1849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友谊。这两件事自然也就成了他写回忆录的中心题目。这些回忆录是李卜克内西晚年时，在他的朋友们的催促之下才写成的；而收录在本书中的绝大部分篇章，是在经过了七十多年以后，第一次重



新发表的^①。

遗憾的是，我们从中选辑的一部分回忆录只留下零星片断。这部分回忆录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写下的，并且大多数都是在杂志上发表，其中主要是《世界新历画报》杂志和《真正雅各布》杂志，这是两家在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读者最多的刊物。为了撰写这些回忆录，李卜克内西不得不从他每天的党务工作中，从他作为国会议员、新闻记者、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主编和宣传工作者的无数事务中，挤出有限的几个小时。不过，只要他做这件事，他就怀着热情的关切，用他亲身的经历，来讲述革命的德国工人运动的早期历史。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感到，作为一个回忆录撰写者，他也是在为党工作，并且是完全符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意图的。恩格斯曾在1885年再三勉励他们两人共同的朋友与战友约翰·菲利浦·贝克尔撰写生活回忆录。恩格斯说：“这将是万分需要的，因为把一切都忘却了、或者什么都没有经历过的青年一代，现在开始想要知道过去发生的事；并且也需要在年轻的一代中，把许多以讹

^① 在李卜克内西去世后不久，法国社会主义者为了纪念他，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中的四篇：《公元1849年瑞士流亡生活纪实》、《青年时代》、《我的第一次演讲》、《我的教书生涯》。这个事实证明了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国际声望。

传讹的错误报道尽可能地加以订正。”*

威廉·李卜克内西是从一个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人领袖的角度去写他的回忆录的。不过，正如读者不久就能发现的那样，其中还有个别的、颇带主观色彩的看法与偶然的错误，这当然是在所难免的。然而，更重要的是有这样一种情况，即他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描述他的政治生活中最初的极其动荡的十年，可是在这十年中，他既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就使得他的论述变得不可思议，出现严重的、有时常常是可笑的脱离实际。人们还能从中觉察到，李卜克内西是如何竭力把他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一些事件的评价当作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在描述1849年初夏发生在巴登和普法尔茨的革命事件时，更是如此。总之，对读者最好的建议是，请读者参阅恩格斯所著《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一文，作为对李卜克内西回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运动的进一步了解。

其实，关于李卜克内西，如果我们能读到和听到他自己说的话，我们又何必写这么多和说这么多呢，最好还是让他自己讲吧！

海因里希·格姆科夫

* 《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的信，1885年12月5日，日内瓦》，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卷，第391页。

原书出版说明

本书选辑的回忆录，基本上都按照各篇的原稿，只有几个标题是出版者加的。凡删节的地方，在文中用三连点(…)标出，并在附录的《材料来源》中用“摘自”(Aus)符号为记。所作删节，是为了避免重复和离题太远，同时把文章中所涉及到的反映当时写作年代的某些日常政治事件而今天却不易领会的内容，尽量删去。

单词的拼写与标点的使用，凡是不走原意的，尽可能使用现代方式。李卜克内西本人所作的脚注用十字号表示。出版者的注释，在正文中用星号标出，读者可在本书附录中查阅释文。凡使用外文单词和句子的地方，如果李卜克内西本人已经译成德文，则将译文放在正文中方括号内注明。出版者的简单附注也都放在方括号内*。

* 见下页。



关于威廉·李卜克内西在他的回忆录中完全没有涉及到、或者只是轻轻带过的那几十年的生活（但是在那几十年中，革命的德国工人运动是以他为首的），则在出版者《后记》中作了简略的介绍。

读者在附录中除了能查阅到注释的释文外，还能找到《材料来源》以及人名索引**。

** 这段和最后一段所说的是德文原本的技术规格，中译本对这些规格作了少许改动，请参看本书《中译者的话》。

“请你们称我为革命士兵！”*

对刚才宣读的那份吉森** 警察局的材料①，我不得不作一些批评性的说明，同时面对这种对我形象的丑化，我也至少要为我的生平大致勾画出一幅真实的图景。这份证明材料本身就是一个古怪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事实是如何从警察的头脑中反映出来，并且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

现在，我简短地叙述一下我的生平，作为对我已经送交的履历表的补充。我出身在一个官吏家庭。由于我早年丧父，我的亲属为我确定了一条仕途。还在上

* 1872年3月11日至26日，莱比锡刑事陪审法庭对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赫普纳进行所谓叛国案审判。本文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在法庭上发言的节录。

** 吉森(Gießen)是兰河(Lahn)边上的城市，位于法兰克福之北，当时是黑森的首邑。

① 系指吉森警察局应检察机关的要求所写的关于威廉·李卜克内西的证明材料。参阅《1872年3月11日至26日莱比锡刑事陪审法庭对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赫普纳叛国案的审判》(附有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前言和附件)一书，1911年柏林重印第二版，第64—65页。

中学的时候，我就读过圣西门的文章。这些文章替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对一个原想“为谋生而求学”的我来说，本来是没有倾向性的。我学习，仅仅是为了造就自己，而我之所以要有所造就，则是为了能够完成国家和社会赋予我的职责。我以优异成绩中学毕业之后，十六岁进入大学。我提到这些，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让人明白，吉森警察局的拙劣手法是故意要把我丑化成一个堕落的人物。如上所述，我研究过各种各样的材料，象每一个真正想学习而不是被迫为谋生而学的大学生一样，我反复探求摸索。不久，我终于放弃了想担任国家公职的想法，因为担任这种公职是与我的政治、社会观点不相一致的。但是我曾一度有过想当大学讲师的计划，并且希望也许能在一所规模较小、独立性较强的大学里获得教授的位置。不过我沉浸在这种幻想中的时间并不长。我终于确信，倘若不牺牲我所信奉的原则，是绝无希望得到任教的资格的，因此我在1847年作出了旅居美国的决定。我毫不迟疑地进行必要的准备。然而，正当我在前往一个海港的旅途中时，我意外地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位侨居瑞士的教员。他不赞成我的计划。他说，从各种迹象来看，欧洲的现状眼看就会发生变革。他用恳切的言辞再三劝我移居到共和政体的瑞士去，建议我在下一个车站掉转方向，驶向苏黎世，而不是奔赴汉堡。

我这位新结识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不少当地的官员，其中还有些是当时身居高位的人。根据他们的愿望，我要在当地取得公民权，并且献身于律师职业。

我移居到瑞士后不久，发生了反对分裂主义同盟的战争^①。我以极大的同情参与了那次战争。我虽然喜欢到苏黎世的德国工人联合会去，然而仅仅是为了受教育，因为我那时第一次有机会倾听工人们自己叙述他们的状况和追求的愿望。说我是 Chef de la Section Centrale [中心组组长]，完全是吉森警察局的故事编造者的一种臆测；还有那个没有上演的剧本，我也必须让这位故事编造者自己去负责。我从来就没有写过剧本，虽然我惭愧地承认，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写过一些诗。不过，那是谁也免不了的一种幼稚病，幸运的是我的这种幼稚病很快就彻底治愈了。

1848年2月23日，传来了在巴黎已开始斗争的消息。我梦寐以求的希望算是实现了，因为我那时毫不怀疑人民一定会胜利。我再也没有耐性在瑞士呆下去。我向当时与我往来较多的朋友们匆匆告别。两小时以后，我已经在前往巴黎的途中。尽管我是如此急急忙忙，可是当我到达目的地时，斗争已经结束，一部

^① 1845年，瑞士七个由基督教保守党统治的邦结成违反宪法的分裂主义同盟，并建立了自己的军队。1847年分裂主义同盟的部队被瑞士联邦政府部队击溃，分裂主义同盟随之瓦解。

分街垒已经拆除。不过，倒是没有使我失望，七月王朝^①被推翻了。我在二月革命中的活动时间并不长。可是它当时对德国所起的作用，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曾毫不怀疑，实现建立一个德意志共和国的想法是可能的。当时，海尔维格正在筹划他著名的进军*。我参加了，并尽力为这一事业效劳。

这次是要为建立德意志共和国而斗争。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最有利的时刻，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会是一个胆小鬼，或者是背叛者。法官和陪审员先生们，你们看，我并不否认我的过去，并不否认我所信奉的原则和信念。我不否认什么，也不隐瞒什么。其实，为了说明我是一个君主王朝的反对者，或者说，一个当今社会的反对者，也根本用不着吉森警察局以拙

^① 1848年2月24日发生在巴黎的二月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路易·菲力浦国王。他是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被自由金融大资产阶级捧上台当国王的，因此常称他为“资产阶级国王”。这个在1830年至1848年统治法国的资产阶级王朝，当时人们称为“七月王朝”。

* 1848年法国巴黎的二月革命风暴吸引了欧洲各国的革命流亡者以及一些外国工人。他们组成了革命志愿军。而后，这些志愿军又幻想解放自己的祖国。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中的大多数资产者为了摆脱外国工人，暗中助长这种狂热。当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海尔维格(Georg Friedrich Herwegh)受骗当了德国志愿军的领导，打算渡过来茵河向前推进，使德国革命化。可是马克思在公共集会上不怕激动的群众的不满，指出整个冒险行动毫无成功希望。事后海尔维格遭到失败，本人被俘。

劣手法作愚蠢的捏造。只要我觉得那是自己的职责所在，我就决不会在斗争面前退缩。我可以在这里直截了当地说：自从我有思考能力以来，我就是共和主义者，并将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奋斗终身。

不幸的是，我在巴黎由于过度紧张而得了重病，未能与他们一起进军到最后。所以，当海尔维格的纵队在多森巴赫被击溃，遭到灾难性结局的时候，我并没有在场。我恢复了健康之后，又重返苏黎世，因为那时在德国，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在巴登，也是君主派取得优势；而我则只好继续执行我的老计划，进行学术研究。不过，这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九月中旬，司徒卢威举出共和国的旗帜。我响应他的号召，与十几个同志在塞肯根(Säckingen)渡过莱茵河，在三天之内我们就成功地组成了一个相当强的志愿军团。为了联合其他的正在南德高地组成的志愿军团，我动身前往劳芬堡，计划中的联合志愿军团应该在那里集中。但是我并没有得到我所期待的援助，而是得到了司徒卢威已误入歧途的消息：他带着他那没有经过训练的部队走出山区进入平原，他本人则被打败并且被俘。

到这时，我还没有丧失一切信心。我原可以渡过莱茵河逃跑，逃到莱茵河那边就安全了。但是我没有这样做，仍然努力要找到我的志愿军团。可是我的这种努力失败了，我被俘了。我和我的难友们一起侥幸

地逃脱了军法审判之后，我在待审拘留所度过了九个月。1849年5月，正当打算在弗赖堡审理我们案件的时候，几天之前爆发了五月革命^①。于是审判一开始，检察官就立刻声明，他撤销对我们的起诉，并建议予以释放。我提出抗议：我们被无理对待了九个月之久，现在我们要在法庭上控诉，我们不同意剥夺我们这种权利。然而法庭却仓促地同意了检察官的提议。我们被释放了。

以后发生的一些事件我就不在这里细述了。我是作为一个记者和士兵参加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我们是为自由、统一的德国而斗争，而当今德国皇帝所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却把那次运动镇压下去，重新恢复了旧的分裂状态和不自由。我又流亡到瑞士。由于返回苏黎世有障碍，我在日内瓦定居下来。我在那里想尽量使瑞士的德国工人联合会（当时会员人数已相当多）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并能取得一个严密的社会主义纲领。为了处理这些事宜，决定在穆尔腾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可是瑞士官厅却在外国列强的压力下，捏造说这次代表大会的本来目的是要“计划武装入侵巴登”。于是所有代表，其中包括我，全部被捕。那是1850年

^① 1849年5月11日，(巴登的)拉施塔特(Rastatt)要塞的驻军起义，要求保卫和实行帝国宪法。以后几天中，几乎所有的巴登军队都站在革命的人民群众一边。

2月。这以后进行了两个月的侦查。自然找不到任何证据能说明嫁罪于我们的那个“武装入侵”的疯狂计划可以成立。尽管如此，我还是依照瑞士联邦委员会的命令被逐出瑞士，转交给了法国当局；而法国官厅则用一张指定路线的护照，把我遣送到伦敦。在伦敦我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吉森警察局的证明材料中说我早已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说法是错误的。我先前认识的唯一的一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是恩格斯，是我在日内瓦遇见的。马克思是我在伦敦才认识的。

再说，共产主义者同盟不是一个密谋的团体，而是一个宣传团体。当然它必须是秘密的，因为结社集会的权利在德国受到压制；最初的基督教徒们也是在坟地墓塚里秘密集会的。从被看作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的《共产党宣言》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个遭到多次诽谤中伤的团体完全是一个革命的团体，因为它要为彻底改变社会、政治状况而努力奋斗；同时也使人完全明了，正因为这个团体把革命看作是个有机的过程，所以它与任何一种把革命看作墨守教条的主观行为的观点格格不入，甚至是敌对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它固有的规律。我们必须研究这些规律，而只有傻瓜才会想到去超越这些规律。我想在这里指出，正是这些科学的见解遭到少数人的反对，从而导致了如吉森警察局的证明材料中所说的分裂。我并不想在今天去深入地

谈论这些内容，否则我就会引用我们多数派当时发表的声明，在那篇声明里，我们针对那种墨守教条的所谓革命，极其明确地强调了我们的立场。可是就是以这样的原则为基础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却被吉森警察局的证明材料贬低为一个专门从事密谋活动的阴谋家的团体。这完全是以假乱真，混淆视听。我在这里还必须更正吉森警察局材料中两处不真实的地方：第一，我从来不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第二，中央委员会里的多数派并没有由于意见不同而退出中央委员会，而是根据多数派的一致意见，在科伦组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解散了伦敦的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党人案件***以及施梯伯****先生在这一案件中所标榜的要拯救社会的“杰出才能”，我以前已经讲过。“同盟”在它完成了历史使命之后解散了。在德国逐渐觉醒的

* 此处原文是 Zentralbehörde，似应译为“中央执行局”，但已通译为“中央委员会”。

**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的不同意见，参阅弗·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卷，第187—188页。

*** 参阅弗·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卷，第193—205页——第五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 威廉·施梯伯（Wilhelm Stieber，1818—1882），曾投机1848年革命。革命过去以后，曾一度充当德国警察的顾问，后又被派作密探，监视德国流亡者，破坏共产主义者同盟。参阅上书第196—201页。

政治生活中，秘密宣传已成为多余。

我在伦敦生活了十三年，从事政治与社会学的研究，而更多的是为生存而斗争。1862年中，我应奥古斯特·布拉斯的邀请，参加他在柏林新创办的《北德意志总汇报》的编辑工作。奥古斯特·布拉斯是1848年的红色共和主义者。他在三年以前曾在我们与布龙布龙主义者^①卡尔·福格特的斗争中为我们出过力。由于在这期间发布了大赦令，使我有机会重返德国。报纸的纲领是宣传民主与共和思想：对外，反对波拿巴主义；对内，反对错误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布拉斯先生当时还是“日内瓦共和国的公民”，他再三强调自己信奉共和主义）。在这一纲领的基础上，我于1862年8月接受了布拉斯的聘请。开始一切都好。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862年9月末，冯·俾斯麦先生掌了权。我不久就觉察到报纸的态度已有所改变。我深感疑虑，并且把这种疑虑表示出来；而布拉斯则坚决否认他对新内阁承担有什么义务，同时授予我在我的部门（外事部）内 Carte blanche（享有全权）。然而可疑的事实愈积愈多，最后我终于得到证据，证明布拉斯是怎样卖身投靠了冯·俾斯麦先生，成为御用文人的。不言而喻，

^① 布龙布龙 (Plon-Plon) 是法国国王拿破仑第三 (路易·波拿巴) 的一个堂兄弟日尔姆-拿破仑-约瑟夫-查尔斯-保尔·波拿巴 (Jérôme-Napoléon-Joseph-Charles-Paul Bonaparte) 的绰号。

我当时必须解脱我与《北德意志总汇报》的关系，虽然我将因此失去我唯一的生活来源。就在那个时候和以后的日子里，也曾经有人不断企图收买我。我不可能确切地说是冯·俾斯麦先生要收买我，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是冯·俾斯麦先生的代理人要收买我，而且是在一种不仅在我自己面前，而且还在我的党内同志们的面前，保存我的尊严的条件下收买我。

冯·俾斯麦先生（现在是冯·俾斯麦侯爵）不仅要钱，而且也要人，只要他能物色得到。至于这个人是属于何种党派，对他来说无所谓。他甚至宁愿要变节者，因为一个变节者，既然名誉丧尽，因而也就可以成为驯服的工具，或者说成为一具 *uti cadavre*（受人摆布的尸体）。

当时普鲁士政府正处心积虑地要与执意违抗的资产阶级联合。假如资产阶级不愿顺从，那就采用三十年前英国托利党党魁迪斯雷利开的药方（因为从渊源上讲，这也不是冯·俾斯麦先生的政策），把它夹在容克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象用两个磨盘似地折磨它。于是，就有人一再怂恿我和我的朋友们把《北德意志总汇报》办成极端社会主义的、甚至极端共产主义的东西。不消说，我不会让自己去干这种卑鄙的勾当。我以应有的轻蔑拒绝了冯·俾斯麦先生的代理人的贿赂企图。如果我当时不这样做，那末我也早就为了自己的

电子书
PDF
PDG

私利牺牲了所信奉的原则，从而声名狼籍；当然，我也就不会象今天这样在这里的被告席上，而是早已有了显赫的地位。今天把我送到被告席上来的人，正是当年企图收买我而未能得逞的人。警察一知道我拒绝之后，就立刻开始百般刁难，而在这之前，警察局是一直不来打扰我的。如果把警察局所找麻烦一桩一桩罗列起来，那我就要扯得很远。那时，他们倒也暂时放弃了对我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他们不愿放弃最终能使我软下来的希望。

1863年，斐迪南·拉萨尔开始了他的开拓新路的宣传鼓动。起初，我对此保持疏远，直到资产阶级报纸对年轻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无耻的攻击时，才使我义不容辞地抛开一切顾虑，成了拉萨尔创建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这样做的理由，在这次诉讼过程中就会明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容克阶级仍然忠实地执行如上所述的政策，力图收买工人运动。在拉萨尔猝然去世之后，全德工人联合会不幸落入另一些人的手中，这些人部分是由于无能，部分是出于蓄谋，为容克阶级的反动意图效劳。这种情况迫使我放弃到那时为止的保留态度，而公开地向以《十字报》的前编辑瓦盖纳·冯·杜梅维茨为主要代表的政府社会主义作斗争，迫使我力陈：仅仅是单方面地向资产阶级进攻，只会对容克阶级有利；只期待一般的选举权，而没有自由结社集

会的权利，没有新闻自由，那末这种选举权无非只是作为反动派的工具而已；而那种由容克政府提供的“国家资助”纯粹是为了笼络工人，为反动派的目的服务。

我知道，我当时敢于做些什么。而警察局为此给我增添的麻烦却要比我所能做的多上一倍。他们要求我从我最后住过的地方的官厅取得一张操行证明。我申辩说，在英国没有一个对未犯罪的人进行警察监视的机构，因而也就开不出这样的操行证明。但这也无济于事。我随身带着一张我出生的城市——吉森警察局的证明。证明书上写着未发现我的“不轨活动”（看来吉森警察局当时还没有研究过那本“黑书”^①），但这也无用。1865年夏天，一个晴朗的上午，我被一个警察“拘留”到警察局。我在那里被告悉：我务必在二十

① 这是指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合编的书《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上下两册，1853—1854年柏林版（Die C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Berlin, Erster Theil, 1853; Zweiter Theil, 1854）。该书是受官方委托，利用德国所有各邦警察局掌握的材料汇编而成的。该书对进步人士，尤其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人士大肆进行诽谤诬蔑。因此，人称它为“黑书”。

* 该书上册叙述了工人运动的“历史”（它是警察的指南），在它的附录中转载了若干落到警察手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下册的内容是一份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人的“黑名单”以及他们的履历表。维尔穆特（Wermuth）——汉诺威警察厅长，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的证人之一。恩格斯把他和施梯伯称为两个最卑鄙的警棍。

四小时内离开柏林，离开普鲁士国家。我向内政部上诉，结果是：在进一步裁决之前，驱逐令暂缓执行。大约一个月之后，裁决下来了，驱逐令得到“确认”，因为我继续留在普鲁士将危及国家安全。

官方建议我与内政大臣亲自谈话。以我所信奉的政治原则而论，与内政大臣亲自谈话，也无话可说。这样，我就不得不离开柏林，离开我经过长期努力之后总算有了足够的生活来源的地方。我迁居到莱比锡。第二年的夏天，普鲁士所执行的政策给我们带来了1866年的普奥战争。在缔结普奥和约之后，我主持了在莱比锡出版的当时还是民族自由党的《中德意志人民报》。

我到这家报纸还不到四周，报纸就被普鲁士军事当局禁止。此后不久，九月中旬，我为安排家庭事务旅行到了柏林。自从我被逐出柏林以来，政治状况已完全改变。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已把旧的德意志同盟摧毁。在新成立的北德意志同盟国会业已公布的选举法大纲中，规定了共同的公民权*。此外，在普鲁士又对一切政治犯实行了大赦。在这种形势下，我怎么能让头年判决的驱逐令继续生效呢？我怎么能普鲁士老

* 1866年普奥战争后，成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同盟来代替德意志神圣同盟。北德意志同盟的基本纲领中规定，所有参加同盟的各公国的公民都具有共同的国籍，享有同样的公民权。

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呢？于是我就在柏林进行完全公开的活动。在我不受干扰地住了几天之后，我毫无顾忌地在印刷工人联合会作报告。然而这个联合会如同所有在普鲁士的其他联合会一样，都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当天深夜十一点钟我从联合会的所在地回家的途中，我被捕了。我被送到了市监狱，指控我违抗驱逐令。在经过三个星期的待审拘留之后，我被柏林市法院判处三个月的监禁。我不屑于对这种判决向上申诉，因为这样做，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我还必须在拘留所再等待三个月以上；况且，纵然我对这种不公正的判决在上诉中能取得胜诉而被释放，也还要受到其他一些事实上的惩罚。我向市法院的先生们声明，我将不去向“柏林的法官们”上诉，而是向更高的裁判——公众舆论去申诉。在我获释之后，我也确实是在报刊上、在北德意志同盟国会的讲坛上这样做了。

关于我自 1867 年以来的全部政治活动，我都毫无遗漏地讲了。这些活动既构成了控告我的理由，因此我才在这里作进一步的申明。

我现在就要讲完了。法官和陪审员先生们，我只是迫不得已才作了这样较长的陈述，完全是这份莫名其妙带到这里来宣读的吉森警察局的证明材料迫使我有道义上的责任这样做。这一点，大厅里在座的诸位都不得不承认吧。可以有充分理由说，这份证明材料

不足以使我服罪，却使我无法尊重这样的法庭。我有责任对这种无耻诽谤进行答辩，而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个人的荣誉。不，这也是为了那些与我一起作为被告的人的利益。他们与我有一定的牵连，而且将可能由于对我提出的不利证词而不得不受害（如果只关系到我个人的事情，我倒可以缄口不言）。我已经坦率地向你们谈了我的生平和我的活动。我过去怎样，我现在仍然怎样，但在许多方面我是前进了。而最重要的是我今天仍然站在我二十二年前的同一立场上。有时候，我在方法上，在对个别的人和事的判断上，也犯过错误。但是在我的目标上、在总的观点上，我却是愈来愈坚定。我不象我的诽谤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堕落的冒险家。早在我的青年时代，我就下定决心，并且从那时以来，就一直不懈地为我所信奉的原则努力奋斗。我从不谋求个人的私利。每当我必须在利害与原则之间作出抉择的时候，我向来是毫不犹豫地牺牲我个人的利益。

当我经历了闻所未闻的迫害而十分贫困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感到什么羞耻。不，我感到的是骄傲，因为这是对我政治声誉最有力的证明。我再说一遍：我不是一个职业的阴谋家，不是一个阴谋集团的到处流浪的丘八。就我个人而言，请你们称我为革命士兵吧，这我不反对。

从我青年时代起，我就怀着这样一个双重的理想，一个自由、统一的德国和劳动人民的解放。这就是说，要消灭阶级统治，并且也同样意味着要解放全人类。为了这双重的目的，我正竭尽全力为之奋斗，并且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必将继续奋斗。这是我的天职！

摘自《1872年3月11日至26日莱比锡刑事陪审法庭对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赫普纳叛国案的审判》（Der Hochverrats-Prozeß wider Liebknecht, Bebel, Hepner vor dem Schwurgericht zu Leipzig vom 11. bis 26. März 1872）一书中威廉·李卜克内西所写的引言，1911年柏林版，第65—77页。参阅《1872年莱比锡叛国案》（Der Leipziger Hochverratsprozeß vom Jahre 1872），1960年柏林新版，第22—29页。



我的学艺生活

我的学艺生活，既不是带象征性的学习，也不是“广义”上的学习。它并不是不可思议的，请读者不用感到惊奇。我这里所要写的“学艺”生活，不是指那种人们一生都应当从事的宏伟意义上的学习生活，而是指一个普通“学徒”的那种简单、平凡的学艺生活；他在某一个真正的“师傅”手下，由一名具体的“伙计”向他传授某种正正经经的、并非不可思议的普通手艺的奥秘，而且他也必须汗流浹背地、用粗糙硬结的双手“卖苦力”，直至掌握“手艺”的全部诀窍为止。我的敌人知道，我是属于那种“选错了职业”的人。这话已经有人对我说过了无数遍，可惜他们还是有权利这样说。而我自己也不得不深感悔恨地承认，我曾经选错过那么多的职业，以致我根本无法把它们数清。但是有一点，我的敌人无法在背后诽谤我，他们不能说我是一个“走江湖”的。我确实学过一种手艺，而且学得非常地道，甚至符合同业公会标准。如果我们在国会里的那些

留恋于行会制的老古董们^①认为，凡是没有正规学过一种手艺的人，都没有资格评判我们的经济状况的话，那末我可以有恃无恐地向他们大声喝道：你们用这话难不住我。我甚至还可以说：你们不妨把你们的资历证明书拿给我看看。而我是有的！我也是出生在亚加狄亚之乡*，在手工业行会的神庙里呆过，并在那里被授以圣职的，因此我就有应得的无可争辩的权利，作为一个知道内情的行家，来谈论粗陋的手工行业，以及那些有着女神似的长耳朵、甚至长指甲的鼓吹行会制的老古董们。对不起，这类怪物现在的名称是“同业公会”。

我确实在一个受人尊敬的行会师傅那里学过艺。我学会的是一种最受人尊敬、最受人崇拜的手艺：木匠手艺。

我说这话不是开玩笑，而是极其认真的。在当时，我更是异常的认真。我记得那是公元1846年，也就是五十二年前。那年的前一年，我不自愿地勉强到柏林去上大学，然后又更不自愿地勉强回到了故乡城市，上了当地的大学。当时我二十岁。由于我十六岁的时

① 这是对德意志帝国国会中反动党派代表的讽刺称呼。这些代表们要求退回到中世纪的行会制度。

* 亚加狄亚(Arkadien)，原为古希腊一地方，风景幽静，人民以牧羊为业。常用来比喻世外桃源，田园诗般的恬静质朴的生活。



候，就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我在最后几学期就已经提前取得了升入大学的资格。但是尽管我可以提前毕业，然而到了我进入大学的那一天，我竟毫无主意了。我面临这样一个问题：Que faire?〔学什么?〕将来干什么?我出生的是这样一个家庭，其中除了出过一个唯一的“叛国者”和“煽动者”^{*}以外，其余的全都是学者、官吏和军官，因此我似乎也应该从事于所谓的“为国效劳”。然而，我从青年时代起就憎恶这种“为国效劳”，不管它所采取的形式如何。至于我应该尽忠效劳的“国家”又是怎样的呢?在这个黑森的小公国里，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人有所作为。我也没有兴趣象我其他的许多亲戚那样到奥地利去，因为那里的统治者，他的名字叫梅特涅，从我童年时代起就成了最坏、最可恨的人物的代表。他反对德国人民，反对德国所追求的一切伟大和自由。他是臭名昭著的讨伐军中的最高统帅，是制定声名狼藉的“追究煽动者法”^①的元凶!他不仅仅统治着奥地利，而且统治着德国的其余地区，甚至超出了德国的范围。“追究煽动者”的卑鄙可耻，岂

* 指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魏迪希 (Friedrich Ludwig Weidig, 1791—1837)，参阅本书《前言》中的注释和弗·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卷，第82、84—85页。

① 1819至1840年间，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代表人物被德国反动派诬蔑为煽动家，德意志同盟议会因此通过法案，对所谓“煽动者”进行迫害、审判或流放。

不比昔日信鬼神时代的女巫的审问更为阴险恶毒吗？因为在以往那个时代，世界上还都相信魔法和巫术，而当时梅特涅和他的刽子手们，则是在对时代精神犯罪。他们大概认为，所有觉醒了的人们都与他们所迫害的那些人有基本相同的观点。试看“追究煽动者法”不正是从我高贵的家庭中也找到了一个牺牲品吗？

我上面说过，在我出生的这个官吏与军人的家庭中有一个例外的人，他就是传道士魏迪希。此人在1835年春天由于“煽动活动”被捕，经过将近两年的监禁和阴险残酷的审讯，于1837年2月23日发现他倒在自己牢房的血泊中。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毫无疑问，他在肉体上遭到最残暴的虐待。几乎可以肯定，他曾遭到难以忍受的残酷拷打，终于导致他企图自杀。但自杀没有成功，于是他被他死敌（一个故意充当他的审讯官的人）不是直接就是指使别人杀害了。我当时才十一岁，可是尽管人们当着我的面根本不提及或者只是含蓄地谈到这件可怕的事情，我还是知道事实的真相；尽管我并不认识我的这位表亲外祖父本人（魏迪希的母亲嫁到李卜克内西家），但这可怕的家庭悲剧却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终于决定我一生的印象。这出悲剧使我看清了我们的政治状况。它留下的深刻印象经常在我的脑海中反复出现，纵然到了不再需要出现的时候，它也不能从我的记忆中磨灭。我的故乡城市吉

森，当时还是一座大约有八千居民的半乡村城市（我至今还记得它那四处游牧的家畜），可是它在参加大学生协会运动方面却比德国任何一座大学城都走在前面。德国大学生协会运动是在为自由而战的人民遭到侮辱性的欺骗之后兴起的。在耶拿的大学生协会中，“穿黑长袍的吉森人”^①代表比较激进的一派。（由于他们穿着黑色的高领紧扣的老式德国长袍，因而得名；后来雅恩*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还穿着这种服装。）协会中的福伦纽斯兄弟**、福格特教授（帝国代理人福格特的父亲）、魏迪希和其他许多人，都是来自吉森及其附近地区的。在当年的居民中，吉森人素以坚强与独立的精神著称。直到今天，吉森人还为他们淳朴、粗犷、率直的性格而自豪。叛逆精神（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革命精神）在吉森人中间找到了最优越的培育的土壤。在德国，再也没有一个其他的地区象我们上黑森乃至整个黑森大公国那样，在“追究煽动者”时有如此之多的牺牲者。没有一个家庭领受过当地侯爵们“慈父般的爱”，从而不为他们的某一个亲属所牵连而蒙受德国的

① “穿黑长袍的吉森人”，是指吉森大学生中的反对派。1816年末他们集会组成一个秘密的政治协会，并在黑森和拿骚地区建立一个组织网。他们主张从事暴力革命，在反封建斗争中依靠劳动群众。

* 雅恩（Jahn），见本书人名索引。

** 福伦纽斯（Follenius）兄弟，即福伦（Follen）兄弟，见本书人名索引。

这种灾难。这一切都在我的心灵深处打下烙印。我周围的人愈是考虑到要避免给我刺激而千方百计地在我面前隐瞒一切，我的烙印愈是深刻。每当我心中想起这些事情，我的血液就立刻涌到脑子里，使我激动万分，以致我怀疑我的心是否还耿直诚实，是否会产生某种歹念。唯一的结果是，这一切使我的内心更深地埋藏着叛逆的思想和愤怒。因为，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父母就已双亡，我没有一个能倾吐我的感情和思想的亲人，所以我就习惯于离群索居，性情孤僻。这种习惯或者说性格，虽在我以后的生活中使我安然自得，但在另一方面却也使我付出巨大的代价。

早在去柏林之前，我就确定了我对当时的政治制度只能采取敌对的态度。至于宗教，在我内心深处早已清除得干干净净。尽管我受的教育是相当自由的，但是毫无疑问，我在中学里也曾潜心学习过非常正统的神学课。我除了专攻最基本的主科语文课以外，还主修神学。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一书，使我从神学转向哲学，并且成了青年黑格尔派。由于我在这期间见到了圣西门和其他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文章，所以我不久就很快从神学和哲学的天空中回到世间和现实的坚实土地上来。我生来讲究实际这一“不易更改的路德派的农民本性”，使自己逐渐有所觉悟，只是非常缓慢罢了。弗朗茨·梅林博士以他特有的敏锐，很快就发现

了我的这种农民本性。了解一个人的活的心和活的脑子，要比阅读书籍和报纸困难得多。在短短的一年里，这种路德派的讲究实际的农民本性不得不在我内心深处，与那种蜚居家中冥思苦想的本性作斗争。我从一只性好蜚居家中的毛虫，蜕变成一只政治蝴蝶。对于这种蜕变，再也没有人会象我的中学老师和最初的大学老师那样感到惊奇。他们所有的人都曾经预言我将有一条安稳的学者道路。但是他们完全估计错了。此后又预言我会找一项轻松而又稳当的工作，而这预言也没有实现。我的“蜕变”与其归咎于我自己，不如归咎于我的恶劣的环境。不妨夸大地说，是恶劣的环境打消了我各种最美好的生活计划。何况实际上，计划还没有考虑成熟呢。在柏林逗留期间，我不得不作更多的考虑。我一直沉浸在冥思苦想中，它虽没有使我作出最后的抉择，却把我带到了通向抉择的道路。在这里，我不想多纠缠细节。因为我考虑到：1848年以前的世界是如何显现在一个二十岁的充满幻想的青年人的头脑里的？在他内心里翻腾着的一切又是些什么？哪些突如其来的矛盾冲突在他心里互相冲撞？——这一切都不是三言两语就能交代清楚的。昔日的回忆犹如泉水喷泻，滚滚而至，以致我今天不得不把水源堵住。

话说回来。我到了柏林，那种大城市的生活在我



的思想与观念上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我把没有排课的时间用来学习社会主义和政治，而在课堂上则听过谢林、米歇勒、特伦德伦堡、伯克、格林兄弟和拉赫曼等人的讲课。我找到了几个意气相投的同学。我们一起读书，有时彻夜地讨论，而且还能有幸带着报纸副刊进入“神圣家族”（鲍威尔兄弟）的沙龙和宴会厅。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却把我推到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去。

当时有一些波兰人的酒馆，由穿着波兰民族服装的姑娘侍候顾客。我对于波兰人从小就有深厚的同情。我常常到这样的一家酒馆里去。我的同情心也就炽热地流露出来，于是引起了那家酒馆波兰女招待对我的注意。她戴着一顶康费德拉特卡^①帽子，看上去非常清洁。有一天晚上，当我一个人在那里等候我的朋友时，她在我的身旁坐下，说了一些表示衷心感激的话以后，她说，只有我还相信波兰的未来。她悄悄告诉我，波兰很快就要东山再起了。总而言之，我知道了她是一个杰出的波兰爱国者，并且知道了波兰行动党的密谋，准备在波兰境内的普鲁士占领区、俄国占领区和奥地利占领区以及在克拉考发动重大的事变^②。

^① 康费德拉特卡 (Konfederatka) 是一种波兰的民族服装，用毛皮镶边的高高的四角形帽子。

^② 波兰爱国者为反抗外来占领者统治的起义于1846年在克拉考 (Krakau) (即今克拉科夫——Kraków) 爆发。这次起义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的军队镇压。

以后一有机会，我们就继续这样的谈话。后来我又和几个年轻的波兰人有了联系。如果那次波兰普鲁士占领区爆发的起义没有因为事先败露而被扼杀在萌芽中的话，也许我早已成了我的德意志祖国的敌人，首先作为支援波兰的志愿军参加了战斗。德国人对波兰所犯的罪行使我内心苦闷；那位女招待——美丽的达娜·雅罗琴斯卡的眼睛更使我的灵魂焦灼不安。是她用原文唱给我听那首《波兰还没有灭亡》的歌曲；是她在我政治上迷惘因而从事学习和漫游的年代，给我提供了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证明妇女是不可否认的鼓动者；基督教会之所以能了解真情和揭露真情，主要应归功于妇女们的力量。话又得说回来。有一天，在柏林，同时也在普鲁士管辖的波兰几个省内，进行了一次大逮捕。我认识的那几个波兰人突然失踪了（后来，其中有一个人在对波兰人进行的大审判中出现在被告席上），达娜·雅罗琴斯卡也不见了。我当时是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而且看上去显得更年幼、更老实，因而肯定不会有人相信我能干出什么坏事，所以我没有受到什么牵连。只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即1846年3月，我从柏林回家途中，顺路穿过萨克森的瑞士到达波希米亚时，在那里被奥地利的宪兵扣留了。尽管通行证完全符合手续，我还是被带到警察局，经过简短的审讯之后，被作为参与波兰阴谋活动的嫌疑犯而逐出奥地利，并且



及时地“右边一个宪兵，左边一个宪兵，罪犯在中间”^①被押送出边境。

这是我第一次被驱逐。在我内心深处展开的这场良知与讲究实际的本性的斗争中，这一次冒险经历肯定没有帮助良知取得胜利。但那时我仍没有作出任何抉择。我在思想上醉心于到一所大学去当教师。在我中学学习宣告圆满结束之后，我内心所活动并酝酿成熟的就一直是这个想法。甚至可以说，当一个教师是我一生中梦寐以求的最美好的理想。我在流亡期间和在以后的日子里不得不从事二十五年之久的教书工作。在有了这样一段教书经历之后，我甚至相信，如果我能当一名职业教师，那肯定是没有选错职业。

然而事与愿违，我未能从事我最喜爱的职业。我聊以自慰的是，我认识的不少人也都有同样的遭遇。我还从未认识过什么人在生活中一直是如愿以偿的。谁认识这样的人呢？

我想成为一个讲师。我清楚地知道，布鲁诺·鲍威尔和其他一些人是如何在普鲁士受到惩罚的。但是，

^① 这是套用歌德的一首诗《1774年夏季科布伦茨的宴会》（“Diner zu Koblenz im Sommer 1774”），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右边一个先知，左边一个先知，凡夫俗子在中间。”两位先知是指瑞士作家约翰·卡斯帕尔·拉瓦特尔（Johann Kaspar Lavater）和教育家约翰·伯恩哈德·巴泽多符（Johann Bernhard Basedow），歌德自称凡夫俗子。



我可以在德国的其他任何一个邦里当讲师。可惜我没有很好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结交权贵们，而障碍恰恰就在于此。这些权贵们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是严格的正统派，因此要结交他们，就得有个绝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我必须信奉严格的正教。而这一点正是我做不到的。我和他们曾经有过许多争执、磨擦和冲突，而最终还是无可挽救地破裂了。当讲师既没有希望，但我总得干点别的事。一定得干些事！可是干什么呢？当我绞尽脑汁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德国的黑暗我也就看得一清二楚了。一个年轻的法国人或者英国人，他们有广阔的领域可以去从事卓有成效的、受人尊敬的工作。可是我，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却无所事事。如果我不想成为一个无赖，不想放弃我的个性，不想对自己犯罪，我在德国就无事可干。我也曾经想到过攻读法学。我不是想当法官或者行政官员，而是想当律师或法律代理人。这是一种尊贵的、高尚的职业。可是在德国，我的这一理想也烟消云散了。我们的法律程序是秘密进行的。没有公众充当阳光与新鲜空气，怎么可能健全的法律呢？虽然在黑森的莱茵地区采用法国的法律程序，实行公开审判和辩护，但是在莱茵河的彼岸，作为上黑森人的我，如果我不履行某些手续的话，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律师。可是，如果我一旦履行了这些手续，我也就带上了耻辱的桎梏。

在德国，世界对我来说都是用木板钉死了的。甚至可以说，我是在牢笼里；不管我如何愤恨、如何满腔怒火地摇撼着铁窗栅栏，我在德国依然是个囚徒，甚至比囚徒更糟糕，是个农奴，是个奴隶。不然的话，我就得去当一个狱吏或者一个奴隶的监头。可是我不能这样，因此我只能冲出牢笼去！冲出去！

在这种思想情绪之下，必然产生逃奔到国外的想法。去当移民如何？虽然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听说过许多关于移民的事，而且就在几年以前，我的一个叔叔也刚去美国。然而我一想到出国，就不禁感到畏惧。我仍然希望，在德国或者欧洲的某个地方，能有拯救的行动来结束这种统治制度。我象一个站在桅楼上的水手，察看着天气变化的征兆，希望能在热带地区看到天空中的一小片云彩。和波兰人是已经无事可干了。在瑞士，自由派的几个州和基督教派的几个州之间正在争执不休。在法国，反对“资产阶级国王”腐败统治的反对势力正在不断高涨。

然而对我来说，这一切都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在德国，我找不到一个固定的、我能依靠的基点，也找不到我能全力以赴的事业。我甚至比狄更斯的米考伯先生^①（虽然他在当时尚未问世）更为迫切地渴望着周围

^① 这是查尔斯·狄更斯在1849—1850年发表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乐观主义者典型。



能否“出现一点什么事情”，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出现。

而我再也不能在牢房里忍耐下去。家境和政局使我一天比一天感到不愉快。

在吉森，大学生成立了一个较大的协会。这些大学生虽然对社会主义只有很少的了解，但对德国现状的看法却和我相近。传道士魏迪希的儿子和一个侄儿在那一学期上了大学。我只要一听到魏迪希这个姓，就激起我内心的无比愤慨，激起我良心上的不安与复仇的欲望。他的儿子由于他父亲的遭遇而受到压迫与摧残。从他懦怯的、显然妨碍了他个性发展和才能发挥的性格中，当时就有人看出并且预言，杀害他父亲的凶手们把这个小儿子的生气完全扼杀了；他们是犯了双重的谋杀罪呀。这个年轻人渐渐地萎靡不振。他没有力量承当落在他家父头上的如此巨大的罪名，更没有力量去复仇。他，一个小小的哈姆雷特，在命运加给他的重担下，一步一步地走向毁灭，连一时一刻的重新振作和复元也不可能了。这就构成了一出不流血的悲剧。不流血的悲剧甚至比流血的悲剧更动人心弦。他终于成了这出悲剧的牺牲品。

今天，当德国象一具活体解剖的野兽那样让那些腐败的政客和想入非非的低能儿任意实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回想到过去的国家中那些权势者们是如何剥

夺公民权和进行迫害的。过去的国家看来要比“未来的国家”^①危险一千倍。今天我们加倍地感到有必要和有责任，来提醒人们记住那些宗教家长式统治所留下的卑劣的罪行。

当我还在柏林逗留期间，我的一些伙伴已经参加了一个移民团体。这些人打算在第二年——1847年离开德国。这样，我就再次（可以说是无意中）找到了一条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环境的出路。这种摆脱未必就是逃避吧？如果在欧洲有我发挥作用的场所，难道我就不能再回到欧洲来吗？我只是要有所作为，而且必须有所作为。一看到统治的现状，我就热血沸腾。如果一旦有了我可以发挥作用的机会（我毫不怀疑，这样的机会是会来的）或者有实现我理想的更好时机的时候，难道我就不能从那新的世界赶回到旧的世界来吗？而且，在本国的鸟笼里，我的翅膀已经僵化；在伤人元气的愤怒中，我的精力已经耗尽。如果我能在自由的空气中锻炼得更加坚强，变得更加朝气蓬勃，到那时，不是可以再回来吗？来来去去完全可以由自己作主。这样，我先前对出国的畏惧感便日趋减少了。一年半

^① “未来的国家”(Zukunftstaat)是资产阶级用来指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使用这个名称含有挑衅的意味。1893年2月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其他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们在一次由资产阶级议员们挑起的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辩论中，阐述了社会主义未来国家的原则。

以后，即 1847 年秋天，我终于决定，如果国内情况得不到改变，或者根本看不到会有什么改变能使我留下来的时候，便远涉重洋到海外去。当然，在思想上我还是保留了归来的打算。

我对这段情节的描述，比我原先想要说的长了一些。但是，我在这里讲到的并不是我个人的个别情绪和思想矛盾，而是当时德国那些活跃的、富有进取心的青年所普遍存在的情绪和思想矛盾。当时德国的青年正处在这样一个转折时期，起初他们厌倦欧洲的生活，但是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可厌生活的本质及其产生的根源；后来都普遍认识到，只有与本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根绝产生“厌恶欧洲”的原因。

出国的风气越来越普遍，而且如我前面所说，在我们黑森大公国尤为盛行，甚至波及最上层的社会。比如几年以前，便有一个贵族团体，想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一个贵族的乐园。这项计划曾付诸实行。起初，从得克萨斯传来十分动人的报告，说一切进行得极为顺利。为了纪念领导这一事业的佐尔姆斯—布劳恩费尔斯侯爵，将在得克萨斯建立一个新的布劳恩费尔斯城堡。可是不久发现，贵族先生们并不愿意劳动；同时，那些本来应该为这些贵族先生们干活的子臣——市民和农人们，也没有兴趣去建设一个贵族的乐园，于

是产生了纠纷。最后，这块殖民地便告吹了。今天，打着“殖民政策”的招牌而仍旧梦想着在海外建立贵族乐园的容克先生们（由于他们觉察到本国“旧世界”的黄金时代正在结束）似乎完全忘记了那次以及后来相继建设起来的许多贵族殖民地惨遭失败的命运。这种只有贵族先生和豪门望族中的人能够理解的容克理想，除了容克阶层自己的人以外，谁都不会对它感兴趣。特别是离开了祖国的德国人，更不愿意和这种“贵族理想”有任何瓜葛。因为他们远离祖国，就是为了摆脱容克的统治和各种各样的压迫。谁也不愿意在幸免桎梏而获海外的自由之后，重新给自己的脖子套上轭头，去受容克和警察的奴役。如若真是这样，人们不禁要失声嘲笑，他是否迂腐得象唐·吉珂德一样。可是在容克贵族中，却有不少人对这个道理是莫名其妙的。他们的头脑中总是幻想着他们所谓的世界政策，即依靠从祖国移居出去的德国人来建立一个“德意志世界王国”。这种狂妄的想法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清一个健康人的头脑极容易理解的最简单的事实。

在我作出有保留地移居国外这个决定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准备。同去的伙伴们把目的地确定为威斯康星州。当时那里人口还很稀少，而气候、土壤、交通等条件，对我们来说，无疑是最适宜的。所有的参加者都可能为自己购买到土地和其他必要的设备。我们要成



立一种农业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原则上不废除私有财产，只是应当保证我们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同时我们也很聪明，绝不受他人先例的束缚，因为罗伯特·欧文的共产主义殖民地的失败，我们都是了解的。此外，我还坚持保留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退出和返回故乡的权利。

由于我们所要去的是未开垦的边缘地区（今天已经没有这种地区了），所以我们必须艰苦创业，善于干各种活，甚至最艰苦的活。为此，我们必须增强自己的体魄，造就吃苦耐劳的能力，学会干各种杂活。在这以前，我除了走路、跑步、滑冰和击剑之外，从未进行过其他运动，于是我就积极地学习游泳和射击。我还兴致勃勃地练习以前觉得是单调乏味的体操。一句话，我按部就班地锻炼我的体魄。这对我以后的生活（尽管它并不是象我事先预想的那种方式）是很有好处的。但是，这还不够。到美国那边去的最初的劳动，将是伐树和盖一排排的木房，这就必须能够和斧子打交道。本来我对这种农村的活儿并不是完全陌生的。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在一个住在附近的细木匠那里使过刨子，锯过料，投过榫头；而当我上中学和大学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愿意为自己家里或者替有交情的人家干点木工活了。因此，我在使用工具方面并不完全是个生手，只是要盖木房，我的本领还不够。



于是，我决定和一个未来的旅伴一起，到一个木匠师傅那里去学手艺。这时碰巧有一个好机会：那座拱形的兰河桥象一个驼背似的，早已成了人们讨厌的交通障碍。经过十年的深思熟虑之后才终于决定另建一座平桥。桥的工程已进行了好些时日。为了桥拱需要有一个木架（今天也许已采用别的建筑方法），用来支撑拱门直到全桥竣工。构搭木架的任务，有一部分委托给了当市政参事的木匠师傅巴尔塔扎尔·赫伯特。他不仅和我们家里人而且和我本人也非常熟悉，于是我去求他的情。他立刻对我和我的同伴愿意在他的木工场上自愿帮工表示非常满意。他把我们交给一个“木匠伙计”约翰奈斯·罗姆；这位罗姆还带着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儿子小约翰奈斯·罗姆一起干活。小罗姆对我们也非常认真地尽他的责任。我们每天除了干六小时正活外，还要和其他学徒一样干许多别的杂活。这样，我们在经过一个半月之后，就能提升到“伙计”一级。自然，为这种事情还得奉送一台小小的酒宴才行。我做木工活是相当卖力、相当刻苦的，所以我曾多次被那位正直的市政参事当作其他“伙计”的表率。

我的学艺生活只是在八月份里，由于某种缘故而中断过几天。这是由于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总算不应当有的行为而引起的。关于这件事，在我那位对现代史极感兴趣的六十年代的朋友鲁道夫·芬特的自传中有



详细的描述。我们大学生和大学评议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次冲突本来完全是非政治性的，可是警察当局从中起了作用，使它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我们进行集会和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在这方面，那个以后变得非常驯服的大学生韦尔凯尔尤其锋芒毕露。他是那位在巴登深孚众望的吉森人韦尔凯尔*的侄儿。由于这种亲戚关系，当时我们几乎把他看作是一位高贵的人物。当局不愿让步。他们威胁说，要把附近的布茨巴赫的骑兵团请来。对此我们哈哈大笑。当这种威胁即将变成严重事端的时候，出乎这些教授先生们和“市侩们”意料之外的是，我们竟庄严地撤出城去，登上了“神圣的山”，即座落在吉森和马尔堡之间那美丽幽静的兰河峡谷边上的风景如画的施陶芬山上。这就是那次著名的、在当时的许多绘画、散文和诗歌中备受颂扬的“到施陶芬山上去的撤退”。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是8月7日的事。这个日期是记在我的一张照片上的，但是我已记不清这是那次上山的出发日期呢，还是我们大学生乘兴聚餐时拍照的日期。总之是8月里的一天，当轻骑兵（“Chevauxlegers”）从这一端的城门进来的时候，我们正好从另一端的城门出去。那天天气十分好。好心肠的吉森

* 即卡尔·泰奥多尔·韦尔凯尔，见本书人名索引。



的市民们(现在我们才发现他们是多么喜欢我们)给我们各种好吃的食物。啤酒多得流成河。这是为期三天的愉快的大学生罢课以来唯一的一次畅饮通宵的聚餐会。它给每一个参加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回忆。大自然如此瑰丽。眺望远方,映入眼帘的是富有浪漫气息的古代遗迹,它们简直能和鲁德尔斯堡媲美。青年们虽然胆大妄为,但要知道,他们是在为一种权利而斗争,因而一切也就显得无可指责了。

这时候,我已不再腼腆羞怯,甚至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演说家。我听到同学们发出简短而又非常坚决的誓言:绝不谈判。不论情况如何变化,我们的条件未得到全部满足,便绝不回城。而评议会方面,则有鉴于市民们迫切的愿望,已在悄悄地进行试探。

大家都宣了誓,并且在一张表达我们决心的文件上签了字(这份文件也可在芬特的遗著中找到,它是影印而作为该书插页的)。此时,评议员先生们内心可感到不安了。他们要求我们派一个代表团去,向最高评议会陈述我们的愿望。代表团选出来了。我们快要到达吉森的时候,就受到男女市民们殷勤的接待。他们陪同我们来到大学的楼房前,恳切地请求我们考虑,让吉森城不久就能重新得到她自己的大学生。他们还特别提醒我,说我本来就是“这个城市的孩子”。这些都是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我在内心赞美我的吉森”。它



固然不是个小巴黎，但它终归是吉森。每当我远离斗争的尘烟，孑身于安谧与闲暇中时，我就想起我的可爱的吉森，想起她那秀丽的景色；在她幽静的四周，从我童年时代起，我从未踩到过一块石头。——我说的安谧与闲暇，不是指那种监狱中的寂静和空闲，然而直到如今，我也只有到了监狱中才有闲暇独身自省，回味往事。

在评议会前，事情进行得并不象事先策划的那样顺利。一个大学生（不是吉森人），在严厉的、用非常严肃的目光望着我们的全体评议员面前，简短地陈述了我们的愿望。尊贵的校长先生的回答也同样简短而且生硬：“只要大学生们还坚持对抗立场，就说不上谈判。你们可以告诉你们的同学先生们，先于一切的条件是你们必须回到大学里来。那时候，随时准备宽大为怀的评议会才有可能满足你们合理的愿望。”听到他这番话，我全身的血液顿时涌到脑袋上来。可是我们那位发言人却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于是我走上前去，竭力克制住激动。我说，评议会把事理完全颠倒了。它没有权利向我们提什么条件，而只能接受或者拒绝我们的条件。

评议员先生们面面相觑。校长用很不友好的目光打量着我，毫不客气地告诉我们可以走了。后来，我为这一被认为过火的行为而受到了责备，虽然我当时仅

仅是表达了我们在“神圣的山”上大家都表示过的决心。一个天才的漫画家(不过他是一名神学系的学生,而且以后也选错了自己的职业,当了一辈子乡村牧师。他叫“普罗伊斯欣的天才”。人们就是这么称呼他的,在大约十年前的《法兰克福报》的一则讣告上还这样称呼他。)曾经作画描绘了那次撤离和这次谈判的场面。他把我画成一个古罗马判官的役吏,手持执法的刀斧,向惊恐万状的评议员先生们的身上砍去。

也许我的那种非外交的(大约也是非议会式的)举动所造成的后果并不怎么坏吧,实际上评议会把一中队的轻骑兵撤出城去了。这等于是向我们作了全面让步(当然还有一些附加条件)。这样,我们就作为胜利者,雄赳赳地回到了欢欣鼓舞而隆重迎接我们的城市。正当我们的队伍通过街道的时候,我的一位老师对我说:“可是小威廉,你也实在没有必要那么粗鲁!”这位老师是非常喜欢我的。甚至在三十年以后,当我早已长大并且已成为一个“叛国犯”的时候,他还用亲昵的“你”来称呼我。至于他为什么要叫我小威廉,这也是很容易明白的。因为,我在文科中学(在我们吉森干脆就叫班级;我十五岁就离开那里了)的时候,身体发育很慢,个子相当矮小。当时我长得象一个小孩,因而常常遭到许多嘲笑和揶揄。人们常说:身体不长,智力早熟;也就是不长个儿,尽长心眼的意思。我就正是如



此。我虽然智力早熟，但所付出的代价是不长身体；我是在大多数人已停止长高的年龄才开始长高的。

我们这一次“撤离”，从序幕到尾声一共是八天。除了这八天之外，我每天都到市政参事赫伯特的木工场上去干活，直至学期与秋假结束。

这以后，我没有再留在吉森。因为对于这次“撤离”虽然答应不加追究，但是不少带头积极活动的人都得到了暗示：他们最好到别的大学去继续他们的学业。我本人也在背地里得到了类似的劝告，它实质上就是官方的强令退学，不过婉转体面一些罢了。我准备离开吉森，前往离我们这里有五小时路程的马尔堡。那个城市和那里的大学，从我童年时代起我就非常熟悉。从那里我还能够和吉森的朋友们保持最密切的个人联系。在我离开之前，我还是去当完了木工艺徒，并且正式成为一个“伙计”——只是我没有成为一个“师傅”。我得到了一张正式的有法律效用的证明，证明我通过勤奋的学习，熟练而有成效地掌握了高尚的木匠手艺。同时也没有缺少传统的仪式：行会举行了一次丰盛的宴会，按照行会的规矩畅饮一番。这样我从1846年秋天起，就已经是一个合格的“Genosse”〔同行〕。这个词在低地德语和汉撒德语中变了音，成了“Genote”；然后在大学生圈子里流行的德语中被故意糟蹋成“Knote”，意思是“粗卑之人”，于是我就成了“粗卑之人”。对



此我并不介意，因为从本来的意义上讲，我就是个“粗卑之人”。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无损于我的路德派的农民的本性。

二十八年以后，我在吉森附近的维泽克(Wieseck)为竞选国会议员发表了竞选演说。这是一篇社会主义的演说。正当我站在讲台上时，我突然听到一个人的声音：“啊！原来是你呀！”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男子挤过惊讶的人群，走到我的跟前，神色显得有点尴尬。“您认识我吗？我是约翰奈斯。”“啊，我不认识您了！”“可是我还认识您。您还记得您想到美国去而学木匠手艺的事吗？是我和父亲一起教您的！我父亲现在已经去世了。”

回忆犹如生命，经过几十年的干涸，它们枯死了；一旦给它们加上一滴清水，它们就又重新生机勃勃地活跃起来。我和家乡已经完全隔绝了二三十年。在这期间，我一直奔波劳碌，忙于为生存和其他各种事情而斗争。对我的家乡，我已经忘却了许多；那田园诗般的木工场也淡忘了。现在，一切又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

“啊，原来是您呀，约翰奈斯！”我从讲台上跳下来，紧握着高兴地欢笑着的约翰奈斯的肥大的双手。他就是我在木工场上两位师傅中年轻的一位——小约翰奈斯·罗姆。

我们热烈地庆祝这一次会晤。这次会晤也给我带



来数目可观的选票。两位约翰奈斯曾经是热情的党员同志。我说“曾经是”，是因为小约翰奈斯今天也不在人世了。朋友奥尔别希从吉森写信给我说，十二年前的1886年，他不幸淹死在兰河中。我不会忘记你们这两位善良的约翰奈斯！

再说到我自己，我很快就离开了吉森。1847年深夜，我在经过了暴风骤雨般的两学期和一系列涉及政治的冒险事件之后，就要踏上远涉重洋的旅途。或者说得确切一些，我要踏上前往鹿特丹*的旅途。可是，实际上我只是到了美因兹**。我没有前往美国，而是到了正在酝酿着分裂主义同盟战争的瑞士。1848年2月，也就是刚好五十年以前，我从瑞士到了巴黎，并在巴黎参加了海尔维格的外国人军团。这以后又到了瑞士，接着到了巴登，然后是进了监狱，如此等等。

原载《新德意志评论——自由论坛》(Neue Deutsche Rundschau—Freie Bühne)，第9年度，1898年第1—2季度，第396—406页。

* 鹿特丹(Rotterdam)，荷兰南部的城市。

** 美因兹(Mainz)，德国黑森的城市。



青年时代

我曾在一期《新德意志评论》中说明了我在1846年是如何打算去美国和学会做木匠的*。在1899年的《世界新历画报》中我又叙述了我在1849—1850年流亡时期的生活片断^①。今天我打算补充一下在这两篇回忆录之间所空缺的一段时间的内容。

不过在这之前，我还要先解释一下我在去年《世界新历画报》中那篇文章所引起的误会。那是关于莫里茨·哈特曼的一段话。我说有人把我“告密”，而他的“告密”又和穆尔腾那次瑞士联邦委员会的突然袭击行动有关^②。“告密”这个词触动了那位哈特曼的深受我尊敬的儿子。他感到很不舒服，觉得受到了侮辱。他写信给我说，他那位早已去世的父亲不可能干那种告密的事情，因此请求我要末收回这句话，要末拿出充分的证据。我立刻给哈特曼博士写了回信。我说我完全

* 见本书《我的学艺生活》。

^{①②} 见本书《公元1849年瑞士流亡生活纪实》。



没有想到要责难他的父亲，也没有任何要毁坏他名誉的打算，并且答应我将在以后出版的《前进报》上和《世界新历画报》中进行澄清。我已经在《前进报》上作过说明了，今天我再在这里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我曾经和国会议员哈特曼有过尖锐的斗争，而我在《公元1849年》那篇引起争议的文章中所说的话也没有什么可更改的。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我会相信哈特曼有告密的意图。

事实是：莫里茨·哈特曼和卡尔·福格特交情甚密，而卡尔·福格特却对我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憎恨。我确实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卡尔·福格特，虽然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城市。正如我清楚地知道的那样，卡尔·福格特曾在伯尔尼向瑞士联邦委员会的委员们（他和这些委员们也是很熟悉的）说我是最危险的人物，会干出最坏的事情，甚至说我将会危及瑞士的中立。当时莫里茨·哈特曼就深受福格特这种告密性煽动的影响。那时候莫里茨·哈特曼还根本不认识我，所以他也完全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朋友的话。至于我和福格特，十一年以后，即在1859年奥地利—意大利战争期间，我们就公开斗争了[●]。福格特到处散布对我的荒唐而卑鄙的诽谤。他甚至在我被逐出

● 请参看卡尔·马克思写的《福格特先生》一书。



瑞士之后，还无耻地把我说成是普鲁士政府和奥地利政府的 agent provocateur〔暗探〕。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家中唠叨这种无稽之谈。因为当时他的儿子正在替他写法文版传记（在巴黎出版），于是他就把关于我的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合盘托出，说我在瑞士期间是领取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津贴的；当俾斯麦上台之后，我又成了奥地利和韦尔芬王室的雇佣兵；最后又说我为一个社会主义的鼓动者是为了自己经营大笔的生意，证据是我在莱比锡附近的包尔斯多夫购置了大量地产和豪华的别墅；说我除了各种住宅（大约在柏林）之外，直到现在还拥有那所别墅^①。我的天哪！如果福格特先生说的都不是假话，如果这些宅邸和别墅不是在西班牙或者在月球上，那我真是万幸极了！但是正如谚语说得好：谁要是自己没有干过，他也决不会付度别人会干。可笑的是这位帝国五人临时摄政之一的大丈夫，一方面信口开河地说我从政府领取津贴，另一方面自己则投靠到皇帝兼无赖——拿破仑第三那里，接受他的所谓“对科学有贡献的奖金”；拿破仑被推翻之后，在法国旧日的丢勒里皇宫里那些“求施舍的爱国者”的文件中，找到了福格特亲自签字的收据。证据是那样确凿，以致也许再也不会有人在背后指责我在《公元1849

^① 1880年，李卜克内西由于所谓“小戒严”的理由被逐出莱比锡，曾避居到莱比锡附近的包尔斯多夫(Borsdorf)。



年》那篇回忆录中冤屈了福格特先生。至于这种罪有应得的鞭挞竟触及到另一个人身上（至少看上去是这样），而这个人本来是不应受到这种鞭笞的（而且原来也没有想到要对他进行攻击），因此这件事使我深感不安。但愿我在这里能把这件事了结。

再说到我在包尔斯多夫的那所“别墅”吧！天哪，也许有一天我得写一篇关于那所住宅的故事吧。当我去到那里的时候，那是一座荒芜破落的废宅。这座废宅曾是一个爱情遭到不幸因而心已破碎了的女人的坟墓。她的故事是如此的富有浪漫气息，象中世纪的传奇一样，以致我有时候情不自禁地想到：但愿能到一个远离尘世的天涯海角去，而不愿在小巴黎（吉森），在这个有反社会党人法令、有小戒严的俾斯麦帝国的人世间逗留两小时。这位不幸的女房主和建房人跟十分之九的“自由建房人”一样，成了负债的奴隶和当铺的俘虏。当我在德累斯登出席邦议会的时候，她真的在她的唯一产业——那所房屋中饿死了。有一天早晨，人们发现她死在一摊败絮破布里——这就是她的“床”。在她因抽搐而紧缩的右手中，还牢牢地握着一枚一芬尼的银币。她拿着这一点盘缠走向世界的彼岸——天堂。后来，用一种远古时代不信神的仪式（既不是基督教的，也不是所谓文明的仪式）把她埋葬了。我曾经帮忙埋葬这位不幸的女人。然而，当她做着回忆



青年时代的浪漫主义的美梦的时候，她却又是很幸福的。对她来说，生命的结束也就是痛苦的结束。不！她可以说并未遭受什么痛苦。在她最穷困潦倒的时刻，她的内心精神还一直停留在充满着美好憧憬的过去；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她从未放弃过希望。因为除了右手紧握着一芬尼钱币之外，她抽搐的左手还捏着一张彩票。因此，如果说这个最贫穷的女人确实确实是饿死的话，那末不是因为曾经赤贫如洗，而是因为被赌鬼夺去了最后一文钱。在她年轻时曾因中了一次彩而获得一笔可观的奖金之后，她就赌博成瘾。至于说到我那幢在包尔斯多夫的奇迹般的“别墅”，幸亏它还没有完全倒塌，只不过最近以来它更“漂亮体面”罢了。因此，友好的男女读者们如果有兴趣，不妨亲自去看看。莱比锡的利平斯基同志曾自行出版过一本书：《莱比锡地区工人导游指南》，这本书也会提供许多有趣的情节，因而不必因为它是为工人写的导游指南而羞于阅读。

现在言归正传。

我二十岁的时候已经“厌恶欧洲”。那次到施陶芬山（那座名为神圣山的施陶芬山其实并不神圣）去的“撤离”使我在故乡城市吉森难以立足。尽管我嫌恶外交家和部长们，我还是采用了外交权术：与其让人赶走，不如自愿出走。1846年秋天，我前往马尔堡。从我



童年时代起，我就一直向往那所可爱的非常熟悉的吉森大学的姐妹学校——马尔堡大学。

象所有决心离开故土、誓与以往整个生活决裂而远走高飞的人一样，这时候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完全是一种苦中作乐、强颜为笑的心情，即所谓绞刑架前的幽默。当一个穷鬼正要升入西天，或者当一个病人正要动一次严重的外科手术的时候，就是这种心情。对我来说，是否也要动一次更大的外科手术呢？移居到国外去，难道不是在我们内心深处动的一次最大的外科手术吗？这正象移植一棵树木要牵动千万条根须那样，移居到国外岂不好比动一次大手术要牵动我们心灵深处千万条神经吗？

我在马尔堡大学注了册。开始的时候还十分勤奋地学习，但是一想到我在德国将无所作为、前途暗淡的时候，我就无心系统地学下去了。不久，我也就不再为一定的实际目标去学，而只是为了自己增加知识而学。以后我到了柏林，成为一个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我愈来愈热心于研究社会与政治问题。

今天的人已不太容易想象得出当时青年们中间那种激动兴奋的情绪。今天的“大学生们”几乎都出自这样的家庭——他们在家里听到的和在学校里听到的一样：德国是世界上最自由、最伟大、最光荣的国家；德国人是一切人类中最有教养、最公正、最忠实、最勇敢的



人；德国的侯爵们和政治家们是一切侯爵和政治家中最有智慧、最聪明和最优秀的。这些青年中的大多数，在大学里被戴上了遮眼罩（此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得参加兵营中的民兵训练），在家里还戴的更仔细。给戴上遮眼罩还只是最简单的办法呢。而他们的头脑和心目中又是怎样想的呢？一切真理和男子气概都被有计划地赶跑了，一切道德观念都让人颠倒了。极其荒唐的无耻诽谤和不伦不类的美化，代替了真实的历史和现实政治状况的真象。到处是歌斯底里的拜占庭式的卑躬屈膝*，其无以复加的程度，使古代拜占庭中最奴颜婢膝的朝臣也要为之深叹望尘莫及。最下流的阿谀奉承竟被当作国民精神和真正男子汉的高尚的行为；甚至诬陷告密也被视作公民的道德。于是，那些出身于高尚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子弟，一旦发现在自己的家庭中有和统治阶级奴性十足的“荣誉法典”不相一致的地方，就向检察当局去告发，而且还认为这是军官和大学生的职责。

呸！

这种铁血统治的痕迹刚刚在不久前才从表面上清除掉。但是俾斯麦时代的那种道德堕落、伤风败俗；那

* 此处原文是 Byzantinismus, (拜占庭主义)，这是指古代拜占庭朝廷上，臣下对君主爬行以表示尊敬的礼仪；引伸为巨服、卑屈、谄媚。



种通过在学校里大肆采用狡猾诡谲的手段，对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所造成的精神和心灵上的创伤，即便在它们的表面痕迹最终消失之后，也还要在民族的机体中存在几十年。如果不是我们的工人阶级从本能的直觉和痛苦的经历中认识到不能轻易相信来自上面的一切，从而保存着健康的机体的话，那末要排除这些毒素便根本无从设想。我决不是一个 *laudator temporis acti*〔旧时代的歌颂者〕，决不是一个颂古非今的人。恐怕再也没有人能比我更有理由为今日的现状感到高兴，因为我满意地看到德国工人阶级为了德国的尊严、为了更高的荣誉已经做了和每时每刻都正在做着的一切。然而今天的资产阶级世界，事实上却比半个世纪以前更为腐败堕落，更为卑鄙无耻。当然，用不着怀疑，这种表面看来的退步，实际是历史上的进步。但是，事实毕竟如此，而且没有一个地方能比我们今天大学里那样表现得更为一清二楚。今天的青年大学生中，大多数都很“世故”，“讲究实惠”而一心为自己钻营。他们不屑于有什么理想，过着放荡的、醉生梦死的生活。

可是在1848年以前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当时的市民阶级还没有完全堕落到资本主义。各公国的市民阶级憎恨和藐视德意志同盟帝国和本公国的政府，特别是普鲁士政府和奥地利政府。当时大学里的青年大

部分来自这样的市民阶级，因而本能地“对国家和政府采取敌对的态度”。

不久，我在马尔堡找到了一群意气相投的同伴。其中我特别要提到大学生富尔曼（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是从卡塞尔*来的）。我以青年人的热情，毫无嫉妒地把富尔曼视作一位天才，而事实上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脑子特别聪明，善于雄辩，谈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反应敏捷，对答如流。我们不知辩论过多少次呢！我记得我们有一次舌战了一通宵，简直不感到疲倦，也不觉得枯燥。第二天又接着一直辩论到深夜，几乎到了第三天的凌晨。

可惜不幸的富尔曼应验了这样一句话：天才与狂人只有一线之隔。后来他精神失常，在疯人院里结束了残生。每当我听到尼采关于悲苦命定的说教时，我就不禁想起富尔曼。

那时我们争论些什么呢？我们争论天上地下的各种各样问题。说也奇怪，我当时常常考虑天堂的问题，恰恰就是没有考虑我自己的处境。虽然施特劳斯、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在我们的舌战中还占据重要的地位，可是我们首先争论的是我们正在热心研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 卡塞尔(Kassel)，德国黑森—拿骚的首府。



除了思想活跃之外，我还热衷于各种实际活动。这也是那种太严格的教育跟青年人的爱好相距太远的必然结果。于是我陷入了最放浪不羁的大学生的纵乐生活之中。老实说，没有哪样行乐的事情我不会。但是我从未在漩涡中淹死，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好的游泳能手（我这样说，既是借喻，也是实情）。同时我也一刻不忘必须锻炼自己的身体。虽然我也在大学生的酒馆里消磨过许许多多光阴，但是从未因此耽误过各种体育锻炼。我做体操，跑步，抡槌，打铁（我在一个制枪铁匠那里干得特别出力），通过打靶和行猎练习射击。为了不使读者对我的打猎情景产生错误的想象，我想随即说明，在马尔堡有一种专门的大学生打猎（也许至今还有）。凡是能够搞到一张打猎证的大学生都有权利去尽兴打猎。这种权利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其结果是凡能打到的野味——从小鹿到鹌鹑，都令人十分惊奇地、无一例外地远远躲离了狩猎区；或者当它们离打猎的大学生和猎枪约莫几百步之遥，就小心翼翼地、惊慌地逃走了。这样一来，对在邻近的属于选帝侯的狩猎区就愈来愈有利了。在他的专有狩猎区里，到处都是野兔、小鹿，有时候甚至还会出现一头从丛林那边过来的牡鹿。但是如果有人胆敢闯进选帝侯的狩猎区去，那是要受到惩罚的。有一天下午，我为了去冒犯这种惩罚，有过这样一段遭遇：一个很不礼貌的看林人直



接就朝我打来一枪。大粒的打鹿霰弹从我耳边擦过。倘若我没有立刻滚到白雪覆盖的凹沟里去，我的性命差一点就被他报销了。我没有死，这对他和我说都是运气。由于我滚到了雪沟里，猎枪上到处塞满白雪，当时也就无法使用了。

如果我不去打猎，那末我几乎每天都在打靶场上。这时候，我的忠实的同伴，一个名叫沙佩尔的拿骚大学生，也一定在场。他是我所属的黑森—拿骚同学会的一员，也就是那位我后来在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会见过的著名的共产主义者沙佩尔的侄子。这个大学生从任何方面讲，都是一位怪异之人。他给自己提出了人生的（至少是他大学生活中的）三大目标：第一，不接触任何科学书籍；第二，在饮酒方面要创最高纪录（诚然这个词在当时还没有被英国人抄袭过去）；第三，要成为一名象“射手奥托”一样的射手（诗人哥德弗利德·金克尔曾歌颂过射手奥托*）。《射手奥托》是我看他读过的唯一的一本书。他对射手奥托钦慕到如此狂热的程度，以致他在1848年之所以成了一个虔诚的共和主义者，仅仅是因为《射手奥托》的作者也是一个共和主义者的缘故。这位“大叔”（这是他的绰号）如果不在酒馆里消磨时光，那末就会出现在打靶场上

* 哥德弗利德·约翰·金克尔(Gottfried Johann Kinkel), 诗人。叙事诗《射手奥托》发表于1846年。



或者在制枪铁匠的作坊里。他和制枪铁匠关系友好，曾把我带到那位制枪铁匠那里去，让我领教领教制造猎枪的高超技艺的诀窍，或者看他自己显显本领。因为他也同那个最杰出的制枪铁匠一样，懂得如何制作枪杆和枪膛。这时候我的射击技术已经达到相当熟练的程度，因此开始希望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大草原和原始森林里成为一个不太坏的皮裹腿的战士^①。

由于打算到美洲的未开垦地区去，我有计划地锻炼自己。那时正值冬季，不可能想到练习游泳，我就利用空闲时间进行长距离的行路和跑步。我尽可能地结伴同行，这样我们就能象亚里斯多德的逍遥学派那样谈论哲学和进行辩论，这要比坐在斗室的空气里更使我高兴。我从来就不喜欢学生房间里的空气。我想，我之所以非常健康，应该归功于这种厌恶。我的朋友们常常嫉妒我的健康的身体。我从来不能够在窗户密闭的房间里呆一会儿。每当我晚上在大学生们的酒馆里坐了很长时间需要离开的时候，我从不立刻回家（我说从

^① 这是指北美作家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的故事集《皮裹腿故事集》中的主人公。

*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出生于地主家庭，曾在英国海军服役。代表作品《皮裹腿故事集》包括五部长篇小说：《先驱》、《最后一个莫希干人》、《草原》、《拓荒者》、《杀鹿的人》，主要反映美国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残酷屠杀和印第安人的反抗，揭露资本主义“文明”的实质，赞美印第安人的英勇淳朴。

不立刻回家，这是极而言之，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并不就是如此），而是还要跑步。如果天气许可，我就跑出城去，穿过森林和田野，跑上几个钟头，直至残留在胸中的酒馆里的污浊空气从肺部完全呼出。然后我才开始回到我那间窗户朝向风景优美的“施皮格尔斯卢斯特”^①的“卧室”，睡得又死又香，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头脑清醒，胃口大开。我在当大学生的时候，从来不知酒后头痛的滋味是什么。也许在我有生之年，只要我始终遵循这一养身之道的良方，将永远不会感到这种酒醉头痛的。我借此机会也在这里向诸位推荐。

有时候朋友们也参加我的这种夜行军。当然，偶尔也会发生逾越常轨的放荡行为。例如有一次，那是一个昏暗的暴风雨的深夜，我们突然产生了恶作剧的想法，把所有悬挂在街上的式样已经老掉牙的路灯统统砸灭。这种恶作剧对我们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的玩耍，对路灯来说则需要一种砸碎玻璃的技巧。我们的恶作剧招来了巡夜人和马尔堡大学校役们的联合追击。虽然我们损失了几顶帽子，我们还是顺利地逃跑了。可是我们一直被他们跟踪追击，并且把我们逼到一块非常不利的地势——兰河的河弯之间。那正是二月天气，河冰已经消融。这样，我们就面临着极不愉快的抉

^① 施皮格尔斯卢斯特(Spiegelslust)是马尔堡奥尔登山(Ortenberg)上的郊游胜地。

择：要末束手就擒，要末游过兰河去。我毫不犹豫地跳进冰冷的河水，游了过去。其他的人由于畏惧凛冽的河水而被抓住了。我冻得浑身哆嗦，只得来回奔跑。约莫跑了半小时之后，才绕了一个大圈子，从另一端的城门回到城里，顺利地到达了 my 住所。虽然我的同伴们不得不集体进入大学的悔过室去坐禁闭，而且还要给所破坏的损失付出可观的赔款，但是他们当然不会出卖我，所以我只是受到嫌疑，怀疑我是同谋犯。于是我被大学当局用怀疑的目光冷眼相看，并且受到严格的监视；何况大学当局本来就没有从吉森大学得到过美言我的报告。

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一次大学生的小小的历险，因为它是与其他绳索联结起来的一根绳索，这些绳索终于为我结成了一个罗网。

当时在黑森选帝侯国，精神上受着一种严厉的正统教会的统治，这一教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天赋很高的马尔维尔（他还是一部优秀德国文学史的编著者）。由于我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竭力表现我的无神论的观点，从而引起了马尔维尔对我的注意。在一个天气美好的礼拜天，他在教堂的宣讲台上慷慨陈词，大声痛骂无神论者和蛊惑民众者，同时也指到了我；虽然没有指出我的名字，但是所发表的言论清清楚楚地表明，无疑是指我。这是替我编织罗网的第二条绳索。

不久就发现了第三条绳索。这条绳索比前两条绳索更厉害，几乎用它一条就可以织成一个罗网。

现在我们就涉及到政治方面的事了。

黑森选帝侯国虽然经过了严重的宪法斗争，但是各种矛盾冲突尚未结束。黑森选帝侯国是属于德意志同盟帝国的国家之一。德意志同盟帝国在七月革命之后通过了一部宪法，而且它大概也是德国宪法中最自由最好的一部。正因为这部宪法是如此之好，所以选帝侯就有理由嫌恶它。于是发生了各种斗争。在斗争中，“宪法之父”聚尔韦斯特·约尔丹，一个出生于梯罗尔的人，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因此黑森政府和当权的选帝侯把全部仇恨都集中在他身上。于是，他以“蛊惑活动”而受到审查。1839年，那些蓄意迫害他的人认为时机已到，可以把他这位法典的制定人，与美国兹审查委员会^①捕风捉影捏造出来的“叛国罪”联系起来（我的表亲外祖父，不幸的魏迪希，就是被他们利用这种所谓的“叛国罪”杀害的）。于是，约尔丹被投进了监狱，然后在旷日持久的审理过程中，一直被拘留着。他被关在马尔堡城堡内某座内宫的一间斗室或者城堡的幽禁室里。这位深孚众望、受人敬爱的人（他是一位

^① 1833年德意志同盟国会在美因兹设立了中央审查委员会，旨在迫害各种进步势力。1838年该委员会发表了所有政治上受到嫌疑和需要进行政治迫害的人物的全部名单，也称为黑书。



法学和政治学教授，由于他的学识，声望极高，远近闻名，在黑森尤其著名，在马尔堡更几乎是家喻户晓）不得不在忧愁之中度过他的岁月。

约尔丹的遭遇（我不得不把他的遭遇和我的表亲外祖父的遭遇联系起来）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当我作为一个中学生和以后作为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我曾常常“远足”到马尔堡去。每逢这种时候，我就要步行到屹立着马尔堡城堡的山上，去寻找铁窗后面那位面色苍白的人，然而很难看到他；尽管他也偶尔深怀忧虑与渴望的神情瞭望窗外。可是有一次，他友善地向我点点头。他一定是从我的眼睛中看出，引诱我来看他的绝不是那种无聊的好奇心和浅薄的饱尝跟福的欲望。

每当我去过马尔堡并到过那座城堡之后，我回来的时候总是怀着巨大的激动。我对德国现状的憎恨在我内心愈埋愈深。

我永远不会忘记也不可能忘记的是1840年5月的一个礼拜天。我的马尔堡的朋友亨利希·毛斯（一位神学系的应考生，也是我在马尔堡寄宿的那位监护人的亲戚）从马尔堡来看我，并且带来丁格尔施戴特的一首诗。丁格尔施戴特是出生在马尔堡附近一个乡村里的黑森人。他的名字在当年红极一时。这首诗是印在一张对折的封面纸上（弗莱里格拉特在他的《桦树



旁的战斗》一诗中，曾把这种封面纸称为是不朽的)。当毛斯朗读了这首诗的最初几行之后，我把这首诗从他手中夺过来。我开始自己朗读。诗中的每一个字更加燃起了我内心的怒火。以致到了最后，我简直是在向同桌进餐的人们大声朗诵了。我几乎要被那种激情窒息而死。这首诗的开头几行直到今天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在经过了五十八年之后要想重新获得这首诗的全文显然是很困难的。今天谁还知道有过这样一位自由诗人丁格尔施戴特——“一个世界主义的夜巡逻”^①呢？他虽然已经从一个世界主义的夜巡逻变成一个为政治服务的夜巡逻；他的“进步的长腿”随着岁月的流

① 引自亨利希·海涅 1844 年发表的一首诗《夜巡逻来到巴黎》（“Bei des Nachtwächters Ankunft in Paris”）

• 在海涅的《夜巡逻来到巴黎》一诗中，夜巡逻即指诗人弗朗茨·丁格尔施戴特（Franz Dingelstedt）。这是因为丁格尔施戴特自己曾在 1840 年发表了一首诗《一个世界主义的夜巡逻之歌》，所以海涅就这样称呼他。丁格尔施戴特是 1841 年冬作为一个报纸记者到了巴黎，而于同年 11 月与海涅相识的。海涅在《夜巡逻来到巴黎》一诗中的前四行是：

夜巡逻迈着进步的长腿，
你跑来了，这样地慌张！
我家里的亲人近来怎样，
祖国是否已经解放？

详见冯至译，《海涅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89—91 页。

逝已变成“落后的长腿”，但是他当年的那首诗却是十分优美动人的。那首诗现在我复述在下面，其中有一部分自然是出于我的手笔。

诗的题目是弗朗茨·丁格尔施戴特原来有的，《复活节的话》，他在诗中要求释放约尔丹。我在这里引用它开始的五节：

我伫立在鲜花与芬芳的海洋之中，
灰色宏伟的城堡高高矗立，守卫着菲力浦的
古城；
可爱的兰河欢笑着在我脚下蜿蜒，
从峡谷中向我投来五月的目光，凝视着我呀，
是她——那明媚的春天。

从艳阳的山脚下出现一群愉快的青年：
“春天不是来了吗？”——“春来了！”，
“春来了！”……游伴的同声回答在四处
回旋。

它象礼拜日教堂的钟声，引起人们内心
静静的怀缅；
它象一条新的绸带，将人们的心灵和那位
隔离的人紧紧相连。

突然，有一位朋友用轻轻的手指触动我的
双肩；

“在那铁窗后面，”他低声耳语，用内心无声的
手指指向远边；——

他那双大大的火热的眼睛，然而一张枯瘦、
苍白的脸，

正从那墙垣后面，朝下凝望美丽的人间。

苍天的主呀！——不要作响！切莫惊醒他的
梦幻！

也许他正在巡视翠绿的树林，

也许他正在眺望蓝色的山巅，看到了那条
通往故乡的土路；

也许他正嘲笑那些高耸的塔楼、垒垒石峦；

也许他在严冬冰川中看到了自由的田园！——

你认出他来了吗？——难道还需要辨认？！

哪个黑森人会不将他怀念？

我似乎看到他威严地坐在贵人的桌前，

当他愤怒地站起来时，声音似雷，目光如电，

他把权势与诡计岂不当作鞭笞，在他嘴边

一吹而散？……

丁格尔施戴特诞生在基尔希海姆附近的哈尔斯多夫村，离马尔堡约有两小时的路程。那是一个座落在玄武石岩山脊上的村庄。在它的最高点上，传教士温弗里德·博尼费修斯建立了阿默纳堡教堂，这是因为他想到了圣经上这样一句话：“我要在这块岩石上建起我的教堂。”这位“卡塞尔的诗人”（丁格尔施戴特在他的第一本诗集中这样自称）是在马尔堡上的中学和大学，从此他就迷恋上了这座“菲利浦的古城”。马尔堡确实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早在高尚忠勇和宽厚的菲利浦第一（他在两位忠实的宗教改革家的帮助下，成为一个合法的多妻丈夫）以前，它就已经出现在世界上。菲利浦第一出于对黑森国的热爱，不愿意和任何人，尤其是不愿和皇帝瓜分对黑森国的主权，因而早就打出了宗教改革的旗帜（我宁愿说它是一面背叛的旗帜）。他竟把那么多天生来就“大逆不道”的农民射死、刺死、绞死、砍死，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神圣的新教徒。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丁格尔施戴特还活在马尔堡的人们中间。到处都传诵他的奇奇怪怪的轶事，说他在生活中如何把白昼和黑夜颠倒（其实这在大学生中间并不少见！）；说他如何找出大学里一个最矮小的人来作为朋友，而他自己则有着两条高大的腿，俨然是个巨人。当我去上马尔堡大学的时候，他已经离开那里好几年了。不过在这之先，我常常到马尔堡大学去玩；

那时候，我曾见过他。他的那个象侏儒似的朋友总是陪伴着他，而他在他的朋友身旁简直是高大无比。由于他比他朋友高出那么多，并且瘦得象根竹竿，所以人们开玩笑，把他称为“一个垂直的破折号”。

丁格尔施戴特对马尔堡的全部的爱(话又说回来，凡是看到过兰河上这颗明珠的人，谁又不爱呢?)在这首诗中已跃然纸上。这首曾在1840年的春天使我心潮起伏、热情激荡的诗，到了1847年五月里美好的一天，又重新出现在我的眼前和脑海之中。又是那“鲜花和芬芳的海洋”的季节。在这花的海洋中，选帝侯的城堡犹如悬崖绝壁的小岛矗立在浪花四溅的银白色的波涛中。那位苍白的男子汉约尔丹的形象(他在城堡的高楼上只能仰望苍穹，忍受着坦塔拉斯的痛苦*而渴望了许多年之后，不久前被最高法院宣判无罪，离开了牢房)又出现在我眼前。在他身旁我又仿佛看到了鲜血淋漓的魏迪希的身影，看到了约尔丹的十六岁小女儿天使般的体态(她在约尔丹受牢房熬煎的忧伤日子里死于家乡**)。这时，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你

* 坦塔拉斯(Tantalus)是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因泄露天神的秘密被罚降下凡尘，投于湖中，渴而欲饮，则水忽退，饥而欲食，则悬于头上之果忽升，备受可望而不可即的痛苦。

① 弗莱里格拉特曾在他的一首优秀诗篇《灵魂》中讴歌了这个孩子的升天。这个孩子的灵魂在“上天”由席勒(Schiller)、佐伊梅(Seume)和舒巴尔特(Schubart)接受。他们三人都是暴君的牺牲品，尤其



必须干点什么；把你的感情吐露出去吧！对那些在内阁和国会的司法制度下牺牲的人，我们要加以颂扬；对那些刽子手们，我们一定要厉声谴责。

想到做到！我告诉了几个朋友；他们也赞同这个计划。有一天夜里，我们在十二点钟以前一起走到城堡上，在最靠近约尔丹曾经作为囚徒住过的地方隐蔽起来。当伊丽莎白教堂里的大钟刚打第一响的时候，我就爬到城堡上，尽我最大的声音高声呼喊。我用一

是佐伊梅更是黑森选帝侯国暴君的牺牲品。《灵魂》这首诗借佐伊梅口中说出的诗句结束：

先把我遣到遥远的海外，再把他投进狭窄的牢房，
都是这黑暗的君主王朝。
难道人们事先没有告诉你，
佐伊梅曾在新苏格兰站岗放哨？

他只盼望在他的坟墓上
不久丛生青绿的兰河之草。
你的父亲将坐在胡登身旁，
约尔丹的女儿呵，安息吧梅。

** 约翰·高特弗里德·佐伊梅(Johann Gottfried Seume, 1763—1810)，与席勒同时代的作家，一个贫穷的佃农的儿子。1781年到法国去，路过黑森，被黑森政府抓去当兵。1782年被卖给英国，以后到美洲作战，曾到过新苏格兰(加拿大领地)。1783年战争结束，回到祖国，又被普鲁士迫使服兵役，一直到1787年。死后出版《我的一生》，叙述了他被运往美洲的非人待遇。

些也许合适也许不甚合适的词句颂扬那些无辜的牺牲者，谴责刽子手们。当最后一记钟声的余音还在空中回荡时，我的这一场宣讲就已经结束了。毫无疑问，这仅仅是一次不伤害任何人的自己心声的表达而已。但是就在瓦尔特堡的节日里，即便有许多宣讲是完全不伤害人的，却也完全遭到悲剧性的结局。对我来说，这次宣讲的后果虽没有达到悲剧的程度，可也相当严重。不少人听到了我的声音，于是这件事就不胫而走，四处传开，象滚雪球似地愈滚愈大。在这期间，我已得到不少警告。有一天，一个善意的官员告诉我说，事态相当严重。于是我向他讲述了来龙去脉。这样，事情又倒平静了一会儿。

可是，那时候在马尔堡住着一个非常讨厌的人物。那是一个老军人，大家都说他是为卡塞尔政府干密探勾当的。此人在约尔丹案件中已经扮演过告密者的角色，现在他又想在我身上得到加官晋爵的机会。他向卡塞尔送了一份报告，说在马尔堡的大学生中有着一个秘密的政治团体，这个政治团体纵然不比当年耶拿和吉森的穿黑长袍的大学生更坏，那末也至少是一样坏；而我则是这些阴谋活动的发起人和中心人物。他撒下的种子恰恰落在适宜的土地上，于是他们决定对我动手。我从背地里知道了威胁我的一切，开始觉得很好笑，可是不久我终于确信我的自由受到了威胁。

Que faire?〔怎么办呢?〕

我在吉森的那些曾经打算结伴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州开发殖民地的朋友们早已动身走了。我考虑了种种出路。如果我不想被监禁，不想遭到象约尔丹那样的命运，那末我立刻动身到美国去不是更好吗？长期以来，我早就作了各种准备。现在我只需要去签订一张承包旅行的合同就行。由于我早就委托一位本地的经纪人去代办，所以我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就能把一切办妥。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我的那位早先已经警告过我的好朋友，就在我办旅行合同的那天晚上来看我。他态度严肃地对我说：“您必须在今天晚上立刻离开马尔堡。据我从最可靠方面获悉，您明天一早就要被拘留待审！”

我立刻下了决心。朋友毛斯要陪送我，也许一直送到美国，至少送到鹿特丹。他立即雇了一辆车，同我前往黑森—拿骚的大学生酒馆，向来自老家的同学们辞行。我简单地告诉那些同乡会的弟兄们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我想在远离以前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我在那里逗留了一会儿，这使得毛斯非常焦急。“再见吧，弟兄们！”“再见，老弟！”当我转身向门口走去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我们最爱唱的一首歌；这歌，我常常在同乡会的酒馆里，用充沛的感情然而错误的调门加以演唱。

祝君健康，再饮一杯美酒！
再见吧，弟兄们，人生终须一别！

我停住了脚步，和他们一起再唱一遍这首歌曲。当最后的余音消失之后，我们匆匆忙忙告别，然后走出门去，登上车辆，在黑夜之中驶向遥远遥远的世界。

我在车上浮想联翩。我内心感到惆怅悲戚。这时候我忽然想起，去年冬天我曾和朋友毛斯一起，去拜访过那位住在阿默纳堡的、在黑森国内广为人知的女算命。她身边蹲着一只黑牡猫。她打量了我好久，然后从她那里得到这样的启示：

“年轻的先生！您将有许多厄运。您会遇到许多不幸，而且要两次渡海。但是最后您会非常富有和幸福！”这个狡猾的女算命一定事先就知道我打算去美国，可是现在她的预言完全应验了。只是后来我渡海的次数远远超过两次，在这一点上她的预言是落空了。

我仿佛听到那个“女巫”口中念念有词的预言，中间又混杂着那首歌曲的声音：

祝君健康，再饮一杯美酒！

从那以后，我又两次重唱过这一首歌曲。第一次重唱这首歌，是十八年之后在柏林的格卢奈瓦尔德，在

施拉赫登湖的岸边。由于我不愿意出力把德国工人绑在普鲁士容克俾斯麦的战车上，同时我也不能容忍冯·施韦泽先生投靠冯·俾斯麦先生，我被逐出了柏林和普鲁士。第二天我就该动身了，可是我还想着自己找一个抛锚的地方。哪里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柏林印刷工人协会（我先前曾在该协会作过各种报告）的一些会员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一些朋友们要和我再相聚一次。他们之中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老盟员福格特，建筑师西格弗里德·迈耶尔（这两人后来在美国逝世已有许多年了），泰奥多尔·梅茨内（他是柏林全德工人联合会最早一批会员中今天还在世的少数人之一）和裁缝雷曼（他也已去世）等。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星期日，我们步行到格卢奈瓦尔德去，在施拉赫登湖（我还是第一次到那里）歇脚野餐。我们互相不停地交谈，时而高兴，时而放纵，时而悲哀，直至夜幕降临。天色告诉我们，该是终须一别的时候了！此时，我又向朋友们说了几句话，感谢他们诚挚的友情。我说，但愿在不远的将来我能再回来，和他们再相会。我的话一讲完，他们大家都和我紧紧握手。这时候，忽然有人领头唱了起来：

祝君健康，再饮一杯美酒！



于是大家一起合唱。那时候我又想起了前次在黑森—拿骚大学生酒馆里的那个夜晚。当年那首歌的歌声曾经把我引向不可预料的未来，我冒过险，革过命，进过牢房，被流放过。可是现在，当我回到了祖国之后，我又重新被驱逐，重新面临一个前途未卜的未来，就象十八年前一样。

第二次重唱那首歌，是在1890年。那时离格卢奈瓦尔德的那次饯行已有二十五年；离马尔堡的黑森—拿骚大学生酒馆里的那次饯行则有四十三年。自从我被逐出普鲁士以后，先在汉诺威的朋友施维舍尔那里休息了几周，同时察看形势，考虑到哪里去落脚为宜。察看的结果，我把目标放到三座城市上：莱比锡、（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和汉堡。我首先想到的是莱比锡，于是我动身到那里去。我在那里看了看就住下来了。一住就住了四分之一世纪（二十五年），其中我把由于“小戒严”而住在莱比锡附近的包尔斯多夫村庄里的八年也算在内。这四分之一世纪是一段动荡然而富有成果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做了许多工作，经历了许多事件：在工人教育协会里的讲课和学习，社会民主党的成立，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之间的斗争，敌对兄弟之间的妥协和统一，反社会党人法令的颁布，反社会党人法令的破产和俾斯麦的垮台，以及在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之后，有必要把总部迁到柏林。可是



对我来说，却很难跟随总部同去柏林。我在莱比锡有那么多事情缠身，需要我去处理。然而，服从党的利益是一个党员的最高准则。我妥协了。在莱比锡的朋友们的同意下，我决定前往柏林。我们互相道别。在我动身前往柏林的前一天，我们在科内维茨相聚。我们互相致辞。这时候的情况和二十五年前在柏林的格卢奈瓦尔德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了！当时，党还处于萌芽时期，只有很少几个为后来人铺平道路的先驱者。而现在，党已是一个胜利的党，它在全德国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在反社会党人法令的十二年时间内，党经受了考验和锻炼；虽然不少人被剥夺了公民权，连话都不让他们讲，但是他们要比那些迫害他们的人强大得多。党战胜了那些当政者和有权势的人。但是尽管形势是如此有利，我们的处境是如此之好，展望未来是如此光明，我们在科内维茨的那天晚上的谈话却一点都不热烈。气氛是压抑的。想到一起共事了二十五年，肩并肩地共同战斗过来，共同经历了艰难困苦岁月，离别难免给人带来内心的痛苦。然而时间是无情的，它并不为了让人满意而停止不前。午夜早已过去，终须一别的时刻到了。我们都站起身来，这时又有一个人领头，其余的人也一起激动地唱了起来：

祝君健康，再饮一杯美酒！

唱完这首歌之后，我们终于分手了。这就是在马尔堡的黑森—拿骚大学生酒馆里的饯行之后的第三次离别。

所以，这一首祝酒歌对我来说，也就成了一首大学生的歌曲，一首民歌。可惜由于它现在采用了一种时髦的曲调而大大失去了原来的意味。人们曾三次在那离别时刻为我唱起这首歌。但是，每一次我的心都是如此地激动。内心的激情并不因为我在那三次饯行时没有喝到一滴“美酒”，而只是喝了些冒泡沫的啤酒而有所减弱。也许在那样的时刻，幻想象个魔术师一样，已把啤酒变成了美酒哩。

不过现在再回到1847年来，回到我们坐着的那辆奔驰在马尔堡和吉森之间大路上的“马车”上来！

我虽是在“逃亡”，可是我没有想到危险。半小时以后，我们已进入黑森大公国境内，脱离了黑森选帝侯国官厅管辖的范围。我们安全了。在旅途中，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我的处境是完全失去了立足之地。我觉得没有着落，就象一个球似地在无限的空间不停地飘动，要末掉到另一个星球上去；要末坠落毁灭。

好在这种阴郁的情绪很快就消失了。它们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到了吉森。我又安排了一下应该安排的事，然后从吉森前往法兰克福。我要在法兰克福买点东西和向朋友辞行，事毕以后再从法兰克福到美因



兹去。我们将在美因兹搭乘莱茵河的轮船。

一想到轮船，想到莱茵河和大海，我多么高兴呵！

那是夏季，尽管那一个夏季对我以后的生活历程有着多么巨大的决定性的影响，我却记不得日历上的确切日期了。我们（朋友毛斯和我）乘行在陶努斯*铁路上。这是当时德国已经建造的稀有的几条铁路之一，所以这件事情还是非常难得的。

我们坐的车厢里相当空。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年老的妇女和一个看上去二十八、九岁的男子。他戴着一顶阔边的毡帽，令人注目地遮盖着一张尖削的脸。我生性不爱讲话，直至今天我还可以整天不说一句话。可是那一次在车厢里，我却违背我的习惯，和我的朋友谈论起我的旅行计划，同时还不得不提醒他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也许这些事项泄露了我要到美国去的意图。总而言之，这位脸庞尖削的先生突然朝我转过身来，脱下他的阔边帽，说道：

“对不起，我似乎听您说要移居到国外去，是吗？”

他说话的音调有点特别，好象很轻蔑的样子。这使我觉得受到了嘲弄似的。我同样没有用友善的目光看他，只是简短地回答：

“这还不够明显么！难道一个有灵魂的人还能在

* 陶努斯(Taunus)，德国莱茵河区的山名。

这样的国家呆下去吗？”

“是这样！那么说您是厌倦欧洲啦？德国的现状使您恶心啰？可是为什么非要移居国外呢？其实您还是应该留在国内，至少留在欧洲。”

这时候我耐心地细听着，各种思想和感情潮水般地向我涌来。我曾经在海涅那里读到过这样的诗句：一个法国人，如果对自己的政府不满，他就革命；但是一个德国人，如果对自己的政府不满，他就让政府留在德国，自己奔向美国。海涅这种辛辣的讽刺象芒刺一样深深地扎进我的心里。

“可是我在这里该干些什么呢？我在这里又能干些什么呢？”我脱口而出（自然，我在这里复述的只是当时谈话的主要意思）。“我不愿象魏迪希那样在德国的一个监狱里丧失青春，最后被谋杀；我也不愿象约尔丹那样被关在鸟笼里使翅膀僵化。对于这样两种遭遇我都不愿意，而宁可到大洋的彼岸去，在自由的土地上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贡献我的力量。如果以后斗争能终于在法国发生，那末美国反正也不在世界之外，我仍然可以在那里履行我的职责。”

“在法国！在法国！为什么斗争一定会发生在法国呢？为什么就不能在德国呢？为什么就不能在其他什么地方呢？现在不是到处都在跃跃欲试吗？在波兰，在日内瓦，在意大利，在瑞士，不是到处一样吗？在

瑞士已经在准备一次革命。反对分裂主义同盟的斗争已经开始。这是一次反对腐朽的暴君统治的欧洲的斗争，一次反对路易—非利浦的斗争，反对梅特涅和他在柏林的应声虫们的斗争，反对法兰克福同盟议会里的那些夜蠹虫们的斗争；在瑞士那边就是您的用武之地，而不是在美国。”

这些话就象启示录一样飞进我的心坎。我愈来愈兴奋。几分钟之后，我竟觉得这位陌生人是如此的亲近，以致我以年轻人那种特有的信任向他吐露我内心的所有思想斗争。我们交换了名片。他是苏黎世的弗吕贝尔学院（现在归前普鲁士上尉博伊斯特主持）的首席教师鲁道尔夫博士。他还认识海尔维格、特赖希勒尔、阿尔诺德·卢格、尤利乌斯·弗吕贝尔以及其他这样一些人。光是这些人的名字就已经象魔力似地紧紧把我吸住，而且他还粗略地向我描述了一下瑞士。经他这一番描述，瑞士、尤其是苏黎世竟变得如此富有魅力，以致当他突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被派到德国来是为了替我们的模范学校物色一位教师；我想，您是最合适的人选，您愿意接受或者哪怕试一试这个职位吗？——这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到了美因兹，我们在同一家旅馆下榻。我们越是交往得多，这位旅伴越是使我喜欢。到了夜里，我脑子里又重现了一遍白天发生的一切。我感到心中明亮。现

在我已经有了目标，重新有了立足的土地。我决心立刻动身到苏黎世去。朋友毛斯也准备陪我一起去。第二天上午，我找到了替我代办旅行合同的那位移民代理人。我说，我愿意牺牲我预付款项的一半。结果是牺牲一半还不够，我只收回了预付款的四分之一。可是我何必为这件小事烦恼呢？

我们在美因兹又呆了一天，然后向鲁道尔夫告别。他还要在他的家乡（我想大概是汉诺威）再逗留几周。我们就这样前往瑞士，而不是去美国。

当我十一年前坐火车驶过威斯康星州的时候^①，我看到那里的德国农舍，门口站着德国的农夫、农妇和无数的农家孩子。当时我就联想到那次我从法兰克福乘火车到美因兹去的情景。如果没有那一次火车上的旅行，也许我现在也和他们一样，站在农舍前面，带着妻子孩儿，眼望着风驰电掣而过的列车了。我的道路究竟是选好了呢还是选坏了？

我以前是多么盼望能成为一个农夫呀！

而当我果真成了农夫之后，我是否会说我是多么不希望成为农夫呀？

没有一个人会比我通过亲身经历更彻底地体会到，人生并非一根铁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锻成他心

^① 1886年李卜克内西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委托在美国进行宣传鼓动的旅行，同时进行募捐。

爱的形状。

在这次旅行中，我看到了巴登的自由主义的各种尝试，看到了已闪耀着共和思想的激进主义的各种尝试。经过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之后，我们在一个喜气洋洋的残暑之夜到达了苏黎世。从我少年时代起，到阿尔卑斯山去就跟到大海边上去一样，象磁铁般地吸引着我。我的监护人曾和我早已亡故的父亲（我父亲是他大学里的朋友）一起去过瑞士，而八十年前要到瑞士旅行一趟，不是一件象今天这样平平常常的事，因此我的那位监护人曾给我讲过许多他们当年在瑞士的生活。当我们在沙夫豪森*附近踏进瑞士国土的时候，我首先领略到了那种早已期待中的大自然的奇异的美。那里有莱茵河的瀑布；莱茵河水清澈得象水晶一般。那时还是邮驿马车的时代。过了一些时候，一个同车的旅伴喊道：“看哪，阿尔卑斯山！阿尔卑斯山！瞧那边的山！”所有的人都朝窗外望去，可是我却转过眼睛不看它。因为我知道在那里只能看到阿尔卑斯山的一段，而我是想在第一次看到它时，就能欣赏它壮丽的全貌。以前有人对我说过，从苏黎世的大桥上能看到瑞士东部阿尔卑斯山的雄伟壮丽的宽阔画面，于是我下

* 沙夫豪森(Schaffhausen)，瑞士城市。

决心在这之前决不朝阿尔卑斯山看一眼。

我们到了苏黎世，很快地下了马车，在杜拉克旅馆*（它当时还是座相当简朴的建筑）交放了行李，立即就走到大桥上。现在我才极目望去。我以前有意节制的欲望终于得到了丰富的报偿。绿宝石湖的湖水纯净透明。湖的右边是巍峨的迁特利山。迎面是一轮金光四射的夕阳，她是如此的明亮清晰，好象人们用双手就能把她摘下来似的。宽阔的耸入云天的阿尔卑斯山脉宛如一条链带。我默默地站在那里。当落日从金黄色渐渐变成火红色的时候，崇山峻岭顿时光芒耀眼，一片辉煌。我情不自禁地向我的朋友喊道：“我就留在这里！”

我就这样留在苏黎世了。

在弗吕贝尔学院一切如愿。我在靠近席夫斯兰台的洛赫尔家里（就是以后名噪一时的改革家洛赫尔的父母那里）找到一间房间，临窗面湖，还可以眺望迁特利山。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臭名昭著的普鲁士密探莱辛曾经在我这个房间里住过。他是一个被德国警察收买的大学生，要他在瑞士监视三十年代的德国流亡者，而他也完全按照至今还适用于国内和国际密探的方法行事。谚语说：“没有什么学到的东西，也就不可能有

* 杜拉克旅馆(Hotel du Lac)，亦可意译为“湖泊旅馆”。

什么忘记的东西”，这句谚语对警察来说比对那些“政治家们”更合适。尽管那些政治家们也是属于老古董，可是他们倒也偶尔学习一些新的方式方法；而警察们则不然，直至今天，他们的方式方法还是旧的一套。他们的工作手段和谋略还是富士时代，甚至还是路易十四时代的那一套（在路易十四手下已经有了密探培训所）。当莱辛的叛卖活动被发现之后，那些被他出卖的人就在苏黎世附近的僻静的西尔霍尔茨利地方对他进行了秘密审判。经过一番审讯之后，把他判处了死刑，并且由两个早已被他出卖给情报机关的同志刺死。他的尸体在第二天上午被找到并验明正身以后，便送到我现在住着的这间房间里来。我的女佣人（她那时就在这家侍候了）告诉我说，事情发生之后，尸体躺在床上的那天，曾被这个死者背地里出卖过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当最后一个人跨进门时，尸体的伤口又开始出血了，就跟西格弗里特死在哈根身旁时血流不止一样*。我的那位女佣人虽然没有向我讲关于

* 西格弗里特(Siegfried)是德国古代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人物。他原是尼德兰首都桑德的一个王子，正直勇敢，早年杀死过怪龙，用龙血沐浴，皮肤成为鳞甲质，刀枪不入。但在沐浴时，肩头上落了一片菩提叶，所以只有这个地方能够受伤致命。后来他的敌人哈根知道了这一秘密，就骗他到林中打猎。正当西格弗里特在泉水旁俯身取水时，哈根举枪向他的肩头投去，血溅在凶手的衣上，西格弗里特在花丛中死去。

西格弗里特的故事，但是在她的心中还始终保存着远古时代的那种迷信，就象西格弗里特时代或者尼伯龙根之歌时代的那些古代的布尔昆德人心中的迷信一样。我在包尔斯多夫的那位女房主也有这种迷信。瑞士人很保守，我从后来的经历中也认识到，瑞士人民是民主国家中最保守的。有人告诉我，刺死莱辛的那个“哈根”是邦里的一个高级官吏。事后他当然受到了审查，但是人民舆论一致认为他不是凶手，而是理所当然的复仇者，他只是去执行罪该应得的死刑。我那时常常看到他，也曾和他谈过几次话，但是我从未见他笑过。

我以极大的热情献身于教学工作。学校的“主持人”，因而也就是我的“上司”卡尔·弗吕贝尔（他是“幼儿园创始人”弗吕贝尔的侄子，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的兄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我在许多方面应该感谢于他。我是在我们的学校里，在那幢座落在湖滨的大得象谷仓似的大屋子里认识他的，同时也认识了他的妻子——一个出生于哈雷的女子。这时候我已能从近处看到和观察特赖希勒尔、卢格、福伦纽斯和其他一些我从远处早就敬慕的人物（鲁道尔夫博士曾作为一只媒鸟把这些人物介绍给我）。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人从近处看都象从远处看那样伟大。

海尔维格已经不在苏黎世。他带着他的妻子迁居到巴黎去了。他在那里和一位被李斯特（这位西修斯）



遗弃的情妇达古伯爵夫人(这位阿利阿德尼)一起虚度着光阴*。我是在半年之后,即在二月革命之后才和他相会的。

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而且一天比一天动荡。分裂主义同盟的问题已经闹得难解难分,不得不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来解决。那些天主教派占统治地位的几个邦,在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怂恿下,拒绝驱逐耶稣教团和解散分裂主义同盟。当时人们估计,联邦政府在联邦议会中得不到足够的多数票;纵然得到微弱的多数,联邦政府也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可是人们的这种估计没有把主人——瑞士人民考虑在内。后来联邦政府终于在议会中得到了必要的多数票,并且能采取有效行动。反对分裂主义同盟的战争爆发了。我想作为一个志愿兵随军参战,但是我的请求被拒绝了。所以当在高原上打响那引起革命雪崩的第一枪的时候,我是站在遥远的阿尔卑斯山巅上看到的。这次革命的雪崩终于越来越大,最后于1847年11月23日在吉斯利肯赢得了决定性的一仗。我为取得这次辉煌而彻底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

* 阿利阿德尼(Ariadne)是希腊神话中克里特(Kreta)王迈诺斯(Minos)的女儿,她曾把她的情人西修斯(Theseus)救出迷宫。威廉·李卜克内西在此处把李斯特比作西修斯;达古伯爵夫人比作阿利阿德尼。

在这期间我参加了新闻记者的行列。我在吉森时的大学朋友鲁道夫·芬特，当时是古斯塔夫·司徒卢威创办的《观察者》报的热心的合办人。除了在他的催逼下为这家报纸写过一些文章之外，我在新闻界还完全是个什么都说不上的人。但是在文学方面则不然，因为在我的抽屉里竟囤积着十几磅的诗稿，其中还有不少令人心痛欲裂的悲剧。我把这些诗稿秘藏起来，现在看来倒是一桩幸事。为了准备参加反对分裂主义同盟的斗争，我曾一度被迫拿起笔杆。我在当时最激进的一家日刊《曼海姆晚报》那里发现，在帐目收支方面竟是如此大方，而我从一开始不仅不要任何稿酬，而且还认为，为稿酬而工作是玷污新闻记者这一神圣职业的。

我的文章给我带来了许多赞扬，也带来了许多谴责，给我带来了许多仇恨，也给我带来了许多友谊。这些文章引起了苏黎世各界有影响人物对我的注意。他们十分器重我，要我去接管瑞士《联邦报纸》编辑部。该报早先是布隆特施利经营的，分裂主义同盟失败之后，便成了无主的财产。正在商谈之中，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革命把我召唤到了巴黎。不过在这之前我已为取得瑞士国籍采取了各种准备步骤。巴黎之行以后，我于1848年4月才重新回到苏黎世。接管那家报纸的谈判继续进行，一切都非常顺利。但是9月份司

徒卢威的那次暴动把我所有的打算一笔勾销了。我被捕以后，先是坐在塞肯根的牢房里，以后被送进弗赖堡的监狱，一直到1849年5月监狱的大门被打开。这以后我就投身到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斗争中去，后来又来到这蔚蓝色的日内瓦湖畔。关于我在日内瓦的生活，我去年已经写过一些报道，也许我明年接着再写。

原载《1900年世界新历画报》(Illustrirter
Neue Welt-Kalender für das Jahr 1900),
1900年汉堡版,第35—41页。

拉施塔特碉堡里的三天

拉施塔特碉堡里的三天？这是什么意思？1849年，曾经有几千人在拉施塔特的碉堡里蹲过*。几乎所有人都呆了很长的时间——有些人蹲了许多年；有些人虽然没有在碉堡里死去，可是从碉堡里出来就被直接投进了壕沟。这要是用艺术语言来表达的话，就是：普鲁士军事法庭的子弹“把他们送到了西天”。那么“他在那里呆了三天又算什么呢？何况他今天还活着。是不是他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写的了？再说，这也并不‘有趣’，他也没有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确，我没有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顺便说一句，我对此并不总是很愉快的），但是也有一点特殊的地方，那就是：我

* 文中“碉堡”一词，德语原文为 Kasematte，原指要塞内的炮兵掩蔽部，是一种建筑在地下的防御工事，远不及现代的碉堡坚固，且常用作禁闭室，囚禁犯人或俘虏，所以亦有人意译为土牢、地牢，但原意实非牢房。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之后，大批被俘的革命军和其他革命志士被关押在拉施塔特要塞的这类工事里，以后遭到普鲁士军队的残酷杀害。

是第一个被关在拉施塔特碉堡里的“政治犯”；同时，我也不是在革命失败之后，而是在革命期间被关进碉堡里的。因此可以说，我的情况也就是非常罕见的了。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让我们回溯到差不多四十年以前，回到那“疯狂”的第二年^①。地点，卡尔斯卢厄；时间，1849年6月初。那时巴登人民举行了第三次起义，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也参加了，同时还波及到周围地区。卡尔斯卢厄这座巴登最陋俗最反动的城市，好象存心嘲讽历史似的，竟成了革命的中心。

从德国各地区，从其他各邦，涌来了各色各样的人物。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人是怀着对伟大的事业抱有热情而来的。当然，这些人所抱的动机和观点，要比这些人本身更加五花八门、错综复杂。我在那里遇到了波克罕、科恩海姆、科恩和罗森勃鲁姆，曾经同他们一起，于头一年的九月由瑞士出发，在塞肯根越过莱茵河，以便同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他已从勒拉赫“侵入”）会合，在德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众所周知，那次起义失败了。波克罕等人也被司徒卢威的劫数牵连进

^① 德国资产阶级在他们出卖了1848—1849年的革命之后，把革命的那几年诬蔑为“疯狂的两年”，李卜克内西在这里引用这个称呼，显然有讽刺的意味。

去，在施陶芬交战之后被俘了。而我自己则在几天之后，正打算拿着武器再次闯入邦的内地的时候，被旧政府的武装抓获了。由于偶然的运气（电报机的打印键盘失灵，以致电文不清），我们逃脱了就地处决的军法审判，就这样一直等到五月革命（或者叫“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这时候，其他的人到了勃鲁赫萨尔。而我，先是在塞肯根，以后就被带进弗赖堡的华丽的邸宅里。原先预定在五月上旬以后（我记得是11日或者12日）在弗赖堡由刑事陪审法庭向我们宣判，而且要判定的都是刑法法典上可以找到的最耸人听闻的罪行（当然包括叛国罪）。可是在加给我们的一长串罪状中，叛国罪却不见了。总之，他们是最漠不关心然而又貌似公正的态度，从取之不尽的各种罪名中选用几个。我至今还记得的有：抢劫钱库，侵犯人身，敲诈勒索，也就是谋杀首犯、盗窃首犯、抢劫首犯、纵火犯、蓄意暗害犯、杀人犯之类。你们看，我们的敌人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善于把“政治犯”故意歪曲为下流的刑事犯了。

审判过程非常短。我们知道，正在筹划一次新的事变，巴登的军队准备投奔到人民方面来。他们把我带到法庭去的时候，街道上已站满了向我们欢呼致敬的人群。当我走进法庭大楼时，一个穿着德国高地服装的高个子农民握握我的手，向我低声耳语：“什么也

别说！”我还看到另一个和颜悦声、频频向我点头的人，他是控告我的主要证人之一，是个村长。我以前曾警告过他，如果不立刻在他的村里宣布实行共和与军法管制，不给20至25岁的所有男子发枪枝的话，我就枪毙他。在这次预审法官事先向我宣读的审讯记录中，他曾提供了关于我的最骇人听闻的罪行，可是现在他却说“什么事也没有”了。风向已经转变，我的心情也轻松下来。在法庭大厅里，我找到了九月暴动的同志们。我已经七个月没有见到他们了。我们彼此问候，互通情报。听众们向我们挤过来，带着十分兴奋激动的神色。几百人向我们问候，几百人要和我们握手，从各方面鼓励我们。他们喊道：“你们很快就要自由了！革命又爆发了！”我们的情绪十分轻松愉快。在整个大厅里，除了法官、检察官和一部分陪审员以外，没有一个人感到胆怯慌乱。

此时此刻我们是多么高兴呀！我们最近八个月积压在心头的所有愤怒，一下子都烟消云散了。我们又能从被告转为审判者了！

“一切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了。”审判开始，四周鸦雀无声。在进行了必要的仪式之后，先由检察官发言，陈述起诉的理由。检察官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毫不相干的话，便宣布按照几天以前结案的案例，建议予以释放！公众顿时哗然。他们把宪兵们推到一边，一齐向

我们冲来，和我们拥抱。我只记得我当时还大声喊道：“我们还要发言！”陪审员们短时间退席，回来后都宣告：认为“无罪！”法庭首席法官在一阵骚动中宣布：“被告予以释放，立即恢复自由！”我要再次抗议这种处理，并且走到拥挤的人群面前讲话，可是这时我已在这蜂涌的人群中象被一个不可抗拒的大海漩涡裹住一样推向前去。在一片“乌拉！”声中，他们把我从大厅抬到街上。街上更是一片黑压压的欢呼的人群。同志们的情況也完全和我一样，因此那一天我们再也不能见面。各种各样的花束，穿着节日盛装的姑娘和妇女，摇晃着啤酒杯和礼帽的男人，站在桌子上的演说，从大街延伸到郊外的一队队游行行列，这一切构成了一幅令人眼花缭乱、头昏目眩的场面。这场面太嘈杂喧哗了，然而却非常吸引人。在那天发生的许多事件中，我今天记得的就是这一些。这一切都发生在美丽无比的五月，发生在异常秀丽的弗赖堡城和它周围的地区！随着大自然的复苏，生机勃勃了，人民也复活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迎来了这最美丽、最值得庆贺的节日。到处洋溢着喜悦。这是何等鲜明的对照呀！几小时以前我们还在监狱里呢！

从牢房到自由——这已经是一种享乐，即便是对最能适应环境的牢房客人来说，也不例外，尽管对于这样一种享乐，谁也不会羡慕。但是从牢房到革命，情况

就不同了！这是一种千百倍的享乐。我至今还为我曾经有过这样一次经历而高兴。这种幸福感十分之九或者说更多，仅仅是出自希望和对比而已。这是从希望中产生的欢乐，从舒适与不舒适的环境对比之下产生的欢乐。转变愈是突如其来，对比愈是强烈鲜明，欢欣愉快的感觉也就愈深刻。

反动派的冰山破裂了，一大块一大块地开始剥落，再也不可能停止。传闻如风，接踵而至；革命风暴席卷大地。除了军官以外，全邦的士兵都声明反对旧政府，赞成新制度。可是新制度又是怎样呢？这方面显然意见非常分歧。大公爵逃走了，邦里也就没有了君主。当时最简单的办法是宣布成立共和国。毫无疑问，这会获得群众的欢迎，而且也能吸引德国其他地区的人民。但是领导这次运动的先生们——布伦坦诺和他的同伙，却有各种必要的和不必要的顾虑。他们想按照鲍威尔的方式，把革命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鲍威尔不久前在邻近的黑森邦，曾经宣布过这样令人深省的带纲领性的口号：“有大公爵的共和国万岁！”

一个按照帝国宪法建立起来的共和国！这就是这些领袖人物的理想。可是由于帝国宪法本身不但不体现共和政体，而且还要求有一个普鲁士的世袭的皇冠（就是戴上这个皇冠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国王也曾把它称为“一个用污泥和粘土制成的假想的头

箍”^{*}，这不是他的谦逊之词，而是真话），所以这个革命目标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从而也就使革命行动矛盾百出，动摇不定。

我逗留在弗赖堡的几天之内，就已发现了这一点。那里驻扎的符登堡的几个营（我记得是两个营），也受到革命“细菌”的感染（虽然细菌在当时尚未被人发现）。他们作出种种姿态，愿意和他们造反的巴登的伙伴们结成兄弟。可是这支部队的指挥官米勒将军却准备把他的全部人马安全撤回符登堡去，于是他命令这支符登堡部队撤出弗赖堡城。我们“青年人”主张制止这次调动。我们认为，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扩大革命势力。如果我们让这些符登堡人选择，是参加我们的运动呢还是同我们开火交战，那么他们势必要参加到我们这边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和他们一起去攻

*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推举为德国皇帝之后，内心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怀有并吞其他各公国的野心，妄图以普鲁士为基础统治全德国，另一方面他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推举他为德国皇帝感到恶心，因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是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威廉四世本人曾经这样说过，这个皇冠以其1848年革命的可恶气味使他受到极大的污辱，这个革命是本世纪最愚、最笨、最坏（感谢上帝，虽不是最恶）的革命。他说，一个受上帝恩佑的正统的国王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用污泥和粘土制成的假想的头箍，而普鲁士国王尤其不能接受。普鲁士国王蒙天之恩，应承受虽不是最古老的但却是最高贵的皇冠。详见弗·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卷，第155页。

打符登堡，由他们打头阵，这就完全有希望把符登堡的军队一下子全部解决。可是却有人说，这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是我们并不甘心。在我们弄清楚巴登的几个营确实准备用武力解决这几个符登堡营以后，我们决定去试探一下这些正在撤退的符登堡人的意向。可是他们在几小时前就离开城里了。民主派议员费伦巴赫和我被选派到符登堡人那里去。我们两人都佩戴着黑红黄三色绶带。这是一项特殊的使命：我们要问问这些士兵们，他们是否愿意效法巴登手执武器的弟兄们，把他们的军官赶走，和我们联合起来！不言而喻，军官们是不会接受这个要求的，而且只要他们还有一点威信的话，他们就一定会叫人逮捕我们，或者用其他的办法把我们迅速处理。这一点也同样是十分清楚的。但现在是在“革命”，而革命时期对各种事情的概念，是与平常时期不同的。平常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往往会变成可能，而平常认为可能的，则又往往成为不可能。一切行动都要用另外的标准来权衡。当然，对于这件事，我们也不是没有防备的。随从我们的人相当多，其中许多人执有武器，还有成百名的巴登士兵护送我们，而且护送者每时每刻都在增加。当我们向符登堡部队的宿营地走去的时候，碰到几个哨兵。他们看到我们佩戴着三色绶带，向我们肃然敬礼。军官带着士兵们走上前来。我们告诉士兵们，我们希望他们干

什么。我们要求他们尽到他们的义务。于是，几个军官命令逮捕我们。士兵们没有这样做。巴登的士兵们走过来为我们助威。我们两人也向那些显然已经犹豫的人走过去，要说动他们的心。动摇的人愈来愈多，而军官方面仍竭力施加他们的影响。这一精彩的场面持续了整整一小时，直到我们弄清楚士兵们不可能那么痛快地投奔到我们这方面来为止。但是从中我们也确信这样一点：倘若我们如我们所要求的那样有两营巴登士兵作我们的后盾，那么这些符登堡士兵就可以不经过战斗投奔到我们这方面来，而且还可以把他们的军官作为俘虏和人质一起带来。

回到弗赖堡之后，我们在市政厅报告了我们的经过。我还竭力主张，立即命令巴登的几个营出发，这样我们还是有可能追赶上符登堡的部队。可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什么事也没有办。米勒将军本人和他的几个营早已处在安全状态。一个大好机会错过了。说真的，我们不会有其他更多的机会，这一点我心里很清楚。

我没有在弗赖堡继续逗留。我赶到了卡尔斯卢厄。我的所有的朋友都叫我到那里去。

我上面说过，卡尔斯卢厄的人员非常混杂，过着一种近似疯狂的愉快生活。这里有的是志愿兵和士兵，有的是没有军官的部队和没有部队的军官，有的是

什么都不能领导而又想领导一切的“领袖们”，和可以担任各种领导而又并未领导什么的“领袖们”；这里也有的是乐于献身的纯朴的力量，然而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理想！没有计划！没有事先的谋略。一切都象肥皂泡似的变化无常。只有激动情绪。可是激动一阵又有什么结果呢？当热情让位给清醒的思考的时候，人们不禁要低声问一问：是要酒还是要醋？

我象其他的“青年人”一样，希望能尽可能地做点普遍有益的（英国人叫 *generally useful*）工作。那位身为平民委员、新闻记者和副官的司徒卢威，是我们认为巴登起义领导人中最能干的一个。当然，此外还有不少在勇敢的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手下的名副其实的志愿兵，尤其是伯克罕炮兵队里的那些炮手。我也被看作是一个真正多能的人，以致使我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选错了自己的职业——可是对于这件事没有人会责怪。我当时比较接近的熟人中，除了贝克尔之外，还有司徒卢威和他的内弟杜萨尔，以及伯宁、伯克罕、契尔奈尔和多尔杜。契尔奈尔是和我在九月暴动中共过患难的一位同志，也是萨克森五月革命中最革命的一个成员。在德累斯顿五月起义失败之后，他竟如此仓惶失措地来到卡尔斯卢厄。我本来对一般的“大人物”和人民中的大人物就不十分尊敬，而他那副样子更使我崇敬的心情大受损害。只有英俊的马克斯·多尔

杜，他那瘦长而健壮的身躯和那活泼有神的眼睛至今还浮现在我眼前，就好象我昨天才见到他，而不是已经被普鲁士军事法庭的子弹打得粉身碎骨之后埋在弗赖堡前布劳斯高的维莱公墓上已有四十五年似的。

在我一生中，我还从未碰到第二个象马克斯·多尔杜这样理想的年轻英雄。他是波茨坦的一个高级官吏(最高法院顾问)的独生子。他毫不犹豫地投身到运动的漩涡中来。他是在柏林和年轻的施略费尔一起，为人民的事业共同战斗到最后的一个人。这以后，他就响应最初的号召赶到巴登来。他破釜沉舟，抛弃了财产，抛弃了远大的前程；一句话，他抛弃了一切。他曾经当过普鲁士的士兵，因此他清楚地知道，只要霍亨索伦王族的统治存在一天，他的祖国对他来说便始终是投有希望的。

在我回忆过程中，在我想到的当年许多人物中，我还必须提到正直的施坦道，他是三十年代的革命者之一。我们的约翰·菲利浦·贝克尔在哈姆巴赫盛会*上就认识他了。如果我没有弄错，他也参加过袭击法兰克福的哨所。他是个身材魁梧、浑身是劲的巨人。非洲

* 哈姆巴赫盛会(Hambacher Fest)是指1832年5月27日在普法尔茨南部一个盛产美酒的乡村——哈姆巴赫举行的盛会。它是南德民主主义者的一次集会，要求德国统一和成立共和国。德意志同盟国会以完全取消新闻和集会自由来回答这次集会。

的太阳把他晒得黧黑黧黑，使我觉得他是个漫游的革命骑士的典型。在逃离德国之后，他一直在南美、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结党造反，发动叛乱，最后在法国参加了外国人军团。他曾经负责对我进行过军事训练。每当他工作时，我看到他那副顽强的一动不动的脸部表情（但又有一双温和的眼睛），我就浑身感到一种畏惧。可是在空闲的时间，在晚上（有时也在白天）喝啤酒的时候，他什么话都说！然而流亡者军团中的志愿兵（其中不少是非洲人）却称他为固执的施坦道。这个称呼虽无恶意，但却使他很不高兴。施坦道在工作之外是一个愉快的人。我们经常和他一起唱那首优美的《流亡者之歌》。他也可以说是这首歌的作者之一。我说“之一”，是因为这首歌是集体创作的。我现在把这首歌词抄录如下：

倘若侯爵们说，
押沙龙*在干啥？
你们该回答：
唉，他已被悬挂。
他不是挂在树上，

* 押沙龙(Absalom)，基督教《圣经》中人物，公元前十世纪上半叶以色列国王大卫的儿子，反叛其父逃跑时，因头发挂在一棵栎树的树枝上而被谋杀。

也不是挂在绳上；

他被悬挂在

共和国的梦想上。

革命哪！

来呀，来呀，来呀，

革命哪！

起来吧，起来吧！

假使他们想知道，

流亡者现在怎样。

告诉他们吧，

他还活着，

他衣衫襤褸，

赤手空拳走天下！

他只有拚一死命，

为自由的王国

在疆场上奔杀。

革命哪！

来呀，来呀，来呀，

革命哪！

起来吧，起来吧！

如果他们假惺惺地问，

他想得到赦免吗？

你们理应回答：

他不会屈膝投降！

快快献出你们

宽大的紫氅，

为一只自由的部队

改做成红色的裤衩。

革命哪！

来呀，来呀，来呀，

革命哪！

起来吧，起来吧！

对他来说，那支“自由的部队”，当然就是后来的“外国人军团”，他们都穿着“红色的军裤”。而现在，也是一支重新有了真正自由的部队。这首歌在以后流亡的漫长岁月里，还常常使我们感到欢乐愉快，虽然那时候，我自己也“衣衫褴褛”（当然这只是从字面上形容而已，实际情况倒还不至于如此）。顺便提及，以后还有不少人不仅从侯爵们那里弄到“红色的军裤”，而且还弄到了红色的外套。这首歌的歌词改动了好几次。上面引用的歌词是真正的原文，特别是最后第三行“来

* 法国巴黎公社革命时，在巴黎的各国政治流亡者和革命青年组成了外国人军团，支援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呀，来呀，来呀”，来源于一首旧的大学生歌曲《小伙子们出来吧！》^①。施坦道也曾经是一个大学生，并且象我们其余的人一样，是一个“流浪的大学生”。自从拉施塔特那场灾难之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从此行踪不明。他一定死在异乡某个地方，成了 *enfant perdu de la patrie*（祖国失去的孩子！）——“在自由战争中献身的哨兵”^{*}。也许他和年轻的高特弗里德·贝克尔一起死在美国了。高特弗里德·贝克尔是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的儿子。他曾在巴登和我们一起战斗。十三年以后他在美国反对南方奴隶主的战争中率领一个团冲锋时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嗨，我把话说到这里去了？记忆的蓄水池一经打开，各种回忆犹如滔滔流水不断涌来，就象史奈德穆尔的那次水灾^②那样势不可挡。话说回来，再说说关在碉堡里的三天吧！

① 《小伙子们出来吧！》是一首大学生的歌曲，歌词和乐谱的作者均为无名氏。

* “在自由战争中献身的哨兵”(verlorner Posten in dem Freiheitskriege)，是亨利希·海涅的一首诗《失去的孩子》("Enfant perdu")中的一句诗句。参阅高至译，《海涅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5页《决死的哨兵》。

② 这是指发生在史奈德穆尔(Schneidemühl)的一次自然灾害。1893年5月，有一次在该城内挖井的时候，凿开了地层下面的一个水源，蕴藏在地层下面的巨大的自然力量把大量的地下水和行泥喷到地面上来，失去控制达数月之久，使城内泛滥成灾，造成严重损失。

一切发生得都很自然，就好像一切必然如此一样，就是最不自然的事情也变得十分自然。我们“青年人”对于俯首听命于那些领导人物已愈来愈觉厌倦。确切些说，他们并不称职，也未能真正担负起领导的责任。他们是一些站在舵位上而又不掌舵的戴着睡帽的革命者。我们也曾想试试我们的运气，看看我们能不能来掌舵。所有的志愿兵都毫无例外地站在我们这一边，还有绝大部分的士兵和一部分数目相当可观的、已作好准备的人民自卫团也在我们这一边。

在古斯塔夫·司徒卢威的领导下，我们成立了一个“坚决进步社”，这是一个秘密的雅各宾派俱乐部*。

这时已经到了六月初，可是临时政府还是没有作出一项有力的进攻方案。我们的“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部队越过边界，到德国的其他地区去赢得革命。一次向黑森的挺进由于力量薄弱和组织太差而宣告失败了。当时，普鲁士政府和其他各邦政府虽然准备动用武力，可是对自己的军队他们又不敢信任。我们几乎得到了人民普遍的同情。如果能有一项大胆的进攻方案，就能够创造出奇迹，并能使形势一下子变得对我

* 雅各宾派俱乐部(Jakobinerklub)，原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的俱乐部。这里借用来指巴登起义中左派激进分子的组织。

们有利。人们虽不能奢望什么奇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只有采取进攻，才能拯救我们自己。我们已经有了军事法庭，可是没有加以利用。那些“大公爵”分子一天比一天猖狂，而我们志愿兵每天都得和这些小子们作顽强的斗争。特别是在卡尔斯卢厄，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在市民自卫团里还有一个装备优良的组织。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迫不及待地要和这些分子较量一番，要跟他们来一次彻底清算。

我们愈来愈不耐烦。气氛日趋紧张，随时可能发生冲突。我们不愿意让侯爵们的部队把我们象一头獾似地从洞穴里赶出来抓住。但是如果整个体制不立刻全部改变的话，我们的命运不可避免地就是如此。我们眼看着机会随时都在减少，因此我们这些“坚决进步社”的“青年人”便决定向（布伦坦诺）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当时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布伦坦诺那里去，我也是

*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在卡尔斯卢厄成立了革命临时政府（邦委员会），由法兰克福议会的一个左派议员布伦坦诺律师任主席。布伦坦诺本想通过革命运动当上大公的大臣，而现在他虽然坐在他的逃走了的君主的座位上，但这是大大违背他最初打算的。他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似乎都在考虑，当他的合法的君主回来以后，他如何为这些事进行辩解。因此他就利用他那几乎没有限制的权力，彻底破坏巴登—普法尔茨革命。一些比较坚决的分子试图迫使布伦坦诺接受革命政策，可是由于布伦坦诺具有几乎无限的声望，这个企图失败了。当时威廉·李卜克内西二十四岁。他在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指挥的人民自卫团当炮手。他是企图使布伦坦诺变得坚强起来的革命派之一。为此布伦坦

代表之一。这位“独裁者”从屋子里出来，神经十分紧张。当司徒卢威向他陈述我们的要求时，他面色苍白，激动得直颤抖。他给了一个含糊的答复，说是要尽可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可是又加了许多“但是”、“如果”之类的限语。我们说，我们对他的答复很不满意。互相交谈成了互相指责。布伦坦诺愈来愈激动。我在弗赖堡监狱里的时候，他曾经作为我的辩护律师来看过我。早在那时候，他就已经警告过我。现在他又对着我说：“我想提醒你，现在可是军法审判的时候。”这句话把我惹火了。我向布伦坦诺逼近一步，冲着他嚷道：“军法审判对你同样适用！”他以为我要揍他；赶紧后退几步，脸色也全变了。我们很不客气地不辞而别。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一场面，是因为它可以说明以后发生的事件。

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十分明白，形势愈来愈危急。我们“青年人”一致认为，如果我们不想被“大公爵”分子制服，那末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我们必须先发制人。如果我们不先动手，他们可就要动手了。我们准备我们的人马。志愿兵是我们随时都可以使用的。临时政府方面默不作声。反动分子不露声色。一种阴郁的寂静。这时已到了1849年6月5日。

这就让人把他关押在拉施塔特要塞的工事里。参阅弗·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卷，第171—177页。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一座花园里喝啤酒。那儿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中心，志愿兵和士兵混杂在一块儿。

突然间，听！那是什么？远处传来鼓声。是命令全体出发的声音吗？对！不！不可能！可真是命令出发的声音哩！大家立时都跳起来。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弄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们最邻近的一块场地上也敲起了鼓声——全体出发！我们中间有几个人，不加思索地冲向那个敲鼓的市民自卫团的岗哨，喝问道：“谁给你的命令？”那个人不愿说出来。于是两支手枪对准他的脑袋，终于使他开了口，“是宫廷戏子霍克！”——霍克是反动分子的首领，是旧的宫廷派的主要代理人。

现在形势已很清楚。一次突然的事变已经不再是变幻莫测的幽灵，而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幽灵正在拿起武器动手。这时我们马上开始执行我们的计划：向城里和周围地区的我们的人（其中包括贝克尔和司徒卢威）告急，向他们报告危急情况。在这之前，我们一直无法动员他们动手。

大鼓、小鼓均被我们没收。我们很快分配了任务，每个人都赶紧去办自己的事情。我和几个朋友的任务是，立刻去报告住在“巴黎旅馆”里的贝克尔和司徒卢威，然后再去逮捕宫廷戏子霍克。我的前一个使命很快就执行了，但是并不象原先期望的那样。贝克尔不

相信布伦坦诺有搞一次政变的勇气。他认为志愿兵整天得足够在什么时候把市民自卫团的市债们弄得落花流水。而司徒卢威则认为我过于激动。我们终于未能消除这两个人的迟疑而郁郁不乐地离开了。但这时我仍抱有希望，如果我们能够抓住霍克，而且有了足够的证据，我们还是可以使他们拿定主意的。我们说：“到霍克那里去！”——我们随即到了他的房屋前面。那儿是卡尔斯卢厄的一个同志事先指点给我们的。我们迅速地占据了所有的出口，并且冲进去。一个仆人试图挡住我们。他说：“主人不在家！”我们二话没说，就把他搬到一边。他问我们有什么权力抓人和进行搜索。我们向他晃了晃手中的武器，这就是回答。我们开始搜寻。这只鸟确实飞走了，可是窝也并不是空的。我们发现了许多阴谋活动的正式文件，无数的信件。这些信件充分证明，霍克在宫廷派的授意下正策划一次反对可憎的志愿兵的袭击，同时也证明他依附于布伦坦诺。

“现在他们就不得不承认我的是对的了吧！”（他们是指贝克尔和司徒卢威）。我们凯旋而归，回到了“巴黎旅馆”。在这期间，城内也活跃起来。我们的人在街道上四处巡逻，这说明大家都已有所准备。但我们还探悉到：在城内的其他几个地区则是市民自卫团在四处巡逻。这样，卡尔斯卢厄也就分成了两半，出现了两

个敌对的阵营。

我们把没收的文件带到贝克尔和司徒卢威那里去。他们两人的房间正好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此刻他们正在贝克尔的房间里。

可是使我非常失望，他们没有发挥我们希望他们所起的作用。他们说，这些人搞阴谋活动已经是老行家了，但是如果他们敢于自不量力的话，我们是有足够的力量把市民自卫团里那些大腹便便的人推到老鼠洞里去的。我们费尽了唇舌，全都白费。我们再三恳求不能错过这个时机，也仍然无用。我们说：“布伦坦诺要出卖我们，他在市民自卫团的帮助下已策划好了一次政变。一切迹象表明，今天晚上他们就要动手。”贝克尔和司徒卢威却说：“可是这些市民自卫团又有什么用处呢？我们的力量超过他们一百倍。”

一切都是徒劳。在谈判了半个小时之后，我终于放弃了说服这两位朋友的想法。可惜没有他们两人，我们什么也干不成。是呀，尽管志愿兵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但是我们绝大部分都是“外乡人”，在本地人当中缺乏足够的信任。贝克尔是深孚众望的（他很快就树立了威信）。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暂时缺少他。但是，一旦事发，他肯定是不可缺少的。而司徒卢威呢，我们是简直不能没有他。

我们尽到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告辞出来，心情都



不是最好。在旅馆门口我们分道扬镳，这时已经快到十二点钟了。我不愿把我的怒气带到同伴那里去，所以我急急忙忙回到我自己的寓所。我还没有走到百步远，就突然被一支巡逻队喊住了。那是市民自卫团的巡逻队。“你被捕了！”他们一看到我穿着志愿兵的上衣就喊道。我猛一下就挣脱了那个正想抓住我的穿制服拿长矛的小子。我抽出腰刀，挡住那群人，一边喊道：“志愿兵快到这里来！”听到我的喊声，好几个志愿兵立刻奔跑过来。这样，角色就很快替换了过来，这支巡逻队反倒成为我们的俘虏了。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多幸运呀！现在总不能再怀疑那天夜里就是要对我们动手了吧！”我以最快的速度，再次赶回到“巴黎旅馆”。我在门口被告诉说，贝克尔和司徒卢威正准备就寝。他们告诉侍役，不要再让任何人去找他们。但我是熟人，所以侍役们也没有给我制造什么困难。贝克尔这时还没有躺下，所以我能立刻走进去向他叙述我遭遇到的经过。我说：“现在就什么都不用怀疑了。他们抓我完全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人命令的。您和我一样，您和其他的人也和我一样，现在是生命攸关的时刻！”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向他这样慷慨陈词了，无非只是更激烈一些罢了。可是贝克尔非常轻视布伦坦诺这个懦夫，更瞧不起那些市民自卫团里的胆小鬼们。他过于相信这些庸人们由于

害怕志愿兵而不可能进行一次政变。我很快就看出来，我无法说服他。当我怀着无可奈何的痛苦感情告辞的时候，我的心如刀割。然而我并不怨恨我所爱戴的这位领导人，我不过是对他的魄力和勇气估计太高罢了。但是在我没有见到司徒卢威和在他那里作最后的尝试之前，我还不能就这样走了。我走上楼去敲他的房门。他正在脱衣，给我开了门。我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并且恳请他发出动手的信号。贝克尔接着也上来了。一切都是枉然。我又被他们说了一遍：“过于激动的小伙子”。“小伙子”！“年轻人”！啊，我在那个时候经常咬牙切齿地咒骂自己“为什么这样年轻”，就象我今天多么渴望回到那年轻的时代去一样。

我能做的，我都做了。以后事态如何，我也只能听其自然。一块滚动的石头势必继续向前滚去。我充满着烦恼与怨忿。在我脑海里想象着未来事情的各种图景。我迈步走向我的寓所。正当我离寓所还有几步远的地方，突然从黑暗中出来一个人把我喊住，挡住我的去路。在我还来不及把腰刀拔出之前，几个人一起上来动手把我抓住了。我认出其中有几个是警察局的官员。“根据政府命令你被捕了！”“就是我一个人被捕吗？”我无意中问道，但是他们没有回答。“我们奉命把你送到拉施塔特的碉堡里去！”这几个人的行为倒还相当规矩。我不可能进行任何反抗。他们把我带到警卫

总部(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在那里被解除了武装,也就是说,我的腰刀连同口袋里的小刀都被抄走了。然后他们把我带到火车站,那里已准备好了一辆特别的机车,牵引着唯一的一节车厢。那时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火车开走了。我已疲惫不堪,很快就进入了睡乡。

到了拉施塔特我才醒来。街道上已渐渐热闹起来。当我在两个护送人员之间向碉堡走去的时候,许多人好奇地望着我。我们遇到的一队士兵把我当作一个“普鲁士间谍”。有趣的事情开始了。我把那些辱骂坚决顶回去,而护送我也偏袒我。到了目的地,在为我准备的碉堡前,我被几百个士兵围住。我反反复复听到那几个不吉利的字:“普鲁士间谍!”我愤怒地提出抗议,并且作了一次简短的讲话。这次讲话使他们的情绪变得对我有利起来。护送我的人不声不响地默许我讲话。当我被带进碉堡时,他们友好地伸出手来表示歉意说:“我们也是迫不得已。”碉堡里布置尚好,由于把我当作普鲁士间谍的怀疑已经消释,所以对我也非常不错。那些看管我的士兵尽量设法让我心情愉快。我甚至还可以在白天随意自由出入。他们给我书籍报纸。这一天虽然过去了,但我还是坐在碉堡里。我问,从卡尔斯卢厄是否有消息来。他们回答说:没有。我想,他们也一定真的不知道,不然他们也就说

了。我早早地就睡了。三个星期以来，也就是说，自我从监狱出来，这是我好好地睡一觉的第一夜。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大白天。我高兴地望见外面一片金光灿烂。我感觉到自己有着那种上绞刑架前的幽默，安详地微微嘘一口气。随它去吧，万事听其自然——反正我已尽到了我的责任。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早有准备。将近十点光景，一个士兵进来报告：“审讯法官来了！”

话音未落，这位法官就走了进来。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曾告诉过我他的名字，可惜我忘记了。他还告诉我说，他是萨克森人，是从德累斯顿逃出来的。一个年轻的男人跟着他，是为他来作记录的。这两位先生在我的桌子的一边坐下，我在另一边坐下。我的那位临时的审讯法官从一个公文包里抽出若干张纸来，翻了一遍。在我说了我的姓名、身份等等之后，他就开始发问——显然有点尴尬。“威廉·李卜克内西先生，我已经告诉过您，对您提出的控告是，您曾经图谋行刺政府主席（确切的头衔我现在已记不清）布伦坦诺先生。而且您是要用我们在您身上搜到的那把匕首行刺。我们这里有您的凶器。您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话，您现在可以说！”

他尽量表现得公正诚实，神情严肃。虽然我从来不属于那些对一点点小事就大惊小怪的人，可是此时

此刻我真是张口结舌。物证摆到了我的面前。这是一把用鹿角做刀柄的大折叠刀，是当时最常见的一种刀；另一端还有用餐的刀叉、起拔软木瓶塞的螺丝钻、清除烟斗的器具等。我一切都明白了，这就是退尔·布伦坦诺*的箭！我的愤怒被这种难以形容的荒唐可笑的控告冲跑了。我禁不住笑个不停。审讯法官先生愕然地望着我。我一阵一阵的大笑就成了回答。

“请您把我现在说的话逐字逐句记录下来；

“全国最下流的无耻之徒是马提，他背叛了他党内的同志，成了警察的帮凶。

“全国最大的蠢驴是巴塞尔蒙，他看到了各种不愿看的人物。

“马提和巴塞尔蒙合并成一个人，也就是布伦坦诺。他出卖了他的党，成了警察的帮凶，看到了各种不愿看的人物。”

那位审讯法官先生脸上是一片惊骇！

“可是我怎么能把这些写进口供记录呢？”

“这就是口供！难道您想改变口供记录吗？”

于是这些话写进了记录，我接着继续口授（大致意

* 布伦坦诺的名字是 Lorenz Peter. 李卜克内西在这里称他为退尔·布伦坦诺，是合并了威廉·退尔的姓。威廉·退尔是瑞士十四世纪传说中的英雄。相传退尔是一个绝好的射手。他曾经把一个放在自己儿子头顶上的苹果射中。退尔的箭比喻危险的箭。



思是)。

“我不是一个刺客。几天以前，我和几个朋友在布伦坦诺先生那里。因为他用军法审判来威胁我们，所以我对他说，军法审判也是为你准备的！这句话说得清清楚楚。有一天晚上，我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抓住了。这时候我就完全能够肯定，布伦坦诺先生和反动分子沆瀣一气，准备发动一次反对人民、反对革命的政变。我公开申明，我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一切，以便发动一次自下而上的政变来对抗他的自上而下的政变。如果真能按照我的意见办，那末卡尔斯卢厄的市民自卫团早就被解除了武装，布伦坦诺先生和他的同谋犯也早就被捕了。同时，正如我曾亲自对他说过的那样，由于军法审判对他也同样适用，所以布伦坦诺先生也早就被送到军事法庭去了。而且我也早已宣判他的死刑并立即执行了这一判决。这就是事实真相。至于说我要用这把口袋里的小刀去刺杀他，那只能是最可伶的胆小鬼想象出来的无稽之谈。”

记录上的措辞经过了一些争辩，而且还对我在布伦坦诺先生住宅前作“可疑的徘徊”的原因进行了简短的盘问(布伦坦诺的住宅恰巧就在我的寓所附近)，然后这位临时的审讯法官带着他的助手告辞了。显而易见，这两个人也对行刺之说发生了疑义。他们当然对我所说的要判处布伦坦诺死刑的话也并不当真。他们

更担忧的是，如何把这样一份“闻所未闻的唐突的”口供记录交给那位布伦坦诺先生。我的一个士兵参加了这次罕见的法律程序，并且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的同伴们。这件事所起的作用是，成千的士兵聚集在我的碉堡周围。我的门被打开了。我不得不对向我热情欢呼的人群发表演说。我对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取得胜利。我们唱的那首歌《不是胜利就是死亡！》在我们面前成了血写的事实。参加过革命的每一个士兵，按照我们敌人的看法都犯有死罪。如果我们的敌人胜利了，那末你们每个人也就丧命了。因此我们必须胜利。而且如果我们能正确使用所有力量的话，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这是我在碉堡前的集会上第一次也是（目前来说也许是）最后一次演讲。它使群情激奋。“不是胜利就是死亡！”的誓言响彻云霄。有了这样一批“人材”，能干出多少事业来呵！

我的碉堡不再上锁了。那把巨大的钥匙就由我自己保管着。我脑子里翻滚着各种各样的计划；门是开着的，世界也是开着的；谁知道呢，也许一切都能变得很好呢。正在这时候，一位法院的官员走了进来，向我宣布恢复我的自由。命令是刚刚从卡尔斯卢厄用电报发来的。

我向那些士兵们和禁闭室的看守们告别，立刻赶到火车站。从卡尔斯卢厄传来各种自相矛盾的消息，

使我也茫无头绪。我曾一度担任过非军职的全权代表，因此我有权让人为我把专列的机车升火开行。我在暮色苍茫之中到达了卡尔斯卢厄。到了那里我才知道前后经过。

事情的发生完全和我预料的一样。布伦坦诺搞了一次政变。在我之后几小时，司徒卢威、贝克尔、伯宁和其他几个人都被捕了。志愿军团与市民自卫团之间的严重冲突，在最后时刻由于勇敢的戈格（我们在政府中唯一的一位朋友）的努力而避免了。他使双方达成了妥协。被捕的人立刻恢复了自由。在布伦坦诺答应采取强有力的主动政策的同时，志愿兵被派遣到纳甲河去向敌人作战，我也象同志们一样，在第二天上午跟着到了那里。许多人把这称为“放逐”。但不管怎么说，“革命行动”现在总算开始了，尽管为时已晚。

我的这一段回忆就到此结束。其他的内容不属于今天要讲的范围。

我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我的那位拉施塔特的审讯法官——他已经去世了。陪同他的那位书记官先生我也没有再见到过。但是他还活着^①，是他把我这一段历史讲给我的朋友布洛斯听的，而我通过布洛斯才回忆起这一段往事。司徒卢威久久不能忘怀他6月5日晚

^① 这位书记官先生的名字是斯楚哈尼(Szuhany)。在我看本文校样的时候，布洛斯告诉我，他不久前去世了。



上对我的责备，坚持认为我是一个“过于激动的小伙子”。可是那个老贝克尔，二十年以后，当他以代表身份参加爱森纳赫的党代表大会期间，我在瓦特堡附近的“高阳”山上和他谈到1849年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时，他富有哲学意味地说，“在当时，大概也说不上什么愚蠢”。诚然，他说的话是对的。

那件物证：行刺的匕首，我在被释放之后就重新得到了。这是我从动荡的革命岁月中，在革命失败之后，抢救出来的少有的几件物品之一。虽然我不再经常使用它，我还是把它保存到了八十年代。后来由于莱比锡的“小戒严”，把我赶到包尔斯多夫，在迁移过程中，这把小刀才丢失了。以后我千方百计想找到它，但毫无结果。

原载《1895年世界新历画报》(Der Neue Welt-Kalender für das Jahr 1895), 1895年汉堡版, 第43—47页。



一个女子和一个男子汉

这是我生活中一段“小小的回忆”；确切一点说，是两段回忆，但它们是密切相关的。

“疯狂”的1848年的九月，我和几个朋友在17日（从瑞士）越过了塞肯根的莱茵河大桥。在这之前，司徒卢威已经在勒拉赫渡过了莱茵河。我们几个人的全部装备就是一枝集体用的长枪，这还是我作为私人财产带在身边的。我们回去的目的是为了赶走德国的侯爵们，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开始几天情况还很好：群众对我们怀着友好的感情，地方政权则已沮丧气馁。从司徒卢威那里得到的消息说，人民群众都聚集在他的周围，他的“革命部队”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我们的情况也差不多。我们解除了敌人的武装，宣布成立共和国，把能打仗的人带走，这样我们很快就有了四千多人。我们跟在司徒卢威的军团后面急行军，期望能在黑森林赶上他们。但是这个希望没有实现。按说从湖滨地区来的第三军团这时也应该到了劳芬堡，可是我



们没有得到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相反的是突然流传出这样的谣言：司徒卢威由于前进得太远，被打败了。这就使我们非要弄到确实的消息不可。我们派了一个人到司徒卢威可能到达的地区去；另一个人，也就是我，朝东南方向去寻找神出鬼没的第三军团。

我很快就发现，事情并不象我事先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必须经过的一些村镇，有些是我们在向前进军的时候宣布过共和国的，此刻，原来的地方政权和其他与我们敌对的分子又回来了，而我们的人却还在战场上。有人认出我来，和我打招呼，但他们也并不都是友好的。有好几次我不得不强行通过。我乘坐在一辆敞篷车上，随时准备好武器。驾车人也同我一样。他是一个我信得过的坚定的志愿兵。到了塞肯根，从我们身后射来几发子弹，这对加快我们那匹迟钝的老马的步伐自然是十分有用的。关于“第三军团”，什么也没有听到，什么也没有看见，寻找它简直象大海捞针一般。但是各种各样的消息还是不断地传到我们的耳边，听上去不能使人感到任何宽慰。不过这仅仅是谣传，也许是有意制造的谎言。不管怎么说，我们要直奔劳芬堡去！到了那里我们就能听到可靠的消息了。

我们终于看到了最初出现的房舍。我们也很快看到了人们在奔跑到一起，他们显然是在观察我们。朝

前去！现在我开始看清了这些人的形象。他们中间没有穿军装的人，都是一些老人、妇女和儿童。当然，能打仗的人都“抽走”了。一个身材苗条的高个子姑娘急急忙忙地朝我们奔来，一边还不停地挥着手。她喊着，可是听不懂。看来她是要让我们停下来。对，我们停下车来。她飞奔着继续向我们跑来，一边向我们喊道：“你们不能再往前走啦！”我从车上跳下来。她走到我们身旁，胸脯还在气喘吁吁地一起一伏，其他的人也跟在后面慢慢地走过来。“你们不能再往前走啦！宪兵和边防哨兵们说，司徒卢威已经被打败了。”——“那么湖滨地区来的志愿军呢？”——“我们没有得到确实的消息，不过听人说，他们被冲散了。如果你们再往前走，你们就要完了。你们现在也不能再往回走，回去的路已被切断了。现在你们必须渡过莱茵河，然后在瑞士境内乘车到巴塞尔去。到了那里，你们再看吧。”——“不，这不行，我得去找我们的人。”——“啊，你不是从塞肯根过桥来的那支部队里的人吗？那里也有我的一个亲戚。”（我也是偶然认识她那位“亲戚”的，于是我告诉她关于那位亲戚的好消息，一直讲到离开军团以前的情况。）我们又探问了其他一些事情，最后她打断了我们的谈话：“现在已经不能再耽误时间了。你们必须立即渡过莱茵河。我来把你们渡过去。您别笑！我学过划船！”——“对，她还划得挺好呢！”乡民们异口同



声地说。她那矫健的形体和富有弹性的步态也都是最好的证明。

这时候我想到赫尔曼的窦绿苔^①。我是多么愿意站在这位美丽的女共和主义者的面前呀！她就象窦绿苔那样，带着一双闪烁有神的眼睛向我自告奋勇。我是多么愿意让她“拯救”我呀。莱茵河就在身旁滚滚流去，到了河那边就安全了，就自由了。可是我有重任在身！不！我不能渡过莱茵河去！我必须立刻回到我们的人那里，即使要花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我们热情地握手告别，把武器藏在干草里，从帽子上拿下红色的羽毛。“再见吧！给我们带来共和国吧！假如我是一个男人就好了！”这位勇敢的女船夫还在后面这样喊道。她的最后一个愿望是多余的，我只希望所有的男子汉都有男子气概就行了。“共和国万岁！”她喊着口号，重又走进狮子洞里*。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姑娘。如果她今天还活着，在给她的孙子们念这篇文章的时候，她一定会回想起那个穿着绿色上衣的年轻的志愿兵。1848年9月21日她曾经想把他渡过急流湍湍的莱茵

^① 这是指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的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Hermann und Dorothea”）中的女主人公。

* 走进狮子洞里（in die Höhle des Löwen gehen），是德语中常用的一句成语，意喻进入危险的境地，有点类似中国成语“深入虎穴”，但并不完全对应。李卜克内西在这里是指当时敌人复辟，对革命者来说处处都有危险。

河去。可是三小时以后，他在“塞肯根的号兵”^{*}客棧里被俘了。

好吧，现在我来讲另一个人物。那是在九个月之后，即1849年6月中旬。紧跟着九月暴动的是五月起义。抵抗从各方面调集来的政府军的战斗开始了。我们驻扎在海德尔堡，因为瓦格豪伊塞尔的那次会战^①失利了，我们没有守住那儿的阵地。当时正在准备那次著名的通过杜尔拉赫侧面的进军。我们都在市政厅里。那里异乎寻常地安静，简直是一种庄严的肃穆。大家都压低着嗓门说话。死神进来了：年轻的施略费尔躺在那里，覆盖着骑兵的大衣。他在瓦格豪伊塞尔战斗中率领他的一个营战斗时，一颗普鲁士的子弹穿过了他的头颅。遗体刚刚从战场运来。他的父亲，在最后一次吻了吻他之后，把他还在淌着血的头部盖了起来，默默含悲地站在旁边。

突然街上一片喧嚷，有人狂喊着：“奸细！奸细！”黑压压的人群蜂涌而来，大部分是士兵和志愿兵。他们

* “塞肯根的号兵”(Der Trompeter von Säckingen)是德国旧时一出戏的戏名，这家边境小镇上的客棧用它命名。

① 1849年6月20至21日在瓦格豪伊塞尔(Waghäusel)附近的一次会战，以巴登革命军的失败而宣告结束。巴登革命军以强行军方式，经过海德堡和杜尔拉赫作大弧度迂回，从而撤出了威胁他们的钳形包围。



中间有一个蹦跳着的家伙，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简直无法辨认。总之，是个惊惶失措的乱动着的家伙，全身上下都用布裹着，遮盖得严严实实。

这一群人到了我们这里后，有的挤到扶梯上大声叫喊着，有的奔跑，有的跌倒，你推我撞。那个难以辨认的家伙也进来了，后面跟着一帮狂喊的人群，他们也要抓住他。这是一个长得又高又大的女人模样的人，农民打扮，一顶女式软帽底下露出一张吓得变了形的脸，满脸的胡茬，裤子和高高的靴子露在外面。这个家伙绝望地走到我们中间。“是个普鲁士奸细！他正要溜到普鲁士人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在城门口把他抓住了！”他显然不是黑森林的农家姑娘，可是他那副样子也实在滑稽得出奇，使我情不自禁地失声笑了起来，而他那张脸和他那副违反警章的拙劣的化妆，说明他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奸细。

我们好不容易把威胁他的拥挤的人群劝开，开始了审问。这家伙不是一个奸细，而是一个“革命流浪汉”。当听不到嗖嗖的子弹声这种音乐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就到这里来闲荡；而一旦真正鸣枪开火的时候，他们就逃之夭夭。这家伙也是这样。他发现真的就要开火打仗了，而且所有的城门也都封锁了，他就在他住的旅馆里向那位侍候他的姑娘买下她的衣裙，于是打扮成现在这副样子。他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原来就是

他？一个德国诗人。我们所有的人早就听说过他，而且在场的人中还有一个和他本人认识哩。他站在那里显得多可怜呀！他任人摆布，任人嘲笑、讽刺和责备。但是他只恳求一件事，就是不要披露他的姓名。我们笑着把他释放了。但是这件事做起来并不象说的那么容易。外边等候着具有主权的人民，他们不相信我们的各种解释，一定要惩办这个“奸细”。于是我们不得不给这位化了装的诗人派去一中队强壮的志愿兵，以便他能回到他的旅馆重新换装，然后安全无恙地走出城去。

这个人我以后也没有再见到。但是他今天还活着，而且是非常的爱国，一直得到不少女人的欢心。他在各阶层广为闻名，以致他几乎可以对自己这样说：

我是一个德国诗人，
在德国的境内闻名；
说出那些最好的名姓，
也就是说出我的姓名。^①*

说起来，他倒是应该属于“坚强的男子汉”的行列，

^① 这几行诗出自亨利希·海涅的诗选，《归乡集，1823—1824年》。

* 见《海涅诗选》，冯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页。

而劳芬堡的那位姑娘倒应该是一个“软弱的女性”。

原载埃玛·阿德勒编，《青年丛书——为无产阶级的儿童们》(Buch der Jugend. Für die Kinder des Proletariats hrsg. von Emma Adler), 1895年柏林版, 第19—22页。



公元 1849 年瑞士流亡生活纪实

在最近两年的纽约《先驱者年历》上，朋友左尔格发表了他的《一个四八年人物的回忆》。他的这些回忆录也在我心中唤醒了某些回忆。在我眼前重又浮现出早已忘却了的人们。我和左尔格是在日内瓦相遇的，并且在那里共同生活了好几个月，有过许多交往。那时候，左尔格不仅每天记日记，而且始终保存着这些日记。可是当时我的情况却不相同。我被四处追逐，长期流离失所，以致当年的物品全都没有保存下来，甚至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留下^①。更痛心的是，我的全部珍贵的藏书都已荡然无存。因此完全是左尔格给我提供了回忆的基础，才使得我在日内瓦的流亡生活和活动现在又清清楚楚地、条理分明地展现在眼前。如果我真要动笔写的话，我就得按照一些朋友们的愿望，从

^① 对了，我记起来了，我留下了一张小的油画肖像。那是日内瓦的一个年轻画家茨瓦伦硬要给我画的。因为我当时已被逐出了瑞士，所以他把画给我寄到了伦敦。



无数的印象、人物和史实中选择一部分来写。

1849年7月3日或4日(我们“四八年人物”的主要活动是在“疯狂的一年”之后才开始的),由于普鲁士军队和帝国军队十分狡猾地回避正面进攻,而采取迂回战术绕过著名的“穆尔克防线”,我们在拉施塔特的那次会战中失败了^①。我们部队的主力,也就是没有陷入拉施塔特包围圈和没有继续向那里挺进的部队,要统统往南撤退。当时曾一度谈论过,要在黑森林地区展开一场“人民战争”,但是大家终于渐渐地考虑成熟,要越过“自由”和“中立”的瑞士(给这两个漂亮的词儿带上引号,是由于我们这些人都亲自领教了瑞士联邦当局的所作所为的缘故。今天的瑞士情况也还如此,但愿不要再让人给它的自由和中立带上引号,至少我是这样希望)。

部队的主力在前头开路。可是人员却很复杂,因为我们是由革命的风暴聚集起来的。但是我们互相之间并不陌生。我们总共有十二个人,其中有正直的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他再也不能纸上谈兵,侈谈未来的胜

^① 1849年6月29日,巴登-普法尔茨的革命军在拉施塔特要塞附近的穆尔克(Murg)战役中经过激烈的抵抗之后终于被迫撤退,这是因为一部分反革命军队越过中立的瓦敦堡地区从背后袭击了革命军。



利了)和他生死与共的妻子阿玛丽爱,有当过副官而当时还没有成为尚未问世的《罗美尔梯普夫》(Rummel-tipuff)杂志编辑的罗森勃鲁姆;还有教师内夫,一个活动能力很强并且非常坚决的年轻人,曾经非常卓越地领导过民团的一个营,直到该营在拉施塔特解散为止;以及始终性情愉快而随时准备冒任何危险的多尔杜(如果他年龄略大一些,我真会把他当作“福尔克尔·冯·阿尔蔡”^①(顺便说一句,他也是很好的歌手,自然他也写诗,就象每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人都爱写诗一样);最后是鄙人。我在那个时刻想得更多的是我和最心爱的人分离的痛苦,而不怎么想到失败的革命。

真是青年无德行么?难道革命就这样失败了不成?革命的旗帜不是还在匈牙利国土上空高高飘扬吗?勇敢的施瑞费尔所高歌颂扬的马扎尔族英雄的人民,不是正在驱赶着敌人的雇佣军^②,使得后者就象豺狼畏惧彼此合群的家畜一样吗?在拉施塔特不是储备了足够几个月的军粮么?难道不可以明天重新再干一场吗?是呀,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曾听到过数千次“明

^① 福尔克尔·冯·阿尔蔡(Volker von Alzeie)是德国古代传说《尼伯龙根之歌》里的人物。

^② 1849年4月,匈牙利议会宣布废黜哈布斯堡皇室在匈牙利的王位,并宣布匈牙利为独立国家。8月,哈布斯堡王朝依靠沙皇军队的帮助击败了匈牙利的革命军,并迫使革命军投降。

天再干一场!”的呼声。

可是我现在想到的是别的事情。由于突然爆发的起义把我从打开了的牢门里放了出来，我差不多在两个月前就离开弗赖堡了。那时我的内心充满着骄傲的希望和幸福的感觉，虽然我不得不在我在患难之中订婚的未婚妻分离。我不是作为一个胜利者离开的。谁知道我这次离别要有多长时间？未来有什么结果？下一步又会怎样？我站着的土地象地震一样在开裂。大地在震动摇晃。一切都还是疑团。未来是那样的纷乱，不管你如何想象，也无法从中勾画出一幅轮廓清楚的图景。但是青年人没有忧虑，这正是他们崇高的德行，与俗语所说的“青年无德行”恰恰相反。至于说“青年人没有忧虑”，这也许是不对的。我在青年时代就有过许多忧虑。当我1850年6月到伦敦的时候，党内有个会摸骨相面的好心的卡尔·普芬德，甚至在我脸上看到一种“痛苦的特征”。但是，这种忧虑和痛苦从来没有持续很久。如果忧虑和痛苦太严重的话，我手中始终有一根鞭子把它们驱走，甚至在伦敦饥寒交迫最难熬的日子里也是如此。这根鞭子就是幽默。这岂能说仅仅是出于轻浮呢？每当我无所适从的时候，幽默就象土地神一样不知从哪个角落呈冒出来。大家知道，幽默的孪生姐妹是忧郁。泪与笑同在嘛，流泪的汉斯和欢笑的汉斯是相辅相成的。谁能一只眼睛哭，一

只眼睛笑，那他他就是最幸福的人。打我成年时起，我就从未哭过（除了由于感动，例如在剧场里看到动人的演出而流泪之外）。我好象已经失去了哭的能力。我所说的哭，是指愤恨时的眼泪，也包括喜悦时（例如，色当战役之后在法兰西成立了共和国^①那种时刻）的眼泪。

可是我在弗赖堡经历了真正痛苦的离别。由于所有与我同行的人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要办，所以我们约好晚上十一点钟在我们临时投宿的“福梭巴赫旅馆”会面。还不能太迟了！因为，我们的人在城里只剩下很少几个，而这以前一直荷枪持盾潜伏以待的市民自卫团这时已纷纷爬出洞外，普鲁士骑哨也三两成群地在附近巡逻，还听说闵斯德城头已飘出一面白旗。虽然这一情况未必确实，但是我们必须采取防范措施，所以我们不能再迟疑，而赶快分了手。我为了防患于未然，把腰刀的刀刃和两支很好用的手枪（当时还没有自动手枪）的子弹盒检查了一遍，然后就登程上路。

十一点差几分，我就及时地离开了。我所得到的各种消息使我加快了步伐。街道上是一派可疑的情景，到处出现一些真实的巴塞尔蒙笔下的人物^②，不过

^① 1870年9月2日，拿破仑三世投降和被普鲁士军队俘获之后，巴黎人民在9月4日起义宣布成立共和国。

^② 这里是对自由派政治家弗里德里希·丹尼尔·巴塞尔蒙所说一句话的讽刺。巴塞尔蒙曾于1848年11月向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报



其中一些人物却是已故的巴塞爾曼不會害怕的，因為他們是他的好朋友。有一些人跟在我的後面，我不久發覺他們是在跟踪我。我聽到戰刀的鏗鏘聲，顯然是“大公爵”分子們認為反戈一擊的時刻到了。

我不願意和他們邂逅，趕緊跑掉。這時候，突然從鄰近一條街上出來三、四個人，站在我的面前。我也聽到他們身上戰刀的鏗鏘聲。我處在腹背受敵的位置，於是只好決心向前進。我每一只手上都握着一支手槍，朝着迎面阻攔我前進的人走去，用槍對準他們喊道：“讓開路！誰敢動我一下，我就開槍！”這話立見成效。巴塞爾曼筆下的人物都象他們當初被送上戰場去的伙伴一樣，帶着他們的佩刀象機靈的猴子般地乖乖撤退了。從這段滑稽可笑的小插曲可以看出，形勢似乎並不十分危險。我真想大聲嘲笑這些瘋狂地趁火打劫的治安隊，讓他們充當福斯塔夫的隨從^③是再恰當

告，他在柏林街道上看到了使人可怕的人物。他說：“這是一些我不願描述的人物。”

③ 這是指莎士比亞戲劇《亨利四世》中的一場戲（第二幕第四場）。在這場戲中，福斯塔夫硬充好漢，用他所謂敢於反對穿着平民服裝、化裝成行路強盜的威爾士親王亨利和他的親信波因斯的英雄行為來吹噓自己。

• 在《亨利四世》第二幕第四場中，亨利王子和波因斯化裝成酒保，而不是強盜。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亞作品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是愛說謊、愛吹牛而又胆小如鼠的庸俗強盜兵的典型。詳見《莎士比亞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五卷，第156—169頁。



不过了。

但是我没有时间来笑，我急于弄清同伴们的情况怎样？在街上我再也没有发现可疑的现象。不过在我走进旅馆以前，我还是侦察了一下。四周没有动静，旅馆的客房里都是好朋友。“你终于来了！你在什么地方耽搁这么久？”“我们真替你担心！”“我们已经等了一个多钟头了。”“城内已经不安全了。”“可是多尔杜在哪里？”“内夫呢？”一片乱嚷嚷的声音。这时候我才发觉多尔杜和内夫没有来。其余的人都比约定的时间略早一些回到了旅馆，因为他们觉得在外面不安全，他们也不愿让他们的外貌去惹人注意。

怎么办呢？自然是等候两位未到的人。我们一直等到十二点，等到一点，等到两点。

“我们再等一个小时就不能再等了！天一亮我们全会被俘的。他们很可能加入了哪一支志愿兵的队伍，跟在军队后面走了，要不……？”

我们等呀，等呀。闵斯德城的时钟敲了二点一刻、敲了二点半、敲了二点三刻，敲了三点！还是不见多尔杜和内夫。

我们再也不能等下去了，于是赶紧动身。我们已经等得太久，现在闵斯德城里真的飘扬出一面白旗了。在拂晓的灰色朦胧中，我们似乎感觉到有一种比昨晚更可疑的活动。小股的治安队不断增多，这尤其令人



深思。我们尽可能避开那些变得疯狂的治安队。我们这支队伍由一位家住近处的志愿兵作向导，加上十个男人、一个妇女，大部分都有武器；不少人，其中包括我，甚至还有枪枝，所以要是遇到十来个纸糊的冒牌兵，原是不必害怕的。但是根据经验，这些疯狂的治安队由于人数少，他们会产生一种盲目的怒气和胆怯感，因此他们就会拚命。他们这种胆怯的拚命比真有勇气的男子汉还要残暴。

话说回来。我们平安无事地出了城。可是这时候，我们的心情才开始真正感到不安。我们部队的最后几个人也早已动身离开了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行踪。我们只看到普鲁士的轻骑兵在我们面前来回穿梭，我们和部队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此外又增加了这样一层危险：虽然普鲁士军队还不敢进入市内，可是治安队现在都壮了胆，想干一些反动的勾当来讨普鲁士军队的欢心。毫无疑问，他们最希望能把司徒卢威认出来。谁要是能把司徒卢威交给普鲁士人，那他一定会红袍加身，得到重赏。不，治安队一见到红色就犹如惊弓之鸟，因此赏给他的长袍一定会选用另一种颜色。司徒卢威走起路来总是那个姿势。他的脸庞具有斯拉夫人和中国人的特点（他原本出生于一个俄罗斯人的家庭，但他的一双眼睛却是斜竖着的，象蒙古人的眼睛一样）。他在巴登的时候，和他终生的老朋友黑

克尔一样，整天叼着烟斗。

我们商量的结果，排除了去找我们自己部队的可能性。因为普鲁士人正在追赶我们的部队，他们自然已向四面派出搜索部队，因而我们会在会合我们的部队以前就不可能不遇到敌人。而我们十个人当中，大部分没有全副武装，其中还有一位妇女，就是司徒卢威太太。她虽然诙谐乐观，但仍不免担惊受怕和疲惫不堪。倘若碰到遭遇战，我们肯定不是处在最有利的地位。还有什么别的可选择呢？我们必须分成小股队伍从侧面前进，就象古代从海德堡到瓦克豪伊塞尔那次战役的大迂回进军一样，以便绕过敌区同我们的部队会合。不过这时候我们发觉朝南的通路都已没有了，所以我们决定乘车（在这期间我们搞到了一辆）朝西转移，并在布拉萨赫渡过莱茵河进入法国境内，然后察看形势，再从那里回到我们的部队。这是很艰苦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我们不想束手待毙的话。

我们顺利地到达了莱茵河。我们那位舍己为人的向导一直陪同我们到了那里，然后他就离开我们，回家去静候事态的发展去了。我们把武器埋藏在灌木丛里。当我向我的圆锥弹的枪枝（当时是最新式的，也是我在司徒卢威暴动那一年以前存下的私人财产）告别的时候，我心疼之极。我们渡过了莱茵河，进入法兰西“共和国”。“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这时正勾结德



国的各种反动势力准备推翻本国的共和政体，这对我们来说自然不是秘密。不过，我们打算依靠的是亚尔萨斯的共和派，因为最近几个月来，我们有不少确凿的证据，证明那里有共和派。曾经有几十个亚尔萨斯人穿着他们国民警卫队的服装，志愿投奔到我们这边来，热情地为德国的自由和统一而斗争。当时大家口中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现在属于法国的德国旧领土亚尔萨斯，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纽带’”。

使我们大为吃惊的是，边界上戒备森严，并不是象我们所预料的那样由国民警卫队守卫。市长佩着他的蓝白红三色绶带，带着一队宪兵接待我们。他说：“你们是难民！我们已得到严格的命令，不让任何一个巴登的难民过境。你们必须回去！”这位市长说着带有很重的亚尔萨斯方音的德语，但是他说话的神情显得还不是那么凶狠。“您这不是打算把我们引渡给普鲁士人吗？”这句话发生了作用。于是开始了磋商。司徒卢威立刻被区别对待。他看上去一点不象打仗的样子，他的妻子也完全不象一个战士，所以没有费多少周折，两人得到允许乘一辆车子，在一名宪兵的陪同下驶向巴塞尔。

这一件事倒很顺利。但是我们其余的人由于外表不大容易引起信任，所以我们的事就不那么顺利了。我们无法否认我们刚刚“打过仗”，身上穿的志愿兵上衣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何况还有一个人甚至穿着



全副军装呢。市长再三表明他非常同情我们。他说，我真愿意赶紧放我们走，可是巴黎早就下达了非常严厉的命令。路易·波拿巴显然要向欧洲合法的统治者证明，他应当成为他们的核心首脑。这位可怜的市长感到非常为难，他决定向巴黎打电报请示。于是我们被带进一家漂亮的旅馆，在那里受到优厚的款待。我们要在那里等候。

那里客人很多，不乏交际。许多友好的男人、妇女和姑娘们要和我们碰杯，或者希望我们与她们碰杯。倘若我们不会豪饮的话，我们真无法和她们干杯致意。没有多久，旅馆前面的街道上已聚集了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或者确切地说，是彩色缤纷的人群，因为当时在亚尔萨斯还不时尚黑色或灰色那种单调的颜色。而那些人的穿戴，尤其是妇女们，简直象彩虹一样的鲜艳夺目。突然人群活动起来，人们都向一个地方看去，接着一齐朝后退。有人喊道：“给市长让路！”市长在两个宪兵陪同下朝我们走来；走进旅馆，走进房间，他那张严肃的脸告诉我们不会有什么好事。他友好地向我们表示问候，然后说道：“先生们，我没有给你们带来好消息。答复是直截了当的：你们要么回到边境那边去，要么参加我们的外国人军团立刻行军到马赛^①去。”

① 也可能是土伦，我记不清了。



“这个畜牲！”我一想到波拿巴就出言不逊地喊道。市长装作完全没有听见这句侮辱他们未来国王陛下的谥语，而是耸耸肩膀说道：“事情可是不妙。你们是不愿回去的，是吗？那末你们只能参加外国人军团！”话听上去很生硬，可是脸部表情却没有说话那样冷冰冰。他使了一个眼色，示意我走进隔壁的一间房间，压低着声音说道：“这是巴黎玩弄的卑劣勾当！波拿巴这个无赖！我们这里的人都是很好的共和主义者。”他把声音压得更低了，“我这里随身带着的两个宪兵也是很好的共和主义者。您尽管放心带着你们的人到阿尔及尔去。如果你们觉得路太远，那末你们就到邻近的瑞士去。明白吗？”我一切都明白了。我们热烈地握手。我很快地把朋友们招到一边，他们焦急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会儿他们自然也明白了。为了使当时在场的观众对这一喜出望外的事不引起注意，我们还故意耍了一点花招。我们大声谩骂，心里却暗自好笑。我们扬言说，我们宁可去到阿尔及尔。我们一齐走出门去，那两个一直象石雕像似地守候在门口的宪兵跟在我们后面。人群中发出向我们致敬的声音，也夹杂着诅咒拿破仑是“无耻之徒”的骂声。我们就在这欢呼、握手、甚至拥抱的气氛中离去了。

当我们单独和监护我们的人（两个宪兵）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说，早在二月共和国^①以前他们就

是共和主义者了。拿破仑一当上总统，他们就想退役，只是顾到家庭生计才留下来。当在巴登的斗争开始的时候，他们真想打起行装投奔我们。但是他们听说我们那里乱七八糟，所以还是宁可留在家里。真可惜！如果法国的宪兵真能来当德国自由部队的战士，该是多么精彩的场面呵！

旅途是轻松愉快的，只是想到莱茵河那边的事才使我们感到心情沉重。旅途中，我们和护送我们的人愉快地谈话。我们说笑、饮酒，酒钱还是护送我们的宪兵付的哩。我们有时乘车（如果遇有机会），有时步行。他俩一直把我们送到瑞士边境。我们及时地到达了目的地。我们和这两个善良的小伙子握手，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几乎有点生气似地拒绝了我们的任何报酬，把我们送进“自由瑞士”的灌木丛里。这两名宪兵盲目地放了两枪，既向我们表示敬礼，也是为了防止万一，假使某一个目击者在远处看到了这一幕情景，那末这枪声就可以用来证明他们是忠于职守而采取了果断行动的。

我们到了巴塞尔市邦。对这个邦我们不指望有友好的接待。但是由于我们是从法国方面来的，我们遇到的困难要比我们想象的少一些。我们虽然被边防哨

① 指1848年2月25日推翻路易·菲力浦国王后成立的所谓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兵相当粗鲁地盘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并没有阻止我们继续往前旅行。而这时候我们也知道了巴登那几事态发展的详情。虽然消息和谣言混杂在一起，众说纷纭，互相矛盾，但是有一个事实是不用再怀疑了，即我们早晨还盼望着和他们联络的部队已经不能进行认真的抵抗了。如果它不想被后面紧追的普鲁士和帝国军队击溃的话，它就必须逃到瑞士境内。在所有瑞士的边境地点都已挤满了逃亡者。瑞士联邦的军队已奉命到边境地区去解除逃亡者的武装。除了枪枝和白刃兵器以外，我们逃亡的人还带着各种重要的军需装备和弹药。我们在瓦克豪伊塞尔和拉施塔特的炮兵，与普鲁士的炮兵相比占绝对优势。在欧斯我们甚至缴获了一门大炮（臼炮），并把这门大炮作为战利品带到了瑞士。

我们不愿意去参加解除武装。解除武装的过程从7月6日开始，一直到11日。在那个日期里，西格尔率领着部队在艾格利骚渡过了莱茵河。

从此以后，我又成了流亡者。我们还能反攻回去吗？革命的旗帜不是还在匈牙利飘扬吗？可是我们中间谁也不相信这种反攻一夜之间就能成功。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向何处去呢？我们大部分人都到苏黎世去了，但是我不能到那里去，因为九月暴动之后，苏黎世政府就把我驱逐出境了。我也

不能留在巴塞尔。我又没有兴趣到伯尔尼和洛桑去。只剩下日内瓦，自然到日内瓦去！又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在所有瑞士美丽的城市中，闪耀着两颗孪生的光辉超群的明星——苏黎世和日内瓦。苏黎世城边无比优美的绿宝石湖，就象她佩戴在胸前的一颗晶莹的宝石。请原谅我作这样大胆的形象比喻：它比我曾经给一位美女胸前佩戴的蓝宝石还大。除了苏黎世这一颗美丽的明星之外，另一颗明星就是日内瓦。日内瓦以她反映蔚蓝色天空的神奇美妙的莱蒙湖*著称。莱蒙湖是意大利与希腊之间的那部分地中海的缩影，她的美丽也毫不比地中海逊色。

苏黎世是最优秀最坚定的宗教改革家茨温格利**的城市。这位宗教改革家不是一般忍受苦难的殉道者，而是一位敢于公开为自己的学说进行战斗的殉道者。也正是在苏黎世这座城市，克罗卜史托克***发现

* 莱蒙湖，或译雷芒湖，即日内瓦湖。

** 乌尔里希·茨温格利(Huldrych Zwingli,1484—1531)，瑞士宗教改革家。1523年以后在苏黎世活动；1549年起，他的教徒和喀尔文教徒统一。

*** 弗里德里希·高特利普·克罗卜史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 1724—1803)，德国民族抒情诗的创建者之一，同情并赞颂过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但后期，特别是在雅各宾派专政时代，他逃避革命并放弃写作革命诗歌。作品有《他们，而不是我们》、《解放战争》等。



了在德国本土再也不可能找到的健康的德意志文化。苏黎世是使孱弱多病的德意志民族文化焕发青春的清泉。自从德国觉醒的民族精神和腐朽守旧的官方权谋进行搏斗以来，苏黎世就成了各种德国流亡者的避难客乡。

日内瓦是晦涩的宿命论者喀尔文*的城市。喀尔文宣称，人不过是受毫无意志的命运播弄的玩物（似乎这种命运比希腊神话中的天命更为冷酷），从而把人本身当成了悲惨命运的无可奈何的产物，这就是所谓神的“先定”学说。日内瓦也是忧伤的自然论者让-雅克·卢梭**的城市。卢梭认为自然将给予万物以健康，可是对于这付良药他自己并不笃信。这个可怜正直的让-雅克在他的《忏悔录》和《新爱洛绮斯》中，歌颂了莱蒙湖和爱情；他的《民约论》替以后爆发的法国革命中的空论家们提出了纲领。日内瓦是软心肠的人类之友吉约丁的城市。一扇日内瓦的落闭式窗户竟启发

* 让·喀尔文(Jean Calvin, 1509—1564)，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家，新教中喀尔文教的创始人。喀尔文教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利益。

**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法国作家和唯心主义的启蒙哲学家，法国大革命前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最重要的思想家。著作有《民约论》、《忏悔录》、《新爱洛绮斯》等。他原是瑞士日内瓦人，用法语写作，但从文化渊源考虑，历史上都把他列入法国作家的行列。



他设想到砍头用的铡刀；嘲弄人的命运终于使吉约丁的名字与断头台一道永垂不朽*。日内瓦从本质上来说，是江湖骗子内克尔**和他聪明的女儿斯达尔夫人***的城市。此外，伏尔泰也曾在这座城市的附近住了十来年。伏尔泰集中反映了当时法国的全部精神生活。他是一位诗人、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那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饕餮无度的太阳国王，曾经为自己说过这样一句蠢话：“朕即国家！”①，而我认为伏尔泰甚至更有资格说：“我就是法兰西！”

在暴风雨般的人民运动和思想运动中，各种从法国排挤出来的人都把日内瓦当作避难所。同样，从德国流亡出来的人则把苏黎世当作他们的避难所。

我自然到日内瓦去！况且我还从来没有到过那里

* 约瑟夫-伊格纳斯·吉约丁(Joseph-Ignace Guillotin, 1738—1814)，原是瑞士日内瓦人，以后成为法国医生。1789年吉约丁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提出对死刑犯人实行砍头法，用机器执行之，以减轻犯人的痛苦，这就是断头台的由来。“断头台”一词(La guillotine)即从他的名字得来。法国大革命时期，根据他的提议，于1792年3月20日通过法案采用断头台。

** 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 1732—1804)，法国银行家和政治家。

*** 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 原名 Staël-Holstein, 1766—1817)，法国女作家，银行家和政治家雅克·内克尔的女儿。她的著作代表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和歌德、席勒以及史雷格尔兄弟有交往。

①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亦称“太阳国王”。他曾经有过一句所谓的名言：“朕即国家！”(L'état——c'est moi!)



呢！到没有去过的城市要比到已去过的城市诱惑力更大。

到日内瓦去！谁一起去呢？我和三个同伴结成一伙；而且立刻制订出旅行计划。晚上我们还在巴塞尔，而第二天清晨我们就要穿过汝拉山脉和美丽的大山谷，步行到日内瓦去了。我们不需要许多盘缠，我们需要的我们也都有了。主要是我们有了一个好天气，而且还有很好的幽默情趣（虽然在巴登遭到了灾难）。这两件都是旅行中最必要的东西，尤其是徒步旅行中更不可缺少。

这是一次我从未有过的最美好的旅行。田园诗般的土地，阳光灿烂的、令人喜悦的夏天。我们是四个人：柏林的科恩，敖得萨的罗森勃鲁姆，哈姆的贝克尔（如今这三个人都早已在美国去世），我是一个“黑森的傻瓜”^①。我们四个人都是愉快的人（其他三个人甚至比我更开心），而且都是情投意合的。因为天气炎热，我们只是在早晚行路。烈日当空的时候，我们就在大岩石和大树荫下休息。我们不必为吃喝担忧，贝克尔把这件事照料得很好。他是一个出色的新闻记者（他曾经和吕宁在法兰克福的《德意志报》一起工作过），现在更是一名精干的司务长。罗森勃鲁姆和科恩，我在

^① “黑森的傻瓜”，早在十六世纪就有这一说法，常常用来嘲讽黑森居民的孤陋寡闻。以后也就一般用来指“愚陋的人”。



苏黎世的时候就认识他们了，而且在那次志愿兵从塞肯根向德国巴登的漂亮出击中，他们两人也是我的战友。那一次我们带着十三个男人和一支长枪，在三天之内征服了巴登四分之一的土地。尽管我们一路上进行着各种各样好坏不拘的戏谑和玩笑，罗森勃鲁姆和科恩还是感到心情有点压抑，因为那四瓣叶子的苜蓿花已经缺了两瓣：波克罕和科恩海姆不在了。这两个人也是从柏林来的，他们一起参加过柏林光荣的革命斗争，进攻过军械库。那次袭击军械库曾使我们大家坐了牢房。波克罕虽已率领他的骑兵炮队到达了瑞士边境，可他还得和他的部队一起留在那儿。而关于科恩海姆则毫无音讯，这使我们感到相当不安。我们只知道在瓦克豪伊塞尔战役之后，他和他自己的那个兵团营失去了联系。在撤退时他不仅丢失了他的部队，而且也丢失了他的恋人。因为他性情浪漫，我们担心他在寻找他的营部和他的恋人时可能遭到意外的不幸。

我要在此预先说明，他后来确曾幸运地重新返回边界去，干了我们相信他会干的那桩傻事，他的杜尔齐妮娅没有把自己的下落告诉他，于是他偷偷地潜过边界回到巴登，终于落到普鲁士人的手中，可是不久又逃脱出来。有一天早晨，他回到日内瓦，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除了眼神忧郁之外，其他一切还都显得健康理智。不管怎么说，是爱情把他治愈了。

我们并不急急忙忙地赶我们的路程。我们即使缓步徐行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在我们能够考虑到未来以前，我们必须先全面地看一看当时的形势，哪些是当时还不可能做到的事。

我们在旅途中自然随时阅读报纸。在勒·洛克勒镇和拉·休德封镇上，我们还遇见一些有文化的瑞士公民，其中一个在(拉施塔特附近的)穆克尔战线的激战前不久还去过巴登。我们在那里知道了我们部队撤退的新情况。我们的人当时已全部撤到了瑞士境内，并且正在向联邦官厅指定的地点转移。有一天中午，我们在一家旅馆里翻阅最新报纸的时候，在《卡尔斯卢厄报》上读到这样的消息：

“声名狼藉的叛乱头目、无耻之徒施略费尔的帮凶和朋友多尔杜，在瓦克豪伊塞尔逃脱了其罪应受的普鲁士枪弹之后，于逃往弗赖堡的途中被捕。”

现在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多尔杜那天晚上没有遵守诺言。关于内夫还一直没有消息。但是可以认为，他也和多尔杜一样被俘了。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虽然我们是在几个星期之后，在7月23日拉施塔特举行军法审判的时候才知道。正如在以后的起诉书中所披露的那样，这两个人是在前来找我们的途中被反动的市民治安队(也许就是那几个曾经尾随我的人)发现和抓住的。这两人已在弗赖堡被枪决。除了这两个年轻人之

外，军事法庭不可能弄到更贵重的牺牲品了。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出身于上层社会，一个诞生在一间农村的低矮茅舍；一个是柏林人，一个来自黑森林。他们为着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来了，肩并肩地参加共同的战斗，最后一道遇上死神。他们两人骄傲地昂着头，面对着死神，深信他们愉快地为之献出如此美好的、充满希望的年轻生命的事业必将取得最后胜利。我以前和内夫交往不多。他那沉默寡言而富于思索的秉性，以及从他宽额角下的锐利眼光中有力地表现出来的果断的决心，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行动也正好证明了他决心的果断。我曾经和他，这位无产阶级的国民学校的教员，作过一次长时间的关于学校任务的谈话。这次谈话使我相信，内夫非常理解教师这个岗位的崇高意义，并且认识到一个真正民主的乡村，必然来自对国民的教育。我永远尊敬与怀念他❶！

❶ 汉斯·勃鲁姆(Hans Blum)①在德国三月革命五十周年时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否定三月革命。他在文集中用下列的描述来刻画内夫：“他是一个来自吕姆林、只受过四分之一教育的乡村青年”。

① 汉斯·勃鲁姆是罗伯特·勃鲁姆*的儿子。罗伯特·勃鲁姆是一位正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11月9日在维也纳附近的布列吉腾脑(Brigittenu)被军事法庭处决。汉斯·勃鲁姆却于1897年发表了题为《1848—1849年的德国革命》的文集，在文集中诋毁革命力量。

* 罗伯特·勃鲁姆(Robert Blum, 1807—1848)，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领袖。1848年10月参加维也纳的保卫战，在该城被反革命军队攻陷后遭枪杀。

多尔杜，这个年轻的骑士式的英雄，我对他更熟悉。我想在另一个地方详细叙述他。这里只想提到，他的父亲就是那位在波茨坦担任最高法院顾问的多尔杜，他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国王有着私交，并且得到了国王给予多尔杜以赦免的许诺，命令将死刑改为徒刑。可是那封命令的电报晚了二十四小时才到达弗赖堡，那时死刑已经执行。军法处决是在“维莱”附近的墓地执行的。那块墓地撕碎了年逾花甲的父母的心。从此以后，这两位双亲再也没有经过那块墓地。他的父亲很快就辞去了职务。他对世事已漠不关心，只是在对他儿子的怀念中度过残年。

七月中旬我们到了日内瓦。我们在日内瓦遇见了许多熟人，其中有波克罕和科恩海姆（他回过边界去找恋人的那件蠢事就是在到这里几天之后发生的）。自从我们旅行以来，天气一直晴朗，以后还晴了一周。

我被介绍到阿勒贝尔·加莱那里去。他是瑞士联邦议会的议员，邦里激进党的领袖，格吕特利协会^①的创建人，是瑞士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我们到他的别墅里去拜访他。他尚未结婚，与他一个弟弟和一个同

^① 格吕特利协会 (Der Grütli-Verein) 是 1838 年创立于瑞士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工人组织。1848 年底该协会约有 700 名会员。



他一样没有结婚的姐姐一起住在那所别墅里。他的姐姐是个受人尊敬、非常有教养的女子。她忘我地为两个弟弟生活着。加莱三十四、五岁。他用年轻大学生的那种随和态度接待我们，所以我们立刻感觉到好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他的弟弟和姐姐也充满着同样的神趣。“你们已经有住的地方了吗？”那位姐姐问我们。“没有，我们昨天晚上才到日内瓦的。”——“那末你们一定不愿意在旅馆里住罗。你们一共多少人？”——“我们六个人。”——“那钱就花得太多了。这里附近有一幢两层楼的别墅，正好对着山上的景物，价钱便宜，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她说的“山”就是指瑞士的勃朗峰*。一幢别墅正对着勃朗峰！这听上去就象《一千零一夜》里的童话那么美丽。“那简直好极了。我们一定不会反对的！”——“好吧，那我得赶紧去！”她说到做到，一小时后就回来了。“一切都办妥了。当然我还没有向他们租下来，因为还得先让你们看一看那房子和花园。不过你们得花……”她说了一个少得可笑的数目。“你们想马上就去吗？”——“现在就去吧！”

我们到了那里，看了看房子，租了下来。简直迷人极了！一座非常宽敞的花园，园里绿树成荫，几百只蜥蜴爬来爬去，好奇地望着我们。别墅雅致舒适，屋前的

* 勃朗峰 (Montblanc)，亦译作白山，欧洲最高峰，海拔4807公尺。

阳台正对着巍峨壮丽的勃朗峰。

这以后我们在那里心满意足地住了几星期，只是巴登传来的凶讯还不时投到这恬淡朴素的田园诗般的生活中来，而军事法庭处决的枪声也毫不留情地使我们想到，我们并不是避暑者和游山玩水的游客。

在这期间，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也带着他的妻子一同到了日内瓦。他们那所非常合适的寓所就在我们附近，这样我们互相之间就可以不断来往。去年冬天，司徒卢威曾在监狱里把罗特克的世界史改写成了共和主义观点的世界史（我说他的世界史是从罗特克来的^①，这丝毫没有贬低他的意思），现在司徒卢威正在写一部关于巴登三次武装暴动的历史。他立刻着手工作，并且在难以想象的短时间内口授给他那位非常耐心的妻子。她的记录技巧真是卓越超群。有时候，我们要作一次愉快的乘车出游，去向她的丈夫告别（我们对她的丈夫并不总是这样敬重，偶尔也说几句笑话）。

^① 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于1856—1859年间在可堡(Coburg)出版了他的《九卷集世界史》(“Weltgeschichte in neun Büchern”),全书实际分成六册出版。司徒卢威这部世界史中的许多史料大多依据卡尔·冯·罗特克(Carl von Rotteck)的《从古代至1831年的世界通史》(“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 für alle Stände von den früheren Zeiten bis zum Jahre 1831”)。卡尔·冯·罗特克是自由派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他的世界通史于1831—1833年间在斯图加特分四册出版。



这时，她总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但是她对丈夫象偶像一样崇拜的爱情，使她不可能对丈夫的意愿有少许的违背，虽然我们也常常十分巧妙地怂恿她一起出去玩。

只有一次是成功的。司徒卢威不喜爱长途行路，可是我们终于动员他去攀登一次萨莱沃山*。这真是一次哭哭不得的冒险，因为差一点发生意外。

我们顺利地到达了山背后广阔的平地上，在阿尔卑斯山麝香草的芳香中来回奔走。这正是麝香草花盛开的季节。密密丛丛的麝香草高齐人膝，把宽敞的平地装饰得象一片紫色的花的海洋。在这个大海洋中只有偶尔几处露出巨大的岩石。突然间我们听到一声响亮而锐利的惊叫声。这是司徒卢威太太，她刚才还在高高兴兴地唱歌，这时候吓得脸无人色，拼命地奔跑过来：“救命呀！牛来了！”果然，在她后面百步远的地方出现了“那头牛”。它把牛尾翘得高高地飞奔而来。“赶快扔掉你的阳伞！”我朝着她喊道。显然是她那把火红色的阳伞惹起了这场可怕的意外。说起那把阳伞，以前就被经常用来象征红色共和国，从而激怒过好些留恋秩序井然的生灵。可怜的爱阿玛丽简直是被吓怕了，以致听不见我的劝告。我是靠她最近的一个人，

* 萨莱沃山(Mont Salève), 意谓“大山”。



因此赶紧跑过去将她那把倒楣的阳伞扔掉，并且选了一处石岩让她登上去躲避。不一会，我们都登上了那片石岩。司徒卢威太太被带到岩顶。笨重迟钝的古斯塔夫也到了岩顶上，只是花了更多的力气。我们还在后面向岩顶攀登。这时候才真正危急哩。我们那个暴怒的敌人顿时就将那把倒楣的阳伞用犄角撞得粉碎，接着用牛蹄践踏着。它气呼呼地站在我们的临时要塞面前。这片大石岩对它的角来说太硬，对它的腿来说又太高。我们的敌人几次尝试都遭到失败之后，决定采取一种军事策略：就地困敌。我们相信它是这个意图，所以觉得情况相当不妙，因为四下里看不到管牛的人。我们只好心安理得地顺应形势，认为我们暂时是安全的。这头牛也终于渐渐明白，它对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也许在它的同类中，它还算是个知识分子哩。而我们这些两条腿的国王们，往常也太低估了它们的智力。最后，它骄傲地抬起那曾经凶狠地咆哮着要进攻坚硬石岩的头，耀武扬威地摇了几摇，终于慢吞吞地、威风凛凛地撤退了。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总算不必在这块奇遇的石岩上度过天气美好的一个白昼甚至一个夜晚了，不然的话，那真是大煞风景。当时有人出过主意，让我们中间的一个人跳到它的背后去。可是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力量把这个进攻者赶走。这头牡牛显然不是一



位惯于一见钟情的神，它不久定会发现，无论哪个德国的志愿兵都不是那位欧罗巴女神^①，哪怕他用的是欧罗巴的名字。再说，我们中间也没有任何人跳到牛背后去，就是那位本来很想跳到牛背后去的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也没有这样做。我们又等了一会儿，直等到那头牛三番五次地回过头来环顾四周，最后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为止。当我们确信这头牛的撤退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策略时，我们才从石岩上跳下来或爬下来。司徒卢威太太伤心地把她那把红阳伞的碎片收集起来，准备留作纪念。我们开始动身回家。我们原想在萨莱沃山背后的那片大得出奇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平地上一直呆到日落，可是我们的兴致由于遇到这个四条腿的凶恶的敌人而完全消失。我们从石岩上下来，虽不十分容易，但总算没有发生意外的不幸。大家的兴致都非常好，而最感庆幸的自然是最担惊受怕的人。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天，这一点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也不得不承认。不过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去登过萨莱沃山。今天，司徒卢威已经去世了。他去世已经有二十多年。由于对他有着许多错误的评价，人们也把他

^① 欧罗巴在希腊神话中是一个女人的形象。她是腓尼基的一个国王的女儿，主神宙斯把她变成一头温顺的牝牛，带到克里特。从此以后地球的这一部分即以她的名字命名，称为欧罗巴。



忘却了，因此我将要在明年的《年历》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他的生活和工作的短文^①。黑格尔对罗伯斯庇尔有过这样的评价：“然而在他身上能够称道的一点，是他做一切事情都是如此一丝不苟！”这句话再也没有比转用在古斯塔夫·司徒卢威身上更恰当的了。他以前是怎样一个人，也应该让今天活着的人知道。

他的妻子今天也去世了。但是她那雍容美丽的身貌今天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大约三十年前，当她已经去世以后，她那样的一双闪烁有神的黑眼睛还最后一次望过我。那是1869年在维也纳的事。当时我正在那里参加新闻记者代表大会^②，并协助筹备下一次的代表大会。我在那里偶然得悉，我久未见面的司徒卢威正住在维也纳。我立刻打听到了他的住处，飞快地奔到他那里去。在一间四层楼上的房门前，我看到贴着一张名片：古斯塔夫·司徒卢威。我敲了门，房间里有了些轻微的响动，好象在整理什么东西似的。门缓慢地打开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张着惊奇眼睛望着我。这双眼睛我是那样的熟悉，使我的思想飞回到了二十年以前。不过，我还是意识到当时要办的事，“司徒卢威先生在家吗？一个老朋友想见他。”——“噢，爸爸在家。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她的声音又使我

① 李卜克内西的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② 1869年7月下旬在维也纳召开了德国新闻记者代表大会。

回想起昔日的情景。“你妈妈呢？”我有点不好意思地问，因为我先前听到过各种关于他们夫妻不和的说法。“妈妈？啊，妈妈已在美国去世了！您请进来！”

我走进一间陈设极其简朴的房间。我还没来得及及张望一週，古斯塔夫·司徒卢威就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了。“啊呀，是李卜克内西！你可真一点都没有变！”——“你也没有变！”当我们握手的时候，我只能用这种一般的回答表示好意。说真的，如果他在街上无意之中突然碰到我，我是能认出他来的，只不过他的早已稀疏的头发变得更加稀疏和灰白，身躯已经有点微微弯曲，容貌显得更严峻罢了。这是他侨居的那个“新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在那个“新世界”里，从不容许有任何一点含糊不清，一切都要求严格认真，甚至能使心肠最软的人变得冷酷起来。他其他的一切，包括他的思想观点，都没有变。他说，必须把所有坚决要求进步的朋友团结在共和国的旗帜下；普鲁士是最凶恶的敌人，无论如何要摧毁它。正当他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朝窗外望去。我幻想着看到窗外银白色的勃朗峰还象卫士守卫着天国那样，守卫着阿尔卑斯山。可是映入我眼帘的不是勃朗峰，而是圣·斯特凡的尖塔。因为此刻我们是在维也纳，不是在瑞士；是1869年，而不

* 指美国。

是1849年。二十年时间过去了，可是它在司徒卢威思想上留下的痕迹，要比他身体上留下的痕迹更少。社会主义运动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不理解社会主义运动，也根本不注意它。

因此我们的谈话很快就转到个人的经历上去。自从我们1850年夏天在(伦敦的)贝斯沃特分手以来，我们就分道扬镳了。他在爱尔兰他的一个有钱的兄弟那里(他的兄弟是研究头颅的骨相学家，但是他不仅摸头骨，而且对心情不好的司徒卢威太太也过分殷勤)住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就移居到美国去了。司徒卢威在美国过着简朴的生活，并且有了一种怪癖：迷信能使人清心寡欲的蔬菜食物。在反对美国南方各州奴隶主的战争^①中，他勇敢地为解放黑奴和美国的统一而战斗。战争结束以后，他又重新渴望返回欧洲，因为他对美国的生活还是不能适应。而当他的妻子死于慢性病后，他就更不愿再留在“汪洋大海的彼岸”了。他的妻子很晚才给他生了一个酷似母亲的女儿。于是他带着幼女到了英国，不久又从那里到了德国，而且到了可堡。他在可堡和施特赖特图出版社建立了联系，并在那里生活了好多年，完成了他的《世界史》的新版工作。他

^① 这是指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这次战争以工业先进的北方各州战胜分裂主义的南方各州而宣告结束。战争的结果导致了奴隶的解放，并为美国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除了对他的世界史作了修订和补充外，还从事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写作，但都没有特殊的成就。他对德国的情况逐渐陌生了。他不再有精力，也没有卑躬屈膝的精神去适应德国新的情况，更不可能依据新的情况去进行什么改革工作。1866年普鲁士容克和内阁的政策使他的一切梦想和希望幻灭。这以后不久，他就迁居到维也纳。本来他是希望搬到德国南方去的，可是他觉得在德国南方没有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找不到政治上的归宿，来弥补他已经失去了的一个象样的家庭。他的小女儿当时不到十二岁，还不能料理家务。又因为她长得和母亲一模一样，这就更使他经常想念她的母亲而引起痛苦的感情。孩子长得多么象她的母亲呀！这个小女儿开始的时候对我还有点胆怯和不信任，但是很快就以那种孩子特有的敏感，觉得我是一个老朋友。她紧紧地偎依着我，张着大大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琢磨着我。这完全是她妈妈的一双眼睛！唉，她妈妈！她妈妈曾经遭到过无端的嘲弄、诽谤和辱骂。这一帮反动的流氓们简直把她说成是一个淫妇，甚至把我的名字也和她连系在一起。没有比这更为卑鄙无耻的谎言了。由于我在一定程度上算是一个权威性的证人，所以我利用这一个机会郑重其事地声明：据我所知，在那流言蜚语最多的时候，她背后受到的种种非议，有些是出于恶意的中伤，有些则是毫无意义的播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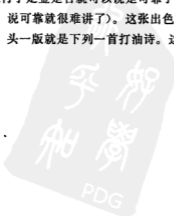


是非。司徒卢威太太活泼愉快、性情开朗，这完全是她正当的生活权利。但是她也象一些男人和有些富于牺牲精神的女子那样有勇气。而且她也是一位忠实的妻子。她从来没有用言词，更不会用行动来玷污一个温柔女性的最高品德。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还不尽兴。当我们热情地分手的时候，都表示希望不久能重新见面。小女儿把她可爱的小脸凑到我的跟前，让我吻吻她的额角。我沉思着回家。

以后司徒卢威没有给我写过信，而我也没有给他写过信，尽管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几年以后我从报上得悉：他去世了。

话说回来。我们在那所别墅里一切都是很美好的，而更幸运的是，一切令人憎厌的消息也总算有了尽头。有一天（那天天气不好），我们终于发现我们的经济状况和这幢面对着勃朗峰的华丽的乡村别墅之间，有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必须在城内去找诗意略少一些的住宅。这时，我的那些同伴们要出版独特的《罗美尔梯普夫》(Rummeltipuff)的计划成熟了。必要的纸张已经搞到，稿件也有了，可靠的印刷者也找到了（付了定金是否就可以说是可靠了呢？——付定金容易，说可靠就很难讲了）。这张出色的报纸出版的时候，头一版就是下列一首打油诗。这首诗是由朋友左



尔格为后世的人抢救出来的。诗的原文是：

“Reich an beißenden Gewürzen,
Unerschütterlich im Spott,
Märchenhaft im Zeitverkürzen,
Mutig für und wider Gott,
Engelgleich in Phantasien,
Lächelnd in dem größten Pech,
Trotzig gegen Apathien,
Immer gleich und immer frech,
Prahlend, blitzend, amüsierend,
Unterhaltend jedem Ohr,
Fromme Heuchler ennuyierend,
Führen wir dies Blatt euch vor!”

（“我们有的是刺鼻的香料，
冷嘲热讽从不动摇，
消磨时光妙趣逍遥，
还有胆量把上帝贬褒，
在幻想中自比天使，
倒了大楣还在微笑，
我们反对淡漠无情，
我们玩世不恭、素性豪放，



我们打扮得漂亮夺目、潇洒俊俏，
跟谁都能谈笑，
让虔诚的伪君子们去摇头叹息，
我们将这张报纸向您献上！”)*

这首诗的每一行的第一个字母组成了这张报纸的刊名，而全诗的内容则说明了办报的宗旨。

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还出过多少期。我只记得就出过那一期，而左尔格说出过两期。我当时没有参加他们的编辑工作，因为我不相信我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我大约为了一本小书画了不少素描，而伯尔尼的著名书商耶尼很愿意出版这本小书。可是这本书终究未能出版，而且我们再也没有看到过我们的手稿，至少我是再也没有看到我画的那些素描稿了。

自从我们在乡间别墅度过了一段富有诗意的生活

* 1848—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之后，曾参加过这次起义的一批大学生流亡到瑞士。他们并不愁眉苦脸，而仍然是无忧无虑，并且形成了一个小组，自称“碗碟帮”。这些大学生在1849—50年的冬天，曾以他们那种玩世不恭的幽默性格迷住了日内瓦的漂亮的姑娘们，并以他们放荡不羁的行为吓坏了瑞士的庸夫俗子。这些大学生还出版了一份刊物《鲁美尔梯普夫》(Rummeltipuff)。在该报第一期出版的时候，曾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首诗，以阐明报纸的宗旨。这份报纸的刊名就是用这首诗的每一行的第一个字母从上往下排列组成，因此这个刊名本身毫无意义。从这里也反映出这些大学生浪漫的幽默性格。参阅弗·梅林，《马克思传》，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73页。

之后，我就单独一个人住了。我过着相当相当节俭的生活。这时候我才真正有可能静下心来考虑我的处境。虽然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带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但是它总不会是老用不完的；而在可望的时间内也没有重返德国的可能，因为军事法庭正在巴登进行血腥的屠杀，国内是死一般的静默，所以我必须作长期流亡的打算。

在九月暴动之前，我曾希望在苏黎世通过法学博士的考试。可是后来便根本谈不上什么法学了，因为苏黎世州政府已经把我驱逐出境。我对于写作总觉得索然无味，也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从来就有点讨厌作家或者什么文学家这样的名称。此外我还常常想起，那份可怜的不伤害任何人的《罗美尔梯普夫》(Rum-meltipuff)的诞生竟有多么痛苦；它寿命虽短，却经历了人间坎坷不平、荆棘丛生的道路。这一切使我确信，写作这玩艺儿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既不是一片铺满黄金的土地，也不是一条夹在玫瑰花丛中的甬道。诚然，我写过一些东西，也发表过一些东西；有些东西我自己还非常欣赏，认为是独具慧眼之作呢，可是我从来没有为这些作品而索取过一芬尼报酬。“为金钱而写作”是违反我的意愿的。我认为该写什么，我就写什么，而不贪图当一个作家。我从未抛弃过教师这个职业，而且很早就献身于这个职业。1847年，我就开始在苏黎

世泽弗尔特的弗吕贝尔模范学校当义务教员，进行实际工作了，并且得到了成绩优秀的证书。后来博伊斯特接管了那所学校，而且至今还办得十分兴旺。

从我童年时代起，我就爱做使用器械的手艺活，甚至有一个长时期还竭力反对过“读书”，因为我曾经在一个与我父亲邻居的细木匠那里学过手艺，觉得手艺活比“动脑子的事”更使我喜欢。我当了大学生以后，还在吉森正式拜了一个木匠为师，正规地学了半年木工手艺，准备以后到美国的边缘地区去盖木房。此后，我又在马尔堡一个制枪师傅那里制作长铳枪的扳机，甚至还发明了改造锥形子弹的更好的方式，即在整个弹体的后半身开一个环形槽，这样就能在火药变成内燃气体之后，更易使弹头和弹壳分裂，而将弹壳脱落下来。可惜在我和我的师傅想到专利权以前，法国早就有了这项发明，并且已经在米尼埃式长枪中加以应用。所以说，这种使用器械的职业和我的心眼比较接近。

我这样想来想去，突然好象有了一个希望：去当排字工人！这个行业还和作家的工作沾边，而且要养活一个人是不用太费事的。至少我听说过有闲着的作家，而没有听说过有闲着的排字工人。我在日内瓦认识一位印刷所主人，他常常带我到他的印刷所去。于是我就去请他帮忙。他带着有点古怪的笑脸答应说，

他很愿意帮我的忙，并且把我推荐到一个我也认识的有经验的排字工人那里。第二天上午我就去上班。我的那位排字工人老师在我身上真是花了不少力气，费了不少工夫，我都简直难以形容。我自己也努了许多力。第一天晚上我自己感觉到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因此第二天我就更加努力。可是到了晚上，我对我的进步就不如头一天那么满意了。第三天我决心全力以赴，拚命也要超过头两天的工效。但是到了晚上，我不得不对自己说：你要能赚到一芬尼的话，还得花几个月的时间哩；而你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排字工人，起码也得等上一年。在这一段长长的学艺时期里，你将什么也干不成！

这样的牺牲太大了。尽管我尚未遭到饥饿的威胁，可是日内瓦的流亡生活难道还能让我笑容满面吗？未来将怎样呢？*Qui vivra verra!*（只有活下去才知道！）于是，我到这位朋友那里去表示歉意：“我必须放弃这项计划，这……”他没有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这事我早就料到了。我只不过先让你自己尝试尝试罢了！”

我替自己找了一些文字工作，而且从马志尼（我是在司徒卢威那里遇见他的）那里得到许多需要翻译的稿件，另外也有一些是需要自己写的。自然报酬不会很多，但是工作却老有得做，这样我就能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钱。所以我又把未来看得非常美好，而且毫无

疑问，我也不能在“硫磺帮”（它曾因吓坏了帝国代理人福格特而举世闻名）里作一个闷闷不乐的成员。

“硫磺帮”里还有我么！一点不错，我也是“硫磺帮”的成员。我和他们一起尽情地痛饮，尽情地嘻笑，这样也就完成了我作为一个成员的一切义务，因为其他的义务我们是没的。我在这里强调指出我是这个团体的一分子，是因为以前有人对这一点有过怀疑或者有过争论。我可非常高兴承认这一点，就好象别人欢喜把这当作我的罪愆一样。我只希望，我这样做会使我更愉快。那位卡尔·福格特简直跟他视为不朽榜样的高贵的福斯塔夫一样，在上帝面前是个十足的酒鬼。他把别人喝的每一滴酒都看作是从他那处偷来的。显然，他认为我们“在上帝的酒山上的豪饮”是“不声不响地和他比赛”，否则的话，我就无法解释他那幼稚可笑的、达到疯狂程度的愤怒。他那疯狂的程度，使他把我们完全是非政治性的携酒漫游，看作是反对帝国和帝国代理人的可怕的阴谋活动。不过现在我也可以承认，我们那种吃喝玩乐的漫游有时也组织得象军事训练一样，气派过大了。

此外，他对我还有一些完全特殊的不满。首先，因为我也是来自吉森，因此我就是个了解他底细的人。其次是因为我除了参加“硫磺帮”的各种活动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活动也使他同样感到不愉快，其中之一就

是我参加了日内瓦工人协会。我参加的意图是要把这个协会重新提高到原有的水平，因为它在当时德国年轻人和共产主义者所进行的斗争中，曾经是国外最重要的一个德国工人协会。我甚至想尽可能把这个协会的水平提得更高一些，以实现我最心爱的理想——把瑞士各地的所有德国工人协会合并成一个统一的组织。当时的时机是非常有利的。在流亡者的人群中，有许多能干的人物，其中还有巴登的士兵。而且我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我在那里讲课，讲《共产党宣言》，讲关于民主党人和按比例选举的问题（由于不久前，孔西德兰写了一篇这方面的文章，促使我去讲这个题目，我那时的论述就已经完全和今天的论述一样）等等。此外，我还作了不少关于德国当时政治动态和最新形势的报告。这一切吸引了无数善于思考的听众。协会一星期比一星期迅速地发展壮大，一个天色很好的晚上，我当选了协会的主席。不久，各个协会成功地合并在一起，我被选为联合会的总裁。

由于我反复强调共产主义的立场（今天我们则称之为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更由于我对议会主义者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而把巴登起义和德国革命的失败主要都归罪于议会主义者（尽管这是愚蠢的），因此我招惹了议会主义先生们的刻骨仇恨，于是他们就谋划着无论如何要把我除掉。为此，他们把秘密反对我们的人派

到协会里来，充当协会的会员。他们以为只要这些会员达到一定的多数，他们这一小撮反革命的首领就能钻到协会里来当会员了。我们可不是瞎子。一旦疮疡溃脓成熟，我们就要开刀。在一次人数众多的协会会议上，我搁下重要的事务性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问题，明确规定了争论的要点，要求摊牌。我的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使反对者们大为吃惊。莫里茨·哈特曼代表他们作了解释。他说，他们感到很意外，是否可以把这次较量推移到下次会议上去。好！我对自己的事业已经有了把握。“那么也得赶紧，就在明天！不能旷日持久地拖下去！”最后以绝大多数通过了这一决定。这样也就取得了一半的胜利。

在作最后决定的会议上，敌对的两派都动员了全部力量。这次会议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会议开始前一小时，宽敞的大厅里就已经挤满了人，而且人群还继续不断地涌来。邻近的各个房间里和楼梯上都挤满了人，甚至一直挤到街上；街上还有几百人在来回走动。会议在鸦雀无声的紧张气氛下由副主席宣布开始（当然我事先就放弃了主持这次会议）。副主席提议先让哈特曼讲话，然后我再发言（这一点是双方事先就已达成协议的）。辩论就这样开始了。不过，在反对派和我发言完了之后，双方还可以有五分钟左右的时间作终结发言。这一点大家也都一致接受了。



哈特曼，这个“毛里茨乌斯小僧侣”^①，象所有的奥地利人一样，是一个能说会道的演说家（幸亏他还象所有的奥地利人那样，是个可怕的玩弄词藻者）。他开始来了一段序曲，其中无非是当时流行的一套标语口号，但还竟有人报以掌声。接着他就唱了一番赞美歌，歌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和可怜的多恩勒斯馨*——德国。他尽量地玩弄了一通辞令，最后才讲到本题。他列举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伟大业绩。他说，如果不是那些放肆的可恶的“革命者”敌视每一项制度，把一切都毁坏了的话，那末最美好的事业肯定早就成功了。然后他唠唠叨叨地讲了整整一个钟头，数落我们的、尤其是我的罪状，说我们是“疯狂者”、“无政府主义者”、“亡命之徒”（这些咒骂在当时已经相当流行）；说我们在法兰克福、巴登和德累斯顿等地的起义，给美好的自由的种子带来了黑锈病；说由于我们疯狂的行动阻碍了为战胜敌人所必需的各阶层人民的团结统一；此外还说了许多蠢话。我个人也受到了指责，说我为了蛊惑的

^① 1849年莫里茨·哈特曼用“僧侣毛里茨乌斯”(Pfaffe Maurizius)的笔名发表了那篇政治性的行乞歌《僧侣毛里茨乌斯的叙事诗》("Reimchronik des Pfaffen Maurizius")，讽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弱点和缺陷。

* 多恩勒斯馨(Dornröschen)，意译为“有刺的蔷薇”，是一篇著名的同名童话的主人公——一个美丽公主的名字，她曾睡眠一百年。此处隐喻德国沉睡了一百年，较之欧洲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还非常落后。



目的而拉拢工人，为了某种疯狂的行动要把工人们送到屠案上去。真是天知道！这番夸夸其谈的讲话以更有力的言词结束，可是它并没有把群众的情绪点燃起来。大声的鼓掌之后，紧跟着的是一片更加响亮的嘘嘘声。

要作出回答对我来说并不难。只消把他发言中仅有的一点实际内容加以反驳，就能把其余的废话象肥皂泡似的统统吹掉。我掉转矛头，列举了议会的和议会主义者们的各种罪状。我指出，正是因为法兰克福这个“清谈馆”里的大多数人不了解社会问题，不懂得革命的本质，才导致德国革命运动的失败。在我结束讲话的时候，我热情地呼吁工人们——这唯一能够责无旁贷地承担社会革命的人们，立刻摆脱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先生们，否则他们终归不可避免地会被这些资产阶级先生们有意或无意地出卖掉。

我在讲话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我们取得了胜利，因为我的讲话象磁铁似地吸引着深受感动的听众。讲话结束时雷鸣般的掌声，压倒了所有的反对者。原先准备要展开讨论，此时也放弃了。只是哈特曼和我还应该再作一次发言。哈特曼的发言远远超过事先给他规定的时间。虽然他的讲话比他第一次的主要发言实质性强些，然而总也避免不了他惨遭失败的命运。我的发言只用了几分钟来归纳和强调了一下重点。表决在群情激奋的状态下进行。议会主义者没有得到四分之



一的赞成票，于是悻悻然地溜走了。从此以后，他们所有的人也就逐渐退出了我们的协会。

但是此事并未罢休。他们以后还是告发了我，说我有朝一日要利用工人进行冒险活动。这支哈特曼先生没有射中的箭，被卡尔·福格特先生捡起来了，而且把它削得更尖，涂上了毒药。这是我在几个月之后遇到的事。但是在我叙述这件事情（它构成我在日内瓦田园诗般的流亡生活中的最后一章）之前，我还必须先提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或者确切地说，一件并非偶然的事。这件事是朋友左尔格提醒我的。他写信告诉我说：有一天晚上，我把他引进我的住所，接受他参加了一个“同盟”。至于是个什么“同盟”，他说他已经不记得了。我本来也把这件事情忘记了，但是现在却记起来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同盟”不是一个老的无产阶级的秘密团体。当我参加政治生活的时候，《贱民同盟》已经解散，我也不愿参加魏德林的《正义者同盟》，我是到了伦敦才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接纳我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这里就有着一个小小的阴谋。这个阴谋只能用这样的话来说明：总有那么一些蠢驴，被人利用来反对我！

十一月份要在日内瓦举行联邦议会的议员选举。保守党人四处煽动，要把可恶的詹姆斯·法齐的政权抛弃。而激进党人则有理由相信，这些虔诚的先生们



在必要时甚至会不惜举行一次暴动，所以就必须先进行防范。于是他们通过加莱，向贝克尔（这个贝克尔就是我们的“约翰·菲利浦”。他在日内瓦用和平时期的酒馆老板的按铃代替了战争时期的长官权杖）、波克罕（这位退役的炮兵上校和炮兵中队司令）、还有两三个流亡者，其中包括我，介绍当时的情况，并且询问我们，如果出现暴动，我们是否准备支持“激进党人”。其实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而且热切地盼望着能立刻行动。我们从州的军火库里得到了武器，从大炮到短枪都能满足需要，因为军火库已在我们自己人的看管之下，并且对任何的突然袭击作了防备。但是，现在还需要物色足够的人员。于是我们提供了一张所有可靠人员、包括志愿兵和士兵的名单，然后对这些人员逐个进行审查。同时还必须对那些较有影响的、可以选拔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人员授予使命，听取他们每个人的誓言：在事发以前，严守秘密。左尔格是在我的名单上，由我授予使命。以后他把这件事当作参加了一个“同盟”，其他的事情他再也记不得了。

事情就要最后决定了。激进党人，尤其是圣·日尔维近郊区的工人，开始积极活动起来（圣·日尔维郊区对日内瓦来说，大概就象巴黎公社以前的巴黎郊区圣·安东尼和圣·马尔索对巴黎所起的作用一样）。我们一共将近有一千名的流亡者，因此可想而知，这件



事是无法瞒得过旁人的，何况都长得有眼睛和耳朵。所以反动派的先生们也變得小心谨慎起来（这种小心谨慎倒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魄力）。他们甚至变得更加聪明，以致连喊得最凶的人都没有去参加选举，以免发生冲突。总而言之，他们可怜地失败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选举日前一天的晚上和选举日那一天。我们随时等待着信号。街道上成群结队的人流熙攘往来。朋友们之间进行着热烈的谈论。对立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甚至有好几起厉害的斗殴。人民群众对反动警察的野蛮无理愈来愈激愤，而反动警察则用最挑衅的方式大肆进行逮捕。我也和年轻的加莱一起，被一个巡警队抓住了。但是在前往拘留所的途中，我又被这一帮警察释放了。当然我受到了一顿小小的教训，并且还为神圣兄弟会^①的福利破了一点小费才算了事，没有同他们发生严重的冲突。当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市政厅前面时，宣布了我们胜利的消息，顿时一片欢呼！圣·日尔维区的工人们又响亮地唱起那首战斗歌曲。三年以前，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歌

① 神圣兄弟会(Santa Hermandad)是15世纪以后出现在西班牙城市里的一个利用警察权力进行反封建活动的自卫组织。

• 神圣兄弟会原是中世纪西班牙各城市公社与农村公社结成的同盟，旨在保卫本身的自由和权利，反对贵族的压迫。曾自设法庭并拥有武力，后变为乡村警察机构。神圣兄弟会有时也指城市中警察的帮会组织。



声下，于1846年10月8日用枪炮进行战斗，然后在1846年11月用选票埋葬了贵族政府和统治了一百年的“带假发”的政府寡头们^①。这首战斗歌曲的最后几句重复部分是这样的：

“贵族们，你们祈祷吧！
跪在皮水手帽的面前吧！
跪在皮水手帽的面前吧！”

这首清新的革命乐篇以后就广泛流传，为大家所熟悉。一位日内瓦的朋友也许出于好心，替我弄来了这首歌的曲和词，并且还对这个可能来源于早期内战时期的Boucingault一词作了一些解释，可是我已记不清这个词是怎样写的了，是Boucingault，还是Boucingot，或者……^②

^① 1846年，日内瓦州以工人为首的人民群众象其他各州一样推翻了结成联盟的贵族统治，从而保证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加强了瑞士中央政权的权力。

^② 这几句歌词的原文是：

“Aristocrats, faites vot' prière!
A genoux devant les Boucingaults!
A genoux devant les Boucingaults!”

Boucingaults的正确写法应是：Boucingots。这是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用来表示年轻的共和主义者的一个常用的称呼。这些年轻的共和主义者用服饰上的固定标志来表明他们的思想派属。以后，皮水手帽(Boucingots)就泛指群众鼓动者、无政府主义者。

现在我来简略地讲一讲我在日内瓦时期的最后一幕吧，要详谈的话，还得另找一次机会。

为了完善已经联合起来的德国工人协会这个组织和促进整个事业的发展，我们准备2月末到弗赖堡州的穆尔腾去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或者协会大会。弗赖堡州在（1847年秋天）分裂主义同盟失败之后已经有了一个激进派的政府。一切都已准备得非常好。所有的各个协会都派了代表，另外还有一些邀请的来宾。

我在预定日期（我记得是2月20日，但是也记不准了）的头一天晚上乘车到穆尔腾去，准备再商谈一下筹备工作。但是使我感到诧异的是，我在火车站没有碰到一个代表。于是我不得不自己问路。就在选作代表大会会址的酒馆内外也是出奇的寂静，看不到任何一个人。我到老板那里去打听。老板只是把我介绍给一位先生。这位先生礼貌地向我走来，说道：“我是为了完成一件不愉快的但又不得不做的差事而来。”他告诉我说，他是弗赖堡州政府派来的（弗赖堡州政府根据伯尔尼严厉的命令行事），他的任务是要阻止代表大会的举行，而且要把我看管起来。“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能让你走，你临时的住处已经找好了。”——“换句话说，我是在自由的瑞士被捕啦？”他尴尬地耸耸双肩。当我知道其他一些比我先到的代表们也被“看管”起来和第二天上午我将由一个州政府的成员来进一步

查询之后，我除了跟这位官员走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了。这位官员显然也深感内疚。他把我引向一辆马车，还有另一位先生（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注意到他）也乘上了这辆马车。然后他告诉我说，为了迅速处理完这件事，我必须一起到弗赖堡去。

一路上，我的两位陪送者渐渐健谈起来。他们说，联邦委员会认为我是要利用德国工人协会在德国举行暴动。我不禁失声大笑。我是一个“政治犯”，但是我还不可能雄心勃勃地去干这种发起暴动的严重事件。我大肆嘲笑伯尔尼的这些蠢人。看来我这样做完全没有使我的陪送者感到厌恶。我在弗赖堡过夜。他们给我安排了一间布置得很好的房间，而且我想吃什么，喝什么，等等，都自己可以选订。有一个“侍役”来侍候我，同时也是来“看管”我。“按照这种情况”我是很舒服的，而且对其他代表们的遭遇也放心了。这些代表们要末根本没有被捕，要末被捕之后立即释放了，因为联邦政府是针对我而来的。况且这些被捕的人（他们叫“被看管的人”）也没有任何过错。所以我也就在舒适安宁之中盼望着第二天清晨的到来。虽然我心里明白，这种神经脆弱的非难也许将意味着我客居瑞士生活的结束。

第二天上午来了一位检察官作解释。这位检察官是一位非常文雅先生。他用最友善的姿态和我打招

呼，好象为了他的使命向我深表歉意似的。然而伯尔尼的先生们已经被柏林、维也纳和巴黎（因为那时，6月13日^①之后，也有许多法国流亡者进入瑞士）纠缠得晕头转向，从而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头脑。他告诉我说，德鲁耶先生，这位退伍的共产主义者和魏德林的朋友，为了维护秩序，突然象中了魔的一般，脑子里不知怎么会想到我们要组织暴动。他说他是被迫来向我质询的。盘问的过程非常短。我把事实真相告诉他，并表示对这种古怪的想法觉得很可笑。我告诉他说，现在五月起义刚被镇压下去，到处是军法审判建立起来的死一般的沉默，在这样的时候怎么可能策划武装入侵德国呢。

检察官好象也非常了解这些事实。他说，讯问纪录将要立刻送到伯尔尼去，他希望很快就能恢复我的自由。但是这个“很快”却一直延宕下去。从伯尔尼不断有新的追究诘问传来，而且问题一个比一个愚蠢。这期间他们给我在四方形的塔楼里安排了一间合适的房间。我在塔楼的屋顶上可以随意走来走去，观看眼底下的市容和美丽的风景，使自己怡心悅目。我的看

^① 1849年6月13日，法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为了保卫共和国宪法，在巴黎举行游行示威。根据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命令，游行示威者被军队驱散。组织游行示威的政治领导人为了不致被捕逃亡国外。

守人是一个长得很精神的小伙子，天真朴实，有着一对快乐的机智的眼睛。他除了喝酒的时间外，整天唱着歌，而酒总是经常喝得很多。他参加了那次反分裂主义同盟的战争，而且是在当时政府的强迫之下作为分裂主义同盟的士兵参加的。但是在第一次交锋时，他就投奔到联邦方面来了。随后，他参加了推翻耶稣教团政府的斗争，现在在新政府里干事。为了把每一个芬尼积蓄起来，以便他明年结婚时用，他什么工作都做。他说，他的未婚妻有一小块自耕地，再有一点钱就能独立度日了；他现在的工作虽然不累，但是不管“主人们”多么善良，还是自己当主人为好。他就这样一会儿用法国的土话一会儿用德国的土话同我闲聊，使得我比听其中任何一种语言更加难懂。不过他从来不硬留在我的房间里；一旦他发觉我不需要他的时候，他就走到外边去，一首接着一首地唱着民歌或其他什么歌。他的歌唱真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他从第一天起就发现我不会因此而生他的气。

伯尔尼一直没有答复下来，至少我没有听说有人来。一个星期过去了，二个星期，三个星期。这里既不能示威，也不能有半点抗议。弗赖堡州政府的好几个成员向我道歉。他们说，这对瑞士来说是一种耻辱。根据惯例我还要受第二次的质询。三个星期以后，我向伯尔尼送去一份备忘录，表示愤怒的抗议。没有答

复。第四个星期过去了，第五个星期，第六个星期，第七个星期，第八个星期。这第二个弗赖堡竟象第一个弗赖堡一样，对我如此恋恋不舍*。一年以前，第一个弗赖堡就强留我这么长的时间。我曾不止一次地自己发誓，以后再遇到有叫弗赖堡的城市，我一定敬而远之。不幸的是叫弗赖堡的城市还有好几个。

自从我搬进塔楼里去住的那一天起，整整过了两个月之后，弗赖堡州政府首脑沙勒才来看我。随同来的还有州政府主管司法事务的负责人，也就是司法部长，可惜他的名字我一时记不起来了。他们向我庆贺，告诉我，这桩案件现在算是了结了，但是……（他们想要说什么，我不用猜就知道）我必须离开瑞士联邦。他们还说，许多在穆尔腾准备开会的协会代表也都被驱逐出去了。“真可耻！”我破口而出，“对我——这还说得过去；但是对那些完全无辜的人！这简直太恶劣了！”那两位先生用最动人的语言表示歉意。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我再去向伯尔尼作任何请求，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了。自从日内瓦州选举联邦议员以来，我早就有了被驱逐的思想准备。而且我早就想好了，要是遇

* 第一个弗赖堡指德国布赖斯高 (Breisgau) 的弗赖堡 (Freiburg)，巴登起义失败之后，威廉·李卜克内西曾在那里受过监禁。第二个弗赖堡指瑞士乌赫特兰 (Üchtland) 的弗赖堡 (Freiburg)，此时李卜克内西正被拘留在此。

到这种情况我就到英国去，而不是到美国去，因为我得到美国去就好象当了逃兵似的。我把我的决心告诉了那两位官员。这时，我突然记起我们在法国冒的那次大险，于是补充说，如果从法国过境的话，我会担些风险。我向他们叙述了我们以前在法国的遭遇，并告诉他们，我宁愿去到热那亚，然后再从那里乘帆船到伦敦（就象半年以前恩格斯所干的那样）。“这没有必要。为什么要绕那么大的圈子呢？”司法部长先生一边回答，一边和蔼地微笑着（顺便说一句，我看见一位司法部长微笑，这倒是唯一的一次）。“我亲自陪您到法国去，而且替您安排好一切，不让您遇到麻烦。”他说。

以后发生的事也确是如此。

我原来很想路过日内瓦，去把留在那里的文稿、书籍之类的东西取回来。但是我被告知说，这是不可能的；甚至强调说明，这是伯尔尼方面禁止的。这样我也就丢失了我在那里的一切物品，因为那位愿意代我照看的朋友在我之后不久也被驱逐出来了。第二天上午，我向州政府首脑和他的同僚们，以及检察官和我那位爱唱歌的侍役衷心告别之后，便和司法部长一起乘车前往法国。到了法国第一个省的首府，我们就到当地行政长官的官署去。那里的人听说我是从瑞士被驱逐出来的，就不分青红皂白地要把我拘留起来，并按常规由宪兵押送，从一个拘留所到另一个拘留所，一直递解

出勒阿弗尔港口。但是陪同我的部长却据理力争说，瑞士政府曾答应给予我人身自由的法律保证。同时，他还拿出一份有力的证件，证明我已得到一张前往勒阿弗尔的指定路线的通行证，上面已严格规定不得前往巴黎。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必须到警察局去依次办理签证手续。这张通行证今天还在我的文件中保存着。

我至今仍然感激我的这位司法部长，但是我们终于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他祝愿我一路平安，还显出并不是完全没有担忧的神情。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也没有从伦敦给他写信，这实在是很不应该的。不过，这也是由于当时的环境使我们在履行最起码的义务时也要受到很大的阻力。

我到勒阿弗尔港去的旅程，并没有完全按照通行证的规定进行，因为我无法抗拒我想去巴黎看望朋友们的诱惑。可是并没有人发现我，我幸运地到达了勒阿弗尔港之后，便从那里搭乘《哈尔勒甘号》轮船前往伦敦。那时正是六月。流亡者的浪漫生活过去了，而在伦敦坚硬的石板路上，我将要过另一种浪漫色彩的政治生活。

有人从巴黎写信给我说，在我离开巴黎的那一天，警察就去逐家搜查我了。好在我已经走了，如果我被抓住的话，虽然未必会把我编入外国人军团，也一定会

将我送上“不流血的断头台”——流放到卡宴或者朗贝兹去^①。

从瑞士传来了一个绝对可靠的说法：瑞士联邦政府在穆尔腾搞的突然袭击是受我们在日内瓦的反对派暗中指示的。这件事我早就预料到了，因为我是非常了解我身边那帮人和那些议会主义者的为人的。那位德国的帝国代理人^②曾亲自在一家拙劣的报纸上作了一番洋洋得意的影射，说我是得到欧洲反动派的津贴的。可是他自己呢，二十年之后在法国巴黎皇宫的文件中却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得到过拿破仑皇帝的奖学金。他们就是这样一些人。

原载《1899年世界新历画报》(Illustrirter
Neue Welt-Kalender für das Jahr 1899),
1899年汉堡版,第30—38页。

① 卡宴(Cayenne)和朗贝兹(Lambèze)均为法国殖民地，通常作为充军流放的场所。

• 卡宴是法属圭亚那的首邑。朗贝兹今名塔祖尔特(Tazoult)，为阿尔及利亚一乡镇，居民四千人，有古罗马遗址。

② 指卡尔·福格特。

“恩格斯是我们公认的卡诺和毛奇”^{*}

……那是1849年的盛夏。我们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失败之后，在蔚蓝色的日内瓦湖畔建立了几个侨居区。当时在侨居区所执行的政策，无论如何要比现在的德意志帝国的政策明智得多和实际得多。当然，除了说它切合实际之外，也没有别的可说。我在这以前认识过一些各式各样的“大人物”，如卢格、海因岑、尤利乌斯·弗吕贝尔、司徒卢威，以及来自巴登和萨克森的“革命”的民众领袖。但是我愈熟悉他们，他们在我眼前就愈显得暗淡无光，卑微渺小。每当氤氲弥漫的时候，人和物看来就会觉得大些。但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却有一个特点，在他敏锐的眼睛前，迷雾必将消失，他所看见的人和物仍都是本来的面目。这种锐利的眼力以及同样锐利的、根据这种观察而作出的斩钉截

^{*} 卡诺(Carnot)，参加法国大革命的法国军官，曾任短期的陆军部长。毛奇(Moltke)，德国元帅，曾任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指挥过1864、1866、以及1870—1871的战役。参阅本书人名索引。

铁的判断，起初使我感到有点不悦，甚至有时使我觉得有伤我的自尊。虽然我对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英雄们的印象并不比恩格斯对他们的印象好一些，但是我总觉得恩格斯未免太藐视这一运动的整体，因为毕竟还有许多人在这—运动中献出了大量的精力，还有许多人表现出了自我牺牲的精神。我虽不是德国的南方人，但是当时“德国南方人的慈善心肠”还附在我身上，直到后来旅居英国才得到克服。不过，这并不足以妨碍我们对人和事在总的方面取得一致的看法，尽管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一开始就能立刻取得一致。而且不久我就发现，恩格斯（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我早已读过，同时通过私人交往，他的渊博的知识也使我赞叹不已）的判断始终是有根有据的。我不禁对他深怀敬意，因为他已经做了许多伟大的工作，并且比我年长五岁——这五年简直就等于整整一个世纪。

尤其是我很快就觉察到，他还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在和他谈话的过程中，我才知道《新莱茵报》所发表的那几篇关于匈牙利革命战争的文章原来是他写的。这些文章由于内容经常得到证实，因而大家都猜测是出于匈牙利军队某高级指挥官之手。其实，正象他自己笑着对我说的那样，除了所有报纸都掌握了、并且差不多完全得自奥国政府的那些材料外，他根本没有任何其他材料。而这个政府却大撒其谎，说它在匈

牙利活象现在西班牙政府在古巴^①一样，总是百战百胜。在这种时候，恩格斯的天才慧眼就对他大有帮助，他能够不理睬那些空话。他的头脑就象爱克司光一样。大家知道爱克司光不会折射，因而任何时候也不会歪曲形象。在这种光线的帮助下，恩格斯放过那些对查明真相无用的非本质的因素，不让任何烟幕迷惑自己，不轻信任何虚构的情节，而根据可靠的事实来确定自己的见解。无论奥国的吹牛家象明希豪森似的吹得多厉害，终究不能掩盖某些事实，例如发生冲突的地点、战役开始及结束时军队的驻地、战斗的时间、军队的调动等等。而我们的恩格斯根据这些点滴材料，用他明察秋毫的目力加以分析，就能描绘出一幅关于战局的真实图画。有了这样精密的战况图，就能根据日期和地点作出数学般准确的结论，说明百战百胜的奥地利人如何日益向后“挺进”，而屡战屡败的匈牙利人则不断向前“退却”。这些结论极其符合实际情况：就在奥军书面宣布获得决定性战役胜利而全歼匈牙利军队的次日，奥军就被逐出了匈牙利国境，而且溃不成军了。

恩格斯既不是一位预言家，也不是一位惯于忖度别人思想的人，他只不过有一双明亮清晰的眼睛，是一个象歌德那样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当年歌德曾在瓦尔

^① 这里指的是西班牙政府对1895年古巴(当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全民起义的镇压。

米*战场上,用他敏锐的眼光看到了那些视力模糊的凡夫俗子和政治家们 pour rire〔十分可笑地〕不能看到的世界转折^①的开始。

恩格斯似乎生来就是一个军事家。他能料事如神,随机应变,通观全局,明察秋毫,沉着冷静,当机立断。以后他还写了许多卓越的军事著作,并且得到第一流职业军事家的好评(诚然,他们不知道他的真姓实名,也根本料不到那些著作的匿名作者竟是一个“恶名远扬”的叛逆者,一个平民出身的巴门工厂主的儿子)。在伦敦我们开玩笑地称他为“将军”。如果当他在世时再有这样一次浪漫色彩的革命,那末恩格斯就一定是我们公认的卡诺和毛奇,是我们军队和胜利的组织者和军事思想家……

摘自《1897年世界新历画报》(Illustrirter
Neue Welt-Kalender für das Jahr 1897),
1897年汉堡版,第60页。

* 瓦尔米(Valmy)是法国马尔纳(Marne)的一个村庄,在圣·曼纳胡德(Sainte-manehould)附近。1792年,杜牧里埃(Dumouriez)和凯勒曼(Kellermann)在此率领法国革命军大败普鲁士入侵军。

① 1792年9月20日,法国革命军在瓦尔米战场上击败了进行反革命干涉的普鲁士入侵军。当时歌德亦在前线,他对他的随行人员说:“此时此刻世界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你们可以说,你们亲身经历了这个转折。”

“这里有我敬仰的一个人”

……我第一次在柏林听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名字，是在1845年。一个莱茵省来的大学生要我注意恩格斯这个人，于是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这之前，我曾经算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共产主义者。我读过和研究过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中最富于实践的人物罗伯特·欧文的著作。但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却以它大量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性，替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本书为我的生活之路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我也曾钻研过黑格尔的著作，但是在这本书中，我看到的却是事实而不是概念。虽然恩格斯在实际上只比我大五岁，但是在我的想象中，他一定是个饱经世故、满额皱纹、有着一部显示智慧的花白胡子的人。

四年后，我和他第一次会面。那是1849年，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之后。关于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恩

船山学社
PDG

格斯已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中描写得绘声绘色*。在这期间，我还读过《共产党宣言》，并且知道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但是《新莱茵报》我只读过很少的几期，因为那时我四处奔波：1848年9月我被投入监狱，1849年春从监狱出来后，我又立刻陷入到革命的漩涡中去。当志愿军团出征的时候，我得悉恩格斯是在维利希的部队里，我则在贝克尔手下服务。

1849年盛夏，恩格斯从他的“驻地”洛桑到日内瓦来看望我们。当时我们都已转移到了日内瓦。他穿着一件蓝色的上衣，这使得他那挺直的、象普鲁士人那样强壮的身躯显得更加魁梧。快乐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响亮而愉快的嗓音，诙谐风趣的谈吐，完全是一个爽朗的、热情奔放的年轻人。原来恩格斯就是这个样子！在他那光滑的年轻人的额角后面，在他那快乐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后面，竟蕴藏着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思想。那张谈吐幽默、常常发出爽朗笑声的嘴，在一年半以前就已经向那仍在昏睡中被束缚着的未来的主人，发出了强有力的、唤醒和策励他们拯救自己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就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个和马克思旗鼓相当的人；卡尔·马克思的第二个“我”，因为早在那

* 参阅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127—235页。

那个时候，他们两人就已融为一体了。恩格斯愈靠近我，身材显得愈高大。我们当时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认真的谈话！完全没有。我们政治谈得极少，倒是互相询问了不少这样的问题：马克思在哪里？某某人在哪里？我们更多地是喝酒。那时正是“硫磺帮”活跃的时候，肥胖的福格特先生对“硫磺帮”恐惧万分。好在我们并没有去议论德意志帝国的君主们和其他的国会议员大人先生们。

虽然我当时才二十三岁，但是我已经和许多人、和当时大多数的“大人物”交往过，然而没有一个人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可是在这里，第一次有一个使我必须对他肃然起敬的人。He was a man!〔他是一个男子汉！〕现在我才知道了我该何去何从，而且我后来和马克思的私人交往也就是从认识这个人开始的。

我们在瑞士还见过一次面。那是在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之后，恩格斯又到日内瓦来过一次。他是来辞行的。我们又痛饮一番。他已安排好了家务。他想长途步行到热那亚去，然后搭乘一艘英国商船，沿着地中海海岸，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绕道西班牙和法国，到英国去。他邀请我去伦敦和曼彻斯特。我没有想到他的邀请第二年就实现了。那时，我还在瑞士，那儿的德国工人联合会组织有许多工作要做，所以本来需要我留在瑞士。但是瑞士联邦委员会却对我的活动不满。1850

年2月在穆尔腾举行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被警察“解散”了。我和其他几个被指控为策划武装入侵德国和奥地利的“阴谋分子”被监禁在(瑞士的)弗赖堡的塔楼里。经过两个月对我来说有时还是非常愉快的监禁之后,我被作为“阴谋分子的首犯”而逐出瑞士。

这时候,除了到英国去之外,自然也就没有别的出路。而这正是我的幸运,因为只有从这时起我才进入到一个真正学习的阶段: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也向约翰牛*学习。约翰牛是最讲究实际、最老成练达的,只有他们掌握了能把我们德国人头脑里有关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各种蛛网和尘垢扫除掉的技术;而且还可以通过他们这个巨大的世界了望台,象勒萨日的跛腿魔鬼**那样掀开世界的屋顶,让我们看看他们统治着的世界市场的经济状况,使我们从他们的现状中看到我们的未来。

我和恩格斯并没有象和马克思那样保持着从不间断的联系。在我流亡伦敦、忍饥挨饿、十分贫困的可怕

* 约翰牛(John Bull),英国或英国人的绰号。

** 阿兰-勒内·勒萨日(Alain-René Lesage, 1668—1747)是十八世纪初叶法国著名小说家。1707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跛腿魔鬼》,描写魔鬼带着一名少年来到马德里上空,把一座座屋顶掀开,让他看屋内发生的一切。小说的情节虽是借用西班牙来展开,实际上却描绘了巴黎生活的图景。参阅《外国名作家传》(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27—628页。

的十三年中，我只有很少几天不去马克思家。

马克思住在第恩街，恩格斯住在麦克斯菲尔德街，我住在这两条街之间的索荷广场教堂街。这里是真正的流亡者居住区，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住所都只有百步之远。

恩格斯是没有必要在伦敦过流亡者那样的“苦难”生活的。虽然他还没有回到曼彻斯特，只能从家中得到相当少的收入，但是他在我们这些人中间却俨然是一个大富翁，因此有时候他就不得不把共产主义从理论变成实践。他实行共产主义常常是这样的彻底，以致他自己也不得不参加我们这批常去“当铺”的人的行列。我们生活愈艰苦，也愈开心，总是诙谐戏谑，开怀大笑。“革命”的笑料和轶事、《新莱茵报》编辑部里令人啼笑皆非的小道消息，成了我们自做饭菜的佐餐品。当时我们住在老康普顿街的模范公寓^①里（“红色的沃尔弗”和康拉德·施拉姆都住在那里，我起初也在那里住了几周），常常用廉价买来的肉片、土豆和洋葱做菜，再喝上一壶或好几锡壶的黑啤酒，或淡啤酒与黑啤酒各半掺合的混合酒，来助兴和增加灵感。

城里的英国人对我们很尊敬。我们在小酒馆里总是受人瞩目的客人，尤其是当我们中间有一名好歌手

^① 模范公寓——一种供寄宿者单间居住，并设有公共厨房、公共客厅和公共阅览室以及吸烟室的公寓。

在场的时候。奇怪的是英国人认为每一个德国人都是很好的歌唱家。这种想法曾引起一次非常滑稽、令人捧腹大笑的场面。在恩格斯寓所的对面有一家酒馆。每到晚上，邻近的小市民们、小店主们就坐在这家酒馆的餐座上，吸着他们的板烟斗，喝着他们的威士忌加矿泉水^①。一天晚上，我和恩格斯、以及后来与维利希进行了决斗的康拉德·施拉姆一起，到这家酒馆去。

恩格斯的房东也在那里。他把我们介绍给在座的人。他们都十分友好地接待我们。我们的话题一个接一个地转来转去，最后终于谈到了“德国人唱歌的天才”。我们自然受到了“邀请”，给这些老实憨厚的shopkeepers〔小店主们〕唱一首“德国歌”。我们三个人虽然生性大方，却也感到很为难。起先我们实事求是地解释说，我们象许许多多其他的德国人一样不会唱歌。但是我们的话没有人相信，认为是托辞而遭到反驳。我们不愿显得太不礼貌，于是不得不“唱”。我们开始“唱”起来，唱那首《刚捎信回家的莱比锡大学生》的歌。这真是一次“空前绝后”的三重唱。三个人唱得怎样呢？反正我不是三个人当中唱得最糟糕的。但是就拿

① 板烟斗(shag)所吸用的是一种切得很细的烈性烟丝。威士忌加矿泉水是英国人一种民族风味的饮料。黑啤酒(porter)是用锡壶喝的；混合啤酒是用英国的淡啤酒(ale)和黑啤酒(porter)各半掺合而成。

我来说，在上吉森文科中学的时候，就经常被大家从音乐课上赶出来，因为我老是唱错，老是把整个班的节拍搞乱。可是在这里我倒不会把别人的节拍搞乱，因为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节拍。这首歌的“效果”怎样呢？简直成功极了。英国人象着了迷似地使劲鼓掌，害得我们不得不重唱其中几段。从此以后，我们就小心翼翼地躲开那家酒馆，不然，每次去都得唱歌……

摘自《南德驿车夫》(Süd-Deutscher Postillon), 1895年慕尼黑版, 第14年度第19期。

伦敦流亡生活一瞥

对伦敦的政治流亡者的生活已经写得不少啦！然而写得很不够。因为已经写的那些都不是地地道道的流亡者的生活。这些流亡者中，有的是动动笔墨、写写短文的人（说得确切一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随军观战之类的人物），有的则是绅士流亡者。后者是比较“高贵”的流亡者，他们在英国的资产阶级圈子里名声很好，通常是华宴上的嘉宾，王公贵族的高等食客。他们只是偶尔尝试一下流亡者的生活，好似出巡的侯爵或某种达官显贵尝一口救济院里的菜汤一般。

真正饱尝过伦敦流亡者生活的人，没有可能把他们的生活写出来。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的早已成了饿死鬼，有的潦倒终生，有的则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为了生活，他们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因此，他们以往的生活经历只能在心里回忆，或者向公众诉说，让别人去谈论吧。为了活着，他们要做的事情是够多的了。所谓活着，从字面上讲就是，他们还不曾

饿死。

伦敦真正的流亡者生活，我是经历过的，只是经历得不多罢了。谁没有钢一般坚强的神经，谁没有铁一般健康的资本，谁没有适时的苦中作乐的幽默，谁就得无可挽救地倒下去。不过，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也许要在另一次才能写了。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轻松愉快的小故事。这个使人开心（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小故事在事过很久以后，有时也还使人觉得好笑。

那是在伦敦流亡生活的初期。1850年，瑞士以一种与它的共和政体很不相称的阿谀奉迎的姿态，向所有对大国有所冒犯的流亡者们宣布取消他们的政治避难权。这件事发生之后，伦敦就成了人们在没有其他出路和办法时首先想到的最后一个避难场所。但是整个流亡者圈子里的人都畏怯泰晤士河畔，把那儿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喧嚣的“罪恶渊藪”。加上那些历来对伦敦贫民所作的凄惨得可怕的描述，以及当地漫无边际的浓雾，都充分表明，对大多数人来说，在英国流亡是一种“苦难”。

在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里，流亡者越挤越多。协会的救济委员会正在开会研究解决办法。由于经费有限，拟定出的方案是：租一所房子来建立公寓。会上决定，成立一个“流亡者营部”，由办事严格的维利希领导。至于我，因为会说几句半生不熟的英语，便交给我



一个任务，要我同几个朋友一起进行必要的筹备，即办理采购一类的事情。不久，就在“河对岸”（泰晤士河南岸）找到了一幢合适的房子。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是座落在坎贝威尔的一幢三层楼的建筑，屋前有一个普通的四平方米的小花园，屋后有一人高围墙围起来的庭院。此时就要购置一些必不可少的家具，尤其是床和烹调用具。这下子，我们就遇到了执行使命中的最大的困难，那就是语言上的障碍。不过，尽管发生了各种各样可笑的误会和趣闻，一切还是办妥了。这里我就讲一讲其中的一个。

我们走进一家大的家具什物铺。我们全都带着志愿兵的帽子。陪同我的人满脸胡须，相比之下我自己倒不十分引人注目。我们惹起了店员们，尤其是女售货员们的几分惊奇。她们用半好奇半嘲笑的目光看着我们，我也并未因此感到惶惑。我是理所当然的发言人。老实说，当一个穿着讲究、举止文雅、身材高大的美貌妇女站在我面前，问我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别扭。

我鼓起勇气，结结巴巴地说：

“We want twenty-five iron bedsteads!”（我们要二十五张铁床！）

“Very well!”（好的！）——这位妇女微笑着答道。

“Fünfundzwanzig Matratzen!”（二十五条褥

子!)——我是用德语说的,还以为说的是英语呢。

“Very well!”(好的!)

“Fünfundzwanzig Blankets!”(二十五条毛毯!)——Blanket 这个英语词还是我从作家库柏那里学来的。

“Very well!”(好的!)——这位妇女总是和蔼地微笑着。

“Fünfundzwanzig Stühle!”(二十五把椅子!)

“Very well!”(好的!)

“Fünf Tische!”(五张桌子!)

“Very well!”(好的!)

这时候我停顿了一会儿。是呀,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Nothing else?”(不要别的了吧?)——这位妇女娇媚地微笑着。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不错,我们还要给我们的床铺配上枕头(Kissen),于是我脱口而出:

“Twenty-five kisses!”(二十五次接吻!)

“What?”(什么?)

这位妇女的脸上顿时显出难以名状的惊愕。这时,其余的妇女开始吃吃暗笑,而当一个男店员面带冷笑赶紧走过来时,我还在大声重复:

“Twenty-five kisses!”(二十五次接吻!)

“Wh-a-t?”(什么?)



我面前的这位妇女霎时满脸绯红。而当其他人的窃笑声愈来愈响时，她难为情地把脸色一改，放声大笑起来。我觉察到一定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可是错在哪里呢？“没有人带两用辞典吗？”幸亏有一个人带着。我赶紧查阅辞典：“K-i-s-s-e-n!”“Kissen, 中性名词，英语是：pillow(枕头)”。我又很快翻到英—德对照部分：“k-i-s-s”“kiss, 名词，德语是阳性名词 Kuß(接吻)!”啊呀，我的天哪！现在我才明白。我拍着自己的额头说道：

“Beg your pardon!”〔请你原谅!〕“Twenty-five—pillows.”〔二十五个——枕头。〕

“A-h, that is different! Yes!”〔是呀，那是不一样的! 这就对了!〕——这位妇女答道。

真的，可以肯定，这位妇女并没有对我这种出自无意的奢求感到恼怒，她倒是对我如此精确的数字更为惊讶。“二十五次接吻”——第一次会面就这样要求，显然是太过份了。结果还是令人很满意的一次普通的“握手”。我们付清了现款，把一切手续办完之后，便立刻撤退。自然，我被大大讥笑了一番。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不得不让别人嘲笑。我作为精通语言者的名声也因此受到一些损害，而其直接后果是，由于出了差错，我在一段短时间内得到较少的工作。这“接吻的趣闻”也使我自己觉得非常可乐。

“营部”就在那一天搬了家，而且存在了半年多。维

利希设法制订出来的纪律，严厉得差一点叫人造反。我在这里再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这位严厉的指挥官先生发布了一道命令，即每一个住在营部的人都必须在晚上十点钟以前回屋，违反者第二天就要遭到软禁。这引起了许多人的愤懑，因而早已有人议论要拒绝服从，并串通一气抵制禁令。有一天早晨，一个在头天夜里执勤的志愿兵极其秘密地告诉我们，那位严厉的指挥官先生自己就没有在头天晚上十点钟回屋，而第二天早晨他却躺在自己的床上，可以肯定他不是从大门进来的。

这倒是个好主意！我们知道维利希一向贪杯好饮。他一定是偷偷地溜进来的。莫非是翻墙越壁爬进庭院的？我们决定第二天晚上进行窥探。想好就干！夜里十点钟维利希果然不在屋内。前面街道上有我们的两个人在监视，后边庭院里连我共三个人潜伏着。时钟敲了十一下，不见维利希。时钟敲了十二下，不见维利希。时钟敲过一点，还是不见维利希。街道上空荡荡。听！远处的脚步声愈来愈近。哎！突然寂静无声。我们屏住气倾听着。墙后有轻微的磨擦声。这时墙上出现两只手，突然又伸进一条腿，接着探出一个头，小心翼翼地四周张望。我们一窜而上，把那条腿从三个方向象老虎钳似地紧紧夹住。“逮住了！”我们用压低的嗓门向被吓得张口结舌的维利希喊着。他很

快就镇定下来（要不他怎么办呢？）强作笑颜说：“今后允许在外面呆到十二点！”他就这样应付我们，我们也只好答应在其余的伙伴面前不提这次奇遇。维利希以后在美国的解放战争中荣任将军，但是一直到他死前，他都没有原谅我这一次举动。

从此以后，在流亡者营部存在期间，再也没有一个人因为晚回来而受到惩罚。可惜这样的好事（我也只是偶尔为之）并不久长。由于协会经费枯竭，那些不愿或不能移居到美国去的人便开始了真正的流亡者的痛苦生活。不过，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将在另一次讲到，今天只是想说：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深切地体察到对“时间就是金钱”这句格言的可怕讽刺。我曾经把许多个月的时间白白地花费在奔走于教会安排的师资介绍人的写字间里。这使我想起，我是在一个金钱和盈利的国土上！我从未有过这么多的时间和这么少的钱，而且也从未有过象那一段时间那样的忍饥挨饿。那时，我竟有那么多的剩余时间，甚至可以用来弈棋。当然，我还没有遭到不幸——我是说，还没有饿死。

饥饿不仅仅是最好的厨师，而且也是最好的教员——如果它还没有把学生过早地扼杀的话。

原载《1895年世界新历画报》(Illustrirter
Neue Welt-Kalender für das Schaltjahr
1896), 1896年汉堡出版, 第38—39页。

我的教书生涯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曾经有人对我说过近百次，尤其是在我作完演讲或报告的时候，总有人说：“你确实是个真正的教师！”这句话并不总是褒意，但即便这句话含有贬意，我还是把它当作一种赞美来接受。这时，我就会不期然地想到：“真是秉性难移！”一个人可能选错职业，但却不能改变他的个性。人的个性是既可以加以戕害，也可以加以培育的。但不管给个性加上什么样的束缚，它依然如故地存在。就我的禀赋来说，我应当做个教师。我从事政治是选错了职业，这一点是我随时都乐于承认，而有时简直有点后悔的。但是不管走到哪里，在我这个选错的职业中，我作为教师的个性还不时地流露出来，而且流露得非常自然。

不过，我并不象大多数的流亡者那样是迫不得已去当教师的。他们中间有的经过“专门学习”，而更多的人并没有经过“专门学习”。这样的流亡者中，有上至菲力浦·埃加里戴的儿子，即后来的路易·菲力浦国



王*。这位后来的“资产阶级国王”曾在流亡伦敦期间为了六便士(50芬尼)去教课。以后,我也就三番五次地步了他的后尘。我偶尔觉得,我还真愿意多教几回书,因为我本来就是一名教师,一名职业教师,早在“流亡”以前我就教过书。那时我对教书一直很喜欢,虽然我对自己的老师并不始终感到满意。我在被赶到异乡国土以前,我的最终打算就是想当一名教师。一直到六十年代,我还带着几分可笑的忧伤之情,翻阅我的古典语老师奥托博士(一个出生于格里马的萨克森人)在我中学毕业证书上所写的评语。他为我写了许多我能当教师的赞语。可惜事后的情况并非如此,不可抗拒的必然性迫使我选错了职业。

我曾经在别处说过,当我无法在马尔堡呆下去的时候,我就接受了苏黎世弗吕贝尔模范学校的教师职位。那是1847年秋天。我很快就去上任。尽管遇到各种各样的周折,但这件工作还是使我非常愉快。这所

* 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浦命名的有父子两人。父亲路易·菲利浦是路易十六的堂弟,法国大革命初期归附雅各宾派,放弃了波旁王族的姓氏,改姓埃加里戴(Egalité,意为“平等”),属于法国国民议会中的山岳党,曾投票赞成处决国王,后来他本人在恐怖时期以阴谋恢复君主政体的罪名被送上断头台。儿子路易·菲利浦于1793年从法国流亡到英国,1830年七月革命胜利之后,被法国金融大资产阶级捧上台,成为法国国王,人称“资产阶级国王”,后被1848年二月革命推翻。见本书人名索引。



学校当时还相当年轻，但是卡尔·弗吕贝尔却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教育家。他原籍图林根，是幼儿园创始人弗里德里希·弗吕贝尔的堂兄弟*（大家都知道卡尔·弗吕贝尔的兄弟尤利乌斯·弗吕贝尔在维也纳幸免处决。他本来是社会民主党中的激进的大德意志派，而当时他已和米凯尔一样，属于俾斯麦的普鲁士—德意志主义者）。看来这个家庭真出教育家的天才。虽然弗吕贝尔模范学校还很年轻，但已赫赫有名。尤其是在英国，卡尔·弗吕贝尔曾任家庭教师多年，在各界人士中广为闻名。这里还要预先说明，这所学校在五十年代初曾转让到当时是普鲁士上尉的博伊斯特的手中。这位博伊斯特就是那位先在萨克森、后在奥地利当上内阁部长的博伊斯特的堂弟**。他曾参加1848年的人民运动，在1849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也曾一同战斗，以后客居瑞士，从事适合他的天赋的教师职业。在博伊斯特卓越的领导下，这所学校日益扩大，并且成为当今尚存的最好的私立学校之一。博伊斯特本人不久前去世，享年八十二岁。我和博伊斯特只有很少的、

* 卡尔·弗吕贝尔是弗里德里希·弗吕贝尔的侄子，见本书人名索引，此处似李卜克内西记忆有误。

** 两个博伊斯特，堂兄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博伊斯特伯爵，是萨克森反动政治家，历任内阁大臣。堂弟弗里德里希·冯·博伊斯特曾任普鲁士军官，参加过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瑞士，从事教育工作，是教育改革家。见本书人名索引。



但却是最友好的交往。

这所学校在我去的那个时候还处于相当原始的形式，因而从它那里还能使人回想起最初的俾斯塔洛齐模范学校原来的样子。那是近乎穷乡僻壤般的简陋，但一切都是纯朴和美好的，尤其是伙食。在大得象谷仓似的大房屋里不乏空间。这类房子在我离开苏黎世将近三十年之后再去寻找的话，那就简直象大海捞针一样。这类房屋早已作为大城市发展需要的牺牲品而拆除了。它们简朴，没有一点奢侈，但是一切最基本的东西应有尽有，这在当时给我留下非常突出的印象。在我们不健康的文化中，我们已习惯于千篇一律，因循守旧，常常本末倒置地在次要的事情上付出过高的代价，而忽略主要的东西。教育成了一种最机械刻板的行业，我甚至愿意说，它已成了一种工匠的手艺。上课的形式和方法都是一成不变的，日趋僵化，并且被教员一代一代地往下传。就象在其他事物和在其他领域里出现的情况一样，手段变成了目的，最根本的目的不见了。只是到了上个世纪，卢梭和俾斯塔洛齐等革命的思想家才重新想起学校的宗旨和上课的目的是：培育儿童成人。由于每个儿童都有独自的素质和天赋，因此教育好每个儿童是他今后进一步深造的前提，而且必须采用个别的方法来教育每个儿童，使其达到共同的培育儿童成人的目的。弗吕贝尔就是根据这样的原



则，利用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把在梅特涅反动统治时期所排斥的、几乎被人遗忘了的俾斯塔洛齐的体系在他的学校里重新建立起来。我看到我在大学时代关于教育的各种理想（它们大部分是在我与周围环境激烈的斗争中所产生起来的）在这里实现了，或者说，我看到了可以把我的才能付诸实践的尝试机会。

我怀着火一般的热情、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发现我竟具有一种教育家必不可少的、而我先前自己也不曾相信我会有的素质，这就是对学生的耐心——不管他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在平时我并不很耐心，因此往往给我带来许多不愉快。但是在学校里，尤其是在课堂上，我记得我从来没有失去过耐心。不过我教过各色各样的学生，不少学生对最有耐心的人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例如，我在伦敦的一所学校里，就教过一些年龄在十六至二十四岁之间、被父母娇惯甚至有某种越轨行为的富豪们的儿子。我深深知道这些情况将给我带来很多麻烦，所以我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一堂课，我就仔细观察我的这一帮学生，就好像驯兽师观察他的野兽一样。我的这种比喻丝毫不是轻浮地贬低教师的职业。但是我发现，凡是能够驯服人的人，也一定能够驯服野兽；反之亦然。话说回来，我望着这些小子们，用适合每个人个性的办法对付他们，

而最主要的是，我知道如何透彻地表达出我瞧不起那些只有财富而缺乏教养的人。不久我就完全赢得了这些年轻小伙子。这样，我在那所学校工作的四、五年时间内，即在我离开伦敦以前，我从来没有和他们发生过任何纠纷。其中有一个我认为最糟糕的学生，是一个很有地位的宗教界人士的儿子。他对我敬慕到这种程度：一切看我眼色行事。到最后他甚至厌恶“上流”社会的生活，决定旅居到澳大利亚去。他的父母尽量给他思想上施加影响，但都没有能够改变他的决心。由于父母不同意，他在天气晴朗的一天，带着一个漂亮可爱的丫环从父亲家中逃出。他和丫环结了婚，并且搭乘下一班轮船前往澳大利亚。他在那里成了一个有钱的、有名望的先生，写了一本关于澳大利亚的很好的书。他和他的妻子过着最幸福的恩爱生活。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意向和爱好把妻子培养起来的，也许他们很快就要庆祝他们的金婚了。

我虽然事先有过教书的经历，但我在苏黎世还完全是个新手。我的班上有二十一个孩子，其中最使我操心的是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的儿子。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的妻子是苏黎世的一个贵族的女儿，生于策勒家族。当他丈夫外出的时候，她就闭门不出。剪成短短的乔治桑式样的金黄色头发，蓝眼睛；虽然谈不上美丽，但却有焕发出青春的妩媚，使这位正处于二十几岁

妙龄的少妇十分讨人喜欢。由于她受到年轻的革命潮流的鼓舞，并且和这一潮流中的许多代表人物相识，所以我不久也和她有了非常愉快的交往。这些交往帮助我克服了工作中遇到的某些困难和突然发作的怀乡情绪。我的教学工作比我自己事先想象的要容易得多。我和学生的关系都挺好，和教员关系也不错。此外，我还可以说，“上司”对我很满意，曾给我写了一张恭维备至的证书。

我自己还附带搞了一些教育实验。我在七个月内（其中不算由于政治事件、二月革命、前往巴黎等等而中断了的六个星期）给苏黎世郊区一个十九岁的农民的儿子补习古典语、德语和历史。这个农民的儿子只上过乡村小学，不仅德语水平差得很远，而且还从未上过拉丁语和希腊语课。我帮他准备得很成功，最后他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并于1848年秋天进入苏黎世大学。

我一向反对在古典语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在吉森的时候曾给自己创造一种学习方法。自从我知道施利曼也是用一种完全类似的方法学会希腊语以后，我就相当自信地在这学校里应用这种方法。附带说明，这是世界上最简便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只要求尽可能快和尽可能多地掌握词汇和习惯用语，而达到这种目的的最好办法，就是快速地大量阅读和不断复



习读过的东西，一直到熟练掌握为止。必须看到，这种方法对学现代语的效果也不比学古典语的效果差。为了不使学习者感到枯燥无味，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应该给他一些能使他入迷的书籍。把语法知识补上，那是教员的事情；如果是自学的话，则是学习者自己的事情。如果一个人真正学会了一种语言，那末他在学习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哪怕是最困难的语言，也就不再需要老师了；当然发音除外。可能我在这里关于教学本身说得过于琐碎了。

我在苏黎世的教师工作不久就结束了。起初，我离开海尔维格军团^①，还能安然无恙地从巴黎重新回到苏黎世。但是不到几个月以后，我又参加了第二次巴登起义，即所谓司徒卢威暴动，那次我就再也不能脱身重返苏黎世了，而是进了监狱。出狱后我又参加了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之后我就开始政治流亡，先是到瑞士的法语区，然后到了英国。我曾作过重返苏黎世的准备，想在那里长期安顿下来，可是这计划却被瑞士联邦当局阻止了。于是我只能日内瓦落脚，但在日内瓦就没有从事教师职业的机会了。

^① 1848年春，旅居巴黎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组成了一个志愿军团——德国民主军团，选举格奥尔格·海尔维格为团长，他们带着一支装备极差的军队去支援巴登起义。但是在志愿军团越过边境的时候，就被符登堡的部队完全打垮。



1850年夏天，我到了伦敦。我以前曾向某些有间谍嫌疑的人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以什么谋生？在我到达伦敦之后不久，我也向自己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只是意思完全不同，而是“你依靠什么谋生？”我从遇难之中所抢救出来的东西，只够我维持几个星期。正在我十分危急的时刻，卡尔·弗吕贝尔还了我一笔钱，这是我在三月革命爆发以前借给他的。顺便说一下，这是当时唯一还给我的一笔债，因此我是不会忘记的。但是这笔钱也不够敷用很长时间。一个“学者”突然从他所习惯的生活环境中来到一个异乡国土，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而且命运直截了当地命令他：自己赚钱谋生吧！这时候，这个“学者”的处境要比一个工人，也就是说要比一个“手艺人”更糟糕。因为手艺活是没有国界的。德国的鞋匠、裁缝、钟表匠等等，他们能在英国或法国过着和在德国家乡一样好的日子，只要他们一旦克服了初期语言不通的困难和不再依靠“善良的家乡”的帮助，能够自立就行，甚至可以比在德国好得多。但是“学者”的情况就不同啦！德国的律师、“哲学家”等等一旦到了“异乡国土”，那就一筹莫展，因为他们的法学、哲学到了那里就完全失去了价值。对于语言学家来说，情况略微好些，因为德国的教员在所有国家都视为珍宝，虽然并不总是受到尊重。至于医生，人们一般认为是到处都吃得开的，可是在英国却要遇到



非常大的困难，因为那里的“医疗事业”和我们的作法大不相同。

好在我是学语言的，所以我的第一个想法自然是谋求一个教师职位。可是大家劝我别去。他们说，我们流亡者名声不好，没有人“保荐”，什么事也办不成。信教的是这样，不信教的更是这样！所以我也就只好放弃第一个念头，另打别的主意。可是能做些什么呢？什么都行。辘辘饥肠逼人急。我在日内瓦的时候曾练习过排字，并且差一点就以排字工为职业了。可是在伦敦能做些什么呢？正在这时，一个同伴给我带来一个佳音，使我增添了一线希望。英国邮政总局局长、一便士邮资制度的创始人——罗兰·希尔勋爵需要几百名新的邮差。我原先曾是一个很好的跑步运动员，现在我还有耐力，在找到更合适的工作以前，我为什么不能当一个邮差呢？我也知道，已经有一些德国人被招收到邮政局去服务了。于是我往后的念头都打消了，尽一切可能去向主管邮政的当局报名。我焦虑不安地等候了一天，又等候了两天；第三天过去了，一直等到四十九年后的今天，还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总而言之，我没有当上邮差，也没有当上排字工。但是肚皮一直在饿下去，而且景况越来越恶劣。肠胃辘辘作响，使我处在两者必取其一的境地：要末找到任何一种生计，要末饿死。我不愿意饿死，虽然曾有不少可爱的婴孩替我



作出了示范——他们因为失去了母亲而饿死在摇篮里。我绞尽脑汁，四处寻求，但是毫无希望。最后我还是不得不去教书，作为救我命的最后一块小木板或最后一根稻草绳。

我已经说过，没有一个中介人便什么事也办不成。但是关于中介人，我也听到过最坏的说法。中介人的确是一种难以革除的弊端，可惜今天还有这种现象。我把各种资历证书找出来，把旧衣服刷干净，把几枚借来的半克朗（合 $2\frac{1}{3}$ 马克）塞进口袋。因为半克朗在当时正作为一般找寻中介人介绍职业的贽礼。我动身出门，一个个地拜见了这些先生们。我受到非常友好的接待，而我的几枚半克朗也就这样友好地被接待光了。他们对我那些优秀的资历证书恭维得甚至有点过分，而那些恭维话显然是我的半克朗钱币换来的。然后我信心不足地静候结果。我已经播撒了亮光闪闪的钱币，应该有所收获，应该开花结果了。但是我还是过于相信了他们。时间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过去，从我那些诚实的中介人那里却得不到任何音讯。

这时候我听说在海滨街的一条旁街——亚当街住着一位高级的经纪人，说他真的能介绍职业，而且是好职位，不过他规定的登记费是半镑（合10马克）。不仅如此，一切办妥之后，还要从第一季度的薪金中拿出一半归他。



我决定去试试这最后的解救办法。当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对于条件也就无从选择。全看这一着了。我借了一套合身的黑色西服，一顶大礼帽（这顶大礼帽在伦敦的雨雾之中还没有戴得太破旧）和一枚闪闪发亮的法定值为半金镑的硬币。为了谨慎起见，又加了一枚六便士的硬币。因为我曾从一个久住伦敦的朋友那里听说，在上等阶层里费用不是按金镑计算，而是按畿尼（这是一种奇特的早已不再铸造的古代硬币*）计算的。这种特定的计算方式是用来在“上流”社会圈子里给每使用一金镑的公众加上一先令（合一马克）的人头税。幸亏我现在还有一枚六便士的硬币（合半马克），刚好可以用来作那半金镑的附加费。于是我到了那幢舒适、华丽的公寓。门上写着：

尼科尔森牧师
教会公职和教师职业介绍所

当我走进门去的时候，立刻碰到一个又高又大的穿制服的佣人和一个衣着讲究的年轻先生。后者用轻声耳语对我说，谁要是不花上半个畿尼，那就会象缺少《一千零一夜》中的那个胡麻根**一样，尼科尔森牧师

* 畿尼(guinea)，旧英国金币，1717年其价值定为二十一先令。

** 胡麻根是古代阿拉伯人供奉在庙宇里的几种神草之一。阿拉伯人常拿着这种神草发誓、祝福、许愿、祭神，几乎无处不用。



和他介绍的门是不会为他打开的。因此我就奉献出了我的(说得确切一点,眼前属于我的)半个畿尼,而牧师这才给我把门打开。

一个高大的男子,胡子刮得溜光,系着白色领带,更使他的脸孔容光焕发,他神态矜持尊贵,从一张宝座似的大安乐椅上站起来,用一种更为感人的声音故作谦逊地迎接我。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尊贵的气息”,浑身僧侣气,这就是英国教士的典型。他开门见山盘问我的愿望和资历证书。我说,我想教书,当私人教师或学校教师都行;可以教德语、法语、历史、拉丁语、希腊语,不过后两种语言会带点德语腔调。尼科尔森先生对这一点并不介意。他是苏格兰人,他的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发音就带有苏格兰的腔调,这大约和我们德国人一样。我的资历确实确实是优秀的,这使尼科尔森先生非常满意。尤其是卡尔·弗吕贝尔为我填写的证书使他特别欣赏。我猜想他一定是弄错了。他把卡尔·弗吕贝尔和那位在英国非常闻名的幼儿园创始人弗吕贝尔混淆起来。不过我也没有急于去指出这个错误。

当我告辞的时候,他和我如此热烈地“握手”,以致我在那一会儿真的忘记了他是一个油滑的僧侣,而眼前竟出现报酬丰厚的教师职位的憧憬。果然,三天之后我收到了一个用粗体字印着“教会公职和教师职业介绍所”的高雅的大信封,里面是一封很礼貌的信,约



请我第二天到办公室去商谈一个收入为 120 镑并免费供应住宿的学校教师职位。

这真是喜出望外的事。可是由于这个人竟表现出这样慷慨的同情，我的各种各样的怀疑也就产生了。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为什么不能象其他人那样得到这个职位呢？反正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地付他钱，而这对经纪人先生来说肯定是最主要的。于是我第二天把大礼帽刷得比第一次还要干净，把上衣熨得尽量平整，在约定的时间准时地站在牧师的面前。他用比三天前和我分别时还要友好的神情接待我。他对我说，这个拟议中的职位是在布赖顿市一所最“上流”、最有名的学校里；我的资历在所有应聘者中是最优秀的，而我的保证人（城里一个十分有钱的商人，我在苏黎世时教过他的儿子）也是符合最高要求的。总而言之，这个肥缺看来是已经到手了，并且我已经在计算第一季度我该付的佣金和剩项是多少了。可是不多一会儿，我的这位尊敬的牧师就热烈兴奋地，用一种比先前还要甜蜜的油滑声调补充说：

“我只是还要向您提一个问题，我想您一定乐意如实地回答，然后事情就完全办妥了。在您将要去就职的那所学校里，上学的尽是‘最上流社会家庭’的子弟（他特别强调地说出“最上流”这几个字）！这些家庭主要是想让他们子弟受到用基督教原则和基督教纯



洁的道德，即用最纯洁的基督教教义所进行的教育。因此我有责任问您一下，您本人对基督教教义，对我们的上帝和救世主耶稣的态度如何。”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就象唱歌一样，完全是一种传教时用的鼻子哼哼声。我惊奇地抬起目光。而我尊贵的牧师也许从我的面部表情上看出，他的甘泪卿*式的问题不是那么使我感到愉快。于是他把话题岔开，表面上想缓和一下气氛，而实际上更有激发作用。他说：“根据您优秀的资历，根据您的言谈举止留给我的印象，我对您本人是丝毫没有怀疑的。本来我根本用不着向您提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受那所学校校长的委托，要确定一下您的宗教观点。这并不是要您皈依我们教会的教义。德国耶稣教会的教义和宗教礼仪跟我们这里的新教教会是大不相同的。”他非常慈爱地向我微笑着，“这些您都知道得比我多。不过在德国到处宣扬不信教，而且大卫·施特劳斯博士的那本包藏祸心的书①，使德国的基督教徒都中了毒。所以，在我们英国不得不对德国人有所戒备。英国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信奉基督教，它的居

* 甘泪卿是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一个市民少女，曾与浮士德发生过爱情，事后深表忏悔。

① 系指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ß) 1835—1836年发表的《耶稣传》，作者在书中指责了福音书中的神秘性。



民都虔诚地信仰基督。我想，您一定会作出对您我双方都满意的答复。”

他结束了他的讲话，带着疑问的表情望着我。他的声音竟变得这样甜蜜和油滑，以致使我想，他的光滑的秃头大概一定会冒油，而且象扑粉似地撒了不少沙糖在上面，又滋润又甜蜜。唉，要是他看出了我心中的这些想法该怎么办呢！他大概惯于在乱七八糟的感情之中去尽可能找到基督的人类之爱吧，而我却希望把这家伙掐死才好呢。他不是甘泪卿，因此也不好利用浮士德式的回答去搪塞，而只能小心翼翼地回避。万一我有一句什么粗鲁的话伤害了他或者让他对我信仰基督教产生一丝一毫的怀疑，那末这个收入丰厚、眼看就要到手的职位就会变成泡影。我就会重新、或者确切地说，会继续挨饿下去。于是我采用了尽量避实就虚的外交手腕。

“您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是非常自然的。但是，看来我是不应当上基督教教义课，也不应当用你们教会的教义去上课的。我确实从未认真研究过你们的教义，所以我只能上一些历史课、文学课和语言课，尤其是象德语和法语这样一些完全与宗教无关的课程！”——“对不起，”我尊贵的牧师温良友善地打断了我的话，“您得每个礼拜日或每隔一个礼拜日带着您的学生到教堂去一次，这是您职责之内的事！”——“噢，



这我很愿意(我没有被这句话噎住)。凡是我的职务所要求我尽的责任,我都尽力认真地去完成。我能向您保证,我将不会用任何语言 and 任何行动去伤害我的学生们的世俗感情以及他们的宗教观念和信仰。”——“对于象您这样的绅士,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也不再期望别的。不过作为一个神学家(在我上吉森大学的名册上,我第一次注册的是神学系),您自己也知道,在形式和信仰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们不能仅仅具备一个形式。当您陪同您的弟子去做礼拜,而您却根本不相信做礼拜的意义及其道德上的必要性,那末这本身就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而完全是亵渎圣神的犯罪。”

我的心血沸腾起来。对我说这样的话,完全是要我依附于英国的国家教会*。他嘴里所说的无非是虚伪的空谈,却偏要装成主教派特具的那种虚假的警句格言!我真想掐住他的咽喉,用拳头把那光秃的头盖骨砸碎。但想到饥饿将使人痛苦不堪,我还是鼓起勇气作了最后一次绝望的努力。

“对不起,”我用超人的力量把满腔怒火压下去,勉强说了这样几句话:“对不起,我不属于主教派教会,这您是知道的。但是,只要您同意我作为一个非教徒参加你们教会的礼拜仪式,您就可以明白,在履行职务时

* 英国国家教会亦称主教派教会。



并不能把是否信仰礼拜的意义和它所包含的真理作为其道德上的先决条件。我将完全尽到我的责任，而绝对不会滥用我的职权去促使我的弟子产生与他们的父母和校长的感情相抵触的思想。我要出售的是关于德语、法语之类的分词、介词和动词的知识，它们既不属于英国的主教派，也不属于德国的新教派或天主教派。它们不属于任何宗教，完全是中性的。我关心的只是正确教好分词、介词等等，并且让学生学会。”——“好吧，我们不必再谈下去了，只是请您允许我向您提一个问题。您说得对，您是否赞同基督教会的某种仪式，在这里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您究竟相信不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不相信人们会得到这位救世主的拯救？一句话，您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教徒？”

他望着我，和蔼地微笑着。在这种和蔼的微笑后面隐藏着使我感到冷酷的漠然态度。现在我才知道我被他耍了花招。他的那种怜悯或者说同情纯粹是为了侮辱我，不过他也没有成功。美丽的牛奶罐打破了。我在这牛奶罐上所做的美梦既然象肥皂泡似地破灭了，那我就可以和法国国王弗朗茨一起高呼：“丢掉一切，只要留得尊严！”

我站起身来。他也站起身来，好象有点畏缩，大概从我的眼神中他没有看到一点友好的感情。于是我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开始说道：“我反问你一句：您是

一个基督教徒吗？基督是谁？基督是什么人？您知道福音书中的故事吗？福音书中基督所宣布和教诲的，您都身体力行了吗？您相信一匹骆驼穿过一个针眼要比一个富翁进入天国更容易吗？您是遵照这种教义行动的吗？您说英国是一个‘基督的国家’，可是你们把信奉上帝的中国人用枪炮杀死，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愿被英国的鸦片毒害，这难道也是基督的人类之爱吗？你们教会里的神父们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而成百万的英国人却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这也是基督的人类之爱吗？”我就这样一直说下去，慷慨激昂的情绪使我口若悬河，而且使我不熟练的英语也流利起来。我把我的全部忿懣倾吐而出。最后我向这油滑的牧师说，我蔑视伪善的说教，更讨厌他假仁假义的言辞。

他顿时变得哑口无言，然后畏惧地看着那只叫人的铃。这时我正站在铃的前面。他显然是想掀铃唤人。我缓慢地向门走去，眼睛盯着这个敌人。当我走到外屋的时候，听见牧师房间里发出狂暴的绝望的铃声。那个高大得象树木似的穿制服的仆人赶紧向他的“主人”跑去。当然我用不着等这个仆人回来，便迅速地把身后的门关上，穿过走廊，急忙走到街上。我的整个身心都为我向这个油滑的秃驴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而感到深深的满足。可惜的是，我这种高兴的心情正象一个曾经汗流浹背地锯下他所坐树枝的农民的心情一样：

树枝锯下来了，他很高兴，可是砰的一声，他自己也连同树枝一起掉进了泥潭。我也感到象是从天空中掉下来似的，从我仿佛在梦幻中坐了一会儿又锯下来的树枝上掉了下来。

我逞这一时之快的结果，是长期的沮丧和为期更长的挨饿。

在尼科尔森牧师那里度过的一刻钟，直到今天还记忆犹新，就象昨天刚发生似的。去年三月，也就是我最后一次旅居伦敦的时候，我再也抵抗不住一种诱惑，想再去看一看那次成为我生活转折点的奇遇的地方。我果真去了。亚当街是属于远离大都市的生活漩涡、因而几十年的时间在那里毫无痕迹地逝去的街道之列。我发现那条街上直到今天依旧还有许多教师职业介绍所，甚至重新认出了我要再去的那所房子。它一点也没有变样，只是门上已经换了另一个名字，底层的窗棂上也添加了绿色的铁栏杆。要是尼科尔森牧师的“教会公职和教师职业介绍所”的字样还在那里，尼科尔森本人也还在那里，我是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的。因为我象半个梦游者那样，完全失去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我已经忘记了自从我最后一次和尼科尔森牧师见面之后，几乎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尼科尔森当时已是五十多岁的人，按照事物的自然规律，根据他那好人进天堂而恶人入地狱的说教，他早已在非此即

彼の归宿之一中度过了数十年——看来他再也不会抱怨寒冷了*。

我重新走到了海滨街，差一点被一辆汉萨姆式的出租马车^①压死，这时我才如梦初醒一般。

自从我离开尼科尔森牧师之后，我再也没有到另一个代理人那里去，忍饥挨饿了好长时间。但是我没有饿死。在那个时候，我有时给私人授课，有时在几所不同的学校里教学，以此度过了难关。附带说一句，我当时仍在不断地倒楣，以致失去了我曾经得到的一个最好的职位。我原以为那个职位是笃定可靠的，因此我大胆地成了家。可是成家之后，我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去照看孩子，而由于这种情况的变化，我便失去了那个职位。

一直到我离开英国的那天，我都在那里主要以教书为生。虽然我也做一些记者工作，但是记者这个行业特别不可依靠，因为能让我们这些亡命的激进分子工作的报纸，大多数都有讨厌的习惯，就是不付稿酬。

在我的教书生涯中，除了在瑞士执教之外，还在英国当了近十年的教员，主要是教语言，当然也教过其他

* 这是德语中隐喻一个人死了的说法，因为一个死人无所谓有冷暖的感觉。

① 一种以英国建筑师约瑟夫·阿洛伊修斯·汉萨姆命名的双轮双座马车，赶车人坐在乘客座后驾驭。

的科目。特别使我愉快的是在伦敦工人教育协会里讲课的日子。工人教育协会也就是那著名的同时也受到各方面诽谤的“共产主义者俱乐部”，或者叫“共产主义者协会”（《共产党宣言》就是在这个协会里诞生的^①）。我在那里讲了八年课，每周作关于时事政治或科学专题报告。

在我戏剧性地结束了和《北德意志总汇报》的关系之后^②，我在柏林又继续呆了两年，以后被强令驱逐出柏林，结束了我在那里的三年生活。1862—1865年间我在莱比锡，在那里的工人教育协会继续我的教书工作……

后来，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令的颁布，使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遭到破坏，我的教书生涯也随之宣告结束，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重操旧业。我只是想说明一点：如果把我作为正式教师的真正从业时间全部算在一起，那末大约有四分之一世纪之久，所以我实在可以为我的教师生活举行庆典。

摘自《1901年世界新历画报》(Illustrirter
Neue Welt-Kalender für das Jahr 1901),
1901年汉堡版,第44—47和49页。

^①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在伦敦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资助下印行。

^② 参阅本书第227页(罗伯特·施维舍尔)篇。



“并无悒悒不乐”

我和马克思第一次作较长的谈话，是在上面提到的那次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组织的郊游时相见后的第二天^①。郊游的地方自然不便深谈，于是马克思邀我第二天到协会会员们相聚的小酒馆去，届时恩格斯也会到那里去。

我到得比约定的时间略早一些。马克思还没有到，但是我遇到好几个旧时的熟人。我们正在热烈谈论的时候，马克思拍拍我的肩膀，亲热地同我打招呼，并说恩格斯在楼下私人谈话室里，在那里我们可以谈得更随便一些。我不知道这个私人谈话室该是什么样子，只觉得我仿佛马上就要面临一次“大”的考试似的，不过我还是很镇静地跟着他去了。马克思给我的印象

* 指1840年由卡尔·沙佩尔、约瑟夫·莫尔等人在英国伦敦建立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1847—1850年以及十九世纪六十一—七十年代，马克思对该协会起决定性的影响。

① 指1850年5月中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组织的夏季郊游活动，在那次郊游中，李卜克内西第一次会见马克思。

仍然象头一天那样的和蔼可亲。他有着一种能使人信赖的素质。他拉着我的手臂，把我引进那间私人谈话室。其实，那是一间酒馆老板（也许是位女老板？）的私人房间。恩格斯已经自个儿在那里倒好了满满一锡壶深褐色的黑啤酒。他立刻愉快地开着玩笑接待我。

不一会，艾米进来了（艾米（Amy）是酒馆里那位敏捷的女侍者，她的名字跟我们德国的 Emma 相近，所以流亡者们有时也就称她为 Emma（爱玛）。不久我还进一步听说，她嫁给了我们贝克尔军团的一个同志）。我们要了一些喝的和吃的“东西”（在我们流亡者中间，解决肚皮问题一直占着重要的位置）。转眼工夫，啤酒便拿来了。我们坐下，我坐在桌子的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着我。坚实的桃花心木桌子，发亮的白锡啤酒壶，起着泡沫的黑啤酒，配有调料的地道的英国牛排，逗人发瘾的陶质长烟杆——一切是如此的安逸舒适，使我不由得感到好象置身在狄更斯所描写的英国生活之中。但是我面临的毕竟是一场考试！而且此刻已经开始。

谈话渐渐活跃起来。我不久就发现我的两位主考人事先已经了解过我。1848年夏天，我曾经给黑克尔在穆腾茨主编的《人民之友》报*写过一篇较长的关于

* 黑克尔(Hecker)，见本书人名索引；穆腾茨(Muttentz)，德国一地名；《人民之友》报——“Volksfreund”。



六月战役的文章（1848年6月的悲剧成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读过我的那篇文章，并且对我开始加以注意。我是一年前在日内瓦才见到恩格斯的，在此之前，我同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有过私人的交往。马克思的著作我只读过他在巴黎《年鉴》上发表的那些文章和《哲学的贫困》一书。恩格斯的著作我只读过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1846年便是共产主义者的我，只是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之后，也就是在与恩格斯见面不久以前，才设法得到了《共产党宣言》，虽然我早已听说过这本书，并且早已知道它的内容。我很少能看到《新莱茵报》。在它出刊的十一个月中，我不是在国外就是在狱中，或者在志愿军的动乱的“狂飚突进”的生活中。

我的两位主考人本来怀疑我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情绪和“德国南方人的温情”。因此我对人对事的不少见解，都受到他们尖锐的批评。但是在有的事情上，我也成功地消除了他们对我的怀疑。比如我向他们讲了我在巴登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怎样给我带来了不幸的遭遇。那时正是第二次起事（即司徒卢威暴动）之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伦坦诺拒绝在刑事陪审法庭上为我进行辩护，尽管我们为此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因为我不愿否认我的共产主义信仰，而在法庭上我是要被控犯有叛国罪以及其他各种罪名

的。也正是这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伦坦诺，两个月后又把我送进了拉施塔特要塞的地牢（当时正值起义进行之际，有人向他告发说，我正在策划对他进行政治谋刺）。事后，他的朋友黑克尔还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责备，因为他没有把我交给军事法庭集体处决。

总的说来，考试进行得不算太坏。话题渐渐转到其他事情上去了。不多一会儿我们便谈论起自然科学来。马克思嘲笑欧洲得胜的反动势力，它们幻想革命已被窒息，而没有想到自然科学正在准备一次新的革命。蒸汽大王在前一个世纪中曾扭转乾坤，现在它的统治已到末日，将被另外一种更大得无比的革命力量——新兴的电力取而代之。这时，马克思异常兴奋地告诉我说，几天以前在瑞琴特街上展出了一部牵引列车的电力机车的模型。他说：“现在这个问题是解决了，但是这件事的后果却是难以预料的。经济上的革命出现以后，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一场政治上的革命。政治革命只是经济革命的一种表现而已。”马克思在谈到科学、特别是力学的这种进步时，他的世界观，即以后人们所称的唯物史观，表达得如此清楚明白，如果说我在这以前还保留有某些疑虑的话，那末此时此刻它们就象积雪那样在春天的阳光下融化消失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回家。我们谈着，笑着，喝着酒，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当我上床睡觉时，太阳已高高

悬在天空。可是我没有躺很久，因为我怎么也睡不着，头脑里回想着我所听到的一切，那汹涌起伏的思潮终于驱使我走到街上去。我急急忙忙跑向瑞琴特街，想要看一看那个模型，那个当代的特洛伊木马*。资产阶级社会在自寻死亡的眩惑中很高兴地，象从前的特洛伊人那样，把它引进到自己的依利翁城，结果是木马给它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毁灭。Essetai hemar**——使神圣的依利翁城毁灭的日子将必定会到来。

在陈列模型的玻璃橱窗前簇拥着密密麻麻的人群。我挤进人群，亲眼看到了机车牵引着列车正在欢快地绕着圈子奔跑。

那时是1850年7月初，而今已是1896年4月初。四十五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可是还没有出现由电动机车驱动的火车。虽然一些小小的有轨电车和其他的一些机器是借助于电的发明才得以产生，但总的说来，影响不大。划时代的发明纵已出现，但是人们完全能驾驭电力并用它来操作人的艰苦劳动和取代蒸汽大王的宝座，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一切革命都不是易如反

* 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故事。传说希腊人围攻特洛伊城九年不下，乃将精兵伏于一匹大木马腹内，置城外营房里，佯作退兵。特洛伊人把木马移到城内。夜间伏兵跳出开城迎入希腊兵，攻下该城。现常用来比喻从内部暗中进行的破坏活动，或引伸为咎由自取。

** Essetai hemar 是荷马时代古希腊文的德语音译。hemar 意谓“日子”；essetai 意谓“将来到”。

掌地就能完成的。只有在那些诳人的政治戏言中才把革命说成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而且也只有那些盲从得出奇的轻信者们才会去相信。谁要是认为自己能预报革命，那末他往往弄错日期……

当我在这里叙述了我是如何认识马克思之后，我也想马上追叙一下，我曾是怎样没有认识马克思的，也就是说，当革命的铁扫帚把我扫到他的身旁时，我曾怎样错过了认识马克思的机会的。

也许只差一点儿，我本来就可以在1848年2月，亦即二月暴动之后遇见马克思的。我事先真没有料想到，我们当时只相隔百步之远。那是在我得到巴黎街头爆发斗争的消息之后，我从瑞士，确切地说是从苏黎世，匆忙赶到巴黎的时候。尤利乌斯·弗吕贝尔把我介绍给海尔维格，我也立刻找到了海尔维格。这位“铁云雀”正忙于装备德国志愿军团。当时有一种想法，要把共和政体从法国移植到德国。这种想法对我这个还不满22岁的青年人的头脑来说，是最美妙不过的，于是我就轻率地参加了这种冒失行动。

当我正在走向这种泥潭的时候，却有一个更为睿智的人在暗中看得很清楚，并且竭力要防止这种愚蠢的事情发生。因为他十分明白，这种组织“外国人军团”从而想把革命输向外国的计划，完全是出自法国共和派的资产阶级之手。而法国资产阶级人为地掀起这一

“运动”，则是出于双重的目的，即一方面他们可以把那些不安分的分子除掉，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在严重的社会危机中把构成竞争威胁的外国工人排挤走。识破这个机关的人便是马克思。可惜我当时正处在兴奋激动的漩涡中，不知道他的存在。如果我当时知道这些背景的话，那末海尔维格在招募志愿兵的时候，也不会把我再招进去了。话又说回来，当时我是没有遇到马克思，如果我遇到了他，那末毫无疑问，他会把我拉到他当时的活动中去。这样，我就不是到德国南方去，而是到普鲁士的莱茵河流域去了，也许还会参加到《新莱茵报》的编辑部去呢。当然，这一切也只是现在说说而已，在当时都没有成为现实。事实是我们在那以后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初次见面的。

当时我在巴黎还错过机会认识另一个人，而且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虽然我当时知道他在巴黎，但是我并没有去结交。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我欣赏他的诗，但是有两件事使我下不了决心去拜访这个“反动派的佣兵”，一件事是他领受路易一菲力浦的恩俸，另一件事是他为奥格斯堡的《总汇报》*撰写文章。这

*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反动日报，创刊于1798年，从1810年到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1842年以空想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伪装出现。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曾揭露它的这种伪装。



两件事当时在我眼里看来（当然这是透过资产阶级的革命浪漫派的有色眼镜看的）简直是犯了滔天大罪。可是事后我真是后悔莫及！我竟失去了这样一个时不再来的机缘。而命运总是这样嘲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在以后也成了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记者……

再说说我们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去的郊游吧！倘若我能活到一千岁，我也不会忘记那些情景。汉普斯泰特荒阜是在樱草山的那一边。不住在伦敦的人也大都从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的人物那里熟悉了那个地方。它的大部分今天仍然是一片荒地，没有房舍，到处是幽谷山岗，丘陵地上遍生着金雀花和小树丛。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信步遨游，而不必担心遭到神圣的财产守护者的阻拦，不会因为“非法侵入”（“trespassing”）而罚款，也就是说，不会由于未经许可而闯入别人领地而受到处罚。直到今天汉普斯泰特荒阜仍然是伦敦人远足最爱去的地方。每逢天气晴朗的星期日，到处是穿着黑色礼服的男人和衣着鲜艳的妇女，他们特别喜爱试试出租的驴子和马匹的耐性，其实那些驴子和马匹本来就够耐性的了。四十年以前，汉普斯泰特荒阜比今天要大得多，也天然原始得多。在汉普斯泰特荒阜上欢度一个星期日，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快乐和享受。孩子们在事前一星期就经常谈论它了。我们成年



人——年纪大的和年纪轻的①——也一样高兴。

甚至到那里去的行路过程中，我们也象过节似地愉快。姑娘们都善于走路，她们走起路来就象猫儿那样的轻快和不知疲倦。从马克思所住的第恩街（离我所寄居的教堂街只隔几步远）出发到那里去，差不多要用一个钟头零一刻钟。一般我们在上午近十一点钟时就起程了。但常常要比这个时间更晚一些，因为在伦敦，人们不习惯早起；等到一切准备就绪——把孩子们打扮好，把篮子里的食物整理好——不少时间也就过去了。

说到那个篮子，它又好象出现在我眼前一般。它在我“想象的眼睛”面前显得如此生动，如此真切，如此诱人，如此地使人垂涎，使我觉得跟昨天看到时一样，还挂在琳蕻的手臂上似的。

这个篮子就是我们的食品仓库。当一个人有一个强健的胃而衣袋里又没有一些必需的零钱时（大笔的钱在当时更是谈不上了），他就全指望这个篮子里的食物了。好心肠的琳蕻非常清楚这一点。她的胸中有着—颗同情的心，同情那些经常挨饿而总觉得吃不饱的客人。在汉普斯泰特荒阜度星期日的传统食物中，主要是很大一块烤牛肉。琳蕻从特利尔城带来的那只手

① 指马克思一家、德穆特（琳蕻）和李卜克内西。



提篮子，在伦敦人看来大得不同寻常，简直成了一个圣品的珍藏所，有时甚至成了一个神龛。篮子里除了牛肉之外，还盛有茶叶和砂糖，偶尔也有一些水果。面包和乳酪是在汉普斯泰特荒阜现买的。那里有一些象柏林那样的公园小吃店，可以从店里借到食具，买到热水、牛奶、面包、乳酪、黄油和啤酒，还可以买到当地盛产的小虾小蟹（长臂海虾或海蛛蟹）、凉菜和牡蛎。这当然要看各人的需要和财力如何了。然而在一个短时期里小吃店内却买不到啤酒。因为那些在家里和俱乐部里堆满了世界上各种美酒、天天欢度节日的伪善的贵族阶层，想通过星期日禁卖啤酒来提高平民百姓的伦理道德。但是当伦敦人一旦肚子受到亏待，便不能容忍这种恶作剧了。这个法案实行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成千上万的人走向海德公园，向着那些坐着马车和骑着马匹悠闲漫游的虔诚的贵族老爷和太太小姐们雷鸣般地呼喊，讥讽说：“Go to church!”（“做你们的礼拜去吧！”）从而使那些道貌岸然的老爷太太们惊恐万状。下一个星期日，二十五万人变成了五十万人，“做你们的礼拜去吧！”的喊声更激愤了。第三个星期日法案便废除了。

我们流亡者尽力支持这个在“做你们的礼拜去吧！”的呼声下进行的革命。马克思在这种大声疾呼的场合显得太兴奋激动了，险些被一个警察抓住而送到



警察局去。幸亏我们那些竭力鼓吹啤酒益处的热烈谈话感化了那位勇敢的法律维护者。

如上所述，伪善者们的恶作剧并没有持续很久。除了极短暂的停售啤酒时期外，每逢星期日我们沿着毫无遮荫的大路去汉普斯泰特荒阜郊游时，一想到在那里可以喝到清凉的啤酒，就欣然自慰了。

出游路上行走的次序通常是这样的：我和两个小女孩走在前面当先锋。我们一会儿讲故事，一会儿做自由体操，一会儿采野花，那时野花并不象现在这样稀少。我们后面是其他几个朋友，接着就是我们这支队伍的中军——马克思夫妇和某一位需要更多照应的星期日来客。在他们后面便是琳蕙和最感饥饿而帮着她提篮子的某些人；如果出去的人较多，他们便分散在队伍的各个部分。当然这一列队伍行军的次序可以根据各人的情绪和需要进行变换，这是我毋需多说的。

到达汉普斯泰特荒阜以后，我们首先要找一个适于落脚的地点，并且要尽可能考虑到那个地点便于得到茶水和啤酒。

但是在吃喝完毕之后，旅伴们无论男的或女的，就各自去寻找最舒适的地方躺一下或坐一会。如果不想小睡，每个人都从衣袋里把来时路上买的星期日报纸拿出来，等孩子们很快地找到了玩伴，在金雀花树丛后面捉迷藏的时候，我们便开始读报和谈论政治了。

为了使这种恬静的生活起点变化，于是就掺杂进赛跑、摔跤、投石头和其他的运动。有一个星期日，我们在附近发现了一棵果实已熟的毛栗树。“让我们看谁打得最多！”有一个人叫道。于是一声欢呼便干了起来。摩尔发狂似地打着，可惜从树上打毛栗子他实在不是能手。不过他也象我们大家一样毫不倦怠。直到最后一颗毛栗子在胜利叫喊声中到手之后，我们才停止了炮击。后来马克思有八天的时间右臂痛得不能动，而我的情况也并不比他稍稍好些。

最开心的事是骑驴子。大家发疯似地笑呀，喊呀！一派滑稽有趣的情景！马克思很会逗趣。他的骑术很糟糕，却又大肆夸口说他对骑术很有造诣，这就使我们更乐了。他所谓的造诣就是指他在学生时代曾上过几次骑术课（恩格斯说，他总共只上过三次）；还有就是他在曼彻斯特的时候，曾经和恩格斯一起，千载难逢地骑着马出去过一次。那是骑着可敬的罗辛纳提*。那匹马也许就是老弗里茨**有一次送给可敬的格勒特的那匹驯羊般的温和的老母马的曾孙。

我们在从汉普斯泰特荒阜回家的路上总是很愉快的，虽然一般说来，回家路上的欢快之情不及来的时

* 罗辛纳提是塞万提斯小说《唐·吉珂德》中主人公唐·吉珂德所骑的马。

**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

候。我们用黄连树下操琴的幽默来驱散心头的忧郁。尽管我们有很多闷闷不乐的理由，但是流亡者的惆怅与烦恼对我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人开始抱怨，我们就立刻郑重其事地提醒他，要他记住自己的社会职责。

回家路上的行军次序与出来时不同。孩子们跑了一天疲倦了，便与琳蕻在一起作殿军。篮子空了，琳蕻走起来也轻快些，便能够照顾她们了。我们总是爱唱歌，不过政治性的歌很少唱，大多唱的是民歌，尤其是感情洋溢的歌和关于“祖国”的“爱国”歌（这并不是瞎说），例如“噢，斯特拉斯堡！噢，斯特拉斯堡！你这个无比美丽的城呵！”这首歌我们特别喜欢唱。或者孩子们给我们唱黑人歌，甚至配上黑人的舞蹈——如果她们疲倦的腿已歇过来一些的话。一路上不许谈政治，也不许谈流亡者的困苦。相反，我们对文学艺术却谈得很多，这时马克思就有机会显示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了。他会成段地背诵《神曲》，而且几乎能把它全都背出来。还一场一场地背诵莎士比亚的剧词，这时，对莎士比亚素有研究的夫人就常常替代他。如果马克思兴致特别高，他就给我们模仿赛德尔曼*如何演《浮士德》中的靡非斯托。马克思非常欣赏赛德尔曼，当他还是

* 卡尔·赛德尔曼是德国著名戏剧演员，见本书人名索引。



一个大学生的時候，就在柏林看過賽德爾曼的演出，並聽到過他的事跡。《浮士德》是馬克思最喜歡的德國詩劇。我認為他朗誦得並不很好，有些過分誇張。不過他總能抓住中心意思，而把它始終正確地表達出來。總而言之，他表演得很成功。他能一口氣念出那些稀奇古怪的諷刺的台詞而又充分進入角色，深刻地掌握魔鬼這個角色的精神境界。

兩個小女孩*中，較大的一個就是小燕妮（杜西，即現在的爱琳娜·馬克思——艾威林夫人當時還未出世）。小燕妮和她父親長得一模一樣，尤其是她的黑眼睛和前額。有時候她會處於預言家似的神秘的激動狀態，象神巫召來了“神靈”一樣，眼睛炯炯發光，口中念念有詞，而所說的常常是最離奇的幻想。有一次，我們在從漢普斯泰特荒阜回家的途中，小燕妮又開始念念有詞起來。她講的是各種星球上的生活，並且把它們編成了一首詩。已經失去了幾個孩子的馬克思夫人對這感到憂慮不安，認為孩子這樣早熟是一種病態。摩爾說她是在胡思亂想，而我則把已從預言的夢幻中清醒過來並且在身旁嬉笑雀躍的“小神巫”指給她看——小姑娘是十分健康的。

隨着兩個小姑娘的逐漸成長，這種星期日遠足的

* 兩個小女孩是指馬克思的兩個女兒——燕妮和勞拉。當時爱琳娜（杜西）尚未出世。

性质也有所改变。不过为了照顾小辈们的兴趣，每次郊游总有年轻人喜爱的项目。

总而言之，我们在那流亡生活最凄楚的日子里，常常是非常开心，而并无恹恹不乐。这当然首先得侥幸没有饿死才行。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往往用得着英国设菲尔德的工人们常说的一句俗话：A short Life and a merry one. [活的日子不多，也要活得快乐。] 谁去想到死呢？Never say die! [千万莫说死的话！] 死是没有价值的。因而我们常常纵情欢乐，景况越坏越洒脱。医治无情的苦难的唯一良药是欢笑！谁要是为苦难而惆怅，那他就可以说是被苦难制服和吞噬了。可是苦难一遇到轻松愉快的欢笑声，就会象魔鬼听到鸡啼一样地跑掉。

这是我向大家推荐的一个良方，只要世界存在一天，它就始终是一副灵丹妙药。我们从来没有象那个处境最困难的时候那样笑得那么多。

而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并不都是苦中作乐！

有时候甚至会重新干出那种大学生的恶作剧来。有一天傍晚，埃德加尔·鲍威尔（他在柏林时就和马克思认识，后来虽然马克思写了《神圣家族》一书批评他，他还没有同马克思翻脸）从他在海格特的幽静住地“进城”来，请马克思和我一起去进行一次“喝啤酒漫游”。问题是：在牛津街和汉普斯泰特路之间，有着数不尽的



小酒馆，要是遇到每个酒馆都进去喝“一点”，哪怕是极有限的“一点”，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然而我们还是无所畏惧地出发了，而且顺利地到达了托登汉姆大院路的尽头。那里有一个酒馆传出了响亮的歌声。我们走了进去，才知道原来是共济会（一个遍布英国的资助病人和免费办理丧葬事宜的慈善团体）的会员们正在举行宴会。我们遇见几个“及时行乐”的人，他们立即以英国人的殷勤好客态度把我们这些外国人邀请到一个房间里去。我们兴致勃勃地跟着进去。谈话的内容自然是涉及政治方面的，因此他们立刻发现我们是德国流亡者。这些英国人纯粹是些善良的小市民，为了博得我们的欢心，竟把大肆谩骂德国的侯爵和俄国的容克视为他们应尽的义务。“俄国”的容克其实应该是普鲁士的容克。在英国，经常把 Russia（俄罗斯）和 Prussia（普鲁士）相混淆，这不仅仅是由于这两个词相似的缘故。开始时一切都好。我们不得不频频举杯，时而接受别人的祝酒，时而回敬别人，一干而尽。

可是突然发生了一件料想不到的事。

“爱国主义”有时简直是一种毛病。即便一个理智的人，一旦到了外国，也可能传染上这种毛病。在国内，由于到处看到各种卑鄙庸俗的事物，所以每一个尚未变得头脑麻木和脊椎弯曲的人还都有一种神奇力

量来抵御那种叫做沙文主义或侵略主义*的政治眩晕病。可是一旦染上了那种病的人，他们往往嘴上借用上帝的名义，眼睛射出虔诚的光芒，那真是危险之极了。

莱辛曾经说过：“我在萨克森赞美普鲁士，我在普鲁士赞美萨克森。”这是一种最常见的人们的“爱国主义”心理。这种爱国主义试图在国外通过某些美化祖国的事例（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虚假的）来弥补祖国的缺陷。我很早以前就因为实践莱辛的这句话，而受到我青年时代唯一的一次吸打，也就是在国外因为爱国主义而遭到的袭击。那是在瑞士。有一次在苏黎世的“海弗莱”酒馆里，当有人把德国骂得不成样子的时候，我忽然跳起来对那些先生们说：“你们别再骂德国了。你们应该为德国的深重灾难感到高兴，因为瑞士的存在应该归功于德国的深重灾难。一旦德国清算起旧帐，那边的意大利和法国也清算起旧帐，那末瑞士就不复存在了。瑞士的德国部分将归并到德国，瑞士的法国部分将归并到法国，意大利部分也将归并到意大利去。”我当时阐述的是一种相当唐突的未来的政策。但那是由于“疯狂”的一年把我的爱国主义激发起来了。我的言论没有博得什么同情，这一点我从听众们的阴

* 侵略主义(德文 Jingoismus 源于英文 jingoism) 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于大英帝国的极端好战的沙文主义。



郁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我遭到激烈的反驳。这时候谈话也就渐渐地停息下来。而且天色已晚，我便动身回家。在我住宅附近的“船埠”处，突然有几个人向我走来，转瞬之间伸过一条腿把我绊倒。当我摔倒在地还没有重新站起来时，狠狠的拳头已落在我的身上。随后，这些袭击者扬长而去。我一直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毫不怀疑，一定是由于我在“海弗莱”酒馆里的那一番爱国主义的言论，才招来了这一帮匿名人士的一顿痛殴。

而此刻在伦敦，在憨厚的共济会会员身旁，我和我的两位“失去祖国”的同伴又陷入一种与当时完全相似的情景。埃德加尔·鲍威尔由于听到一句不顺耳的话，便立即调转矛头，嘲讽起那些英国的势利鬼^①来。马克思也发表了一通热情赞扬德国科学和音乐的演说。他说，没有一个别的国家能够产生象贝多芬、莫扎特、韩德尔、海顿这样的音乐家。而英国人呢，他们未曾有过什么音乐。他们一向是完全倚仗着德国人的。只不过到了今天，德国人由于政治和经济上落后不堪的状况，才受到大大的阻碍而没有取得实际的进展。然而尽管

^① 势利鬼(snob)原是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1863)一篇著名讽刺杂文里的人物，他装腔作势，故作矜夸，表现出一个“自由的堂堂的英国人”，但实际上却爬行在名利、地位与金钱之前。

如此，德国人仍然走在所有其他民族的前列。我还从未听到过他英语说得如此流利。至于我自己，也用激烈的言词发表了一通见解（有些所谓的见解和看法其实也是极为荒谬的）。我说，英国的政治状况并不比德国好一丁点儿，唯一的区别是，我们德国人知道我们国家的状况是 miserable〔悲惨的〕，而英国人却不知道从何处看到光明。我们在政治知识方面实在要比英国人强得多。

我们好客的朋友们的脸色阴沉下来了，情形很象当年在“海弗莱”酒馆里一样。当埃德加尔·鲍威尔还想用更尖刻的言辞针对英国人的 cant〔巧言令色〕加以讽刺的时候，人群中已发出轻轻的咒骂声，Damned foreigners!〔该死的外国佬!〕紧接着骂声愈来愈响。有人怒气冲冲说着威胁的话，有人在空中挥舞着拳头。我们也非常知趣，不再硬充好汉，而随机应变，下决心撤退；虽觉有点尴尬，但也只好忍耐。

这会儿，我们对于“喝啤酒漫游”已经厌倦了。为了发泄一下纵情欢乐的欲望，我们开始长距离竞走，一直到埃德加尔·鲍威尔在一堆铺马路的碎石子上打了一个趔趄。“乌拉，这可是个好主意！”他回想起了大学生时代的疯狂的恶作剧，便拾起一块石子，只听得“砰！”的一声，煤气路灯霎时发出玎玲琅琅的声响，玻璃碎片四溅。完全是一场瞎胡闹。马克思和我也不甘落后，

我们打碎了四盏或五盏煤气路灯。这时候约莫是凌晨两点钟光景，街道上空荡荡。但是这种叮铃铛的声响引起了一个警察的注意，他果断迅速地发出一个信号给他所辖地区的其他警察。立刻从四处传来回答的信号。情况非常危急。我们观察了一下周围地形，幸亏这地区是熟悉的。我们在前面奔跑，三四个警察在后面遥遥紧追。我先前从未想到过马克思竟是如此敏捷机警。这样拚命地追赶了几分钟之后，我们拐进路旁的一条小巷，再穿过那里的一条“林荫道”，其实也就是两条马路之间的一个“庭院”。我们从那里奔跑着绕到了警察的后面，让他们看不到我们的影踪才算脱了险。他们没有记下我们的相貌特征，而我们也不再闹下去，各人回到了自己的家。

我在马尔堡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一次类似的险遇，可是对我和我的同伴们来说，结局都没有象这一次这样顺利。那一次我虽然没有被当场抓获，但事后却吃了不少亏。

可是这一次在伦敦，人们对德国大学生的恶作剧根本不了解，因此事情也就不象在马尔堡、柏林或者在波恩那样地被严肃对待。我必须承认：当我第二天早晨（不，那已经是中午）醒来时，我真高兴极了，因为我还在自己原来的房间里，而不是跟“神圣家族”的成员埃德加尔·鲍威尔和未来的《资本论》作者马克思一起

蹲在伦敦的警察局里。此后每逢想起那次夜间的历险，我们总要大笑起来。

摘自威廉·李卜克内西：《纪念卡尔·马克思——生平与回忆》(Karl Marx zum Gedächtnis. Ein Lebensabriß und Erinnerungen), 1896年纽伦堡版，第28—31, 33—34, 69—74以及81—85页。参阅《摩尔与将军——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Mohr und General. Erinnerungen an Marx und Engels), 1964年柏林版，第48—52, 54—56, 110—117以及128—134页。



难堪的一刻钟

有谁不知道拉伯雷的难堪的一刻钟^①呢？那时他必须付清欠小旅馆主的账或者面临更为窘困的事情。谁没有经受过这种难堪的时刻呢？这种时刻我经受过不少。在考试之前；在第一次演讲之前；在首次走进监狱大门，看守人命令我交出背带和领带，而毫不留情地坦率回答我的质问，说怕我用来自杀以逃避军事法庭的审问时——在这样的时刻以及遇到诸如此类的许多事情时，都是令人窘困和尴尬的。但是这些遭遇

① 在法国大革命的那几年，巴黎演出过一出法国喜剧《拉伯雷的一刻钟》(Le quart d'heure de Rabelais)。此后，“拉伯雷的一刻钟”在法国就成了一句嘲谑性的隐语，表示人们在必须还债时的那种窘困和难堪的时刻。

* 本文标题《难堪的一刻钟》(Eine böse Viertelstunde)，即借用这一隐语，表示处境的窘困不堪，然而并非为了偿清债务。拉伯雷(Rabelais, 1494—1553)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巨人传》，尖锐讽刺封建制度，揭露教会的黑暗，曾受统治阶级的迫害，终生颠沛流离。

同我现在要讲的那一时刻比较起来，或许还算是愉快的呢。那一次窘困的时刻总共不到一刻钟，最多不过七八分钟，或许只有五分钟，总之我没有计算过时间。我没有空来计算这个，就算是有空，我也没有表。流亡者和表是两码事！现在我只记得，对这段窘迫的时刻，当时我觉得是很长很长的。

那是1852年11月18日发生在伦敦的事。

那位号称“Iron Duke”（“铁公爵”）和“百战百胜者”，但后来在改革运动时期被英国人民弄得非常软弱和恭顺的威灵顿公爵，于9月14日在他的沃尔梅城堡去世了。11月18日应当替“这位民族英雄”举行“国葬”，他应当同其他的“民族英雄”一起葬在圣保罗教堂的墓地，并且举行隆重的国葬盛典。从他死的那天起，整个英国，特别是整个伦敦都在谈论着这次出殡葬礼。这次排场就其铺张和豪华的程度来讲，将是空前的，因为在英国人看来，这个入葬的人比过去所有的英雄都要来得伟大。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整个英国都沸腾起来，全伦敦都出动了。成千上万的人从外省来到伦敦，好几千人从国外涌来。

我厌恶这种戏剧性的作法，并且素来害怕那蜂拥杂沓的人群，因此这一次我也宁愿象其他同来亡命的流亡者那样，留在家或者到詹姆斯公园去。但是两个女朋友却使我不得不抛弃我早已下定的决心。que

femme veut, Dieu le veut〔妇女所欲即上帝所欲〕。妇女想要的,都要给办到才行。尽管我这两位女朋友,一个才六岁,一个才七岁。确实,我们是那么要好的朋友啊。一个是黑眼睛、黑鬃发的燕妮·马克思,她长得和她父亲“摩尔”一模一样;另一个是长着一头美丽的金发和有一双灵活的眼睛的劳拉,她长得非常象她高贵的母亲,尽管流亡生活的环境是如此艰苦严峻,她总是活泼地微笑着,始终是快乐的“小劳拉”。我方才说过,我们,两个女孩子和我,真是好朋友。

1850年夏天,我从瑞士,更确切些说,是从“自由的”瑞士的一个监狱里,持着一张强迫离境的通行证,经过法国来到伦敦。这以后没有几天,我们的友谊就开始了。我认识马克思一家是在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组织的夏季郊游的时候。那是在什么地方我已经记不清了,或许是在伦敦附近的格林威治,或许是在汉普敦广场。我第一次见到的“Père Marx”〔父亲马克思〕立刻对我进行了一次严格的考验。他用锐利的目光逼视着我的眼睛,并且相当仔细地察看着我的头。这种举动我倒早已从我的朋友古斯塔夫·司徒卢威那里习惯了。司徒卢威一直怀疑我的“严肃的习性”,他特别喜欢把我当作他研究骨相的试验品。幸亏这次考验顺利地过去了,我经受住了那个头上披着狮鬃似黑发的人的逼人目光。于是考验变成了幽默谐趣的、滔滔不绝的

谈话。我们很快就成了尽情欢乐的郊游人群的中心，而这群人中，马克思是最无拘无束的一个。这以后不久我就认识了马克思夫人，认识了从少年时期起就是他们的忠实助手的琳蕙以及孩子们。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想下一次再多讲一些马克思的家庭情况。这是我为了表示感激之情需要偿还的笔债，也是我对同志们应尽的义务。同志们有权利要求每一个与卡尔·马克思有过接触的人尽他力所能及来完善卡尔·马克思这个形象。

总而言之，从那一天起我便俨然成了马克思家里的一个成员。我每天都到他们家里去。那时他们住在牛津街的一条横街——第恩街，而我则住在邻近的教堂街。关于马克思我在这里不多说了。他的夫人对我后来的影响也许和马克思本人一样大。在我三岁的时候我母亲便去世了，所以我受的教育就显得有点过于拘谨，而不习惯于和妇女认真周旋。可是在这里，我却遇到了一位美丽、高贵和聪明的妇女，她象母亲和姐姐一样地对待我这个被抛到泰晤士河畔的举目无亲的志愿兵。我深信，和这样一个家庭的交往挽救了我，使我在流亡者的苦难中免于沉沦。而那两个小女儿，她们已经和我非常亲密，以致一见到我就要把我缠住。这两个小女儿给我的流亡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在那样的艰难时期，除了和孩子们打交道外，没有



什么东西可以使人心情欢快和生气勃勃。当我心中感到无聊烦闷的时候，我就常常跑到我的小朋友们那里去，和她们一起溜大街、逛公园！忧郁的思想马上就烟消云散了，随着心境的变好又产生了为生存而斗争的令人鼓舞的力量。通常我得讲故事；认识后没几天我就被公认为是讲故事的能手，总是受到热烈的欢迎。幸而我知道很多童话，而当我的储备用尽了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把童话故事东拼西凑地自己编造出来。当然，这样讲的时间不能长，因为这两个活泼的小姑娘很快就发觉我是在炒冷饭。于是最后我就得自己新编故事。这样，我就迫不得已成了一个故事编写者，虽然我还不能称为一个作家。故事一个接着一个，还没有一个人能象我这样赢得如此受感动而又如此怀着感激心情的听众。哎，我把话说到这里去啦？还是说回来吧，我要描述一下我那最难堪的窘困时刻。

当我要带着两位急不可待地蹦跳着的姑娘出发去观看威灵顿出殡而向马克思夫人告别时，她对我说：“您得千万当心孩子们呵！千万不要挤到人群里去！”在楼下门口，琳蕻又急急忙忙地追上我们，再一次地嘱咐我：“千万当心，亲爱的‘Library〔图书馆〕’！”（这是孩子们替我起的奇怪绰号）。“摩尔”习惯于晚起，我们没有见过他就走了。

我心里作了这样一个安排：我们没有钱去租一个

窗口或一个看台，而送殡的行列既要经过泰晤士河沿岸的街道，那末我们就必须沿着一条从北向南顺坡而下通往河岸的街道走去。

我左右两边一手拉着一个姑娘，衣兜里装了些小点心。我向选定的观看地点走去，这地点靠近把城区和威斯敏斯特教堂分开的旧城门。从一清早起街上就热闹非凡，人山人海。但由于送殡行列要经过这个大城市的很多街区，人们也就都分布在所有这些街道上，所以我们没有穿过拥挤的人群就到达了选定的地点。地点很好。我自己站在一级台阶上，而让两个小姑娘紧挨着我，站得比我更高一级。我一手拉一个。听！人海汹涌澎湃，远处传来的喧嚷声愈来愈高，就象大海发出的低沉的呼哮，愈来愈近了。送殡的行列过来了，从我们站着的地方看得非常清楚。孩子们象看戏一样，欣喜若狂。一点也不拥挤，我所有的耽心顿时消失了。

闪烁着金色光彩的仪仗队簇拥着巨大豪华的灵柩，长长的送殡行列正把这位“战胜拿破仑的人”送到陵寝。一批又一批的人经过我们面前，直到最后一个身穿绣金衣服的骑士消失为止。

可是就在这时，人群忽然从后面一齐涌来，聚积在后面的大量人群使劲往前冲，每个人都想追赶上送殡行列。我用全力抵住，竭力掩护着两个孩子，让人流从

旁边过去而不碰着她们。然而无济于事！人群自发的冲势并非人力所能制止，正如一艘不坚固的木船对付不了严冬之后解冻的冰川巨流一般。我只得避开身子并且死劲地抱住两个孩子，同时想法脱离开潮水般的人流。我自以为脱离了人海，可以轻松地喘一口气了，哪知忽然从右面又有一股人流猛烈地向我们涌来，把我们挤向河岸街，而千千万万汇集在这条交通要道上的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跟着行列走，想再饱饱眼福。我咬紧牙关想把两个孩子扛到双肩上，但四周挤得实在厉害，无法弯腰。我死命抓住孩子们的手，随着人流顺势而行。忽然间我感到我和孩子们之间有一股力量挤过来，使我不得不把她俩的手臂抓得更紧。但是在孩子们和我之间出现的那股力量象一把楔子愈插愈深，以致孩子们快要从我手里拆开了。我必须放开她们，这是任何力量都顶不住的，不然我就会折断她们的手臂或使她们的手臂脱臼。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时刻。

怎么办呢？前面是一座高大的城楼，城楼底下三条门洞：中间走车马，两侧走行人。正如流水填满了所有的桥孔一样，人群堵塞了所有的三条门洞。但是我一定要挤过去。如果孩子们没有被踩在地上（但是周围绝望和惊恐的大声叫喊告诉我情况很危险），那么，可能在人海尽头的那一面我能找到她们。但愿如此！我象发了疯似地挺着胸脯和臂肘向前挤去。但是在这

样拥挤的人群里，一个人就象一根随着漩涡转动的麦秸。我不停地挣扎着，有多少次我都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门洞跟前了，但是一一次又一次地被挤向一旁。最后，正当人群从四周紧紧地挤住我时，背后涌来一股力量把我朝前推去，这样我就到了城门洞的那一头，并且脱出了这个可怕的异常拥挤的人海。我四处奔走寻找两个女孩，但是哪儿也没有找到她们！我的心不由得紧张起来。忽然听到两个孩子响亮的叫声，“图书馆！”我以为这只是我的幻觉。然而她们到底是好端端地、安然无恙而且笑咪咪地站在我面前了。我亲吻她们，紧紧地把她们抱在自己怀中。刹时间我什么话也讲不出来了。她们告诉我说：人潮把她们从我手中拉走之后，平安地带着她们穿过城门，然后把她们挤到一边，于是她们靠墙而立得到保护。而正是这些城门的隔墙，在城门的另一端造成了这样骇人听闻的拥挤。她们站在城门隔墙的凸出部分，记起了以前散步时我经常对她们的嘱咐：当她们和我走散了的时候，不要离开原地，就是要走动，也不要走远。

我们得意洋洋地回到家里。马克思夫人、“摩尔”和琳蕙欢天喜地迎接我们。他们全都一度非常不安，因为他们听说拥挤的程度是难以相信的，有许多人被挤死和挤伤了。孩子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她们可能遭遇到的危险，她们很开心。那天晚上我也没有再提起

我所经受的那个绝望的时刻。

在把孩子们从我身边挤走的那块地方，有许多妇女丧了性命。那天下午发生的可怕的悲剧，使得不久之后这座造成交通堵塞的城门被拆除了。

但是那可怕的时刻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就好象昨天才发生似的。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带着孩子们到人群拥挤的地方去过，而且以后也永远不可能再这样了。

原载《民众文艺副刊》(Volks-Feuilleton, Monatliche Korrespondenz. Herausgeber: Eduard Fuchs und Ad. Müller) 1895年慕尼黑版,第1期,第1—2页。



乔治·朱利安·哈尼

大多数人拿起这份报纸，还是第一次看到上面这个名字。可是他却是无产阶级先驱战士中最早和最优秀的几个人之一。早在1848年以前，他就已经是一名先驱战士了。如果他今天还一直参与解放事业（因为他还活着），用他明亮的眼睛注视着新世界反对旧世界的斗争，全心全意地参加战斗，争取他所渴望的新时代，那末他即便不再冲锋陷阵，也一定是个统帅和象天神将军一样的战略家，因为他本人就曾经在这一斗争的最前列战斗过。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了。那是在五十年代初，我刚到伦敦不久的时候。关于宪章运动我虽然在1848年3月德国革命以前听说过很多，并读过许多有关文章。但是自从1848年4月10日的那次群众集会*（或者说真正的高潮）失败之后，我奔忙于德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事件，以致于很少关心英国，而那时的英国看来也暂时失去了革命

运动的势头。宪章派的代表人物我只知道奥康诺，可是他已经完全消沉。老一辈的领袖人物，如洛维特*、弗罗斯特、斯蒂芬斯等人，我只知道他们的名字。有一天，马克思对我说：“今天晚上哈尼要在宪章派会员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我们一定得去听听！”在这以前我没有听说过哈尼这个名字。

这时候我打听到，哈尼是除了厄内斯特·琼斯之外，在当时年轻的宪章派领导人中最能干的一个。当

* 1848年4月3日，宪章派在伦敦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再次向国会递交新的请愿书，并预定在4月10日组织群众前往国会示威，支持请愿。4月10日晨，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集合在肯星顿广场，准备向国会进发。这时，政府在伦敦全市实行武装戒严，决定以暴力手段对付工人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的对垒形势异常紧张。在此紧要关头，以奥康诺为首的宪章派领袖惊慌失措，他们放弃原定的行动计划，力劝参加示威游行的工人解散回家。哈尼和琼斯也支持奥康诺的主张，群众斗志立刻瓦解。部分工人群众虽仍勇往直前，但在军警的弹压下也纷纷散去，4月10日的大示威终于半途而废。

** 威廉·洛维特(William Lovett, 1800—1877)出身木匠，英国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宪章运动的参加者。他是散文的信徒，认为工人的解放可以不通过暴力革命，只需争取普选权，并以“公正、有力的舆论”对统治阶级施加压力，就能逐渐实现。1836年6月，他领导一部分工人和手工业者创立“伦敦工人协会”，宣布要以各种合法手段革除统治阶级剥夺人民自由权利的各种反动立法，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使社会一切阶级都获得平等的地位。1837年6月，该协会拟定一个关于争取普选权的纲领性文件，提出六点要求。1838年5月8日，这个文件以法案形式公布，命名为“人民宪章”，此后为实现宪章内容的斗争就称为“宪章运动”。

时琼斯由于1848年4月的一次演讲，还没有完全“坐满”两年的监狱。哈尼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把《共产党宣言》作为纲领，并且从1842年以后就和恩格斯有联系；他和马克思有联系是在1848年以后。

马克思、恩格斯、施拉姆和其他一些亲近的朋友们一谈论起他来，就没个完，说他有新闻记者的天赋、善辩的口才，还有他的热情而坚强的性格和明确的原则性。

集会是在一个大厅里举行的（英国的欧文主义者^①建筑了这一类的大厅），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是在丹麦街，反正是离流亡者居住区很近的地方，要不就在流亡者居住区里。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英国人的集会。大会还没有开始，我们就进去了。这时候，一个衣着朴素、看上去有三十来岁、中等身材、面庞尖削的男子向我们走来，和马克思握手。当马克思把我的名字介绍给他并把“Mr. Harney（哈尼先生）！”介绍给我的时候，他也和我握握手。大厅里已坐满了人，因此没有闲聊的时间。我们约定在会后再见面。于是哈尼登上讲坛，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他的讲演。他讲了政治形势，讲到把宪章运动剩下的队伍重新集合在社会主义和共和国红色旗帜

^① 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信徒。

之下的必要性，说有必要在英国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

我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这位看上去沉静持重的人在我面前突然变了模样：眼睛好象散发着灼热的火光，双臂兴奋地挥动着，脸部的表情极其生动地反映出这位讲演者的思想感情，以致使他那些奋激的富有魅力的言辞显得无可辩驳。哈尼是一位了不起的演说家，而那时又是他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他说得清楚了，没有浮华的词藻，不作别出心裁的修辞，然而表达中肯，令人信服，并且形象生动。他特别具有地道的英国人所具有的辩论才能，尤其是在工人阶级中间更是令人感到亲切。

当今在德国，对英国人和一切英国的东西咒骂很多。但是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这个咒骂英国人的德国民族，那末我们就能发现，每一个正直的人都从英国人那里得到了一种非常好的印象。我不想在这里给他们唱赞歌，我只是想说，象哈尼这样的男子只有在英国的土地上才能产生。理想主义与求实精神相结合，健全的理智与牺牲的勇气相结合，高尚的意志与坚定不移的决心相结合——这就是英国的典型……

他是一名战士。倘若今天宪章派能得以新生（这也正是他所梦想和热烈追求的），那末他一定会不顾八十岁的高龄立刻奔向革命的总部。但愿他直到今天对

他毕生献身的事业仍然有着年轻人那种火一般的热情。

就是在那次集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哈尼，会后我们和他谈了一阵子。由于我当时英语还相当差，我在交谈时说得不多（一般说来，我当时还不习惯口头表达，但是我已经能完全听懂别人的谈话了）。当马克思半开玩笑地把我这个志愿兵介绍给他之后，他也开始不断地和我这个“志愿兵”攀谈。这时候我发现哈尼也十分了解欧洲大陆的形势和那“疯狂”年代的几次革命，以及这些革命的后果。

从那一个夜晚以后，我就常常见到哈尼。在我寄居伦敦期间，我和他交往甚密。

企图给宪章派灌注社会主义的血液而使其恢复青春的尝试失败了。哈尼在伦敦也无法生活下去，于是移居到泽西岛，在那里主办一家报纸。从此以后，我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七十年代末，我从马克思那里得悉，哈尼在美国很有影响（马克思在去世前一直和哈尼有书信往来）。在这期间我还错过一次与哈尼见面的机会。一直到去年我到英国来作巡回讲演旅行，在艾威林的家里看到哈尼的照片时，我才得知他还活着，并且还在英国，住在离伦敦不远的利奇蒙特。当时我们打算在我回国以前去拜访他一次，但是由于某些原因未能如愿，而我从此也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最后

一次见到他，是在1862年，他在动身去美国之前到伦敦来看望我们；而我当时也正整装待发，准备回到德国去。

摘自《真正雅可布》(Der Wahre Jacob)，
斯图加特版，1897年2月16日，第276期(增
刊)，第2385—2386页。

爱尔兰的历史——前仆后继的反抗

可怜的爱尔兰，再见吧！大约二十五年前我访问你时^①说过这话。那时，1845和1846年可怕的饥荒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饥民的目光都注视着美国，希望能从美国得到拯救和医治。当时爱尔兰正在进行着反抗英国人的游击战，事实上游击战就从未停息过；爱尔兰的历史就是一部接连不断发起大大小小暴动的历史，一部前仆后继的反抗斗争史。那时农业凋敝，也象现在这样时常发生饥馑。所有的爱尔兰人都懂得，没有外界的援助便毫无办法，而这种援助，人们期待着从美国来。当然并不是期待美利坚合众国和她的政府的援助，而是期待在美国的爱尔兰人的援助。在美国的爱尔兰人中，有一大半是爱尔兰土著；虽然他们在那边的景况要比他们在家乡时好上一百倍，可是他们的心还是向往着自己的故乡……

^① 威廉·李卜克内西于1861年或1862年到过爱尔兰。

那时候(我又说到爱尔兰本土了)芬尼亚运动^①刚刚兴起,但是已使英国佬焦头烂额。在那民族解放运动时期,传教士们所起的作用也许要比现在大得多。

我还清楚记得我在一辆乡间马车上遇到的一位年轻传教士。我们在车上闲谈了好几个钟头。他曾随着爱尔兰移民一起坐船到过美国,现在刚从美国回来。“瞧那些盎格鲁撒克逊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指英国人)——这是他一切言谈的主题,也是我当时遇到的所有爱尔兰人言谈的主题。谈话的内容并不是虔诚的传道,而是关于世俗的人间。爱尔兰人全都是天生的演说家。每当他们谈论起英国来,就滔滔不绝。这位年轻的传教士向我谈起他的民族的苦难,向我谈起成百万人如何在那可怕的荒年沦亡。“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谢天谢地!还有成百万的人在美国那边。他们是自由的,并且有钱。他们念念不忘他们贫穷的同胞,念念不忘他们可怜的祖国。他们现在已经用经费援助我们,不久他们也将用武器援助我们。一旦我们有了武器,我们也就不缺拿武器的人了。到那时

^① 芬尼亚(Fenian)原是传说中爱尔兰古代的勇士。1858年,在美国的爱尔兰流亡者成立了一个旨在把爱尔兰从英国殖民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以芬尼亚命名,称为芬尼亚运动(Fenianism,又译爱尔兰独立党)。它是十九世纪五十一——六十年代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的领导力量。这个团体于1867和1869年间在爱尔兰组织了几次起义,均告失败。此后,这一运动因宗派分裂而瓦解。

就让老天去保佑那些盎格鲁撒克逊人吧！”

我前面说过，这位传教士当时谈话的内容不是关于基督教教义的虔诚的传道，而是关于世俗的人间，但是他说的时候却十分严肃认真。他的眼睛四射着光芒，一只手情不自禁地紧握着拳头。如果他热切盼望的反抗斗争真的到来，那末这位传教士（他事先告诉我说，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这位年轻的、乌黑眼睛炯炯发光的、高个子宽肩膀的男子，必将象马卡比^①家族的人一样，领导着他的民族从事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斗争。

可是现在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爱尔兰并没有站起来。可能有这样一线希望：有一天，骄傲的不列颠终于能主持正义，让英国的子孙后代自愿为他们的祖辈赎罪。但愿这种希望能够实现！如果真有这种可能，那简直是太美了。

摘自威廉·李卜克内西：《观察新世界》(Ein Blick in die Neue Welt)，斯图加特 1887年版，第 15—17 页。

^① 公元前 168 年，塞琉古王朝的安条克四世宣布犹太教为非法。耶路撒冷人民在犹太人马卡比(Makkabäer——意为锤子)的领导下举行起义。马卡比家族的人英勇善战。虽然安条克四世对起义者采取血腥镇压，但犹太人民坚持斗争。后来在马卡比的弟弟西门·马卡比的领导下，于公元前 142 年脱离塞琉古王朝的专制统治。

爱 琳 娜 · 马 克 思

……马克思的几个孩子就象我自己的孩子那样常在我心中惦记，其中爱琳娜，也就是杜西，是我最想念的一个。她小时候，我们叫她杜西；亲近的朋友们一辈子都叫她杜西。她的母亲，一个被驱逐的无辜的牺牲者，当时遭受了各种苦难。深重的忧愁使她昔日如此开朗的额角蒙上了阴影；穷困和死亡走进了这幢狭窄、简陋的流亡者的住宅；为每日的面包操心，为那棵小嫩苗，那棵移植到伦敦流亡生活苦难中来的小嫩苗——杜西操心。流亡生活就是苦难！七百年以前，《神曲》的作者^①就这样叹息过。这棵嫩苗是不是也会和另外三个在伦敦的极度贫困中出生的孩子一样枯萎凋谢呢？

^① 《神曲》的作者是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Alighieri Dante, 1265—1321），他早年参加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曾当选为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市政委员。后因以罗马教廷为代表的反动势力抬头，在1302年被驱逐出境，曾流亡巴黎。

那是在1856年。哪一天我记不得了，反正是孩子出世的那一天。生下来的是一个女孩，长得健康。医生艾伦博士说，只要细心护理，这个孩子肯定能长得很好。还说头几年的食物只能限于乳汁，这时候妈妈微笑了。艾伦医生自1850年起就一直是马克思的家庭医生，并且也是一个常来的客人，以后也就成了朋友。大家对孩子的饮食和护理商量了很久，我也参与了这些谈话，因为我当时非常热衷于我们在英国发现的不用药物的自然养身疗法（以后由于经济拮据，这种自然疗法也带到德国）。请看，乳汁创造的奇迹：小东西健康地成长了。她长得伶俐活泼，两颊丰满红润。她是父母、姐姐们和我们大家的欢乐。十个月之后她就能奔跑。她长得壮壮实实、聪明乖巧。她调皮快乐，就象她的小姐姐劳拉（劳拉长得和母亲一模一样）；她沉思多想的内向的个性，就象她的大姐姐燕妮（燕妮是父亲的宝贝，长得也和父亲一模一样，可以说是她父亲的一个女性的翻版）。而爱琳娜的求知欲则完全和她两个姐姐一样。这几个姑娘都是好奇、聪颖，有时候她们的智力甚至超过她们的年龄，显得早熟……

总之，在那个时候，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在马克思的家。杜西出生不久，马克思一家离开了狭窄的第恩街，迁到这个几百万人口城市的更富于乡村气息的北郊。我也尽快地跟着他们搬到了汉普斯泰特荒阜附近。并

在那里成了家，作了一家之主。那里的空间和空旷的地面能让孩子们四处奔跑。我只要有时间也常和他们一起玩。当时对我们流亡者来说并不缺乏时间，我们缺乏的是钱。而那句言过其实的谚语“Time is money〔时间即金钱〕”，却把金钱看作是时间的本质、果实和等价物。爱琳娜没完没了地向我提出各种各样问题，尽管其中有些问题她的两位姐姐就能回答。爱琳娜还缠着要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于是我不得不把我已经给她两个姐姐讲过十几遍的故事，变着花样，改头换面地再讲一遍。我编造得很巧妙，甚至连她那两位喜欢嘲笑小妹妹的姐姐也不能一时就辨认出来。

在我的袖珍照相册里还有一张当时爱琳娜的像片，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是怎样得到的。那是她五、六岁的时候，穿着一件小短衫，手扶着椅子靠背拘束地站着，噘着小嘴，很不高兴的样子。一定是照相的时候，她正在玩着什么淘气的游戏而不让她玩了（愈是粗野的游戏，爱琳娜愈是喜欢）。但是，尽管由于打断了她的游戏而扫兴地噘着小嘴，她的脸部的一半还是露出笑容。她的眼睛不仅含着愉快的笑意，而且流露出一股严肃沉思的神情。这副眼神使我想起了她的大姐姐。她的大姐姐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让人永远看不透；而她那性情开朗、温文尔雅的小姐姐则是一双褐色的调皮的眼睛，显得分外诱人。她的小姐姐现在成了

拉法格夫人，是目前马克思留在世上的唯一的一个孩子。

当我 1862 年秋天离开伦敦的时候，杜西约莫六岁光景。从此我们相隔很长时间没有见面，尽管我们彼此还是常常想念。从她母亲和她本人的来信中，我仍然能十分详尽地了解到他们家里发生的一切。她父亲在来信中是从来不谈家事的，或者只是匆忙地附上几句。1864 年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在马克思的家庭生活中引起了一场革命。在这以前的十年时间里，马克思尽了极大的努力，好不容易脱离了政治的漩涡，而现在又重新卷入到政治漩涡中去。马克思曾尽量设法摆脱这种繁难的任务，让别人去做，从而减轻自己的负担，但是他的努力都失败了。因为事实证明，只有马克思的双肩才能挑得起这样艰巨的任务。国际工人协会成了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各国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都加入这个组织而共同奋斗。马克思的家成了一切活动的中心和总部。人人都把马克思当作最高的决策人，有事就找上门来。在这个家中，除了马克思本人之外，还有那位聪明睿智、始终镇定自若的夫人。她既是家庭主妇，又是几个孩子的妈妈，既要协助丈夫完成伟大的事业，又要尽妈妈的责任，料理全部家务，操持全家的生活。而在这个总部中，还有三个受到革命社会主义哺育的女儿。她们随着革命社会主义一起成长社

大，在这台织造时代的织机旁受到热情的鼓舞，并尽力参与了这一工作。她们共同经历了好象我在过去也亲身经历过的一切。

六十年代末，法兰西共和派反对腐朽的法兰西帝国的斗争浪潮也冲击到这个总部和家中来。重新涌现出来的许多政治流亡者在这里来来往往。其中有年轻瘦长的弗洛伦斯，一位肩负领导的革命骑士。为了革命，他在克里特**奋身战斗。他象一颗流星似地出现，又象一颗流星似地消失。这在十四岁的杜西的头脑里，或许还在她的心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接着是爆发战争①的“可怕的一年”。战争带来可怕的骚动。法国的流亡者们匆匆忙忙地返回法国，用各种方法进行反对拿破仑的革命斗争。然后是色当—麦茨战役中德国反动派的胜利**。而在这时，巴黎宣布恢复共和政

* 克里特(Kreta)，地中海内的一个希腊岛屿。

① 系指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1870年9月1—2日色当战役中法军大败，法皇拿破仑被俘。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涌进波旁宫的立法团会议厅，要求实行共和，保卫祖国。共和派议员甘必大被迫在市政厅宣布废黜法皇，恢复共和。但是普鲁士的德国军队为了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继续向法国长驱直入，9月19日普军包围巴黎。

** 1870—71年普法战争时期，从里姆经色当开往麦茨的法国沙龙军，被德军围困于色当—麦茨地区而发生会战。拿破仑三世当时困在军中，不得已而命令法军投降，从而导致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崩溃和共和国的成立。

体。巴黎的共和国在硝烟弥漫、血雨腥风之中能生存下去吗？在百战百胜的俾斯麦常胜军的铁的包围之中能生存下去吗？这次战争是所有战争中最可怕、最具有毁灭性的一次。但是在它大肆摧毁了人类文化之后，终于出现了一线希望的光芒，公社在黑夜中，在战争的恐怖中诞生了。公社既照亮了黑夜，又使人们在战争的恐怖之外看到了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许多可贵的人物。

但是，理想的梦毕竟破灭了。残酷的战争窒息和扼杀了许多可贵的人物，使他们象烟雾似地消散了。弗洛伦斯牺牲了，他是最初一批牺牲者中的一个。一把胆怯的屠刀从背后向这个手无寸铁的人砍去，同时也砍伤了在伦敦的那位杜西姑娘的心。这位伦敦的姑娘把她那少女的诗意般纯洁的初恋，暗自不声不响地献给了他，因此她所受到的是双倍的创伤。

在“五月流血周”^①大浩劫的灾难日子里，公社流亡者象潮水般地涌到伦敦来。所有来的人都汇集到马克思的家里，其中既有比较重要的人，也有许多不是很

^① “五月流血周”是指1871年5月21日至28日凡尔赛的军队在俾斯麦的密切配合下，向巴黎公社发动总进攻。5月21日，反动军队得到奸细的内应，潜入巴黎西南的圣克卢门，冲入市街。激烈的巷战开始了。这场激战历史上称为“五月流血周”。在这一周之内以及在此以后的几周时间里，约有三万名巴黎公社战士被梯也尔法国大资产阶级政府的反革命军队枪杀。

重要的人。这一洪水般无法阻挡的流亡者的人流，又引起马克思家中一次新的更大的革命。如果与先前一次由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而引起的家中革命相比，那末那次革命简直是象田园诗一般的和平，而这一次却几乎要打破一切迄今为止的家庭生活秩序了。虽然马克思夫人竭尽全力，并且作了巨大牺牲去招架这股汹涌而来的洪流，但是徒劳无益。洪流伴着漩涡，卷向她的家庭，把她冲到一边，而夺走了她的两个较大的女儿。燕妮成了龙格夫人*，劳拉成了拉法格夫人，而杜西则幸运地逃脱了也嫁给公社成员的命运。她留在这里，成了家庭的支柱，妈妈和爸爸的好帮手。她和“忠诚的琳蕻”这位善良的护家神一起，争着做各种琐碎的家事，为父母分忧，尽量减轻父母的工作负担。

杜西不仅熟悉了政治上的伟大的解放斗争，而且也熟悉了为生存而进行的各种琐碎而严峻的斗争。她不愿成为父母的负担；多年以来就一直是父母的左右臂。看上去她好象在玩似的，而实际上却在有意识地努力工作。她是埋头苦干的人，别人不会察觉到她干活的劳累辛苦，似乎繁重的工作对她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她除了在家里干各种家务外，还做各种政治宣

* 燕妮·马克思的丈夫沙尔·龙格(Charles Longuet, 1833—1903)曾译为：查理·朗格，是法国的记者，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著名活动家，属蒲鲁东派，后参加可能派。

传工作。由于她熟悉情况，因此做党的通讯联络工作也就象在厨房里干活一样胜任愉快。所以，她无论对母亲还是对父亲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就这样，她还觉得不够，还要在经济上自立。这完全不是出于自私之心，想逃避责任，而是出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以便更好地尽到自己的责任，好让别人生活得更好些。

在父母的家——这个国际“正义的避难所”里，她除了讲祖籍的德语和出生地的英语外，还完全学会了法语，并且讲得很流利。英语是她讲得最流利的语言，而且以后她一直用英语书写。此外，她还会说其他好几种语言。这些知识使她能在以后卓有成效地为党工作，并能胜任外语教学。除此之外，她还学会了打字（打字机是当时刚刚问世的）。她从不休息地、孜孜不倦地工作，使自己获得生活来源，不给父母增加困难。

1874年秋，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归来的途中，到莱比锡来看望我们。这次旅行是应医生的要求进行的**。当时杜西陪伴着她的父亲，而从此以后她也就成了父亲的护士和勤务员。十九岁的杜西，青春焕发，长

* 卡尔斯巴德 (Karlsbad)，是现今捷克城市卡罗维发利的当时德国名称。

** 1873年秋天，马克思得了很厉害的头痛病，很有中风的危险。但是经过他和恩格斯的共同的朋友——曼彻斯特的医生古姆佩尔特的治疗，终于痊愈了。遵照古姆佩尔特医生的劝告，马克思在1874年到卡尔斯巴德去疗养。

得非常漂亮而健康，特别是她那温柔的神情更是动人。温柔是一种崇高的、永恒的女性美。而她的容貌的美却不能用寻常的观点来衡量，因为她并不完全合乎女性美的特征。她的鼻子和嘴长得象个男孩；唯有她那一头美丽的浅色黑发，那一双如此深邃、如此诚实的乌黑眼睛，和那张象白雪公主一样“牛奶般白嫩、鲜血般红润”的脸，尤其是她的神态和风韵，才使她显示出最高贵的女性的美。总而言之，她是非常之美丽，而且她的美丽似乎从未随着岁月而消逝。从我那一次同她见面以后，我没有发现她的模样有什么改变。后来当她躺在灵柩里的时候，她还是两颊红润，容光焕发。这是她的一位女友莫特勒夫人从伦敦来信中这样写的。我们在莱比锡的那年秋天，天气晴朗，令人陶醉的秋色和残余的夏景融合在一起。马克思经过疗养之后，完全恢复了健康，显得兴致勃勃，谈笑风生。杜西看到我的大女儿，象孩子似地高兴得不得了。当我大女儿还是一个三岁小姑娘的时候，杜西就认识她了，这次重新见面，我大女儿已经十五岁了。杜西对我家里的几个女孩和男孩都非常喜欢。一年以前杜西还向我讲过，我的两个男孩是如何挖空心思地在她面前干傻事。有一次，他俩趴在地上，和我们那条狗抢着吃狗食碗里的食

• 爱琳娜·马克思(杜西)于1898年逝世，李卜克内西撰写此文是一年之后的1899年。

物。当她讲述这些事情时，眼泪都笑出来了。我的两个男孩中，杜西最喜欢的那一个，后来在居心不良的施韦泽的挑动下，差一点与一些工人一起，在所谓“爱国战争”中作为牺牲品而丧命。

当时倍倍尔因莱比锡叛国案而所服的两年要塞监禁虽已期满，但仍在兹维考的监狱里以读君罪服刑。很可惜他当时未能与我们一起相会。

当时也有许多严重的、非常要紧的事要处理。对于这些最棘手的严重事情，杜西已表现出成熟和自持。她已经成为三姐妹中 *par excellence* (最杰出的)政治家。她是生活在工人运动中，并随着工人运动一起成长起来的。她最了解她的父亲，是她父亲思想和意志的最好的执行者。

她母亲的健康状况也是这些严重的事情之一。她母亲的病痛是十分严重的，需要长期忍受可怕的折磨。

我们在莱比锡会面以后不久，为了商订营救被流放的公社战士的劫狱计划^①，需要我到伦敦去。从那时起，我就经常去伦敦，至少每隔两年去一次。杜西的两个姐姐都已美满地结了婚，燕妮还成了一个多子女

^① 1877—1878年间，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人酝酿过一项计划，要到放逐地卡宴(Cayenne——法属圭亚那首府)去武装劫狱，营救被流放的公社战士。但这种意图未能实现。

的母亲。杜西看来是放弃了出嫁的机会。家务、职业和党的工作，使她忙得无暇顾及私事。最糟糕的是她以后失去了职业，而党的工作又老是做不完。不久，家庭又需要她大部分时间。妈妈受疾病折磨，病情愈来愈恶化，几乎无望了（幸亏当时还没有作出最后的诊断）。而爸爸又恢复了他彻夜工作的老习惯，同时旧的严重肝病又复发了。双亲在家里需要人护理；在尽可能节俭的经济条件允许下，到乡间或海滨去疗养时，也需要有人照料。

杜西和琳蕾一起担负了全部的家务和护理工作。她是怎样完成这些工作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正如我在别处写过的那样：舍己为人与工作，这就是她的生活。她从来不考虑自己。她的思想，她的感情，她的行为，都是为了别人，为了集体，为了人类。她所努力从事的是，把她父亲的学说变成行动；她的职业就是为她那位献身于全人类的父亲服务。所谓献身于人类，就是要使人类摆脱贫困、疾病和愚昧的三重奴役，要把产生这三重奴役的根源——人剥削人的制度（在今天来说也就是资本主义）彻底粉碎和铲除干净。这种解放人类、拯救人类的工作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完成。杜西就这样把她充沛的工作精力，把她无私的舍己精神，献给了无产阶级，献给了国际工人运动。

悲痛的日子终于到来——母亲去世了。杜西以安

提戈涅^①一样的忠诚来对待自己的父亲。在马克思为恢复健康作最后一次旅行时，杜西一直陪伴着他。父亲已经不能再失去这位勇敢而忠实的同伴了；离开她是不行的，因为这时候马克思的大女儿突然死了。这个意外的死讯给了马克思致命的最后一击。这位在素质上异常健康，但由于彻夜的工作、无数的焦虑与忧愁而已憔悴衰老的父亲，终于被夺去了生命的最后一根神经。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与世长辞了。到这时，党只有爱琳娜一个人，只有杜西，作为她父亲的唯一的纪念……

摘自《1899年世界新历画报》(Illustrirter
Neue Welt-Kalender für das Jahr 1899),
1899年汉堡版,第60—62页。

^① 安提戈涅(Antigone),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Oidipous)的女儿,她陪伴着父亲一起去流放。



罗伯特·施维舍尔

1862年9月22日，我第一次见到施维舍尔。那次会见是在异常特殊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我对流亡生活已感到厌倦；虽已不再患怀乡病，但内心却热烈地渴望着能回到祖国做些事，起带头作用。我终于接受了多次的邀请，担任了新创办的《北德总汇报》的编辑职位。这家报纸的创办人布拉斯在1848年曾以鲜血一般红的民主主义者而著称。他曾说过：“我们要染成红色，我们要好好地用暴君的鲜血来染。”布拉斯曾在我们和“福格特先生”的论战中为我们出过力，所以我不加考虑就答应了他的邀请。当时的德国确实是正在完成着一次意义深远的转变，使我终于又想重新“参与”进去。布拉斯也没有对我加以什么限制条件，于是我就怀着某种奢望跳进了这黑暗之中。我从当时世界中心的伦敦重新回到了柏林。我在伦敦是无人过问的，象小鸟一样的自由，而突然之间回到柏林，来到一个军事与警察的国家，来到这个充斥着御用文人的国家的首

都，这简直跟《一千零一夜》神话里的变化一样。我仿佛是在一个梦境里，周围的一切是如此的富有浪漫色彩，如此的不真实，假若这一切霎时化为乌有，而发现我重新作为一个流亡者在伦敦附近的海威尔斯托克山丘上醒来，我将一点也不会感到诧异。

我在柏林一个人也不认识，只有布拉斯的地址。他住在脑恩堡街，编辑部也设在那里。我到达柏林之后，就立刻到了他那里，受到他非常亲切的接待。经过简短的谈话之后，他把我领到编辑室去介绍给同事们。其中有一个三十来岁的头发黝黑的男子，用一双明亮的引人注目的眼睛，带着明显的兴趣审视着我，我后来才察觉到那是一种稍微特殊的眼光。“这位是伦敦来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先生；这位是洛桑来的罗伯特·施维舍尔先生。”当时我们只是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但是我已经得知，他也和我一样长期流亡国外，在瑞士住过，并在那里认识布拉斯的；大约一年前，为了筹办《北德总汇报》而随布拉斯来到柏林。

第二天，我就开始了我的编辑工作。不久之后，我们两人更接近了，也就很快明白了他那特殊目光的含意。

当时政治形势极度混乱，任何意外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已经开始了军队改组问题的争执。国王要不惜任何代价改组军队，而邦议会却加以否决，这就使得矛

盾愈来愈错综复杂^①。是否能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最终解决呢？9月24日，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晴天霹雳——俾斯麦出任总理。此人在1848和1849年曾故意扩大事态，扮演了血腥镇压革命的骑士角色。谁也料不到前景将是如何，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将会发生决定性的重大变化。

在我到达柏林之后两天，我就陷入《北德总汇报》一片忙乱的事务之中。我和施维舍尔负责政治版编辑工作。他预感到前景非常不妙。虽然他自己也被弄得晕头转向，但毕竟还能把握任一点方向，因而已经对布拉斯和这家报纸产生了怀疑。他告诉我的一切也同样使我产生了不信任。

^①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在普鲁士发生了一次关于军队问题的争执，以后演变成关于宪法问题的争执。这是以普鲁士国王和普鲁士政府为一方，自由资产阶级控制的普鲁士邦议会为另一方。普鲁士国王和普鲁士政府为了确立普鲁士在德国的领导地位，要改组和加强军队。而控制着当时议会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固然认识到要达到资产阶级的民族目的，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又不愿削弱资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让王室和容克控制的军队逐步成为反对资产阶级利益和反对邦议会的重要工具。1861年邦议会否决了军事议案，于是政府解散了议会。可是1862年新选举的议会中自由资产阶级又获得多数席位，否决了军事改革的全部经费。这场资产阶级和容克之间的权力之争以俾斯麦出任普鲁士总理而告终。俾斯麦干脆不征得议会的同意就实行军队的改组。虽然自由资产阶级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的，但也无可奈何，因为资产阶级害怕在议会之外动员人民群众进行斗争，从而对国王和俾斯麦作了让步。

我们决定把一切弄清楚。我们首先逼着布拉斯说出真情。但是他却用最无辜的受冤屈的表情否认和俾斯麦有任何关系，甚至否认和政府里的人有任何关系。然而可疑的理由愈积愈多。

这种情况对我们两人来说都十分严重，因为一旦我们的怀疑得到证实，我们就不可能在编辑部继续工作下去。由于这家新办的报纸与我们的生计有关，因此我们的心情就象悬挂在空中一样飘荡不定。

相似的命运和共同面临的危险使我们的关系愈来愈近。这时候我也认识了施维舍尔的志同道合的妻子。不久我也和他的妻子结下了和他本人一样诚挚的友谊。他的妻子活泼、精明、机灵、勇敢，是一个和他门当户对的伴侣。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他家里度过的那几个夜晚。我们闲聊着往事，讨论变得愈来愈错综复杂的时局，试图看清使我们这些“重返祖国的流亡者们”感到日益朦胧的未来。在这期间，我的家属也从英国迁来。家累在身，更使眼前的忧虑变为焦急，因而也愈来愈迫切希望能弄个水落石出。

我们一定得弄清楚，我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境地。有一天晚上，这个谜底终于揭晓了。

我们的女仆（《北德总汇报》当时还没有发展到需要一个男仆）冲进编辑室，喊道：“博士先生，布拉斯

博士先生，有人急着找您。”（布拉斯对员工们自命为博士，并且说是“人家愿意这样称呼”。）因为布拉斯不在那里，施维舍尔便作为最年长者走了出去，并且很快就回来了。他的脸部神色告诉我，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事情。他使了一下眼色，要我走到门外去。“现在我们总算抓住他了。他现在再也不能抵赖了！”他告诉我说：一个警卫骑兵直接从陆军部把罗恩* 的文稿送来，要在今天晚上编进报纸。这已经到手的罪证是再也不用怀疑的了。我们立刻作出决定：不采用这份稿件。

布拉斯那天晚上不在场，第二天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才在编辑部出现。一张尴尬的愕然的脸，显得异乎寻常地懊丧颓唐。他轻声地问施维舍尔和我，昨天晚上是否接到一份需要立即发表的稿件。“一点不错。但那是陆军部送来的。您对我们说过，《北德总汇报》不和政府各部打任何交道，所以我们把它扔进了字纸篓，否则对一家独立的报纸来说是不相称的。”布拉斯满脸摆出一副可怜相，结结巴巴地解释。够了，别再演这种闹剧了！我们跟他一起走进他的私人房间，存心揭开他的一切内幕。他吞吞吐吐地绕了许多弯子，终于深表悔恨地承认，由于没有刊载那条非常重要的消息，他曾被俾斯麦召去受到严厉的训斥。他说，他不是要

* 罗恩(Roon)伯爵，普鲁士的政治家和军事家，1859—1873年任陆军部长，负责普鲁士军队的改组工作。见人名索引。

出卖自己；而是觉得一家想要办得好一点的报纸是需要官方消息的。他认为我们全然不了解俾斯麦，说俾斯麦根本不是一个守旧分子。这无疑是对的，但是我们没有继续争论下去。我们两人都辞职了。

我早就意识到这对我们两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获得新的谋生之处。施维舍尔先是被迫到了汉诺威，在那里担任了《汉诺威通报》的编辑，而我仍然留在柏林。当然，就别问我是怎样生活的了。我经历了拉萨尔从登台到死去的整个斗争过程，并且跟俾斯麦建立的容克和警察的独裁统治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以致认为有必要把我驱逐出普鲁士。1865年深夏，我到了汉诺威，在施维舍尔那里避难，并在他那里过了一段喘息和作出决定的时期。

“兄弟之战”那一年^①，我被投进监狱。施维舍尔来到了莱比锡。他的那家报纸和《汉诺威信使报》合并了。在我从市监狱被释放之后，我们在莱比锡又重新相会了。然而相处的时间不长。1868年底，他从莱比锡迁到了柏林，成了《小说报》的副刊编辑。他在《小说报》工作了十三年，从此以后就一直住在柏林，而且一点也不显老，简直是鹤发童颜，因为只有他的黑发此刻变得雪白罢了。

^① 指1866年俾斯麦为统一德国而进行的普鲁士—奥地利之战。这次战争被当时的人称为“兄弟之战”(Bruderkrieg)。

他的精彩小说，尤其是那些取材于农民战争的小说，使德国工人对施维舍尔相当熟悉。1868年他在纽伦堡工人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杰出的演讲更使他广为人知。这次演讲最重要的贡献是：使德国工人联合会的大多数会员认识到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从而剥夺了假装与工人友好的敌人的监护权。

施维舍尔绝不是在一时的冲动下站到党的立场上来的。他是一位老资格的民主主义者，是为数不多的、始终忠于人民的事业而从不动摇的“四八年革命者”之一。施维舍尔总是这样，即便从流亡归来，偶然的命运又一次把他推入政治斗争的前列，他也仍然如此。

摘自《1897年世界新历画报》(Illustrirter
Neue Welt-Kalender für das Jahr 1897),
1897年汉堡版，第68—69页。

两位先驱者

有两位被忘却了的人*，遭到了与大多数先驱者相同的命运——被人们所遗忘。无论是在野蛮的国度里也罢，抑或是在所谓文明的国度里也罢，他们都不愧是文化的开拓者。在野蛮的国度里，他们为培植文明充当着无声无臭的“肥料”。在所谓文明的国度里，他们的遭遇常常要比在野蛮的国度里更糟糕，因为在这种国度里，旧的文化要抗拒新的文化，因而有一种很恶劣的习惯，把具有新思想的人推上执行火刑的薪堆，或者愚蠢地送他们上断头台，或者把他们投入监狱，而其中最糟糕的是，让他们在“自由”中饥饿而死。

这两位之所以被人忘却，是由于我们要持续不断地从事挣扎与斗争，因而每天都有新的战斗和新的人物给我们留下新的印象，他们便日渐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他们被人们遗忘，一直到在美国的一位保存

* 威廉·李卜克内西在这篇文章里纪念了两位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一位是西格弗里德·迈耶尔，另一位是鞋匠奥古斯特·福格特。

他们遗物的忠实的朋友把他们从遗忘中发掘出来，才被列为青年人应该遵循的光辉榜样。这两位先驱者在被赶出旧大陆之后，曾经在美国这个“新世界”中作为“培植文明的肥料”而贡献过自己的力量。

当翻阅我们党在美国的同志今年出版的《先驱者年历》的时候，我忽然看到一张相片，而且立刻认出是谁，于是旧日的回忆骤然来到了眼前。相片上方的标题是：

国际工人协会在美国的
两位先驱者

这张神采奕奕的半身像下边写着：

西格弗里德·P·迈耶尔

这是那些曾经在德国本土，而且是在当时最困难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场——柏林，不声不响地埋头苦干，和少数几个人单枪匹马地作了许多艰苦的开拓工作的真正先驱者中的一个。这样的先驱者今天仅剩下两三个人了。

不过在我继续谈到他以前，我还得讲一讲另一个人。题目不是《两位先驱者》么。这另一位先驱者比他年长，是他的老师，原是个制鞋工人，是个来自莱茵河畔的科伦人。莱茵河畔在两千年前曾是移殖罗马文化



的先哲们的基地；后来，在十九世纪中叶成了社会主义文化开拓者的基地。在那里，在那座出版《新莱茵报》的城市里，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弗莱里格拉特的思想影响下，这个制鞋工人福格特*终于决心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并且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个同盟中，除了毕尔格尔斯和“红色”贝克尔（他后来作为上议院议员而去世）之外，属于最激进的成员的还有米凯尔先生（可是就在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米凯尔正在反动派的政治舞台上走钢丝，大显其身手。如果他自己不从钢丝上跳下来或者及时死去，哪怕当成特技表演故意做作一下也好，那么明天他也许就是一个堕落下来的大人物，到了后天则肯定是一个堕落下来的大人物了）。福格特出生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但是他早就和宗教断绝了关系，而拿《共产党宣言》当作他的圣经。他不但能背诵《共产党宣言》，而且已经把《宣言》溶化在自己的血肉之中，融合在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行动之中。在任何场合扮演一个显著的角色，对他来说都太年轻——他是在七月革命之后出生的，哪一年我不知道。但是尽管如此，福格特还是参加了那“疯狂”的两年的革命斗争。当时他十七岁或者十八岁。他是

* 本文所叙述的先驱者之一，鞋匠奥古斯特·福格特，不是马克思批判过的卡尔·福格特。参看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一书原出版者的话，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在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才受到政治教育的。那时，在科伦案件^①之后，莱茵河畔也还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残余组织和新结集的组织。

他和几个朋友一起组织了一个小团体，悄悄地活动着，直到拉萨尔的《公开的答复》*发表，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为止。当时福格特正在柏林谋事。他是属于最早参加早期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那一批人。我们就是在那时认识的，但是关系并不密切。这以后不到几个月的时间，拉萨尔方面出现了各种倾向，我们“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对这些倾向是不满意的。对于拉萨尔和贵族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关系，人们虽然不十分喜欢，但也容忍了；现在竟又出现了和俾斯麦频送秋波的现象，以及跟俾斯麦委任的处理西里西亚织工问题的代表们交往^②，那就更令人不满了。我自己虽然

^① 在1852年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几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被判处徒刑。

* 1863年2月，莱比锡中央委员会请拉萨尔用任何一种他认为合适的形式，就工人运动及其可以利用的手段等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拉萨尔用《公开的答复》一文作答。该文写的是3月1日的日期，大约在三月中旬公之于世。参阅弗·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卷，第29页。

^② 1864年春，一个由三名织工组成的代表团前来朝见普鲁士国王，要他关心西里西亚织工困苦的状况。他们从国王那里得到财政资助，建立了生产合作社，但是生产合作社存在的时间很短。拉萨尔分子试图利用俾斯麦对工人阶级所实行的诱惑政策来证明普鲁士政府对工人友善的立场。

参加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但态度上一直是有保留的。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磨擦。必须让人们看清，《公开的答复》只是对《共产党宣言》所作的一个修正主义的整体的修订版；还必须让人们看清，我们这批“老共产主义者”决不是由当初来去匆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培养起来的。然而我们现在勉强可以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了，因为总算有了一个运动和一个组织，尽管这两者还都处在萌芽状态。

当我和福格特在一次告别宴会上相会的时候，我心里是明白这些情况的。那次告别宴会是在1864年拉萨尔在他那幢陈设讲究的寓所里举行的。拉萨尔要离开柏林，而且不打算再回来。那是一次来客相当复杂的社交（拉萨尔家里老有这种现象），例如，在我对面就坐着巴龙·科尔夫*。在他的旁边，我的斜对面，坐着一个瘦长的男子，神色严峻，几乎显得有点冷酷地紧闭着嘴唇。他以半似拘束，半似嘲讽，但无论如何不是赞赏的态度，望着这豪华的客厅和十分铺张的筵席。他是由拉萨尔介绍给我的，说这是奥古斯特·福格特，当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兄弟。我们只是交谈了很少几句。他一贯沉默寡言，从来没有说过很多话。

那天晚上，发生了一段小小的插曲。在丰盛的酒

* 巴龙·科尔夫(Baron Korff)，斐迪南·拉萨尔的朋友。



宴将近结束的时候，拉萨尔突然站起来，站在科尔夫的后边，面朝着我，发表祝酒辞，向大家辞行。他在祝酒辞中希望在座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忠实地坚持斗争。但在谈到普鲁士的宪法危机时，却又说，在国王和邦议会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中，任何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是，无论如何不能站在进步党一边。他当时说话的语气还要尖锐得多。我顿时就十分气愤。拉萨尔刚一结束他的讲话，我就说了几句。我说，看来我们好象从来没有站在俾斯麦一边反对过资产阶级似的。拉萨尔把话题岔开，于是避免了一场争论。然而欢乐的和谐气氛终于消失了。在回家的路上，福格特走到我的身旁，激动得连说话都断断续续（每当他心里有许多话要说时，他总是结结巴巴）。他说，他对晚宴上发生的事非常愤懑，接着又用激烈的词句告诉我他对拉萨尔及其策略的看法。我们的意见基本上一致。就在那天夜里，我们结成了亲密的朋友。我们商量好，不管情况怎样，我们要寻找志同道合的同志。我们很快成立了一个小组，有我们的朋友梅茨内参加进来（据我所知，他是今天还唯一活着的一个参加者）。也许还有另一个人报名参加。

当施韦泽于拉萨尔去世后进行的阴谋活动导致分裂的时候^①，福格特、梅茨内、雷曼（他早已去世），还有其他十几个同志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有一天晚上，在我们的分会开会之前，福格特来看我，并且给我介绍一个年轻人——一名工科大学的大学生。此人体形细瘦，属于中等身材，留着剪得短短的乌黑鬃发，高高的额角和一双闪烁有神的眼睛。他就是西格弗里德·迈耶尔。他对我讲，他是怎样在报上读到我的文章，怎样下了决心把自己和自己所有的一切贡献给党的事业。他约莫二十四、五岁。但是他的每一句话，就象他的人品一样，表现出一种与他年龄相比罕见的明确性。这种明确性显示出他深邃的思想和判断的成熟。

社会主义当时还正锋芒初露。拉萨尔的鼓动引起了（迈耶尔）的兴趣。他曾经参加过一次集会，在那次集会上我作了关于英国工会的演讲。他是在那次集会上认识福格特的。福格特不久就确信，迈耶尔并不是仅有那种稍纵即逝的兴趣而已，于是把他带到我这里来。他的父亲虽称不上是有钱的富豪，却有一份不愁吃穿的殷实的家业，因此他可以经常从家里得到一张相当可观的“汇票”。他生活节俭，所以他的生活费和学费用不了“汇票”的一半。剩余的钱，我敢说有一

① 威廉·李卜克内西先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意下，参加了由约翰·巴普提斯特·冯·施韦泽于1864年末创办的拉萨尔派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工作。由于施韦泽赞同俾斯麦的政策，李卜克内西于1865年退出编辑部，以示抗议。



大半，他是用在为党的工作上。他的最美好的计划是把马克思请回德国来。这计划当然不能实现，因为马克思当时正准备出版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不可能从伦敦来；再则，他失去了普鲁士的国籍，也不可能重返普鲁士。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来散发国际工人协会的《贺信》*和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①。至于《共产党宣言》，当时我在德国几乎只剩下唯一的一本孤本，好在迈耶尔自己出资印行了新版，这样才使德国工人有机会用《共产党宣言》原著来对照阅读拉萨尔的《公开的答复》。

在柏林，我们在数量上肯定超过施韦泽的追随者。我们还联络了其他地方，并且和马克思保持经常的通信。这样，就为建立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国际工人阶级政党的组织奠定了基础。1864年秋天，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建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坚实的据点。

关于当时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的斗争这里就不谈了。我本人由于对俾斯麦政策所采取的立场而不得不

* 1864年，阿伯拉罕·林肯再度当选美国总统。马克思向他致函祝贺。马克思起草了这封致“工人阶级的忠诚的儿子”的贺信是得到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赞同的。这封《国际工人协会的贺信》是马克思写作的纲领性文件。参阅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7页。

① 《福格特先生》是1860年发表的论战性著作。



亲自到公众场合、到第一线进行活动，因此于1865年夏季被逐出柏林和普鲁士。这件事对俾斯麦的警察来说实在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借口，但是那位从最珍贵的朋友变为最凶狠的敌人的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却竭力助纣为虐（这是她后来亲自向我承认了的），竟帮助警察找出这样一个借口：既然我退出了《北德总汇报》编辑部因而生活没有着落，那么我和我的家庭就不应留下来给柏林地区增加社会负担。

于是我搬到莱比锡。我在莱比锡仍然同柏林的朋友和同志们，特别是同迈耶尔和福格特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一旦有什么困难出现，他们总是盼望我能呆在柏林。于是我就化名威廉·米勒，戴着一副太阳眼镜和一顶伦敦式大礼帽到柏林去了。我就住在迈耶尔那里。在那里我感到十分安全，以致于我有一次为了得到一项重要的情报，竟敢于公然在乳酪市场^①行走。我在那里大概由于我的那顶大礼帽而受到特别的尊敬。

1866年的兄弟之战（普奥战争）使我们的鼓动工作中断了一个时期。迈耶尔被征召入伍，并且在卢森堡呆了几个月。和约缔结后，我急忙赶到柏林，以便在新的政局下把中断了的联系重建起来。当时北德意志同盟正在创立，发表了未来德国的基本政纲，其中有关

^① 柏林的乳酪市场（Molkenmarkt）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市监狱、市警察拘留所的所在地。



于共同国籍^①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由于我的家乡上黑森省也参加了北德意志同盟，因此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再继续戴着太阳眼镜和英国大礼帽。我公开地和老朋友，尤其是和福格特与迈耶尔来往，甚至接受邀请到柏林的印刷工人联合会去作报告。警察局虽然让我安安静静地把报告作完，但是在作完报告之后我被捕了。我被控违反驱逐令。尽管有了共同的国籍（居住权），我还是被柏林的法官们判处三个月的监禁。我只好接受这项判决，到市监狱去坐牢。因为这虽然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大家都不赞成我从拘留所保释出来，其原因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我向上申诉的话，其结果只会是延长我的刑期。那是自从1848—1849年革命以来我第一次同德国的法官和监狱打交道。这是一次很好的提前尝试，使我约莫预感到我以后面临的将是什么。

我在监狱里与外界完全隔绝，而当我出狱时，我十分惋惜地得悉，迈耶尔已经到美国去了。这是因为军事一容克普鲁士的胜利对德国来说意味着更糟糕的未来，加上我的被捕和判刑更增加了他的困难处境。到美国去的计划他以前早就和我讲过，但我想这是因为

^① 1866年普奥战争的结果是，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北德意志同盟取代了德意志神圣同盟。北德意志同盟规定，所有参加同盟的各公国的公民都具有统一的国籍。



我曾向他吐露我有过到美国去的打算的缘故。

这时福格特也不愿意留在德国了。他的朋友迫切地邀请他，并且向他介绍说，在那里不仅鼓动工作可以有成果，而且也有较好的物质条件，这就时刻吸引着他。我当然劝他留在德国，但是最后我从良心上讲，也不好意思再阻拦他。他的思想和活动已为众所周知，因而再也找不到工作，再也不可能有顾客了。而我自己也处在可以想象得出的最困难的境地。那时候还没有一个党能使它的先驱战士免于饥饿。

这样，他便在1867年夏天前往纽约，当时我正在萨克森第十九选区竞选国会议员。

西格弗里德·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两人在美国尽到了他们的义务。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左尔格都成了国际工人协会和科学社会主义最勤勉和最有影响的先驱战士和鼓动者。

福格特不爱写信，他很少用书面谈话，跟他很少用口头谈话而沉默寡言一样。但在鼓动工作中，如果为了驳斥一个敌人或者争取一个朋友，他也真能说会写。

写信似乎是迈耶尔的事，总是由他来替福格特代笔。迈耶尔还不辞辛劳地为使我能在美国的报纸上取得一些收入而奔波。他肯这样尽力，真是感人肺腑。

德法战争（普法战争）使倍倍尔和我进了监狱，我们的通信中断了。1872年6月，在我到胡伯图斯堡要



塞去服刑之前，我还接到过迈耶尔一封充满深厚同情的信。这是他最后一封信。隔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我才从左尔格那里知道，迈耶尔去世了。他曾在匹兹堡的一位工程师那里找到了一个与他本人卓越的才能相称的职位。他在那里执行公务时，脚部受了一点轻伤；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脚底踩着了一根铁钉。可是这个并不严重、因而未加重视的伤口却越来越恶化，最后引起强直性痉挛（破伤风）。1872年7月西格弗里德·迈耶尔去世了。他死的时候还不到三十二岁。由于死在异乡，过了几个月之后朋友们才得到他死去的消息。

福格特为此异常悲痛。他不仅失去了他的最好的朋友和学生，也失去了生活上的资助而从此入不敷出。朋友们都想接济他，只不过他是那种很难帮助的人。他不愿增加别人的负担，不肯让别人对他尽义务。他在向他提供接济的朋友面前总是规避。他在美国周游了好几次，到处为革命事业而工作。他最后一次给我来信是1880年，从此以后就杳无音讯。我曾多次打听，但得到的答复总是：行踪不明。而这总使得我觉得他还依然活着。后来我通过《先驱者年历》才得知，他大概是在迈耶尔死后十一年去世的……

摘自《新世界》（Die Neue Welt），1900年，第17期（插图增刊），第131—134页。

人 民 的 儿 子

由于我反对俾斯麦把年轻的社会主义运动用来当作他达到专制独裁和容克贵族目的的马前卒的企图，我被逐出了普鲁士，这样我在1865年年中就不得不为自己选择一个新的居住地、新的活动场所和新的据点。

我想到三个城市：汉堡、（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和莱比锡。愉快的青年时代的回忆把我引向莱比锡。那里的工人相当活跃，全德工人联合会就是依靠他们建立起来的。我希望具有自由思想的莱比锡分会不会拒绝我在那里逗留，并让我能在整个萨克森地区进行广泛的社会活动。但在我作出最后抉择之前，我想还是先去看一遍。

我是九月到莱比锡的，给我的印象非常好，以致我在刚到的第一天就下决心留在那里，而且以后也从未后悔过。没有比那个地区更有利的了。顶多除了汉堡之外，在德国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象莱比锡那样受到社会主义学说如此大的影响。工人教育协会还存

在，它主要是从事工人的思想工作。协会名义上是按照舒尔采-德里奇*提倡的互助合作、鼓励储蓄等福利原则建立起来的，而实际上成了全德工人联合会莱比锡分会中的拉萨尔派的反对派。那里思想活动非常活跃，正准备转变到社会主义立场。我到莱比锡的第二天，就立刻和协会的主要领导人倍倍尔会面。开始的时候，他们对我还有几分不信任，总以为在互不了解的情况下避免轻信要好一点似的。虽然他们并不怀疑我早已和施韦泽先生、贝克尔主席以及其他的拉萨尔派的领导人决裂了，但是他们还是认为我是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宗旨与目的来进行活动的。好在这种不信任的时间并不长。

那时候，倍倍尔作为一个“小小的工人”还充分保持着他的“独立”性。不久，我和倍倍尔完全取得了一致，而且我在工人教育协会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会员中也找到了许多朋友。其中首先是克里斯提安·哈德里希，一位忠诚的战士和同志。我在他身上第一次遇到

* 舒尔采-德里奇，即弗朗茨-海耳曼 (Schulze-Delitzsch, Franz-Herrmann, 1808—1883)，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1848年任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德国合作事业的创始人，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反对拉萨尔派但仍站在资产阶级自由党立场的一员。他主张工人协会应以设立劳工银行，组织各种合作社等方式取得工人在经济上的独立为宗旨，对当时工人运动有一定影响；六十年代是进步党领导人之一。

这样一种德国人的典型（我以后在萨克森的厄尔茨山脉和福克特兰特常常遇见这种类型的人），他们生动有神的褐色眼睛显示出明智和心地善良；由于祖祖辈辈的饥饿和营养不良，他们大都体质日益衰退而显得孱弱，他们脸部的表情呈现出痛苦的沉思和深刻的忧虑，仿佛经过亲身的体验和从受苦的人身上深深懂得了人世的艰辛。

他是哪一年到莱比锡的，我不知道。但是从一些偶然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是在1848和1849年间到那里，至少是路过那里，并且参加了当时“共产主义”色彩很浓的工人协会，或者至少与工人协会有了来往。我到莱比锡的时候，他已经是1861年成立的工人教育协会最能干的理事之一。当时工人教育协会设在“巴伐利亚饭店”，但在同年冬天搬到了骑士街。此后不久，哈德里希掌管了协会的总务。哈德里希的头衔是“管家”，但实际上正如别人开玩笑称呼他的那样，他是“协会的老大”。他成了协会的灵魂，一切思想行动都围着他转。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他是我的新交中第一个坦率表示赞成社会主义的人。

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当时还处在莱比锡资产阶级的襁褓之中。那时，莱比锡的资产阶级还能严格地奉行自由主义。不仅许多有名望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该协会的施主，而且莱比锡的市政当局也给予资助。

但是也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资产阶级曾象莱比锡的资产阶级那样，在精神上衰退得如此明显、如此迅速、如此彻底，而终于背弃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各种理想。1865年，当少数几个精明的人看到俾斯麦“革命”的阴影的时候，莱比锡资产阶级中还是民主精神占上风。这种民主精神是与1849年的五月革命^①一脉相承的；他们还沉浸在对五月革命依依不舍的回忆之中。在昔日的萨克森，对“犯人”施行一种“仁慈”的判决，不是用军事法庭立即执行的子弹去处死犯人，而是判处无期徒刑，使他们经过若干年的折磨之后，最终得到“赦免”。这种“犯人”在资产阶级社会圈子中很受人尊敬，他们是受人庆贺的蒙难者。而每一个来到莱比锡的外乡人，都照例由饭馆主人引到那“有可靠根据的”“犯人坐过的桌子”旁去入座就餐。我们就常常是上午和晚上都在那种桌子旁喝着冒泡沫的巴伐利亚啤酒，收集近百年来与“瓦尔德海姆”^②有关的史料。

激进主义倾向在那里达到无拘无束的程度。共和国被他们当作神来崇拜。他们眼中的魔鬼就是博伊斯

^① 1849年5月3日，德累斯登的工人、大学生和民主的资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要求接受帝国宪法。他们把萨克森国王赶出城去，成立了革命的政权机关。经过激烈的战斗之后，由于萨克森和普鲁士军队的绝对优势，起义于5月9日宣告失败。

^② 瓦尔德海姆(Waldheim)为萨克森监狱所在地。



特伯爵”。实际上俾斯麦和他是一丘之貉。俾斯麦也是个正在得势而殚精竭力地偷偷挖着暗壕的魔鬼。博伊斯特和俾斯麦都想利用我们社会民主党。恰好拉萨尔又匆匆忙忙地表示了态，于是他们两人都居然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好的“全权代表”。可是，1849年和其后“最黑暗的反动”年代中所发生的一切惨案，后来都归咎于博伊斯特。那时候，博伊斯特便被看成“反动的罪魁祸首”了。无穷无尽的愤怒和不满都倾泻到他身上，以致对普鲁士和奥地利政府这两个德国反动派的主要支柱，反倒觉得没有什么了。五月起义是由于普鲁士的帮助才被镇压下去的，没有普鲁士的帮助本来是不会失败的，这一点人们也似乎忘记了。而普鲁士的宣传机器却正好充分利用这种激进情绪，在普鲁士政府的默契下，通过萨克森的民族协会，尤其是通过比德尔曼教授，大肆鼓噪，致使自由资产阶级不久就把普鲁士看成是“德意志未来的国家”；而把奥地利连同它的妄想并吞普鲁士的博伊斯特一起，塞进了不孚众望的口袋。奥地利被当成了产生民族分裂和一切罪恶的根源。谁要是怀疑普鲁士的霸权意图，指责俾斯麦的活动，特别是他反对议会的行为，那末就会有人说：俾斯麦只是普鲁士太阳上的一个黑子，是暂时的现象，很快

* 博伊斯特伯爵，反动政治家，历任萨克森和奥地利的内阁大臣，是工人运动的死敌。见本书人名索引。

就会消失。这种观点甚至在工人中间也广为流传。从一开始我就不止一次地发现，那帮俾斯麦的卑鄙小人竟造谣说，我是受哈布斯堡皇室*收买的。尽管这种谎言纯属无稽之谈，但一时却难以驳斥。

1866年终于出现了思想上的分水岭。在这之前，普鲁士派的头面人物比德尔曼教授，本来和大德意志派的民主主义者乌特克教授以及“四八年”的民主主义者罗斯梅斯勒教授一起，同时都在工人教育协会担任教员和讲课。但是一声炮响，俾斯麦的枪炮就把工人的合法权利和德意志同盟国会连同它的神圣的世界秩序统统化为乌有，从而也在“工人阶级的朋友们”中间引起了一场变革。到处响起了“不要普鲁士!”、“不要普鲁士的德国!”、“不要普鲁士，不要奥地利，要民主的德国!”的呼声。而资产阶级却越来越赞成俾斯麦(尽管他有容克的粗暴)，把他视为金牛犊的偶像、未来的最高神父。在“兄弟之战”(普奥战争)期间，这种对普鲁士的同情表现得尤其突出，以致在尼古尔斯堡和约中，奥地利不得不接受一条著名的附带条款：保证对在奥地利犯有叛国罪的人实行大赦。

但是在工人和小人物中间却对俾斯麦的经济抱怨越来越多。这种抱怨从本质上讲有助于传播社会主义

* 哈布斯堡皇室是日耳曼皇室一支，即奥地利皇室。



的原理。既不要普鲁士王朝，也不要奥地利王朝，盼望有一个“统一的和自由的德国”，这在劳动人民的健康头脑里无疑是十分清楚的。而资产阶级的犹豫动摇，正好直截了当地证明了，只有自下而上通过无产阶级的运动，才能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

事件接踵而来。普鲁士虽然打赢了这场事先早有准备的战争，但它必须顺从公众舆论，答应给予普选权和成立德意志帝国议会。这又使思想界热烈地活跃起来，产生了新的希望和趁热打铁的要求。我本人恰巧在这紧张的时刻被柏林警察当局逮捕了。指控我的罪名是违抗驱逐令，因为我是被驱逐后又回到柏林的，那是由于我轻信了新规定的北德意志同盟的共同国籍的缘故。最后，我被柏林的法官判处三个月监禁，这样就使我在1867年1月以前处于停止活动状态。不过在这期间，朋友们却没有停止活动。他们在所有萨克森有工人协会的选区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并且进行了极其活跃的鼓动工作。从监狱释放出来以后，我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沉痛的家庭不幸^①。为了设法忘却这一不幸，我就全身投入到这一斗争的漩涡中去……

动荡不安的、忙忙碌碌的几年过去了，我经历了与拉萨尔派的斗争和竞选活动，又在莱比锡工人协会担

^① 1867年5月29日，李卜克内西的第一个妻子埃内斯蒂纳去世。



任过教学工作。在这几年间，工人协会统统纳入了社会主义的轨道。接着是更大的一次与法国的战争。看来这次战争要威胁到我们所花费的心血，使我们前功尽弃，可是实际上它却大大促进了我们的事业。这以后发生了莱比锡叛国案，最后是和拉萨尔派的合并。

在追求崇高目标的斗争中，已经取得了比人们开头所敢于期望的还要多的成果。持续不断地奋斗，纵有坎坷不平，也要永远前进！这就是当时工人们心里产生的想法！有一次我对一位侨居在美国的德国同胞说：“如果德国工人不能恢复民族的荣誉，不能从这受人歧视的充满臣仆和走卒的国度中培养出社会革命和文化的先驱战士，那么我真羞于做一个德国人。”这番话居然激起了他的愤慨不平。

情况就是这样。

在我流亡回来之后，我的肺腑里充满了瑞士和英国的自由空气。当我看到所谓德国上流社会和有教养的人们中到处都是一片奴颜婢膝、卑鄙无耻的乌烟瘴气的时候，我真要被这些霉浊腐朽的空气窒息而死了。一辈子呼吸着污浊空气的人，自然不会觉得这种空气是如何有毒和如何散发着恶臭，必然会在其中渐渐地然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我又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呵！我一直在资产阶级的圈子中寻求支持，但是我找到的是麻木不仁、懦弱胆怯；要在他们身上积聚反对俾



斯麦野蛮和腐败统治的战斗力的不可能。这正好比在一根朽木上，不管我从哪里打进钉子，总是哪里都钉不牢。

工人们的情况就不是这样，那里是另外一个世界。他们象完好而坚实的木料，有着健康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来接受一切新事物，有坚强的实干能力，还有从不枯竭的精神力量！我们——倍倍尔和十几个最热心的协会会员，常常在晚上作完报告和结束讨论会之后，还要在哈德里希那里坐到深夜。我们畅谈一切，商讨和争论，自学到深夜，第二天晚上继续进行。要研究的问题层出不穷，常常是旧问题还没有谈完，新问题又提出来了，所以每天晚上都是接着头天晚上的内容。这往往使我回想起我的学生时代。那时候我们日日夜夜地讨论，有好几次一直讨论到第三天。我们讨论生与死的问题，讨论哲学、政治和社会问题。我的学生时代正是面临着一次巨大变革的四十年代中期，如今在莱比锡又重新出现了这种情况，只是眼前这次变革要比先前那次规模大得多。这不是少数人从事的工作，而是由许多人——照英国人的说法，也就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来从事的。

摘自《1896年世界新历画报》(Illustrirter Neue Welt-Kalender für das Schaltjahr 1896), 1896年汉堡版, 第68—69页。



“社会主义提高了自己的声音”

党的执行委员会决定，要把多年来已经脱销而又不断要求供应的有关莱比锡叛国案的文件重新出版，并且委托我负责出版事宜。

“为什么？”——这时候我似乎听到内心有这样的声音问我：“为什么要重新公布一宗旧的案件？自从莱比锡案件以来，政治案件不是已变得象草莓一样多了吗？莱比锡案件在那时是罕见的，因此关心它就象春天初露的嫩绿一样使人感到新鲜；而当太阳高高升起，大地上树荫浓密、百花盛开的时候，谁又会去注意一片树叶和一朵孤芳呢？在当时，它是一宗几十年来第一次引起公众注意的案件；可是在当今的世界上，一切政治案件已是司空见惯的了。倘若在那发生莱比锡案件的时候，也是每天或者至少每周都有一宗新的案件出现，那末莱比锡案件大约也未必会引起什么兴趣了。”

不错，说得完全对，或者一部分是对的。但问题正在于时代不同。莱比锡案件所发生的时代，正是欧洲

大陆两个最有文化的民族进行可怕的互相残杀的野蛮战争的时代，是响起了宣告一个新世界诞生的巴黎公社的隆隆炮声的时代。那时，普鲁士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从而把俾斯麦侯爵的权力捧到了顶峰，同时沙文主义膨胀到闻所未闻的程度，使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受到愚弄和蒙蔽，把他们的思想弄得混乱不堪；人民的理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失去了严肃地冷静思考的能力。正因为莱比锡案件是发生在公社失败后的第一年，离公社的建立正好一周年，离公社悲惨的结局才九个月，人们对公社这一伟大事件还有着完整的印象，这就使得社会主义的敌人完全有可能利用这一事件把社会主义描写成洪水猛兽、嗜血的怪物，把社会主义当作一条疯狗来痛打，并把它压在污蔑诽谤的崇山底下。莱比锡案件发生时，沙文主义正甚嚣尘上，而社会主义正遭到大肆猖獗的扼杀。可是社会主义却提高了自己的声音，向全世界呼喊：我没有死亡！我还活着！我正在斗争，而且必将取得胜利！莱比锡叛国案的意义就在于：社会主义在那十四天的时间里，向世界视听阐明了它的原则，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目的，证明了社会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德国社会民主党并不是希望在莱比锡叛国案中才来陈述自己的立场。早从公社刚一成立时起，我们就在《人民国家报》上表明了毫无保留的支持态度。当

时，尽管公社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和错误，而且我们也知道起义是没有希望成功的，可是我们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中唯一的一位社会主义代表倍倍尔，便在国会宣布我们是和公社团结在一起的。那时，我们所写的文章，只能在相当小的范围内传播，而我们的呼声，正如我们“不要并吞亚尔萨斯—洛林”的呼声一样，全被反对者的一片声嘶力竭的喧嚣声所淹没了。

这次莱比锡叛国案使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在关切的公众面前彻底陈述我们的观点和立场。整个德国都是我们的公众。当人们从理性和良知中把沙文主义的战争狂热压下去之后，人类文明所遭到的惨无人道的扼杀，终于出现了缓和和削弱的局面。至少人民群众已变得理智一些，能够倾听我们的声音了。

而站在被告席上的我们是些什么人呢？是叛国犯、卖国贼，是那些犯了滔天罪行的公社社员的同谋犯。要利用我们这些人来控告社会主义，控告工人运动；要通过对我们的宣判来对社会主义，对工人运动宣判，这就是莱比锡叛国案的用意所在。因而这是一次最胆大妄为的政治蓄谋案件，是对一个政党进行审判，是对全体被告共同具有的世界观的审判。社会主义世界观被作为一个整体列在被告席上了。我看，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以前也曾有过许多重大的政治性案件，但都没有象这一次那样完全缺乏事实与根据。这

是一次彻头彻尾反对思想观点和原则的案件。

这一点我们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白。我们留意着不能让我们的事业蒙受任何耻辱，而要为我们的事业争取朋友，把我们的反对者解除武装。要达到这一切，就必须赢得公众舆论。

他们反对我们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为弄清这个问题，人们不得不回顾一下案件产生的那个时代背景。

1870年6月的5日、6日和7日，以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为当时德国工人党的一翼，同以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为另一翼，在斯图加特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在当时的政治天空中还没有出现一片乌云。九个月前，法国人还在巴塞爾的国际代表大会上邀请过我们参加1870年在巴黎举行的下一次代表大会。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之后一个月，预示着不祥征兆的战争乌云便开始翻滚起来。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刚刚结束六个星期，战争的恶犬就出笼了。7月13日的埃姆斯电文^①把求降的鼓声一变而成开战的军号。7月

^① 1870年7月13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从埃姆斯温泉打给俾斯麦一份电报，通知说，他拒绝了法国要霍亨索伦王室今后不再继承西班牙王位的要求。这份电报经过俾斯麦的篡改，使它具有侮辱法国的意思，并且将它在各报纸上发表，成了以后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和北德意志同盟宣战的借口。



19日波拿巴开始宣战。面对法国的宣战，我们当然不能对德国的自卫提出异议，但是我们对俾斯麦的政策也不能投信任票。因此在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对一亿两千万塔勒战时公债提付表决时，倍倍尔和我投了反对票。这次历时三天的帝国议会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战争拨款……

与我们的立场相反，当时在北德意志帝国议会中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们则在施韦泽和门德领导下投票赞成战争拨款。

我们抗议，同时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反对进攻性的侵略战争。因为德国方面最初的一些战果已经十分明显地表明了，这次战争已成为进攻性的侵略战争。

与莱茵河畔取得军事上最初胜利的同时，在多瑙河畔发生了立法阴谋的案件，而在所谓维也纳叛国案[●]中，把许多参加游行示威的工人判了重刑，有的甚至判了六年徒刑。

这是一个毫不含糊的信号。

战争开始时，在我们自己队伍里也有这样或那样

● 1869年12月13日在帝国内阁开会时，约两万名工人在当时的维也纳国会大厦前游行示威，要求结社自由。这次示威运动并不是没有成果。第二天国会就讨论了结社法的草案。但是事后不久，领导示威的重要领袖被捕了，并且在“维也纳叛国案”中被判处多年的徒刑。



的混乱。

当时党的正式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的编辑部是在莱比锡。我们在莱比锡的人和设在不伦瑞克的党的常务委员会^①，在对战争的看法上有各种意见分歧。不伦瑞克的党委员会7月24日发表的宣言，和我们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色当之役和在巴黎宣布成立共和国，使我们之间的一切分歧一下子都消除了；我们和伦敦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也完全取得了一致。我们在9月21日出版的那一期《人民国家报》上的头版标题是：“与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公平的和约！不要并吞领土！惩办波拿巴和他的同谋！”

9月5日不伦瑞克的党委员会按照这个意思发表了一篇宣言，9月6日见报。而三天以后，9月9日，常务委员会的五个成员白拉克、斯皮尔、彭好斯特、格拉莱和曲恩，还有印刷所主人锡菲尔斯和党员埃勒斯，根据德意志海岸卫戍部队最高司令长官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将军的命令，按照宣布的战时状态法而被捕。他们全都带上镣铐被押送到吕森要塞。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奥古斯特·盖布和约翰·雅可比，而雅可比当时还不是社会民主工党的正式党员。

^① 社会民主工党根据章程规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由五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领导，并选出监察委员会检查事务管理。

汉堡的监察委员会不能执行党的常务委员会的职权，因为党章有这样的规定；况且汉堡也处在军法管制状态。于是我们一致同意把党的领导机关迁往德累斯顿^①，而且很快就选举出新的常务委员会，因此党的统一没有受到一时一刻的破坏。同志们表现得真是令人钦佩。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党屈服。

从德国方面讲，毫无疑问，这次战争应该是**反对法国皇帝而不是反对法国人民**。但是在法国皇帝被推翻之后，战争仍在继续，而且很清楚，最终的目的在于吞并亚尔萨斯—洛林。通过这一事实，形势愈来愈明朗。

社会民主党是团结一致的，因而也就显得有力量，但是和那象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般的敌人相比，社会民主党还只是很少很少一些人。

那是一个令人激动得发疯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需要有健全的神经。震撼世界的事件接踵而至，以致入了魔似的狂热感情象飓风一般无法阻挡。要抗拒这种感情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当时压倒一切的问题是：需要有负责的感情！你们这样做也是正确的吗？抗拒这种“民族”的感情潮流是明智的吗？你们不是要为党的利益而放弃个人的好恶吗？你们能抗拒这股潮流吗？党能胜利吗？党能扭转这危机而得到荣誉吗？

① 德累斯顿不在法尔肯施太因将军管辖之内。

普鲁士容克现在正傲慢地坐在大战船上顺着这股强大的激流而下，而社会民主党这只惊涛骇浪中的小船不会触在礁石上撞得粉碎或者搁在沙滩上吗？

在这期间，一切顾虑都很快地消除了，因为事情迫在眉睫，必须当机立断。一旦需要迅速的、刻不容缓的行动，就决不能有哈姆雷特式的瞻前顾后。宁可多走弯路，也不能无所作为。在关键时刻无所作为，肯定要被埋灭。纵然做得不正确，失败毕竟是成功之母。

因此我们必须勇往直前！难道我们能扔掉这面旗帜吗？扔掉就等于自杀，就意味着党的彻底完蛋，意味着牺牲未来的前途。取得工人运动全胜的信念是以纯洁伟大的理想为基础的，如果和这些敌视文化的最下流的禽兽（衣冠禽兽）同流合污，那就等于在庸人政治中自取灭亡。蒙昧无知的状态决不可能持久，人民总会觉悟过来。总有一天，他们将为他们惨无人道的兽行感到羞耻。尽管人民的敌人暂时还充当着人民崇拜的偶像，也总有一天人民会认清他们最危险的敌人驱赶他们去干的事情的目的所在。

逆潮流而动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这股逆流象尼亚加拉大瀑布那样急湍地直泻而来，那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

老一点的同志大约还记得属于“民族”耻辱的迫害社会党人的那一年——发布臭名昭著的反社会党人法



令的 1878 年。那时，成千上万的人把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看作是谋杀者和最卑鄙的罪犯，就象 1870 年把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看作是卖国贼和死敌一样。一旦整个“民族精神”都是如此，那种爆发出来的天然的精神力量真是巨大得可怕而难以阻挡。这种力量十分令人吃惊地要扼杀一切。面对这压倒一切的巨大力量，人们感到束手无策，似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抓得住的敌人。这正象一种流行病毒一样，在人体中，在空气中，处处皆是。

不过，1878 年的那种狂热的感情，就其力量和野蛮程度来说，远远不能和 1870 年相比。1870 年，不仅人的狂热感情象要席卷一切、折断一切、破坏一切的旋风一般，而且还有军国主义的机器在完全有效地进行可怕的工作。而我们则好象处在飞转的铁轮之间，一旦碰到铁轮我们就粉身碎骨。我们又象是在四面挥动的铁臂之间，随时都可能被铁臂抓住。除了势不可遏的自发的精神力量之外，还有世上迄今罕见的最完善而巧妙的杀人机构。一切都在疯狂地进行着，象立刻就要爆炸的蒸汽锅一样。个别的力量，个别的意见，在那时又有什么用呢？尤其是当你知道自己正处在逐渐减少的少数人中间，而且即便在人民中间也没有可靠支持的时候。

莱比锡案件的时候，我们的党才刚刚开始形成。

在建成一个必要的组织以前，我们面临着最严重的考验。而当反社会党人法令颁布的时候，这对我们的敌人来说是耻辱的一年，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则是光荣的一年。那时，我们已经有了如此强大和如此广泛的组织，每一个人都因为有了强大的后盾而增加了勇气。没有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会相信党会屈服。

可是，在1870年要逆潮流而动，的确不是一件小事。但是又该怎么办呢？还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就是说，要咬紧牙关，全力应变，而不可把时间浪费在顾虑重重之中。

工人队伍本身还处在分裂状态。虽然在莱比锡，就象在整个萨克森一样，信仰社会主义的大多数工人是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是组织刚刚建立，社会主义才开始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还远远没有获得象现在这样坚实的基础。而拉萨尔为首的少数派又在竭力拉人，这也给我们增加了困难。何况还有生性聪明的煽动家施韦泽在给这一派施加影响。施韦泽当时正在民族的火焰上调制他警察社会主义的汤。他正在利用他本已众多的一切手段，来煽动他的情绪激昂的追随者有计划地反对我们的国际主义，反对我们这些根本不理解“拉萨尔学说的民族核心”的“卖国贼”。莱比锡的拉萨尔分子中有一些人正在和资产阶级的“爱国”的拉拉队接触。这些资产阶级的“爱国者”曾有过“光荣的历史”，

早期戴过民主主义的桂冠，当过“政治犯”，此刻就向拉萨尔分子敞开大门。我们并没有被这些情况吓住。我们继续坚持领导工人和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惧怕战争恶果的人士。

最可恶的是一帮大学生。他们是“爱国者”中的主力，人数最多，而且也最粗野无知。他们对一个“离经叛道”的新闻记者奥伯米勒大肆发泄愤怒，在他那里大吵大嚷，砸碎他的窗户，而警察却袖手旁观。奥伯米勒自1866年以来就一直同俾斯麦的政策作尖锐的斗争，以后死在维也纳。也有人想对倍倍尔和我采取类似的手段，要冲进《人民国家报》的编辑部和印刷所，把一切砸个稀巴烂。可是我们让人去直言不讳地告诉《莱比锡日报》的编辑说（这家报纸在当时是最疯狂地攻击我们的），只要第一块石头扔进《人民国家报》的房间，我们在十分钟之内就一定会赶到《莱比锡日报》的大楼前；他们应当知道，他们遭到袭击所受的损失，可要比我们这份无产阶级的家当多得多。这样的警告居然奏了效。由于害怕报复，《莱比锡日报》竟然成了它十分憎恨的《人民国家报》的悉心保护者。

但是对待我们个人，他们无论如何也要“突然打击一下”。倍倍尔住的是独家庭院，白天门卫谨严，晚上九点半以后大门紧闭，就根本不让出入，所以那些骚扰起哄便主要针对着我。为了保护我的住宅，我们有好

几个星期不得不派出警卫。有好几次，大学生的队伍从城里出来，发现工人们的警戒线就小心翼翼地折回去了。这些小子们根本拿不出更大的勇气来。有一天，我和四个臂粗腰圆的同志到这些起哄者的总部去。他们眼睁睁地望着我，与其说愤怒，不如说惊讶。我走到几个吵嚷得最凶的嘴巴英雄跟前，问他们是否有话要和我讲，因为我听说他们要和我讲话。可是尽管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上十倍，他们还是一声不吭地让我们走了。

然而终于爆发了这样的事情。但不是来自大学生们，因为他们除了背后吵嚷之外，当着我们的面就象羔羊似的温顺；而是来自一帮工人。他们干了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敢干的事情。有一次我们“爱森纳赫派”在城东集会，一群“拉萨尔分子”就利用这次机会去袭击我远在城南的住宅。他们以为能够随心所欲地蹂躏那块地方。而实际上在我们能够赶到以前，他们确也达到了部分目的。他们拼命地沿着房子猛跑，用大石块把几扇窗户砸得粉碎。其中有一块大石头差一点把我当时还是乳婴的大儿子的脑袋砸烂。我们的同志快步跑去解围，并且还抓到了几个试图逃跑的人，好好地教训了他们一顿。住在我隔壁的警察局长吕德尔立刻跑了过来，但是我向他声明，我不需要警察保护，还是让我“安安静静”为好。我只是请他做到，不要让我们的警

察在第二天到街上来三个小时，我就担保能把莱比锡所有闹事之徒全部肃清，而且今后再也不会这类丑行发生。可惜他不敢同意我的请求。自然我也拒绝追究法律责任，而向后来赶到的警察们说：“这件事我们自己会处理。我也不要求市政府赔偿损失。”此后不久，我们也确实是自己把事情处理好了。这些受蒙蔽的工人不久就恢复了理智，而且在以后全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和战友。

发生这样的事件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工人之间人为的分裂状态虽然还存在一些时日，然而关系却逐渐友好起来。尽管在以后的几年当中还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发生过小小的摩擦，但是在莱比锡工人之间已经形成了统一的条件。

我曾考虑是否有必要提到这件偶然发生的事。可是由于这件事不仅在莱比锡城尽人皆知，而且在当时的《人民国家报》上也有过报道，因此我没有理由完全保持缄默，何况这件事只不过说明了它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所造成的，是当时工人运动的状况罢了。

事态还在继续向前发展。

最初的暴风骤雨过去之后，往往对形势容易忽略。我们此刻虽不是在战场上，但枪弹却在耳边嗖嗖地飞过。这些枪弹也可能碰到我们，这一点我们心中有数。

我们不可能躲避危险，也不应该采取逃遁的办法，而必须把生命置之度外。空气中既有雷电，我们周围便随时都可能发出闪电。我们曾与之进行激烈搏斗的这股肆无忌惮的力量在向我们袭击之前，先向后退了一步——这是人的本能，也是事物的本性。

我们曾得到过来自那些最有教养的人的忠恳警告。这是由于当时在萨克森，分立主义势力还相当强；而不久前，弗里森男爵还在倍倍尔的作坊里和倍倍尔握过手；担任过多年萨克森上议院议长的策门男爵也曾给我来过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他的最热烈的同情，所以我们在上层圈子里也还有“朋友”。在8月份我们就被告知，柏林方面要求逮捕我们，而且是立即逮捕。但是德累斯登方面的意思是：等到我们的国会议员任期届满，或者至少等到国会结束会议后再行逮捕。这样看来，当时在德累斯顿，“软心肠”、良心上的内疚和法律上的犹豫还起点作用。

我们再次得到了完全来自可靠方面的忠恳的警告。当时倍倍尔和我（我们还没有想到，《人民国家报》的一个编辑赫普纳也会和我们牵连在一起）完全没有时间考虑这次警告。我们不能让我们的阵地空着，而必须坚守在这个阵地上。有什么事要来就让它来吧。

北德意志同盟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国会议员的委任期原来应该在1870年8月31日届满，但是鉴于特

殊情况延期至 1870 年年底。由于事务方面的原因，这次会议也不可能在圣诞节前结束。这样，我们就有了几个月的缓期执行。但是也不完全可靠，柏林一催逼，德累斯顿就得屈从。这里到处充满着软弱，软弱得不可思议。因此我们在那一段时间里也是相当不自在的。我们，尤其是我，在莱比锡比在柏林更有紧迫感。每当住宅附近出现一张可疑的脸，宅门上或甬道里有一点可疑的声响，心里就会想到：“现在他们可来了！”在几个月里，我们上床睡觉都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警察明天一早来把我们唤醒？不过，一切也就渐渐习惯了。我们对我们自己和对我们的同志们是完全了解的。我们没有时间老去牵挂这些忧虑。每一分钟都很宝贵，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任务与新的工作。

在统治阶级中间，在当权者们中间，他们对我们有多少新仇旧恨，这一点我们在帝国国会上就能相当清楚地察觉出来，不过他们在那里只是把自己的感情克制住不让流露出来罢了。他们怀着刻骨的仇恨和憎恶把我们两个人看作罪恶滔天的卖国贼，说我们不是象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那样，仅仅由于对法国革命一往情深而向法国人频送秋波，而是有真正实际的卖国行动。我们这些卖国贼勾结法国政府，阴谋反对自己的祖国，并且有一项营救法国战俘的罪恶的计划，就是要让战俘们（至少是在我们的向导下）朝法国方向移动，



以便暗地里从背后袭击打了胜仗的德国部队，把德国部队消灭在两面夹攻的战火中。这完全是一派荒唐的胡言乱语，谁要是听信这些无稽之谈，谁就是十足的愚昧无知。可是居然会有人相信他们。看来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而且不仅国会里有人相信，我们被捕以后，我立刻发觉，象预审官阿乃尔特这样一个非常有声望的人，居然也相信这些瞎话。于是我急忙向他解释，让他相信他是受了蒙蔽。他很快就相信了我的解释。这时，从这位善良的先生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心上如释重负一般。

总而言之，我们似乎一直在为非作歹，罪恶累累，是人群中的败类，是人们憎恨和嫌弃的对象。例如，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国会的谈话室里工作，背向着房门。这时有几个议员进来，在我身后开始闲聊军事形势，其中一位从他的谈话听来是刚从战地回来的。我因为不愿意当一个无意中的窃听者，所以朝他们转过身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几副惊愕的神态。这些议会同僚先生们吃惊地望着我，然后一窝蜂似地出去了。又比方说，有这样一位保守派的议员，我不愿说出他的姓名，他是一位伯爵，今天已不在人间；他的衣帽架就在我的衣帽架旁边，因为看到我有一次偶然带了一根镶有铅头的小手杖，于是这位议员先生也立刻给自己准备了一件合法的凶器。一直到这次会期结束，这件凶器都

在老盯着我的小手杖。

而当我们在国会发言的时候，那种狂怒的场面简直更不得了！在那些神圣的大厅里，竟不止一次地响起柏林大街上最粗野的喊声：“剥他的皮！剥他的皮！”我们常常被这些威胁我们的“同僚们”围住，看着他们不时地向我们挥舞着拳头。奇怪的是没有发生过斗殴。但是不管怎么说，法国议会中还从未有过比这更粗野的场面，而在德国议会中，当时那种爱国的愤激竟表现得如此粗野。可是我们那些儒雅的议员先生们却经常骄矜地对法国议会嗤之以鼻。

12月17日，预料已久的事情终于来临了。那天上午警察进来的时候，我没有感到任何意外。甚至可以说，我倒觉得总算轻松了一些，因为心神不定的痛苦终于结束了，等待被捕的紧张情绪毕竟消除了。我对倍倍尔是否也要被捕根本没有过问，因为那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赫普纳竟受命运的摆布也作了牺牲品，这一点我确实没有想到。

经过几个月不断的惊扰和激动之后，待审拘留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需要的安静环境，同时也让我有时来思考世界的形势、党的状况和自己的处境。至于对家庭的牵挂所引起的难堪的忧虑，也就不用了，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象现在这样可以信赖的党，能为我的家庭作出细心的安排。可是战争的前途将会怎样



呢？德国将会怎样？法国将会怎样？朋友们又会怎样？

这时，又看不到按期送到的报纸。

然而我们这样忧心忡忡，这样无尽的思虑，对于事态的发展又能改变些什么呢？

于是我埋头于写学术论文。

审询过程中没有使我伤多大脑筋。逮捕我们的理由都是虚构的，不能成立的。我们把自己看作是我们的敌人利用权力非法逮捕的俘虏。

我说我们，是因为我们每一个被捕的人都自然而然会有这种共同的想法，尽管我们在审询期间互相没有来往，而且在获释之前互相也没有见过面。我们被严格地孤零零地隔离起来，就象这次对我们的控告在性质上完全是孤零零的一样。

来自战地的消息使我们毫不怀疑，法兰西共和国并不把局势看得很严重，因为它已经实行了总动员。而战场上的失败，虽然导致领土的丧失，却将成为国内革命的先导。

在永远是千篇一律的令人生厌的战役和屠杀的报道中，终于有了一件使人感到意外的消息：2月7日，在奥地利一个新内阁掌了权——一个保守派内阁取代了自由派内阁，并且把头年夏天工人案件中判刑的人都大赦了。



终于缔结了和约，但这并没有给我们带来自由。

3月19日传来了巴黎人民3月18日起义的消息，紧接着又传来了宣布成立公社的消息。

狂躁的希望又被唤醒了，为的是让这些希望重新很快地被理智所扑灭。在德国军队重重包围之下的巴黎，在这个铁箍里面怎么可能取得胜利呢？这样的法国，这样的巴黎，它正在被人出卖，受人宰割，遭到穷追猛打，弄得精疲力尽，到处是饥饿，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振作起来，有力量去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呢？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联合全世界共同进行斗争。

审讯结束了。预审官向我们作了一些暗示，从这些暗示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他认为继续待审拘留是不必要的。

3月28日他来给我们打开拘留所的大门，这一点就更加确证无疑了。当我们三个人在经过三个月的隔离之后重新见面时，我们是何等高兴！我们互相热烈庆贺。

我们被拘留期间，党表现出能完成更高的任务。让反对派们去胡说什么党是在“领袖们”的监护之下吧！现在党和它的“监护人”隔离了三个多月，“监护人”完全不能有所活动，而“被监护者”却在“领袖们”不在的情况下同样能干出和“领袖们”一起时能干的事情。只

要认清目标，就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目标是不可缺少的向导。党还在它十分幼稚的童年就经受了这样的考验，现在党已经比以前强大了一百倍，那就更能从容不迫地经受一切“考验”。我们的敌人再也不可能象当初那样肆无忌惮地愚弄人民，蛊惑人民了。

当然，这次待审拘留使我失去了我的选区——萨克森第十九选区：什内堡—司透耳堡。由于我们在这个选区还没有达到这样巩固的地位，可以用个人名义来参加候选人的竞选，所以我在1871年3月3日的选举中落选了。可是倍倍尔在他的第十七选区：格劳绍—美拉内，已经有了相当大一批可以作为基干的、有经验的同志。他在第一次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中，就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唯一代表被选上了。而在当时的形势下，要想在国会中从正面有所前进是不可能的。当时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无非是大力强调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严厉谴责俾斯麦的政策。而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代表也就完全够了。

我们的案件慢慢地拖延下来。萨克森政府当时还没有走在反动派的前列，所以也不催逼。逮捕我们的起诉理由已完全不成立；要寻找的叛国罪，连一点影子都没有找到。战争结束了，又拿我们怎么办呢？怎样反对我们呢？这宗案件在广大公众，甚至萨克森官方的心目中，都一致认为要告吹了。但是，这种估计没有

把后台老板,也就是说,没有把普鲁士政府考虑到。这整个事件完全是普鲁士政府挑起的。普鲁士政府早在战争爆发之后,就曾通过半官方的《蔡特莱尔通讯》为此进行煽动,终于使萨克森官厅也感到事态的严重。煽动和压力不断加码,经过将近一年的不遗余力的策划,总算把眼看就要成为泡影的卖国罪改换成了稀里糊涂的叛国罪,或者照检察官所用的术语来说,叫做“阴谋叛国罪”。读者从案件的审讯过程中,就能对这般神异的奇迹和法律上的点金术一目了然。

可是我们丝毫不感到恐惧。1871年不伦瑞克案件的审理结果告诉我们,无论按照法律的精神还是按照法律的文字来理解,对我们的控告都是不能成立的,至少控告我们犯有叛国罪是不能成立的。

在一定程度上,不伦瑞克案件是莱比锡叛国案的前奏。关于不伦瑞克案件这里也说几句。不伦瑞克委员会在根据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将军的命令被捕之后,被监禁了六个多月,直到1871年3月30日才被释放。他们被监禁的时间差不多是我们的两倍。有关这次“吕森的镣铐—诉讼事件”的细节(这次诉讼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给德国投上最不光彩的阴影),读者可以从白拉克发表的文章《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在吕森和在法庭前》中得知其详。不伦瑞克案件拖的时间很长。关于叛国罪的起诉早在3月份就被最

高检察院和不伦瑞克公爵最高法院的上诉法庭驳回，并且正准备释放被告。但是在不伦瑞克和在莱比锡一样，柏林方面的影响仍然起作用。因此，不伦瑞克的法院最后总算找出一些“理由”，把“叛国罪”改成“危害公共秩序”。10月份重新起诉，11月23日开始审判。审判进行了三天，最后对被告都判了刑。

由于所加的罪证材料基本上和我们这次一样（而且罪证材料同样不完备和不充分），所以我们对我们即将面临的审判也同样的达观和冷静。诚然，并不排除这仅仅是我们的幻想。因为我们也不会那么天真，相信在政治案件中会如此尊重“客观的公正”。

还值得提一下的是，不伦瑞克案件还有一点令人愉快的余波。这些仅仅以“危害公共秩序”而被判刑的人还反过来利用民法控告了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先生，要求他赔偿损失。而不伦瑞克法院事实上也并不一味依附军方。这项诉讼花费了好几年来通过所有的法律程序，最后判处了孚格尔·法尔肯施太因先生以罚款。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先生不仅被判定违法，而且还要赔款，这使他十分心痛，虽然皇帝恩赐了他这笔罚款。

1871年7月21日，检察官授权对我们——倍倍尔、赫普纳和我——起诉阴谋叛国罪。此外，还控告我犯有亵渎普鲁士国王罪，并把我们三人移交刑事陪审



法庭审判。1871年9月27日，法庭决定受理检察官的公诉。按照1871年11月10日德累斯顿上诉法院的判决*，我们就完全根据检察官所提出的公诉理由被移交给刑事陪审法庭了。

1872年3月11日，也就是我们从待审拘留释放将近一年之后，莱比锡刑事陪审法庭开始公开审判这宗已经拖延了一年半的案件。这次审判一共进行了十四天，最后以判处倍倍尔和我两年要塞监禁和赫普纳获释而告结束。我们的两年刑期内应扣除两个月待审拘留的时间，因而实际上只需服刑二十二个月。由于萨克森王国除了哥尼斯坦因要塞之外没有其他要塞，而哥尼斯坦因要塞当时又实在没有收容政治犯的设备，所以我们被送到胡伯图斯堡去服刑。该地有邦立的反省院和病院，环境相当不错。我是1872年6月15日去服刑的；倍倍尔比我晚去几个月，为的是不影响他履行国会议员任期内的职责。

我用不着向读者提出我个人对莱比锡叛国案的法律上的批判，读者自己从案件本身中就会批判。就连萨克森的法官也对我们的判决感到愤怒。不止一个人这样说：职业法官是不会这样判决的。表示这种态度，

* 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赫普纳在1871年9月27日法庭决定接受检察官的公诉之后，曾向德累斯顿上诉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撤销公诉，但于11月10日被德累斯顿上诉法院驳回。

在当时也许还是可能的。我还想提及，我曾在印象还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写过一篇揭露资产阶级陪审法庭的文章，但是考虑到维护阶级利益的司法不消说都是一个样，因此也就把它塞进写字台里，直到如今还不知塞到哪个角落里去了。

算一算政治账，我们还是相当满意的：收获远远超过了我们最大胆的期望。莱比锡叛国案原本是想消灭我们的党，但实际上却促使我们党大大地兴旺发达起来。敌人总是事与愿违，在这上面又助了我们一臂之力。嘲弄人的命运就是这样惩罚他们，把他们所干的对我们不利的事，倒变成对我们有利的了。这合得上一句老话，我们是“因祸得福”哩。在我们尚未彻底粉碎敌人的压力之前，情况将一直会是这样。我们这个案件本身以及对我们的判决，于我们的党简直是太有利了。原先想要消灭我们的敌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讲坛，让我们可以从这个讲坛上向全德国讲话，把那些对我们党不利而广为流传的谎言和错误的想法加以反驳和澄清。这个讲坛既然是由一宗叛国案这样富有浪漫色彩的材料组成的，这对于宣传效果来说，比利用帝国国会的讲坛更为有利。当我们还是少数派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借助于报纸这一传声筒向整个德国（在不少情况下，也能越出国界而向外国）讲话。我们也并不仅仅依靠民众集会，因为任何一次民众集会，哪怕参加的

人很多，也只能面对很少的一部分人。但是自从我们的运动开展以来，由我们社会民主党来体现的民主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能够第一次以它完整的形象出现在各界人民的面前了。在国会中，我们还从未有过这样阐述社会民主党思想的机会。而我们战争期间在国会中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反倒使原先同情我们的大部分人民与我们疏远起来。现在我们把这被告席当作讲坛，就能针对各种歪曲诽谤为自己辩护，就能澄清所谓“卖国”的真象，就能捍卫我们的原则。

尤其是人们曾经把我们想象得很坏，这就更增加了对比的效果。在被歪曲的形象和得到如实反映的形象之间，在诗与真之间，竟有多大的差别！这种对比对我们个人和社会民主党都是十分有利的。

整个审判进行得幼稚可笑，这给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推动力。法官们自己也觉得十分兀突，看出我们这些少有的怪人是要从容不迫地观察他们，研究他们，甚至考验他们。他们常常对我们的答辩表现出由衷的高兴，因为其中很多他们觉得陌生的内容，引起了他们探讨学问的兴趣。

而有一些法官则完全被我们的观点所淹没了，以致在朗读我们的证明材料时常常陷入正直的革命热情，往往情不自禁地发出“Bravo!”的叫好声，从而替我们在广大同情社会民主党的听众中作出了贡献。

整个审判过程收到了戏剧性的效果。审判过程中的一问一答简直就象在朗读一本社会民主党教科书中的某一篇章。

摘自《1872年3月11至26日莱比锡刑事陪审法庭关于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赫普纳叛国案的审判》(Der Hochverrats-Prozeß wider Liebknecht, Bebel, Hepner vor dem Schwurgericht zu Leipzig vom 11. bis 26. März 1872)一书中威廉·李卜克内西所写的引言,1911年柏林版,第3—21页;参阅《1872年莱比锡叛国案》(Der Leipziger Hochverratsprozeß vom Jahre 1872),1960年柏林版,第385—39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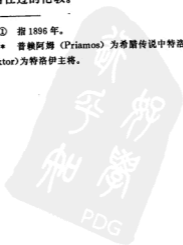
寻 访 故 地

当我今年^①5月动身到英国去的时候，我事先就有一个打算，要在我完成宣传鼓动任务回到德国之前，去寻访一下我们流亡者从前在伦敦住过的地方，特别是去寻访一下马克思一家住过的那些寓所。

那天是6月8日，星期一。我们（杜西·马克思、艾威林和我）早晨从西登汉姆出发，乘坐火车、出租马车和公共马车去到索荷广场附近的托登汉姆大院路的拐角口，就在那里开始我们的寻访。我们按部就班地进行工作，就象施利曼重新发掘特洛伊城的遗址一样，并且也象他那样，感到这确实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施利曼要发掘的是普赖阿姆和赫克托耳*的特洛伊，我们要发掘的是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和六十年代政治流亡者们居住过的伦敦。

^① 指1896年。

* 普赖阿姆（Priamos）为希腊传说中特洛伊之王。赫克托耳（Hektor）为特洛伊主将。



施利曼所要寻找的特洛伊已经被掩埋了三千多年，而我们所要寻找的伦敦才距今不到半个世纪。可是特洛伊木马里的希腊人是不能和现代的建筑师、工程师和投机商们相比的。当时希腊人的杀人武器和破坏工具是十分原始简陋的，就其破坏力来讲，简直可以比作软弱无能的侏儒。而今天的情况却不同，以往需要几十年乃至几百年才能摧毁和重建的东西，今天只消几天工夫就能全部摧毁而加以重建。

这是现代大城市中出现的一种什么样的革命呵！用德语说，真是 Umwälzungen（天翻地覆）的变化！尽管它不象政治革命那样普遍，那样随处可见，但这对我们来说毕竟是一项持久的发掘工作。谁要是今天从一个大城市出发去周游世界，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在许多居住区就找不到原来的样子了。

我还记得，当我在相隔了十六年之后，于 1878 年第一次重返伦敦时所发生的情形。我擦着我的眼睛：难道这就是我住了十几年的城市吗？以前的每一条街、每一个角落我都是十分熟悉的。虽然有一些地方还和以前完全一样，但是又有了多少新的建筑呀！简直是完全陌生了！即使以前熟悉的地方，也由于周围环境的改变而认不出来了。一些街道消失了，以前的居住区不见了；出现了新的街道、新的建筑。整个面貌变得来连我从前蒙着眼睛就能循路前去的地方，现在虽

然近在咫尺也需要雇用一辆出租马车才能到达。

话说回来，我们到了托登汉姆大院路的拐角，附近便是索荷广场和莱斯特广场。这两个广场曾经是一群由于寂寞而聚在一起德国和法国流亡者们的麇集之地。

我们先漫步到索荷广场。那里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原来的房子；房子上还是蒙着熏黑的煤烟，甚至有的招牌上的字号也没有改变。这真好象做梦一样。四五十年的光阴犹如一片烟雾被一阵急风驱散，青年时代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我，一个二十五岁的流亡者，越过广场，穿过一条熟悉的横街（不是海湾街就是希腊街），朝着老康普顿街走去……那幢旧的模范公寓*还在那里。四五十年以前，模范公寓里的生活是多么疯狂，多么有趣而又令人懊恼啊。红色的沃尔夫不就是从这里溜走的吗？康拉德·施拉姆不就是站在这里吗？

一切一切都象我昨天就在这里似的。

奇怪的是：在伦敦这个房宅充斥的汪洋大海里，居然有些街道和街区在经受了汹涌澎湃、冲毁一切的时

* 模范公寓(Model-Lodginghouse)见本书《这里有我敬仰的一个人》一篇中李卜克内西的原注。当时在英国伦敦开办了几家这样的公寓。这种公寓适合于住家，每家有几个房间，除了上述的公用设施外还有浴室。这种有专人管理的宿舍干净极了。现在在伦敦各种各样的模范公寓还很盛行。

间浪潮之后还能无损原样地保留下来。

外界的风暴雨没有袭击到这里来。比方说，当年法国革命的风暴也只是在各阶层的人民中一掠而去，没有掀起任何波澜，甚至连一根毫毛也没有损伤。

一切依然如故！好象时间都停止了。人们在打开古代埃及国王的陵墓时才会有这样的感觉：过去仿佛就在今朝，而今朝仍一如过去。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里是第恩街，马克思曾在这里住过。

我们没有拐弯进去，而先到教堂街和麦克尔斯菲尔德街去。

对，这就是那教堂，教堂街就是因它而得名的。一切都是老样子；教堂对面还是那家少不了的小酒馆，也没有什么变化。那一排正面有两扇窗户的深灰色的三层楼房也没有变样。我住过八年的那幢 14 号楼也还在，它仍旧是老样子。这时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摸房门钥匙，然而门是开着的。我走进门去，看到楼梯向上一直通到我住过的二楼和三楼，转而又看到楼梯向下一直通到我以前也偶尔去过的厨房，那是在我欠的房租太多的情况下，为了向善良的女房东和她的女儿们寒暄求情才去的。

我们又继续前往！伦敦是非常之大，而我们的行程才刚刚开始，可以说是开始的开始。

我们又回转到街角，折入麦克斯菲尔德街。这里只有很少的几幢房子。1号，2号，3号，4号，5号。6号在哪里呢？这是麦克斯菲尔德街吗？那幢房子应当在这里，可是这里并没有。那幢6号楼是以前恩格斯从流亡生活初期直到他老父派他去曼彻斯特经商为止所住过的，当时肯定是在这里，可是我们就是没有找到。新辟的道路把那幢房子吞没了。那家小酒馆是我从前和恩格斯、康拉德·施拉姆一起在这里给在座的那些英国的酒馆常客们演唱过一首不成调门的歌的地方。当时我们在这里还居然赢得了热烈的鼓掌，而现在这里已经成了一家豪华的酒吧间。只是那位正直善良的托塞尔先生开设的铁制品商店还在（他的姓名今天还可以在我的几把纪念刀上看到），而且一点没有变样，只是业主已经不再是他了。

我看到四周都是新的街道，新的街名。一切都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的市容要比旧的市容宽大漂亮多了。充满着艰难不幸的达德利街和詹理斯街已清除掉了。所有的贫民窟、棚户区、各种简陋的住房都不见了，出现了整洁优雅的道路。这个有教养的“体面”的社会受到了一种“道义”上的攻击（但不是道德上的攻击），使它面对这种攻击自己感到羞愧。为了不在自己的鼻尖底下看到这种罪孽，这个社会把最肮脏的东西清除掉了，把各种污秽清除到别的地方去，正如懒惰的

家庭妇女和料理家务的懒姑娘把各种垃圾废物统统仔细地扫到一间小屋里，扫到床铺底下去，或者扫到某一个隐蔽的角落里去一样，做到眼不见为净就行！

沙夫茨伯里伯爵把伦敦进行了一番“大扫除”，把那产生邪恶与罪愆、贫困与不幸的贫民窟都消除了；他要“经常不断地”改善那些不幸的女裁缝们的命运，这些不都是昨天的事吗？

这果真是昨天的事吗？

是昨天吗？我最后一次到这里来是什么时候？我从前是什么时候从瑞士、从法国来到这里的？对了，那正是那位在英国废除谷物税的罗伯特·皮尔从马上摔下来折断了脖子的时候，即1850年6月。四十九年的时间过去了。可是今天呢？难道贫民窟、棚户区、各种简陋住房果真都清除了吗？是呀！它们在这一片地方是清除了，可是移到了别的地段，仍然是这样的肮脏破烂，阴森惨淡，和从前一模一样。

而那些社会邪恶又怎样呢？所谓“社会邪恶”，就是指偷偷地大肆卖淫的娼妓，她们又怎样呢？难道卖淫停止了吗？绝非如此。卖淫的人减少了吗？不，今天有两万多卖淫的女人，比以前还多。

而那些女裁缝们又怎样呢？她们的命运变得好一些了吗？血汗劳动制(sweating-system)停止了吗？没有，完全没有！牺牲者的数目反而增加了。如果托马

斯·胡德*今天能从棺材里爬起来的话,那末他一定会给他的《衬衫之歌》再添上一些新的诗句。她们的命运比以前更加“血汗”,而这种血汗劳动制今天世界各地都在采用,就好像往昔的法国三色国旗在世界各地飘扬一样。

难道人们能够期待另一个样吗?一个人本性难改,社会也是如此。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人们不可能要求它本身无法做到的事情。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本性,使它没有能力消除贫困与罪愆,因为它本身就产生罪恶。这罪恶的社会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可能表现出它有改变世界的良好意愿(沙夫茨伯里伯爵肯定是有良好意愿的,况且他还有财富、威望和权力),但也仅仅停留在良好的意愿而已,纵然使之付诸行动,也无非是一大堆毫无效果的难题罢了。良好的意愿等于零,这一点已为巴克尔**所证明。只要产生问题的根由依然存在,那末问题就将始终存在下去。这并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些人或某一阶级的人所能改变得了的。

充满不幸与悲惨的贫民窟虽能离开资产阶级的社

* 托马斯·胡德(Thomas Hood, 1799—1845), 英国现实主义诗人和漫画家。1843年发表《衬衫之歌》("Song of the Shirt"), 作品描写了伦敦女缝纫工们的苦难生活, 对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 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实证主义者, 曾试图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

会圈子稍远一点，这不过是一个花点钱的问题，一个建筑上的问题，但是只要产生不幸与贫困的根源依然存在，那末这里的贫民窟驱散了，而在另一个地方贫民窟又产生起来。

纯粹是卖狗皮膏药！纯粹是珀涅罗珀式的手工活^①！英国人叫做海上耕犁。要在水上犁出一条沟，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然而转瞬之间水又重新会合，所以还是劳而无功。

我们接着往前走！现在到了第恩街。我们去找马克思一家人住过很长一个时期的那所房子。我以前已经去找过一回，但是未能确定是哪一所，后来恩格斯告诉我，门牌号码换过了。那里的房子幢幢都是一模一样的。前几次我来伦敦的时候，每一次都没有充裕的时间去更仔细地寻找。在琳蕻死前不久，我曾和她谈起过这件事，但是她也不能确切地指出是哪一幢。而杜西呢，从第恩街搬到肯提希镇去的时候，她才一岁，也当然不会记得。

我们必须一幢一幢地逐个寻找。这条街变动很

^① 珀涅罗珀 (Penelope) 是希腊神话中俄底修斯 (Odysseus) 的妻子。俄底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中献木马计，从而使希腊军获胜。在他回国途中，历经艰险。当时，他的妻子珀涅罗珀正苦于无法摆脱各地求婚者的骚扰，于是她找了一个借口，说她在择偶以前，要先做完一件衣服。她白天缝纫，但是到了晚上又都拆掉，因此永无完工之日。喻徒劳无益的工作。

少。右边，从与老康普顿街相交处起，有几幢外貌完全相同的房子，很难确定到底是哪一幢。我唯一记得的可靠标志是：它的斜对过有一座朝着老康普顿街的剧院，是当时凯利小姐私人开设的。可是现在这剧院已完全改建过，比以前大得多了，并改名为皇家剧院。我不知道它是向哪一面扩建的，是向右边呢还是向左边。这样一来，我所知道的唯一可靠的标志也就移动了位置。最后我总算确定了两幢房子，只要认出其中一幢来就行了。但是单从外表看是不够的，我必须走到屋里去。其中有一幢房子的门敞开着，我走了进去。入口处的楼梯间看来是熟悉的，再从楼梯间向外面看，所见到的整个建筑的格局也和我记忆中的相吻合。但是伦敦大多数的房子都象是在工厂里用一个模子造出来的一样，丝毫没有独特的地方。再往一层楼走进去，我觉得又不对了，一切都是陌生的。

这时候马克思的女儿和她的丈夫正在街上继续观察。我把我似是而非的探察结果告诉了他们。

那末再到隔壁那一所房子去看看吧！那所房子的门牌是28号。马克思一家住的那所房子的门牌不也是28号吗？我没有记错吧？对啦！我突然记起来了，我初到伦敦时是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记住这个门牌号码的，这个门牌号码是我住的房子的门牌号码的一倍。那末这一定是恩格斯自己搞错了。他说门牌号码好象

是换过了，也许只是他的猜测吧？我们拉了一下铃，一位年轻的妇女来开门。我们问她是否还记得以前的房客和房主的姓名。

她说记得，但只限于她搬来后最近九年的房客和房主。

我问她听说过有一位叫卡维纳太太的人吗？她是一个著名女作家的母亲*，也是我们当年住在这里时这所房子的房东。

她说，没有听说过！

我说，能允许我进去看看这所房子吗？

她说，当然可以！

楼梯间是符合的。整个建筑的样子也跟先前一样。我愈往前走，就觉得周围的一切愈熟悉。楼梯通向后面房间，一切都对！

可惜二层楼上马克思住过的那几间房间锁着。但是我所能看到的一切都一点不差，完全是原来那样。毫无疑问，我确信马克思过去就是住在这里。

我走下楼去，叫喊起来：“找到了！这房子就是！就在这里！”这就是我曾经来过无数次的那幢房子。马克思就是在这里，在贫困的流亡生活和敌人的疯狂憎恨（不光是诽谤）的折磨下，克制着疲惫不堪和焦急烦恼

* 卡维纳(Kavenagh)太太——伦敦的一位房产主，英国著名女作家朱莉娅·卡维纳(Julia Kavenagh)的母亲。



的心情，写成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福格特先生》和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通讯（这些通讯现在终于编成了集子，题名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就是在这里为写《资本论》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就是在这里，马克思夫人在伦敦所生的三个孩子相继地死去。首先是弗克斯欣*夭折。1852年，燕妮·马克思怀着万分的悲痛在活页日记本上写道：

“我是多么伤心，这是我失掉的第一个孩子呀！”

几年之后，她又同一张纸上添加这样的话：

“唉，我当时真没想到还会再次遭受这样的痛苦，我想再没有什么痛苦比这样的痛苦更难忍受的了！”

她说的是可怜的穆希**的死。

在弗克斯欣死后过了十几个月，小弗兰契斯卡***死了。

在活页日记本的另一张纸上（这些活页日记是不久前清理手稿时找到的）我们还能读到：

* 亨利希·格维多·马克思 (Heinrich Guido Marx, 1849—1850)，爱称弗克斯欣 (Föxchen)，马克思夫妇最小的儿子。1850年11月由于肺炎引起抽风死去，死时年仅一岁。

** 埃德加尔·马克思 (Edgar Marx, 1847—1855)，爱称穆希 (Musch)，马克思夫妇的第一个儿子，病魔夺去他的小生命时刚九岁。

*** 弗兰契斯卡·马克思 (Franziska Marx, 1851—1852)，马克思夫妇最幼小的女儿，还在婴儿时期——约十一个月就夭亡了。

“1852年复活节，我们可怜的小弗兰契斯卡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可爱的孩子和死亡搏斗了三天，受了许多痛苦。失去生命的小尸体停放在后面小房间里，我们都搬到前面房间来。晚上我们睡在地板上，三个活着的孩子同我们睡在一起。我们都为停放在邻室的冰冷而苍白的小天使痛哭。这个可爱的孩子在我们生活最穷困的时候死去了。”（由于缺乏埋葬孩子的费用）“我跑到住在附近的一位不久前曾拜访过我们法国的流亡者那里……他立刻以友谊的同情给了我两英镑。我可怜的孩子现在能够安睡的小棺材就是用这钱买来的。她生下来的时候就没有睡过摇篮，而她最后安睡的一具小棺材也是等了好久才得到的。当我们把她抬出去送到永眠之地的时候，我们是多么伤心呵！”

我们还是不去谈论这尼俄柏的痛苦^①和令人悲伤的流亡者的凄惨情景吧！

每一句话都是如此使人伤感，简直是在对死者抱愧……

我们在第恩街已经没有什么可寻找的了，于是又回到托登楠大院路的拐角处。在那里我们坐上了去肯提希镇的公共马车。

^① 尼俄柏(Niobe)，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后。因她触犯了阿波罗的母亲而失去七个儿子和七个女儿，为此她悲痛万分，整天哭泣，后来变成石象。尼俄柏的痛苦常用来比喻失去子女的痛苦之情。

托登楠大院路上只有很少的一些变化。街面还是跟从前一样，大多数的杂货铺和商店是从前就有的。

大路左边的那座“小礼拜堂”（教友派教徒惠特菲尔德的“神龛”）一点都没有变样，只是墓园现在上着锁。可怜的穆希就葬在那里。我记得似乎马克思的另外两个夭折的孩子也葬在那里。

我们渐渐驶近肯提希镇。那家熟悉的饭馆出现在眼前。不错，这就是那当年的“红头巾”饭馆，它因为挂有一幅戴有红头巾的少女肖象而得名。我们曾在那家饭馆里作过一次异想天开的尝试，想把那里的一个受人压迫的雇佣少女从她的苦难中拯救出来，为此我们差一点遭到一顿毫不含糊的、绝非传奇式的殴打。

接着我们看到了座落在威尔士亲王路的另一家饭馆——用女巫希普顿的名字作招牌的“希普顿大婶”饭馆。它的对面就是我的旧居——劳克斯匹坪的3号房子，样子还一点都没有变，就好象我昨天才离开它似的，不过路名已经改了。我想，门牌号码也都已换过。现在的门牌是朝威尔士亲王路的方向数过去的。

公共马车把我们送到这里，我们就下车了。我们徒步拐过弯去，走上摩尔顿路。完全是一番重返故园的感觉！不过没有走多久就看到了新的马路。我离开伦敦时，这些马路还没有呢。那时，这里还只是一片旷野，如今已出现一排排鳞次栉比的房屋。

突然，杜西举起双臂，指给我看一所在伦敦郊区来说是比较宽敞的房子。她叫道：就是这幢！

真的，就是这所房子。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在这所座落在格拉弗顿坪的单幢住宅里，马克思一直住到他辞世前十年。这就是那个小阳台！那时候，马克思夫人出了重天花后，正在痊愈时期。三个女儿因母亲生病住在我家里。马克思夫人就经常在这个小阳台上向她的三个女儿挥手，作送往迎来的表示。当时马克思夫人身体还非常虚弱，一开头只能低声讲话，可是当我把孩子们领到阳台下面时，她就马上变得多么容光焕发！当时这幢住宅的门牌是9号^①，现在是45号。

我们走不多远就到了梅特兰公园路41号（九年前还一直是1号^①）住宅，卡尔·马克思就是在这幢住宅里辞世的。他不是1872年，就是在1873年搬到这住宅来的*，因为原来的寓所由于家里两个大的女儿都已

① 杜西坚持说这所房子从来就是1号，或者至少当他们搬进去的时候是1号。不过我认为她搞错了。不管怎样，这一点很快就会弄明白的。

① 自1856年10月1日至1864年3月末，马克思一家居住在哈弗斯托克岗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巷9号楼（das Haus 9, Grafton Terrace, Maitland Park, Haverstock Hill）。

* 马克思是从1875年3月到逝世为止，住在梅特兰公园路41号。马克思于1863年11月30日他母亲在特利尔逝世之后，就离开伦敦，先后在特利尔、扎尔特博默耳、汉堡、汉诺威、卡尔斯巴德等地逗留、疗养。详见格姆科夫著《马克思传》年表。

出嫁而显得太大了。

在这整片地区，我觉得几乎一切都是新的。这里，从前是城的尽头。但是迄今已过去了三十四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内，这座几百万人的城市大大地向四周扩展了，超越了原来的界线。

我们从这里出发，默默地向汉普斯泰特荒阜走去。荒阜的变化很大，但是原有的本地气息还没有完全失去。我们寻访着当年的旧地，也感到需要吃点东西了。因为我们这次“重游故地”已经费时很长而又费力很大，漫游伦敦实在比漫游整个英国倍感辛劳。于是我们来到“稻草人城堡”点心铺，准备吃些点心。这个点心铺是以英国童话中稻草人的城堡命名的。

“稻草人城堡”点心铺！从前我们来过这里近百次！我们今天又坐在这里的这个小房间，就是 long long ago〔很久很久以前〕我和马克思及其夫人和孩子们以及琳蕻等人曾经欢聚过数十次的地方。

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摘自威廉·李卜克内西：《纪念卡尔·马克思——生平与回忆》(Karl Marx zum Gedächtnis. Ein Lebensabriß und Erinnerungen), 1896年纽伦堡版，第92—101页；参阅《摩尔与将军，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Mohr und General. Erinnerungen an Marx und Engels), 1970年柏林版，第160—174页。

社会民主党在汉堡港

“您是讲凯旋式吗？那种远古时代异教徒的凯旋式，不就是胜利者向自己人炫耀战利品和战俘，从而煽起他们继续作战的乐趣吗？”

别着急，我要给你们讲的，不是某个公爵的凯旋式，而是人民的凯旋式。人民的凯旋式是不会把鲜血淋漓的人作为战争祭礼的。

德国劳动代表大会今年在世界城市汉堡举行^①。从这里可以了望浩瀚的大海，有无数的航道可以通向世界各地，也可以从世界各地前来这里。汉堡是世界城市，因为每一个港口城市都是一座世界城市。作为港口城市的汉堡，仅次于伦敦和纽约。汉堡也是一座劳动城市，是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的活动中心。

^① 1897年10月3日至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汉堡举行党代表大会。在这以前几个月，约一万六千名海港工人进行了为期十一周的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争取十二小时工作日和星期日工作八小时。

汉堡的工人邀请我们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参加星期四、二时正举行的港口巡礼航行。星期四、二时正我们登上“联盟号”的甲板，站在骄傲地飘扬着的红旗下面。港口巡礼航行开始了。我们驶出一望无际的海港，穿过两旁络绎不绝的来自世界各国的船只。

陆地上的居民惊异地观看着这不寻常的表演。

听，这是什么声音在空中咆哮，在四周回荡？原来是从所有船只上传来的欢呼声。水手们爬在帆桁上挥动着帽子！在每条船的船舱旁、甲板上和起重机旁，在来来往往的单帆船上或驳船上，到处都是工人。他们都在热烈欢呼，向我们致敬。他们挥动着各式各样的帽子，升起了各式各样的“船旗”（不是检阅用的信号旗，而是各种颜色的手绢和织品）。这是一种十分美妙的五彩缤纷的景象。我在英国观看过盛大的舰队检阅，但是还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场面，恐怕以后也永远不会再见到。

他们站在那里，目光都闪烁着热情。他们的欢呼，他们面部的表情和一举一动，都表现出令人感动的、出自肺腑的信任。他们就这样观看着代表们。这些代表大部分都是象他们一样的普通工人，代表着德国的无产阶级，领导着斗争，充当着先锋战士，因为在我们这里是不会有躲在火线后面的长官的。欢呼的人们站在那里，我一边观察着他们，一边在脑际中骤然出现了

另一幅图景。就是这些人，他们从未如此欢乐兴奋过，他们从未用鼎沸的欢呼来表达他们内心最高尚的思想和最热烈的感情。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他们紧闭着嘴唇，表现出一副愤怒和轻蔑的气概。他们决心为最低的要求进行斗争，反对贪得无厌的、要敲榨出他们最后一点骨髓的、威胁着他们的资本。他们敢于使用他们仅有的这一点权利，也是富翁们的王国曾仁慈地给予他们的这样一点权利。

成千上万的男人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始终象上面描绘的那样。难道他们还应该低着脑袋伸着脖子去迎合向他们套来的牲口的轡头吗？难道他们还该回到旧日的苦难和奴役中去吗？永远不能！

然而饥肠辘辘使人痛苦。陆地上的朋友们虽然尽力帮助，但他们也很贫穷。施图姆*之流的先生们握握那些小商小贩先生们的手，鼓励他们不要向那些试图要挣脱锁链的奴隶们屈服，并帮助他们给那些反抗者重新套上了锁链。

饥饿难忍，严冬酷冷。在可怜的斗室里坐着愁眉

* 卡尔·斐迪南·冯·施图姆-哈尔贝尔格男爵 (Karl Ferdinand Freiherr von Stumm-Halberg)，大工业家和保守派政治家，萨尔地区最有权势的人，人称“施图姆国王”，工人运动的死敌。参阅本书人名索引。

苦脸的男人们，他们刚才在门外边也是这副样子；丈夫旁边是一个因忧虑而憔悴的妻子，妻子身旁是一群讨着要吃面包的孩子。

结果势必是这样。饥寒交迫终于使昂然挺立的头不得不再次低下来，伸进牲口的轭套；而被资本养得肥头大耳的人却讥笑着向这些再次被征服的人嚷道：“你们期待的社会民主党在哪里？它给你们工作和面包了吗？你们还是从那些荒谬的预言家们那里回来吧。你们要认清楚，我们是养活你们的主人，是受上天恩佑的仁慈的主人。你们的主人不容忍你们作任何的反抗。你们主人的意志就是你们最高的法律。如果你们象训练得很好的狗儿一样俯首帖耳，你们就能从主人那里得到你们每日的面包。如果你们不愿做沉默不语、顺从的奴隶，那末他们就把面包篮子挂得高高的，让你们可望而不可及。我们是你们的施主！吻吻我们给你们面包的手吧！诅咒邪恶的社会民主党吧！它竟敢起来反对上帝和他神圣的资本，反对众神之神的上帝所创立的神圣的世界秩序——金钱万能。社会民主党要把你们拉进它的罗网，堕入毁灭。诅咒社会民主党吧！”……

乌拉！一片欢呼声。德语的、荷兰语的、丹麦语的、瑞典语的欢呼声，其间还混杂着响亮的法语的万岁声——Vive！和意大利语的万岁声——Evviva！象

巴比伦时代那样，各种语言汇集在一起，但又不是单纯的语言的混杂，而是各种语言都能用以表达共同思想、共同感情的词句。这些民族已不象圣经上那些受蒙蔽的民族那样漫无目的地、束手无策地四处分散。他们已认识到地球上的各族人民都是兄弟；劳动人民，不论他们属于哪个国家，不论他们说的是何种语言，他们才是真正的同一个民族。从飘扬着的旗帜上一直到船舷旁，那些用红黑双色字母写成的国际同盟提出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社会民主党国际万岁！”在向我们胜利地欢笑。

看，他们——全世界的无产者们，联合起来了！看，他们在向我们欢呼！就是这些在汉堡港口工人罢工中暂时遭到挫折但必定会胜利的工人们，为社会民主党准备了这次凯旋式。

Ave Socialismus Imperator, victi victuri te salutant!

〔欢迎，必将胜利的社会主义，正在走向胜利的暂时的失败者们向你致敬！〕

这种致敬礼要比那些从凯撒大帝身旁走过、向凯撒大帝致敬、把生命已经献给了死神的斗士们^①的敬

^① 古罗马斗士（大多为俘虏或奴隶，持剑相斗以供娱乐）在比武前向凯撒大帝致敬的颂词，“向您致敬，陛下，已经献给了死神的人向您致敬！”

礼更为壮观。

这样的凯旋式，这样的检阅，凯撒大帝是从未经历过的，而且以后也不会有哪个凯撒能经历到。这不是奉命为谨的欢迎！这不是那种用暗室禁锢的惩罚威逼出来的欢呼！这完全不是那种人为的造作。这是本能，这是天然的力量，这是胜利的保证。

原载《真正雅可布》(Der Wahre Jacob)，
斯图加特版，1897年10月26日，第294期(增
刊)，第2573—2574页。



后 记

1847年，当威廉·李卜克内西决定放弃到美国去过一种不但有个人自由、甚至过得很满意的生活，而决定投身到反对欧洲的封建专制主义和黑暗势力的斗争中去的时候，他二十一岁。二十五年以后，他已能在资产阶级一容克的阶级法庭面前，毫无愧色地宣称：“请你们称我为革命士兵吧！”（见本书第27页）从这以后又过了二十五年，他已经是国际工人运动先锋队中的老前辈了；那时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写道：“国际同盟提出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社会民主党国际万岁！’在向我们胜利地欢笑。看，他们——全世界的无产者们，联合起来了！看，他们在向我们欢呼！”（见本书第350页）五十年来为反对压迫与剥削、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为社会主义的未来所进行的从不停息的忘我斗争至此终于结出了果实。

倘若有人问，是什么使威廉·李卜克内西的生活道路得以始终如一，是什么使他在政治发展上这样直

线上升（尽管也有过一些暂时的错误和走过一些弯路），那么回答是：正当他在革命的烈火中开始汲取经验教训的时候，他及时地找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两位无与伦比的导师，及时地找到了科学共产主义作为他以后生活的指南。这里的一些回忆录能证明这一点，而读者也能印证这一点。

在他几乎已是七十老人的时候，他在回忆录里记述他在1849年夏天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写道：“可是在这里，第一次有一个使我必须对他肃然起敬的人。He was a man!〔他是一个男子汉!〕现在我才知道了我该何去何从……”（见本书第192页）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他在别处提到了卡尔·马克思。他写道：“使我这样一个毫无阅历、渴求知识的年轻人有缘认识马克思并接受他的影响和教诲，这样的好运，是我万分庆幸的。”*

在这种教诲中，威廉·李卜克内西逐步掌握了社会主义的科学。他成为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个活跃的盟员。在马克思的影响下，他克服了残存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想，形成了自己先前还不十分肯定的见解，而终于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要使整个社会从压迫和剥削中解放

* 参看《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6页。

出来，从而也就解放了无产阶级自己；并且树立了这样的观点，即工人阶级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必需有一个革命的政党。

其实，在伦敦的艰苦的流亡时期，李卜克内西决不只是马克思的学生和思想上的同志，他还成了他们家庭的亲密朋友，成了几乎每天必到的客人，成了他们最可信赖的知己。即便在六十年代初他回到德国之后，他们之间的直接接触已经很少了，他还仍然是马克思的挚友。在这方面不仅李卜克内西几十年来与马克思的从不间断的书信往来（当然也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通信）可以证明，而且他和马克思的女儿——燕妮与劳拉，尤其是和最小的女儿爱琳娜的终生友谊，也能佐证。这里选辑有不少篇，就是叙述到这种友谊，从而展示出李卜克内西之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与共和战斗与共的。

这方面的情况，尤其可以从李卜克内西所写的如何在德国为建立一个独立的革命工人政党而进行艰苦奋斗的通讯报道中可以看出。

他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憎恨，使他很快就识破了一些先前的“激进分子”（如奥托·布拉斯）或者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袖们（如斐迪南·拉萨尔、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勾结普鲁士容克和总理俾斯麦的内幕。李卜克内西不受他们的迷惑，坚持“工人阶级的解

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卡尔·马克思在为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所写的临时章程中宣布的。李卜克内西当时作为这个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群众性组织的先驱战士，用他的演讲和文章在德国发挥作用。

他先在柏林，然后在莱比锡，把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聚集在自己周围，向他们传播《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思想，特别是要他们认识到工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有科学纲领的政党。他在莱比锡找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内他的最重要的同志——旋工师傅和工人协会职员奥古斯特·倍倍尔。他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白拉克以及其他一些经过战斗考验的工人领袖们一起创立了爱森纳赫派（即1869年在爱森纳赫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骄傲地称它为“我们的党”^{**}）。1870年，他领导爱森纳赫派的社会民主工党，和其他一些思想一致的同志们一起，肩并肩地对普鲁士军国主义进行了斗争，反对普鲁士掠夺法国人民的战争。1871年，国际

* 卡尔·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15页。

** 参看《弗·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1875年3月18日—28日，伦敦》，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卷，第3页。全句是“我们党经常地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

主义者威廉·李卜克内西以社会民主工党的名义，声援巴黎公社的英勇斗争。1872年，他作为爱森纳赫派的发言人之一，以及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的主编，被牵连到法律诉讼中去，在莱比锡刑事陪审法庭受审，而法庭的被告席却成了他和倍倍尔一起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讲坛。

可惜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回忆录只写到七十年代初的一些事件就中断了。1900年8月7日，威廉·李卜克内西逝世，他的回忆录也就无法继续写作。然而，他从事活动的最后三十年，却是他战斗生活中内容最丰富的一个时期。在这三十年中，他不仅与倍倍尔一起，并且从八十年代开始又与保尔·辛格尔一起，共同领导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时他还是一位公认的、受人尊敬的、革命的国际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因此在这里，将他最后三十年间的活动，概括地向读者作一介绍。

1872年6月中旬，李卜克内西到胡伯图斯堡受两年要塞监禁。他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学术研究与写作活动。在这段时间，除了发表一些文章之外，还完成了他的《人民外语词典》的第一稿。但是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李卜克内西在这段时间，通过他的妻子娜塔丽，从狱中给《人民国家报》出主意、写文章，对该报予以很大的支持。

获释以后，他就参与从事统一德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1875年5月，在哥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工党和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合并。至此，德国工人阶级有了一个统一的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威廉·李卜克内西所作的贡献。当然，他也应对这次合并中的严重缺点，即在新的党纲中保留着错误的拉萨尔派的观点，负主要责任。李卜克内西在理论上的认识不足，使他不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哥达纲领草案中的大部分问题上对他所作的批评。但是由于“伦敦老人”及时地对他的态度进行有力的批评，他自己在以后的几年里却做了很多工作，使得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始终是由马克思主义这一派的势力决定政策，从而在革命实践中弥补了纲领中理论上的缺陷。也正因为如此，他作为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主编，才顶住了当时拉萨尔分子的顽固的反抗，在《前进报》上连载了恩格斯的一组论文《歌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变革》。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得到广泛传播，从而大大有助于在有阶级觉悟的德国工人中间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

1878年，随着非常法令的颁布，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自己的岗位上，经受住了这场严峻考验。虽然，由于法令禁止一

切党报的发行，使他本来已有两个女儿、而他的续弦娜塔丽又给他生了五个儿子的众口之家，在物质上陷入了极其困苦的境地，他却从没有过片刻想到妥协的念头。他从帝国国会的讲坛上，揭发了俾斯麦警察国家的野蛮行径，并且预言，一切反对革命的工人运动的禁令和措施都是徒劳的。

他与倍倍尔一起，作为党的领导成员，参与建设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他帮助建立了地下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并代表党的领导机关对该报的编辑工作负责；同时通过他自己在报上发表文章，对报纸作出了重要贡献，使报纸成为党在反对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的斗争中和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最重要的堡垒之一。他的杰出贡献还在于使被禁止的党不久就懂得：在他们与剥削阶级的革命搏斗中，应当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把国会内的斗争与国会外的斗争结合起来。

李卜克内西对机会主义势力企图把党当作一种与统治阶级进行妥协的腐败的政治手段，并不总是立刻就能识破。可是，他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密切的书信往来，以及他与奥古斯特·倍倍尔牢固的友谊和合作，都始终能够帮助他在党内各种决定性的争论中，最终还是采取了革命的阶级立场。

当俾斯麦的警察统治于1881年也对莱比锡宣布

小戒严时，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是第一批从他们的寓所被驱逐的人。李卜克内西暂寓在莱比锡附近的包斯多尔夫*，以便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至少能在星期日来看望他。在那里，他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

但是，这些年的大部分时间，他是作为党的领导成员，在德国境内作宣传鼓动工作的旅行中，以及作为党的国会代表，在柏林和德累斯顿度过的。如果说，他从1867年至1871年就已进入北德意志帝国国会，那么他从1874年起直到逝世以前，就差不多一直担任着德意志帝国国会的议员（起初是由福格特兰工人，其后由奥芬巴赫和柏林的工人把他选进去的）。1879年至1885年，后来又从1889年至1892年，他都是萨克森邦议会的议员。他的坚定的阶级立场，他所受的广泛的教育，他的演说天才，以及他的革命热情，使他成为除了奥古斯特·倍倍尔以外，十九世纪最后三十余年德国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无产阶级国会议员。他深受工人人们的信赖，却为容克与大工业家以及他们的仆从们所惧怕。

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内，威廉·李卜克内西也负责国际联系。他在几十年内所获得的国际威望，加上他的渊博的外语知识，使他特别适合担任这一工作。

* 包斯多尔夫(Borsdorf)是莱比锡—德累斯顿铁路线上的一个村庄。

为了加强兄弟党之间的接触，为了在群众集会上介绍德国工人运动的经验，为了呼吁给正在进行非法斗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道义声援，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出访法国和英国，经常到瑞士去，1886年还到过美国。他多年为法国、英国、波兰、丹麦、北美以及其他外国工人的报纸和杂志撰写文章。他协助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89年在巴黎建立了第二国际，并作为德国党的代表团成员，参加了所有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反对俾斯麦的非常法而进行十二年胜利斗争的英雄时代，也正是李卜克内西显露英雄本色的一个时期。在这时期里，党于1890年重新争得了合法地位，而“铁血宰相”则由于反对无产阶级遭到失败而下台，这些也可以说是威廉·李卜克内西个人的胜利。

在哈雷举行了党在德国重新取得合法地位以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李卜克内西从总结斗争经验中得出结论——迫切需要制订新的党纲。次年，即1891年，在爱尔福特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他为新党纲的制订作了讲演。由于恩格斯及时的不断的帮助，党必须采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新党纲中得到了反映。

1891年，李卜克内西一家迁居到柏林。李卜克内西在他的《青年时代》一文中提到，他离开莱比锡是多么依依不舍。“然而，服从党的利益是一个党员的最高

准则。”（见本书第 81 页）在柏林，李卜克内西担任党的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领导，尽管这项工作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他却在党的工作的其他领域，即在口头宣传鼓动和新闻记者的工作中得到他自己精神上的寄托与最大的满足。

他忘记了岁月，年复一年地在德国所有地区的各种党的集会和群众集会上讲话。哪里需要在帝国国会里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揭露统治阶级的掠夺和侵略企图，那里就总是有他在场。没有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是李卜克内西不在会上发言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总是报告人之一，就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原则问题发言；他也常常就党在国际方面的任务发言。他始终为加强党的组织、维护党的团结作坚持不懈的努力，因而有时甚至低估了机会主义的危险，但是他的革命的基本立场则是坚定不移的。

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分钟，李卜克内西始终是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的激烈的反对者和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对妥协于剥削者的统治，或者任何一种使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国家一体化的主张，他都愤慨地加以驳斥。他已是七十高龄的老人，还被阶级的法律以所谓“渎君罪”判刑，而气宇轩昂地走向监狱。他最后一次于 1900 年 7 月 28 日在德累斯顿所作的伟大的讲演，如同以前无数次的讲演一样，是一次对德国

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非人道政策的愤怒控诉。

威廉·李卜克内西非但是一个演说家，而且还是一个政论作家。除了他的许多演讲被印成宣传社会主义的传单或载入刊物外，他还写了几百篇论著和文章，写了许多小册子，著作了好几本书。这些作品涉及到政治、历史和生活经历方面的各种题目，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学校与教育政策毫无疑问地受到他的重视，因为他毕竟终生是个教员！

他所写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传略，以及对其他一些科学共产主义创建人的回忆，诸如《什么是社会民主党和他们追求什么》、《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知识》、《纪念三月十八日》*等，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方面，在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方面，在与阶级论敌进行论战方面，都起过极其卓越的作用。这些作品曾多次再版，并被译成好几种文字，特别是经常由布尔什维克译成俄文。我们知道，列宁曾称颂威廉·李卜克内西为社会主义群众领袖的典范，并对他的文章备加

* 在世界历史上，1871年3月18日是巴黎公社成立之日；1849年3月18日是德国法兰克福议会通过帝国宪法之日；1848年3月18日是柏林人民起义之日。这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都是威廉·李卜克内西亲身经历过的，并都与他的政治生涯有关，因而他撰文纪念3月18日，以此总结革命工人运动的经验。

赞扬。

从重新发表在这里的几篇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出李卜克内西所有作品的特色，那就是具有一种极其生动的、绘声绘色的、富于形象的语言；这种语言能完全适合他作为宣传鼓动者的需要，深深地感染和激励读者。这些作品反映出李卜克内西对世界文学和世界历史（自然，也包括从丰富的战士生活中获得的重大的宝贵经验在内）有很深的造诣。他的文字里，冷嘲与热讽并见；既充满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革命激情，同时也有自我揶揄。

“Le style est l'homme même!”（风格即其人！）——如果说，毕丰这句多次为人引用的话经常被用之不当，那末用于威廉·李卜克内西则是难得有的准确。他的作品，当然也包括他所写的回忆录，真实而确切地反映了一个为被剥削与被压迫的人民的权利、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热情战士的本质。他的作品向我们表明，威廉·李卜克内西确实确实终身是“一个革命士兵”。

海因里希·格姆科夫

威廉·李卜克内西生平大事记

1826年3月29日 出生于德国吉森。幼年失去双亲。

1832年 以优异成绩通过中学毕业考试，取得提前进入大学的资格。以后开始接触和研究过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

1845年 前往柏林上大学。开始接触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与波兰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交往，并同情和支援波兰民族解放斗争。

1846年3月 重返故乡吉森时，途经波希米亚，被奥地利宪兵认为有参与波兰叛乱嫌疑而驱逐出境。后在吉森上大学。同年年底转入马尔堡大学学习。

1847年5月 离开马尔堡，准备去美国，但在法兰克福至美因兹途中遇见鲁道夫，并接受他的劝告改赴瑞士。此后便在苏黎世的卡尔·弗吕贝尔模范学校任教，并开始与工人运动接触，除了参加苏黎世的德国工人联合会各种集会外，还以记者身份为民主的《曼海姆晚报》写通讯稿。



1848年2月 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后赶赴巴黎，然而革命高潮已经过去，但仍参加了海尔维格组织的志愿军团，准备渡过莱茵河，促使德国革命化，不幸途中患了重病，未能返回德国，病愈后重返苏黎世。

1848年9月 与十几位同志一起在塞肯根渡过莱茵河，参加司徒卢威领导的巴登暴动，失败后被投进监狱，后被苏黎世政府驱逐出境。

1849年5月 由于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而重获自由。在贝克尔指挥的人民自卫团当炮手，因动员布伦坦诺采取革命立场而发生齟齬，后被布伦坦诺投入拉施塔特要塞监狱。获释后积极投身于维护帝国宪法运动。

1849年6月底 巴登革命军与普鲁士军队决战于拉施塔特附近遭受失败，7月初与司徒卢威等人一起流亡瑞士。在日内瓦与恩格斯结交并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对瑞士的德国工人协会内部的议会主义者展开坚决斗争。

1850年2月 赴瑞士弗赖堡州的穆尔腾参加将要召开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于到达会址时被瑞士联邦当局拘留，在弗赖堡软禁两个月，最后被强迫遣送出境。

1850年5月 出瑞士境后经法国流亡到伦敦，在伦敦



住了将近十三年，成了马克思一家亲密的朋友。

1861年 德国宣布大赦政治犯后，于翌年8月从伦敦回到柏林，应布拉斯的邀请担任《北德意志总汇报》编辑。但在俾斯麦出任首相后，该报为俾斯麦所操纵，遂与该报另一编辑施维舍尔一同辞职。后在柏林从事工人运动和记者工作，为传播《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思想作了巨大努力。

1865年夏 被逐出柏林和普鲁士，先到汉诺威的施维舍尔家暂住几周，后去莱比锡住了二十五年，与倍倍尔并肩战斗，共同创建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并出任党的机关报《民主周刊》的主编。

1867年 被选为北德意志同盟的国会议员。

1870年 在任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期内坚决反对德国对法作战，并与倍倍尔投票反对政府的军事拨款。

1871年 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名义声援巴黎公社的英勇斗争。

1872年 作为爱森纳赫派发言人和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主编被控犯有“叛国罪”，在莱比锡审询中以被告席为讲坛，揭露反动派，宣传社会主义，最后以“阴谋叛国罪”和“渎君罪”判处两年要塞监禁。在胡伯特斯堡服刑期中，积极从事学术研究，写成了《人民外语词典》第一稿。获释后即着手准备德国工

人运动的统一工作。

1875年5月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争取与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以达到德国无产阶级的团结中作了卓著成效的努力，终于使德国工人阶级有了一个统一的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但由于自己理论修养不足，以致在哥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制定的新党纲中保留了拉萨尔派的一些错误观点。后来在担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主编时，对拉萨尔派进行了必要的抵制，同时在《前进报》上主持刊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得以广泛传播。

1878年 为反对当时颁布的反社会主义者法令，在帝国国会讲坛上竭力揭露和抨击俾斯麦警察国家的野蛮行径，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与倍倍尔一起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和党中央的秘密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出任该报主编。

1881年 在俾斯麦宣布“小戒严”时，与倍倍尔一道被逐出莱比锡。然后只身前往莱比锡附近的包尔斯多夫村，在那里居住八年中，经常为党的领导工作和作为各地工人推选国会代表而往返于柏林和德累斯顿等地，并积极从事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曾多次受党的委托出访瑞士、法国和英国。1886年到过美国。

1890年 俾斯麦下台、社会民主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



后，在同年10月党的哈雷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演说，提出当时党的最重要任务是建立新组织和制定新党纲。

1891年10月 在党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就制定新党纲作了重要报告，由于恩格斯的帮助，新党纲反映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年，全家迁居柏林。

1900年7月28日 在德累斯顿发表最后一次重要演说，对德国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提出强烈抗议。

1900年8月7日 在柏林家中与世长辞。



人名索引

- 说明：1. 人名按姓氏检索，姓氏后面用逗号与教名等隔开。
2. 姓氏按中译名首字的汉语拼音字母次序排列。
3. 每一人名后的简介文字，都译自原书。中译者所加的补充说明用译注方式排在圆括弧内。

阿乃尔特 (Ahnert)——莱比锡的预审官。——第 320 页。

埃勒斯，约翰·亨利希·康拉德 (Ehlers, Johann Heinrich Conrad)——铸钢工人，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9年起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869—1870年任党的常务委员会委员。1870年9月，和党的其他常务委员一起被捕。——第310页。

艾伦 (Allen)——英国医生，替马克思一家看病。——第 226 页。

艾米 (Amy)——伦敦市区一个酒馆女招待。——第 227 页。

艾威林，爱德华 (Aveling, Edward 1851—1898)——英国社会主义者，医生，作家，政论

家。曾与赛米尔·穆尔一起，将《资本论》第一卷译成英文。1884年起，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员。1884年，为社会主义同盟创建人之一。1889年，因同盟内无政府主义的活动日益增多而退出同盟，从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是非熟练工人和失业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889年出席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1884年起成为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的生活伴侣。——第331、339页。

奥托射手 (Otto der Schütz 1340—1377)——德国古代黑森一个诸侯的名称。——第 64 页。

奥托博士 (Otto, Dr.)——吉



森文科中学古典语教师。——第 205 页。

奥尔别希 (Orbig) ——吉森的社会民主党人。——第 53 页。
奥康诺, 费格斯·爱德华 (O'Connor, Feargus Edward 1794—1855) ——英国工人领袖, 宪章运动左翼领导人之一, 《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48 年后成为改良派。——第 257 页。

奥伯米勒, 威廉 (Obermüller, Wilhelm, 生于 1809) ——新闻记者。——第 315 页。

巴克, 亨利·托马斯 (Buckle, Henry Thomas 1821—1862)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实证主义者。试图用实证主义观点来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第 337 页。

巴塞耳曼, 弗里德里希·丹尼尔 (Bassermann, Friedrich Daniel 1811—1855) ——出版商, 自由派政治家, 巴登邦议会议员。1848—1849 年为预备议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1848 年 8 月至 1849 年 5 月任帝国临时摄政内务部副部长。——第 119、137 页。

白拉克, 威廉 (Bracke jr., Wilhelm 1842—1880) ——出版

商, 书商。1869 年为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 又是该党马克思主义派的领导人之一。1865 年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不伦瑞克工人协会的创始人。1867 年以后任全德工人联合会总司库。他和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一起, 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内组成反对派。1869 年他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被选进党的常务委员会。1871 年不伦瑞克叛国案的被告之一。1877—1879 年为帝国议会议员。他是马克思恩格斯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的文章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为克服拉萨尔主义和贯彻马克思主义作出过重要贡献。——第 310、325 页。

鲍威尔, 布鲁诺 (Bauer, Bruno 1809—1882) ——唯心主义哲学家, 宗教批评家, 政论家。曾一度以青年黑格尔派的身份和卡尔·马克思交过朋友, 在普鲁士受到封建反动派的迫害。1848—1849 年革命后, 成为反动的《新普鲁士报》编辑之一。1866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他是埃德加尔·鲍威尔的哥哥。——第 36、38、62 页。

鲍威尔, 埃德加尔 (Bauer, Edgar 1820—1886) ——政论家。曾



以青年黑格尔派的身份和马克思恩格斯交过朋友。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美国。1861年大赦后任普鲁士官员。他是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弟。——第36, 240, 243—245页。

倍倍尔, 奥古斯特 (Bebel, August 1840—1913)——**工**,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朋友和学生。1863年为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创建人之一, 又是该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1867年任该联合会主席。1866年起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1869年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之一。1867—1870年为北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1—1881年和1883—1913年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德法战争期间积极反对普鲁士的併吞政策和捍卫巴黎公社, 是坚决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反对派, 主张用民主革命的方法统一德国。1880—1913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常务委员会的成员, 以后成了“欧洲最有才干的国会议员, 最有天才的组织家和策略家, 成了国际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运动中最有威信的领袖。”(列

宁)。——第274, 294, 297, 304, 307, 309, 315, 318, 321, 324, 326, 327页。

贝克尔 (Becker)——出生于哈姆城 (Hamm),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后流亡美国。(此人即奥古斯特·贝克尔 August Becker 1814—1871, 瑞士正义者同盟盟员, 魏特林的拥护者, 参加德国1848—1849年革命后, 于五十年代初流亡美国, 为民主派报纸撰稿。——译注)——第149页。

贝克尔, 伯恩哈特 (Becker, Bernhard 1826—1882)——作家和编辑。1863年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的参加者。1864—1865年任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名誉主席。1870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1874年脱离工人运动。1879年发表诽谤性文章反对巴黎公社。——第297页。

贝克尔, 高特弗里德 (Becker, Gottfried 1827—1865)——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儿子, 新闻记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的参加者, 后流亡美国, 参加美国内战, 任上校, 在反对南方各州的战争中阵亡。——第108页。



贝克尔, 海尔曼·亨利希 (人称“红色贝克尔”) (Becker, Hermann Heinrich (“der rote Becker”) 1820—1885) ——法学家和政论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在科伦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1852年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告之一。以后成为进步党党员, 随后又参加民族自由党。1875—1885年任科伦市长。1872年起任上议院议员。1884年起任枢密院顾问。——第286页。

贝克尔, 约翰·菲力浦 (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 ——制刷工人, 新闻记者。自三十年代初起参加德国和瑞士的民主运动。在1849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期间, 先是巴登人民自卫团里的一名指挥官, 后任人民自卫团一个师的司令。恩格斯称颂他是“唯一的一个德国革命将军”。1860年以后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864年为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支部创建人之一, 并且是国际工人协会历次代表大会的代表。1866—1871年为国际工人协会月刊《先驱》杂志的编辑和出版人。1869年为爱森纳赫派的创始人之一。他为

国际工人运动奋斗一生直至在瑞士去世。——第103、104、108、112—116、122、175、191页。

贝多芬, 路德维希·范 (Beethoven, Ludwig Van 1770—1827) ——作曲家, 德国音乐史上古典音乐最杰出的代表之一。——第243页。

比德尔曼, 卡尔 (Biedermann, Karl 1812—1901) ——历史学家和政论家。1838年起在莱比锡任教授。1848—1849年为预备议会和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1863—1879年任《北德意志总汇报》编辑, 以后一直是民族自由党的政治家。——第300、301页。

俾斯麦侯爵, 奥托·冯 (Bismark, Otto Fürst von 1815—1898) ——政治家和外交家, 普鲁士容克阶级利益的代表者。1862—1872年和1873—1890年任普鲁士总理。1871—1890年任帝国首相。他利用王朝战争, 采取反民主的手段, “自上而下”地统一了德国。他是工人运动的敌人, 于1878年颁布反社会主义者法令。——第22、56、60、79、80、270、279、281、282、287、289、296、300、301、306页。

俾斯塔洛齐, 约翰·亨利希 (Pestalozzi, Johann Heinrich 1746—1827)——瑞士著名的人文主义教育家。——第207页。

毕尔格尔斯, 亨利希 (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激进派政论家。1844—1845年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与马克思结交。1846—1847年在科伦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工作, 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部成员。1850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委员。1852年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被判处六年要塞监禁。六十年代转向资产阶级, 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1877—1878年代表进步党出任帝国议会议员。——第286页。

波克平, 西吉兹蒙德·路德维希 (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1825—1885)——商人, 政论家, 革命民主主义者, 曾参加1848—1849年革命。1848年在柏林参加袭击军械库的战斗。1849年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以后流亡到瑞士和法国。自1851年起居住英国。1860年以后和马克思恩格斯

有友好关系, 曾翻译俄国革命者的文章。——第95、103、150、153、175页。

波拿巴, 路易 (Bonaparte, Louis)——见拿破仑第三 (Napoleon III)。

伯克, 菲力浦·奥古斯特 (Böckh, Philipp August 1785—1867)——哲学家和考古学家, 柏林大学教授。著有古代经济史的各种著作。——第36页。

伯宁, W. (Bönning, W. 约1779—1849)——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8月17日在拉施塔特被普鲁士军队以军法处决。——第103、122页。

勃鲁姆, 汉斯 (Blum, Hans 1841—1910)——法学家和政论家, 民族自由党的政治家。1867—1871年任北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1—1879年任《国境信使报》(“Grenzboten”)的编辑。是社会民主党的反对者。——第152页。

博伊斯特伯爵, 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 (Beust, Friedrich Ferdinand Graf von 1809—1886)——萨克森的反动政治家。1848年任驻柏林使节。1849—1866年历任萨克森政



府各部大臣，以后任奥匈帝国外交大臣(1866—1871)和首相(1867—1871)。1871—1878年为驻伦敦大使。1878—1882年为驻巴黎大使。他是弗里德里希·冯·博伊斯特特的堂兄。——第206、299、300页。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冯(Beust, Friedrich von 1817—1899)——原为普鲁士军官，后来接受民主思想而离开军队，参加1848—1849年革命，是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军事领袖之一。以后流亡瑞士，从事教师工作，是教育改革家，国际工人协会苏黎世德国支部成员。1869年以后退出工人运动。他是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博伊斯特伯爵的堂弟。——第85、167、206页。

博尼费修斯，温弗里德(原名温弗里恩)(Bonifatius, Winfried(Wynfrith)约672—754)——盎格鲁撒克逊的传教士。719—722年在佛里森人(Friesen)中间和在黑森传教，此后在黑森和图林根传教直至732年，是这两个地区的教会创建人。——第73页。

布拉斯，奥古斯特(Braß, August 1818—1876)——新闻记者，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瑞士。1859—1860年任《新瑞士报》总编辑。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俾斯麦的拥护者。1861年起是《北德意志总汇报》的出版人。——第21、277—281页。

布洛斯，威廉(Blos, Wilhelm 1849—1927)——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1872年成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几种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和工作人员。1877—1878年、1881—1887年、1890—1906年以及1912—1918年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是帝国议会中社会民主党右翼的领袖人物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8年11月革命之后任符登堡临时政府主席。1919—1920年任符登堡(Württemberg)总理。——第122页。

布伦坦诺，罗伦兹·彼得(Brentano, Lorenz Peter 1813—1891)——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派议员。1849年巴登起义期间任临时政府主席。后流亡瑞士，继而流亡美国。——第99、110—115、118—122、229页。

策门男爵，路德维希 (Zehmen, Ludwig Freiherr von 1812—1892) ——政府顾问。1867—1871年为北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萨克森上议院议长。——第318页。

茨瓦伦(Zwahlen)——日内瓦的画家。——第132页。

茨温格利，乌尔里希 (Zwingli, Huldrych (Ulrich) 1484—1531) ——瑞士宗教改革家。1523年以后在苏黎世活动。1549年起，他的教徒和喀尔文教徒统一。——第146页。

达古伯爵夫人，玛丽-加特琳-索菲 (Agoult, Marie-Catherine-Sophie comtesse d' 1805—1876) ——法国女作家和政论家，笔名丹尼尔·斯特恩 (Daniel Stern)。弗朗茨·李斯特 (Franz Liszt) 的女朋友。——第91页。

大公爵 (Großherzog) ——见路易二世。

德鲁耶，亨利 (Druey, Henri 1799—1855) ——瑞士资产阶级激进派政治家，1848—1855年为联邦委员会委员。自1848年起任司法警察部长。1850年任瑞士联邦主席。——第180页。

德穆特，海伦；爱称琳蕾 (Demuth, Helene (爱称 Lenchen) 1823—1890) ——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马克思逝世后住在恩格斯家。——第234、236、238、250、251、254、271、275、338、345页。

狄更斯，查理斯 (笔名波兹) (Dickens, Charles (Boz) 1812—1870) ——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第40、233页。

迪斯雷利，本杰明 (1876年起封为比康兹菲耳德伯爵) (Disraeli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 ——英国政治家和作家，保守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1852年任财政大臣。1858—1859以及1866—1868年再度出任财政大臣。1868年和1874—1880年任首相。——第22页。

丁格尔施戴特，弗朗茨 (1876年起封为男爵) (Dingelstedt, Franz (Freiherr von), 1814—1881) ——三月革命前的自由派新闻记者和诗人，后成为君主派。1840年发表一部社会批评的诗集，书名为《一个世界主义的夜巡逻之歌》 ("Lieder eines kosmopolitischen

Nachwächters”)。以后成为宫廷剧院的总监和编剧，对德国古典作品有所发掘和继承。

——第69—74页。

杜埃，卡尔·丹尼尔·阿道夫(Douai, Carl Daniel Adolf 1819—1888)——教师和新闻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后成为社会主义者。法国血统。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年移居美国，创办过几所学校。1878—1888年任《纽约人民报》编辑。曾是柏林《前进报》的工作人员。——第160页。

杜萨尔(Dusar)——司徒卢威的内弟。——第103页。

多尔杜(Dortu)——法学家，官吏，最后任最高法院顾问。约翰·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多尔杜的父亲。——第153页。

多尔杜，约翰·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Dortu, Johann Ludwig Maximilian 1826—1849)——原为普鲁士军官，后来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曾参加1848—1849年的革命。1849年为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志愿军团的领袖之一。1849年7月31日被普鲁士军队以军法

处决。——第103,104,134,138,151,153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第19,174,183,186,187,188—195页。

老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 sen., Friedrich 1796—1860)——巴门的工厂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父亲。——第335页。

法齐，让·雅克(詹姆斯)(Fazy, Jean Jacques [James] 1794—1878)——瑞士政治家和资产阶级激进派政论家。1846—1853年和1855—1861年任日内瓦州政府首脑。是瑞士银行的创建人，曾推行反拿破仑的政策。——第174页。

菲利浦第一(人称“高尚忠勇者”)(Philipp I. (der Großmütige), 1504—1567)——黑森伯爵。1522—1523年参加镇压骑士起义。1525年镇压图林根的农民起义。1526年在黑森进行宗教改革后，于1540年经过新教的“忏悔仪式”，在路德、梅兰吞和布策尔的赞同下，娶了萨莱的玛加丽特(Margarete von der Sale)为妾。(菲利浦·梅兰吞Philipp Melancton,

1479—1560, 德国古典文学家, 曾协助路德改革宗教。马丁·布策尔, Martin Butzer (Bucer) 1491—1551, 德国西南部的宗教改革家, 路德的朋友和合作者, 原属于圣多米尼克斯 (St. Dominikus) 教团的修道士。——译注——第 71、72 页。

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 (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马克思主义之前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最激进的思想家。他追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在晚年对社会主义的著作发生兴趣, 并于 1870 年参加社会民主党。——第 62 页。

费伦巴赫, 扎洛蒙 (Fehrenbach, Salomon 1812—1892)——律师。1848—1849 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和斯图加特残缺国会的议员。——第 101 页。

芬特, 鲁道夫 (Fendt, Rudolf)——吉森的大学生, 威廉·李卜克内西的朋友。——第 46、48、92 页。

弗朗茨一世 (Franz I. 1494—1547)——1515—1547 年的法国国王。——第 221 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 (Fried-

rich Wilhelm I. 1802—1875)——1831—1847 年任共同摄政, 1847—1866 年为黑森的选帝侯。——第 63、67、68 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 Wilhelm IV. 1795—1861)——1840—1861 年的普鲁士国王, 1857 年起患精神病。——第 99、153 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 (人称“弗里德里希大王”或“老弗里茨”) (Friedrich II. (“Friedrich der Große”, “Der alte Fritz”) 1712—1786)——1740—1786 年的普鲁士国王。——第 237 页。

弗里森男爵, 里夏德 (Friesen, Richard Freiherr von 1808—1884)——萨克森的政治家。1849 年德累斯顿 5 月起义期间任内政部长。1866 年和普鲁士签订和约, 后任外交部长。——第 318 页。

弗莱里格拉特, 斐迪南 (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诗人, 马克思多年的朋友。1848—1849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1—1868 年流亡伦敦, 在这

期间逐渐脱离革命斗争。——第 69、74、286 页。

弗吕贝尔，弗里德里希·威廉·奥古斯特 (Fröbel, 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1782—1852) ——进步教育家，俾斯塔洛齐的学生 (亨利希·俾斯塔洛齐 Heinrich Pestalozzi 1746—1827, 瑞士著名教育家——译注)。曾专门研究“学前教育时期游戏的作用”。1840 年在巴德·勃兰肯堡 (Bad Blankenburg) 建立“全德幼儿园”。曾遭受普鲁士反动派迫害。——第 90、206、207、216 页。

弗吕贝尔，尤利乌斯 (Fröbel, Julius 1805—1893) ——弗里德里希·弗吕贝尔的侄儿，政论家，进步著作的出版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参加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作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8 年 10 月在维也纳被反动派判处死刑，后得到赦免。1849 年参加巴登起义，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1857 年重返欧洲，以后成为自由党人。——第 85、90、186、206、209、231 页。

弗吕贝尔，策勒 (Fröbel, Zeller) ——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的妻子 (策勒是她娘家的姓。——

译注)。——第 209 页。

弗吕贝尔，尤利乌斯 (Fröbel, Julius) ——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的儿子。——第 209 页。

弗吕贝尔，卡尔 (Fröbel, Karl) ——弗里德里希·威廉·奥古斯特·弗吕贝尔的侄儿和教育家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的兄弟。——第 90、206、212、216 页。

弗吕贝尔，哈勒尔 (Fröbel, Hal-ler) ——卡尔·弗吕贝尔的妻子 (哈勒尔是她娘家的姓。——译注)。——第 90 页。

弗洛伦斯，古斯塔夫 (Fiourens, Gustave 1838—1871) ——法国自然科学家，奥古斯特·布朗基的追随者，曾参加 1870 年 10 月和 1871 年 1 月巴黎无产阶级起义的领导工作，为巴黎公社成员，后被梯也尔政府的军队残酷杀害。——第 270 页。

弗罗斯特，约翰 (Frost, John 1784—1877) ——英国小资产阶级激进派。1838 年参加宪章运动。1839 年因组织威尔士地区矿工起义被判终身流放塔斯马尼亚岛 (Tasmanien, 澳大利亚东南端的岛屿——译注)。1856 年经大赦重返英国。——第 257 页。

弗克斯欣(Föxchen)——见马克思·亨利希·格伦多。

伏尔泰, 弗朗索瓦-玛丽(真姓阿鲁埃)(Voltaire, François-Marie (Arouet de) 1694—1778)——法国哲学家和作家, 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大百科全书》编者之一。——第148页。

孚格尔·冯·法尔肯施泰因, 爱德华(Vogel von Falckenstein, Eduard 1797—1885)——普鲁士将军。1867—1871年为北德意志帝国议会保守派议员。德法战争时期任海岸卫戍司令, 下令逮捕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第310, 325, 326页。

福伦, 卡尔·特奥多尔·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原姓福伦纽斯)(Follen, Karl Theodor Christian Friedrich (Follenius) 1796—1840)——阿道夫·路德维希·福伦的弟弟, 作家, 大学教师。1816年大学生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以后成为大学生协会中激进派——“穿黑长袍的人”所公认的领袖。1818年在耶耶任大学讲师。1819年经法国流亡瑞士, 后流亡美国。1824—1835年在

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任教授。1832年以后热情支持美国黑人的解放事业, 因而失去教授职位, 此后成为作家、教育家、传教士。——第33页。

福伦, 阿道夫·路德维希(原名奥古斯特·阿道夫·福伦纽斯)(Follen, Adolf Ludwig (August Adolf Follenius) 1794—1855)——卡尔·福伦的哥哥, 作家和出版商。曾参加领导建立大学生协会的工作。1819年由于政治活动被捕, 在柏林监禁至1821年, 以后流亡瑞士。1822—1827年在当地任教授。——第33, 99页。

福格特(Vogt)——卡尔·福格特的父亲, 吉森的教授。——第33页。

福格特(Vogt)——卡尔·福格特的儿子。——第56页。

福格特, 卡尔(Vogt, Karl 1817—1895)——自然科学家和政治学家, 庸俗唯物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7年在吉森任大学教授;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派议员。1849年6月为帝国临时五人摄政之一。1849年流亡瑞士。1852年起在日内瓦任教授。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

是拿破仑第三的密探，积极参与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活动。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对他进行了揭露。——第21、33、55、56、169、174、192、277、291、341页。

福格特，奥古斯特 (Vogt, August 约1830—1883) ——鞋匠，马克思恩格斯的拥护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曾参加1848—1849年的革命，为全德工人联合会柏林分会的成员，属于反对拉萨尔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后为国际工人协会柏林支部成员。1867年前往美国，是纽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的会员，国际工人协会驻美支部的组织者之一，任国际工人协会在美国的通讯书记。——第79、286—290、293—295页。

富士，约瑟夫 (Fouché, Joseph 1759—1820) ——法国大革命时是雅各宾派，在拿破仑第一手下出任警察部长。——第89页。

富尔曼 (Fuhrmann) ——1846年前后，马尔堡的大学生，后患精神病。——第62页。

盖布，奥古斯特 (Geib, August 1842—1879) ——汉堡的书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属爱

森纳赫派，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亲密战友。1864—1865年起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9年初为实现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而参加全德工人联合会理事会。1869年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之一。1869—1871年任该党监察委员会委员。1872—1878年任党的司库。1874—1876年为帝国议会议员。——第310页。

歌德，约翰·沃尔夫冈·冯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 ——诗人，也是自然科学研究者，德国古典文学最杰出的代表。——第188页。

格林，威廉 (Grimm, Wilhelm 1786—1859) ——雅可布·格林的弟弟，语言学家，德国民间童话和中世纪史诗的整理者，德国文学和语言科学的创始人之一，曾出版多种德国古代诗选。——第36页。

格林，雅可布 (Grimm, Jacob 1785—1863) ——杰出的语言学家和文化史家。他和弟弟威廉都是德国文学和语言科学的创始人。历史语法书《德语语法》的编者，并和弟弟威廉一起编著有《儿童与家庭童话集》。从1852年起出版了最初几卷

- 的《德语词典》。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是1837年“戈丁根七君子”之一（格林兄弟曾在1837年为抗议汉诺威公爵违背成立宪法的诺言而失去戈丁根大学教授职位。——译注）。——第36页。
- 格勒特，克里斯蒂安·蒂希特高特（Gellert, Christian Fürchtgott 1715—1769）——抱有虔诚基督教立场的启蒙运动诗人。——第237页。
- 格拉莱，亨利希（Gralle, Heinrich）——木匠。1870年为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常务委员会委员。1870年9月和其他的常务委员一起被捕，未经起诉而待审拘留至1871年3月。——第310页。
- 戈格，阿曼德（Goegg, Amand 1820—1897）——新闻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为巴登临时政府成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七十年代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22页。
- 哈尼，乔治·朱利安（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有影响的英国工人领袖，宪章运动左翼领袖之一，正义者同盟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几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刊物的编辑，和马克思恩格斯保持密切联系直至五十年代初，以后曾一度参加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行列。——第256—260页。
- 哈布斯堡王族（Habsburger）——这一贵族统治者的家族从1273年至1806年（中有间断），是所谓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拥有德国的王位和皇位，其间还拥有西班牙（1516—1700）的王位，奥地利帝国（1804年起）的皇位和奥匈帝国（1867—1918）的皇位。——第301页。
- 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索菲娅（Hatzfeldt, Sophie Gräfin von 1805—1881）——拉萨尔的女朋友和追随者。1867年创立拉萨尔派分裂集团，即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但没有什么影响。——第287、292页。
- 哈特曼（Hartmann）——莫里茨·哈特曼的儿子，法学家。——第54页。
- 哈特曼，莫里茨（Hartmann, Moritz 1821—1872）——奥地利民主主义作家。1848年3月德国革命以前为了抗议新闻检查离开奥地利。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第 54、55、171、172、173、174 页。

哈德里希, 克里斯提安 (Hadlich, Christian 1831—1894) ——织袜工人, 客栈店主, 会计师。1848 年参加工人运动, 为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会员。1869 年在莱比锡任该联合会理事会司库。作过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代表。1872 年起任党的莱比锡印刷合作社领导人。1882 年流亡美国, 在美国的几家工人报纸工作。——第 297、298、304 页。

海涅, 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 ——著名诗人和政论家, 热情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教会的反动统治, 是德国民主文学的先驱战士, 马克思一家的朋友。——第 84、232 页。

海因岑, 卡尔 (Heinzen, Karl 1809—1880) ——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敌。1849 年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随后流亡瑞士, 以后流亡美国。1850 年前往美国。——第 186 页。

海尔维格,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Herwegh, Georg Frie-

drich 1817—1875) ——三月革命前和工人运动初期德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 (海涅称他为“革命的铁云雀”)。1842 年起和马克思有友好往来。1848 年 2 月革命后是巴黎的德国民主协会领袖之一, 也是 1848 年 4 月参加巴登起义的德国流亡者志愿团体的组织者之一, 后长期流亡瑞士。六十年代是德国工人运动的亲密战友, 国际工人协会会员。1869 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以及该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的编辑之一。——第 16、53、85、90、231、232 页。

海尔维格, 埃玛 (Herwegh, Emma 1817—1904) ——格奥尔格·海尔维格的妻子。——第 90 页。

海顿, 弗朗茨·约瑟夫 (Haydn, Franz Joseph 1732—1809) ——奥地利著名作曲家, 创作有许多欧洲形式的交响乐、弦乐四重奏曲和钢琴奏鸣曲。——第 243 页。

韩德尔,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Händel, Georg Friedrich 1685—1759) ——当时德国最伟大的作曲家, 与巴赫 (Bach) 齐名, 自 1712 年居住伦敦。



——第 243 页。

赫普纳,阿道夫(Hepner, Adolf 1846—1923)——编辑,1869 年为社会民主工党创建人之一。1869—1873 年为《人民国家报》编辑之一。1872 年莱比锡叛国案的被告。1872 年为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代表。1882 年移居美国,1908 年重返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持改良主义立场。——第 318、321、326、327 页。

赫伯特,巴尔塔扎尔(Herbert, Balthasar)——吉森的市政参事和木匠师傅。——第 46、51 页。

黑格尔,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资产阶级古典哲学最杰出的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他第一次系统地阐发了辩证的思维方式。——第 159 页。

黑克尔,弗里德里希·弗朗茨·卡尔(Hecker, Friedrich Franz Karl 1811—1881)——曼海姆的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激进的共和主义者。1848 年 4 月为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以后流亡美国。1861—1865 年支

持美国北方各州而参加美国内战,任陆军上校。——第 139、227、229 页。

胡登,乌尔利希·冯(Hutten, Ulrich von 1488—1523)——政论家和诗人,人文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宗教改革的拥护者。1521 年与济金根(Sickingen)联合。1522—1523 年参加骑士起义。——第 75 页。

胡德,托马斯(Hood, Thomas 1799—1845)——英国现实主义诗人和漫画家。1843 年发表《衬衫之歌》(“Song of the Shirt”),反映伦敦女缝切工人的苦难生活,对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第 337 页。

惠特菲尔德(Whitfield)——伦敦的教友派教徒。——第 343 页。

霍亨索伦(Hohenzollern)——1415—1701 年勃兰登堡选帝侯的王族。1701—1918 年为普鲁士国王,其间于 1871—1918 年登德国皇帝位。——第 104 页。

霍克(Hock)——卡尔斯卢厄的宫廷演员。——第 112、113 页。

吉约丁,约瑟夫-伊格纳斯(Guillotin, Joseph-Ignace 1738—1814)——法国医生。法

国大革命时期，根据他的提议于1792年3月20日通过法案采用断头台（1789年吉约丁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提出对死刑犯人实行砍头法，用机器执行之，以减轻犯人的痛苦，这就是断头台的由来：“断头台”（La guillotine）一词即从他的名字而来。——译注。——第147页。

加来，阿勒贝尔—弗雷德里—让（Galeer, Albert-Frédéric-Jean 1816—1851）——瑞士教育家和作家，民主主义者。1838年为格吕特利协会（Grütli-Verein）创建人之一。1847年参加反对分裂主义同盟的战争。1849年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第153、175、176页。

金克尔，哥德弗利德·约翰（Kinkel, Gottfried Johann 1815—1882）——艺术史学家，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6年发表抒情和史诗般的叙事诗《射手奥托》（“Otto der Schütz”）。1849年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被普鲁士法庭判处终身要塞监禁，1850年越狱后流亡美国，成为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

的领袖之一，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第64页。

卡诺伯爵，拉查尔—尼古拉—马尔格里（Carnot, Lazare-Nicolas-Marguerite comte 1753—1823）——法国政治家和军官。在军队服务至1783年，退役时为上尉工程师。1791年为制宪国民会议议员。1792年为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793年8月起任（战时）福利委员会委员，革命部队的创始人。1794年雅各宾派专政被推翻后，参加热月九日政变。1800年曾任短期的陆军部长。——第186、189页。

卡维纳（Kavenagh）——伦敦的一位房产主，英国著名女作家朱莉娅·卡维纳（Julia Kavenagh）的母亲。——第340页。

喀尔文，让（Calvin, Jean 1509—1564）——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家，新教中喀尔文教派的创始人。喀尔文教代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利益。——第147页。

凯利（Kelly）——伦敦的一位剧院女老板。——第339页。

科尔夫，巴龙（Korff, Baron）——斐迪南·拉萨尔的朋友。——第288、289页。



科恩 (Korn) ——柏林的一个商行侍役，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柏林人民协会的领导人之一。1848年6月参加并领导冲击军械库，后被判处两年要塞监禁。——第95、149页。

科恩海姆，马克斯 (Cohnheim, Max)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参加1848—1849年巴登革命起义，失败后流亡美国，为国际工人协会旧金山支部创建人之一。——第95、150、153页。

克罗卜史托克，弗里德里希·高特利普 (Klopstock, Friedrich Gottlieb 1724—1803) ——德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重要诗人。——第146页。

孔西德兰，普罗塞倍尔-维克多 (Considérant, Prosper-Victor 1808—1893) ——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学生。1848年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站在革命方面。1849年被控犯有叛国罪，从法国逃亡比利时。1869年重返法国。——第170页。

库柏，詹姆斯·费尼莫尔 (Cooper, James Fenimore 1789—1851) ——北美现实主义作家。——第200页。

拉法格，劳拉 (Lafargue, Laura 1845—1911) ——卡尔·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1868年与保尔·拉法格结婚，是法国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第249、266、267、271、344、345页。

拉萨尔，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 ——法学家，作家，小资产阶级的工人鼓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曾参加1848—1849年革命。他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之后，还于1863年以“公开的答复”为题发表了他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纲领，并在此基础上于1863年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该联合会与自由派的资产阶级没有关系，但是试图通过与俾斯麦达成协议，使全德工人联合会为容克普鲁士的国家利益服务。——第23、282、287—289、300、314页。

拉伯雷，弗朗索瓦 (Rabelais, François 约1494—1553) ——文艺复兴时代法国最重要的人文主义讽刺作家，医生，法民族文学的奠基人。——第247页。

拉赫曼，卡尔 (Lachmann, Karl 1793—1851) ——古语学家和

日耳曼学家，教育家。1818—1825年在哥尼格斯堡(Königsberg)任教授，后在柏林任教授。他是古代文学注释和古德意志文学语言训诂的创始人。——第36页。

莱辛(Lessing)——大学生。普鲁士的密探。——第88,90页。

莱辛，高特霍德·埃夫拉姆(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诗人，文学艺术批评家，德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现实主义美学和德国资产阶级古典民族文学的奠基人，反对专制主义。——第242页。

勒萨日，阿兰-勒内(Lesage, Alain-René 1668—1747)——法国作家，写有批评社会的讽刺小说和喜剧。——第193页。

雷曼, A. (Reimann, A.)——裁缝，国际工人协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柏林支部的成员。1868年为柏林民主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也是全德裁缝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代表。——第79, 285页。

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 卒于1829年左右)——威廉·李卜

克内西的母亲。——第250页。
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威廉·李卜克内西的父亲，曾在吉森的官府中任职。——第13, 87页。

李卜克内西，艾丽斯(Liebknecht, Alice 生于1857, 卒年不详)——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女儿，1877年嫁给社会民主党的编辑和作家布鲁诺·盖泽尔(Bruno Geiser)。——第273页。

李卜克内西，卡尔(Liebknecht, Karl 1871—1919)——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律师，和罗莎·卢森堡同为德国左派的领袖。1918—1919年为德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1912年起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919年1月15日被反革命军官谋杀。——第273页。

李卜克内西，特奥多尔(Liebknecht, Theodor 1870—1948)——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法学家。曾和弟弟卡尔一起在柏林从事律师业务。——第273, 316页。

李斯特，弗朗茨(Liszt, Franz 1811—1886)——十九世纪匈牙利最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第90页。

利平斯基(Lipinski)——莱比锡



- 社会民主党的出版人。——第58页。
- 龙格, 燕妮 (Longuet, Jenny 1844—1883) ——卡尔·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的大女儿, 新闻记者, 国际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在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1872年嫁给沙尔·龙格。——第239, 249, 266, 271, 274, 276, 344, 345页。
- 卢梭, 让-雅克 (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 ——法国作家和唯心主义启蒙哲学家, 法国大革命前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最重要的思想家。——第147, 207页。
- 卢格, 阿尔诺德 (Ruge, Arnold 1802—1880) ——激进的政治家, 青年黑格尔派,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4年同马克思合作出版《德法年鉴》。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派议员。五十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 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85, 90, 186页。
- 鲁道尔夫博士 (Ludolf, Dr.) ——苏黎世的弗吕贝尔学院首席教师。——第85, 86, 90页。
- 路德, 马丁 (Luther, Martin 1483—1546) ——神学家, 作家, 宗教改革家, 德国新教的创始人。他的全部文学作品, 尤其是他从拉丁文译成德文的圣经, 对发展统一的德国文学语言有重大影响。在1524至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中, 他坚决反对农民的革命行动。——第34, 35页。
- 路德维希二世 (Ludwig II. 1777—1848) ——黑森-达姆施塔特的大公爵。——第99页。
- 路易十四 (Ludwig XIV. 1638—1715) ——1643—1715年的法国国王。——第89页。
- 路易-菲力浦, 奥尔良公爵 (Louis-Philippe, duc d'Orléans 1747—1793) ——1789年为法国国民议会极左派议员。为了表明他的共和主义思想, 在1792年改名为菲力浦·埃加里戴 (Philippe Egalité), 曾参加法国国民代表大会, 1793年被处决。(路易-菲力浦是路易十六的堂弟, 在法国大革命初期归附雅各宾派, 放弃了波旁王族的姓氏, 改姓埃加里戴(意为平等)。属于法国国民议会中的山岳党, 曾投票赞成处决国王, 后来他本人在恐怖时期以阴谋恢

复君主政体罪被送上断头台。——译注)——第204页。

路易一菲利浦, 奥尔良公爵 (Louis-Philippe, duc d'Orléans 1773—1850)——路易一菲利浦的儿子。1793年从法国流亡到英国。1830年七月革命胜利后被法国金融资产阶级拥立为法国国王, 后被1848年二月革命推翻。——第85, 204, 232页。

罗伯斯庇尔, 马克西米里安—玛丽—伊丝托尔 (Robespierre, Maximilien-Marie-Isidore de 1758—1794)——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领导人, 雅各宾派的领袖。1793年起任革命政府首脑。1794年7月27日被反革命政府推翻, 次日被处死。——第159页。

罗恩伯爵, 阿尔勃莱希特·泰奥多尔·埃米尔 (Roos, Albrecht Theodor Emil Graf von 1803—1879)——普鲁士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负责普鲁士军队的改组工作。1859—1873年任陆军部长, 其间于1861—1871年兼任海军部长。1873年1月1日升为陆军元帅。——第281页。

罗斯梅斯勒, 埃米尔·阿道夫

(Roßmäßler, Emil Adolf 1806—1867)——自然科学家和民主主义作家。1830年任泰兰特 (Tharandt) 森林学院自然史教授。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9年由于参加残缺国会免职。六十年代曾为促进工人的教育事业作过贡献, 是萨克森人民党的创建人之一。——第301页。

罗森勃鲁姆, 爱德华 (Rosenblum, Eduard)——大学生,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失败后流亡国外。——第95, 134, 149页。

罗姆, 约翰奈斯 (Rohm, Johannes)——吉森の木匠师傅。——第46, 52, 53页。

小罗姆, 约翰奈斯 (Rohm jr., Johannes)——罗姆·约翰奈斯的儿子, 吉森の木匠。——第46, 52, 53页。

洛维特, 威廉 (Lovett, William 1800—1877)——英国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英国宪章运动的参加者。——第257页。

洛赫尔, (Locher)——第88页。

吕宁, 奥托 (Lüning, Otto 1818—1868)——医生和政论家。1844年以后成为“真正的社会

主义”的代表人物。1844年是《威塞尔汽船》(“Weser-Dampfboot”)的出版人。1845—1848年是《威斯特伐里亚汽船》(“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的出版人。1848—1850年是民主主义的《新德意志报》(“Die Neue Deutsche Zeitung”)的出版人。1866年以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149页。

吕德尔, 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鲁道夫(Rüder, Christian Friedrich Rudolf 1809—1890)——官吏。曾参加1848—1849年的革命。1866—1881年任莱比锡警察局局长。——第316页。

马克思, 卡尔(Marx, Karl 1818—1883)——第19, 55, 174, 191—194, 226—229, 231—245, 249—251, 254, 257—260, 266, 268, 272—276, 286, 291, 334, 340, 344—345页。

马克思-艾威林, 爱琳娜(又名“杜西”)(Marx-Aveling, Eleanor (Tussy) 1855—1898)——卡尔·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最小的女儿, 政论家, 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1884年为社会主义联

盟盟员。1884年为社会主义同盟创建人之一。1889年是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和伦敦码头工人与煤气工人工会的组织者之一。自1884年起与爱德华·艾威林结为生活伴侣。——第239, 265—276, 331, 338, 339, 344, 345页。

马克思, 埃德加尔(又名“穆希”)(Marx, Edgar (“Musch”) 1847—1855)——卡尔·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的儿子。——第341页。

马克思, 弗兰契斯卡(Marx, Franziska 1851—1852)——卡尔·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的女儿。——第341, 342页。

马克思, 亨利希·格维多(又名“弗克斯欣”)(Marx, Heinrich Guido (“Föxchen”) 1849—1850)——卡尔·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的儿子。——第341页。

马克思, 劳拉(Marx, Laura)——见拉法格, 劳拉(Lafargue, Laura)。

马克思, 燕妮(Marx, Jenny 1814—1881)——卡尔·马克思的妻子和战友, 娘家姓冯·威斯特华伦(Von Westphalen)——第236, 238, 239, 249—



251, 254, 265, 266, 268, 271, 272, 274—275, 341, 344, 345 页。

马志尼, 朱泽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 ——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之一。1849 年任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 年是设立在伦敦的欧洲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创建人之一。五十年代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第 168 页。

马提, 卡尔 (Mathy, Karl 1807—1868) ——巴登的政治家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巴登邦议会中的反对派领袖之一。1848 年为预备议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中间派右翼), 后来是俾斯麦政策的拥护者 (民族自由党人)。——第 119 页。

迈耶尔, 西格弗里德 (Meyer, Sigfrid 约 1840—1872) ——矿山工程师, 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的拥护者, 全德工人联合会柏林分会会员, 属于反对拉萨尔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与马克思有书信往来。他是国际工人协会 (第一国际) 柏林支部的创

始人之一。1866 年自费出版《共产党宣言》。1866 年移居美国, 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美国的组织者之一, 纽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的会员。——第 79, 285, 290—295 页。

毛奇伯爵, 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 (Moltke, 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on 1800—1891) ——元帅, 军事著作家, 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1857—1871 年任普鲁士总参谋长。1871—1878 年任帝国总参谋长。先后指挥过 1864, 1866, 以及 1870—1871 年的战役。——第 186, 189 页。

毛斯, 亨利希 (Maus, Heinrich) ——1840 年 5 月神学系的应考生, 威廉·李卜克内西监护人的亲戚。——第 69, 77, 78, 83, 86 页。

梅林, 弗朗茨 (Mehring, Franz 1846—1919) ——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后来成为德国工人运动杰出的代表。八十年代参加马克思主义者的各种活动, 写有许多关于德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著作。他是《马克思传》的作者。德国社会民主



党左翼领袖和理论家之一。1918—1919年为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第34页。

梅茨内, 泰奥多尔 (Metzner, Theodor 1830—1902)——鞋匠,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建人之一, 为该联合会的理事和驻柏林的全权代表, 属于反对拉萨尔的无产阶级反对派, 后脱离全德工人联合会。1866年为国际工人协会柏林支部的创建人之一。1868年是柏林民主工人协会的创建人之一。1869年起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1869年受森纳赫代表大会的代表。——第79、289页。

梅特涅侯爵, 克莱门斯·文策尔·洛塔尔 (Metternich, Clemens Wenzel Lothar Fürst von 1773—1859)——奥地利政治家和外交家。1809—1821年任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1821—1848年任首相, 是沙皇俄国—奥匈帝国—普鲁士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1848年3月在维也纳被革命推翻下台。——第31、85页。

门德, 弗里茨 (Mende, Fritz 卒于1879)——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9—1872年在哈茨弗尔特伯爵夫人操纵的“拉萨尔

全德工人联合会”中任主席。1869—1871年为北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第309页。

米凯尔, 约翰奈斯 (Miquel, Johannes 1828—1901)——律师,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以后转到资产阶级一边。1859年为民族联盟的创建人之一。1865—1870年以及1876—1880年任奥斯纳布鲁克 (Osnabrück) 市长; 1880—1890年任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市长。1867年以后是民族自由党领袖之一, 曾历任普鲁士议员、北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82年起任普鲁士上议院议员。1890—1901年任普鲁士财政大臣。1897年受封为贵族。——第286页。

米歇勒, 儒勒 (Michelet, Jules 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和作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写过许多有关法国历史的著作。1848年由于他的民主和反教会的思想而被解除教师职位。——第36页。

米勒 (Müller)——符登堡的将军。——第100、102页。

米勒 (Müller)——六十年代中期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化



名。——第292页。

米尼埃, 克洛德-埃蒂安(Minié, Claude-Étienne 1804-1879)——法国军官, 曾发明一种枪枝, 以他的名字命名。——第167页。

明希豪森男爵, 卡尔·弗里德里希·希罗尼穆斯(Münchhausen, Karl Friedrich Hieronymus Freiherr von 1720-1797)——奇闻轶事的叙述者, 德国的漫游探险家, 以喜述夸大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战争、行猎和漫游等各种冒险故事而著称于世, 后人把明希豪森比喻为口出大言者。——第188页。

莫扎特, 沃尔夫冈·阿马杜斯(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奥地利著名作曲家, 古典音乐的杰出代表。——第243页。

莫特勒, 埃米莉(Motteler, Emilie)——尤利乌斯·莫特勒的妻子。(尤利乌斯·莫特勒 Julius Motteler 1838-1907,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在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实行时期曾负责传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秘密文件。——译注)——第273页。

392

穆希(Musch)——见马克思, 埃德加尔。

拿破仑第三, 路易-波拿巴(Napole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儿。1848-1851年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52-1870年为法国皇帝。——第56, 140-143, 185, 252, 269, 309-311页。

内夫, 弗里德里希(Neff, Friedrich)——教员, 共和主义作家和政论家。1849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 在巴登领导民团的一个营, 后在弗赖堡被军事法庭处决。——第134, 138, 151, 152页。

内克尔, 雅克(Necker, Jacques 1732-1804)——法国银行家和政治家。1770-1789年多次出任财政总监。1789年革命前夕曾试图进行一些改革。(1789年7月11日雅克·内克尔被国王免职, 激起了人民的愤怒, 导致了7月14日攻克巴士底狱事件, 成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标志。——译注)——第148页。

尼采, 弗里德里希·威廉(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唯心主义哲



学家和作家，唯意志论和非理性主义的鼓吹者，帝国主义神秘与非理性的生活哲学以及法西斯思想的先驱。——第62页。

尼科尔森(Nicholson)——伦敦的职业介绍人。——第215、216、223、224页。

欧文, 罗伯特 (Owen, Robert 1771—1858) ——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自己是一个工厂主，却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弊端，认为可以通过向统治阶级传播知识和灌输真理以及各种空想共产主义的改良措施来消除阶级矛盾。1800—1829年在苏格兰自办的新拉纳克(New Lanark)棉纺厂内改善工人的生活 and 劳动条件，成立了消费生产合作社，以后试图在美国建立共产主义的模范移民地，但都遭到了失败。在被逐出上层社会和完全贫困之后，参加了英国的工会运动和合作社运动。——第45、190页。

彭好斯特, 莱昂哈德·冯 (Bonhorst, Leonhard von 1840—1915) ——机械制造技术人员和设计师。六十年代曾参加威斯巴登(Wiesbaden)工人教育协

会的工作。1867年春与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中央委员会有联系。1869年为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代表，不伦瑞克常务委员会秘书。1871年成为不伦瑞克叛国案被告之一，以后脱离政治活动。——第310页。

皮尔, 罗伯特勋爵 (Peel, Sir Robert 1788—1850) ——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支持自由贸易政策。1841—1846年任首相期间在自由派的支持下于1846年取消谷物税，随后被大农场主轰下台。——第336页。

普芬德, 卡尔 (Pfänder, Carl 1818—1876) ——德国工笔画家。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1845年以后流亡伦敦，为伦敦的正义者同盟和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的成员，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64—1867年和1870—1872年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第135页。

普罗伊斯欣 (Preuschen) ——四十年代吉森神学系的大学生，后来当了乡村牧师。——第50页。

阿尔奈尔, 赛米尔·埃德曼 (Tschirner, Samuel Erdmann 约1812—1870) ——包



岑的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期间是萨克森极左派的领袖，曾领导1849年德累斯顿的五月起义。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是反对布伦坦诺政府的激进的反对派领袖之一，以后流亡瑞士，继而流亡英国。——第103页。

乔治桑，见“桑，乔治”。

琼斯，厄内斯特·查尔斯(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英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宪章运动左翼领袖之一，几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刊物的编辑和出版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密切联系直至五十年代，以后代表改良派的观点。——第257、258页。

曲恩，约翰·奥古斯特·卡尔(Kühn, Johann August Karl 约生于1829)——裁缝，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70年1月起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870年7月起任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是不伦瑞克叛国案的被告之一。——第310页。

萨克雷，威廉·梅克皮斯(Thackeray, William Makepeace

1811—1863)——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家。——第243页。

赛德尔曼，卡尔(Seydelmann, Carl 1793—1843)——演员。——第238页。

桑，乔治(原名阿芒狄娜—露西—奥洛尔·杜班)杜德万男爵夫人(Sand, George; (Amandine-Lucie-Aurore Dupin) baronne Dudevant 1804—1876)——法国女作家，写有大量社会题材的小说。——第209页。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家。他的作品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即从封建主义向早期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状况。——第238页。

沙佩尔，卡尔(Schapper, Karl 1812—1870)——林学系大学生，正义者同盟领袖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与维利希(Willich)一道成为反对马克思的小资产阶级集团的领袖。1856年重又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他们



- 的战友直至逝世。1865年起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员。——第64页。
- 沙佩尔 (Schapper) —— 马尔堡的拿骚大学生，卡尔·沙佩尔的侄儿。——第64页。
- 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Earl of 1801—1885) —— 英国保守派政治家。1847年起成为自由党人，是四十年代通过“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贵族仁爱运动的领袖。——第336、337页。
- 沙勒，尤利恩 (Schaller, Julien 1807—1871) —— 瑞士政治家。1848—1856年任弗赖堡 (Fribourg) 州政府首脑。——第182页。
- 圣西门，克劳德-昂利·德·卢佛卢瓦 (Saint-Simon, Claude-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1760—1825) ——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要求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革和改善工人的状况。——第14、34页。
- 施拉姆，康拉德 (Schramm, Konrad 1822—1858) —— 商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曾参加1848—1849年革命，为《基尔民主周刊》(“Kieler Demokratische Wochenblatt”) 出版人。1849年后流亡英国，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出版负责人。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是马克思的拥护者。——第194、195、258、333、335页。
- 施维舍尔，罗伯特(笔名：罗索斯) (Schweichel, Robert (Rosus) 1821—1907) —— 新闻记者和作家，民主主义者，以后成为社会民主党人，是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梅林的朋友。曾参加1848—1849年的革命。1850—1862年作为流亡者寄居瑞士，任几种德文报刊的编辑。1868年起为《民主周刊》编辑之一，写作批评社会的历史小说和乡村故事。——第80、277—283页。
- 施维舍尔，伊丽泽 (Schweichel, Elise) —— 罗伯特·施维舍尔的妻子。——第280页。
-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 (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 —— 神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属青年黑格尔派，对耶稣的历史存在提出异议并指出天主教的神秘性。1866年

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34, 62, 218 页。

施略费尔, 弗里德里希·威廉 (Schlöffel, Friedrich Wilhelm 1800—1870)——古斯塔夫·阿道夫·施略费尔 (Gustav Adolf Schlöffel) 的父亲, 西西里亚的工厂主。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民主派议员。曾参加 1849 年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后来流亡到瑞士, 以后又流亡到美国。——第 128 页。

施略费尔, 古斯塔夫·阿道夫 (Schlöffel, Gustav Adolf 约 1828—1849)——弗里德里希·威廉·施略费儿的儿子, 大学生和新闻记者, 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曾参加 1848—1849 年在柏林、匈牙利和巴登进行的革命活动, 后来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阵亡。——第 104, 128, 151 页。

施坦道, 尤利乌斯 (Standau, Julius)——教员。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参加德国的民主运动, 是瑞士的皮尔 (Biel) 地区自卫团的组织者之一。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第 104, 105, 108 页。

施瑙费尔, 卡尔·亨利希 (Schnauffer, Karl Heinrich 1823—1854)——诗人和新闻记者, 1848—1849 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 年越狱逃跑, 1851 年以后流亡美国, 任《巴尔的摩觉醒报》编辑。——第 134 页。

施利曼, 亨利希 (Schliemann, Heinrich 1822—1890)——商人, 以后成为考古学家, 曾发现特洛伊城的遗址, 1868—1885 年又发掘出迈锡尼 (Mykene)、奥尔科米纳斯 (Orchomenos) 和泰林斯 (Tiryns) 古迹。——第 210, 331 页。

施韦泽, 约翰·巴普提斯特·冯 (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von 1834—1875)——律师, 以后成为新闻记者和作家。1864—1867 年是 (拉萨尔派)《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和发行人之一, 1868 年以后为该报的唯一发行人。1863 年起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 (拉萨尔派)。1867—1871 年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 支持俾斯麦在普鲁士霸权之下统一德国的政策, 阻挠德国工人参加国际工人协会, 干涉德国工人运动在科学共产主义基础上的统一。

1872年被开除出全德工人联合会。——第79、274、289、291、297、309、314页。

施梯伯, 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1851年起任警察顾问。1852—1860年为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 是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策划者之一和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德法战争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 是德国在法国的间谍机关和反间谍机关的头子。——第20页。

施图姆-哈尔贝尔格男爵, 卡尔·斐迪南(Stumm-Halberg, Karl Ferdinand Freiherr von 1836—1901)——大工业家和保守派政治家, 萨尔地区最有权势的人物, 人称“施图姆国王”, 是工人运动的死敌。——第348页。

舒巴尔特, 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丹尼尔(Schubart, Christian Friedrich Daniel 1739—1791)——联系人民的民主主义平民政论家, 狂飙突进运动的诗人, 曾作为反封建的《德国编年史》的出版人在霍海纳斯贝尔格(Hohenasberg)被监禁十年。——第74页。

斯达尔-霍尔斯坦, 德国男爵夫人(人称“斯达尔夫人”)(Staël-Holstein, Germaine de, baronne (Madame de Staël) 1766—1817)——法国女作家, 银行家和政治家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的女儿。她的著作反映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 和歌德、席勒以及史雷格尔兄弟有交往。——第148页。

斯蒂芬斯, 约瑟夫·雷纳(Stephens, Joseph Raynor 1805—1879)——英国传教士, 社会改革者, 1837—1839年宪章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第257页。

斯皮尔, 萨穆埃尔(Spier, Samuel 1838—1903)——教员。1867年起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9年起为社会民主党党员, 国际工人协会不伦瑞克支部的成员, 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被选进党的常务委员会。1870年3月和其他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一起被捕, 是1871年不伦瑞克叛国案的被告之一。——第310页。

斯楚哈尼(Szuchany)——1849年巴登的法学家。——第122页。
司徒卢威, 古斯塔夫(Struve,



Gustav 1805—1870)——律师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是1848年4月和9月巴登共和国起义以及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流亡英国，成为在英国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1861—1865年为支持美国北方各州参加美国内战。——第17、92、93、95、103、109、111—116、122、124—126、133、139、155—161、163、168、186、211、228、249页。

司徒卢威，阿玛丽爱 (Struve, Amalie 卒于1862年)——古斯塔夫·司徒卢威的妻子，1848—1849年德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第134、140、141、155—159、161—163页。

司徒卢威 (Struve) ——古斯塔夫·司徒卢威和阿玛丽爱·司徒卢威的女儿。——第159—163页。

特伦德伦堡，弗里德里希·阿道夫 (Trendelenburg, Friedrich Adolf 1802—1872) ——唯心主义哲学家。1833年在柏林任哲学教授。——第36页。

特赖希勒尔，约翰·雅各布 (Treichler, Johann Jakob 1822—1906) ——瑞士法学家，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合作社事业的先驱者，路易·勃朗 (Louis Blanc) 的拥护者。1851—1852年和卡尔·毕尔克里一起在苏黎世成立消费合作社。1872—1906年在苏黎世任法学教授。——第85、90页。

托塞尔 (Tozer) ——伦敦铁制品商人。——第335页。

瓦盖纳，海尔曼 (Wagener, Hermann 1815—1889) ——法学家，政治家，政论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反动的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的代表，普鲁士保守党的创始人之一。1853—1858年和1861—1870年为普鲁士下议院议员。1867—1873年为北德意志帝国国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议员。1866—1873年为俾斯麦政府的枢密顾问，《新普鲁士报》(十字报)的创始人。——第23页。

威灵顿公爵，阿瑟·威尔斯利 (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 ——英国元帅和保守派政治家。1808—1814年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一世战争中指挥英国军队。1815年在滑铁卢战役中指挥英军大败拿破仑而闻

名于世。1818—1827年任总军需长。1827—1828年和1842—1852年任总司令。1828—1830年任首相。1834—1835年任外交大臣。——第248页。

威廉一世 (Wilhelm I 1797—1888) ——普鲁士亲王。1849年镇压巴登—普法尔茨起义。1858—1861年为摄政王。1861—1888年为普鲁士国王。1871—1888年为德国皇帝。——第278、326页。

维尔希, 奥古斯特 (Willich, August 1810—1878) ——普鲁士少尉, 因政治信仰退役,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在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担任一个志愿军团的指挥官, 后经瑞士流亡英国。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 与卡尔·沙佩尔同时成为反对马克思的小资产阶级宗派集团的领袖。1853年流亡美国, 在美国1861—1865年的内战中任北方各州的将军。——第195、202、203页。

维尔马尔, 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 (Vilmar, August Friedrich Christian 1800—1868) ——东正教神学

家, 教育家, 文学史家, 作家。1833年起在马尔堡任文科中学校长。1855年起任神学教授。

——第67页。

魏德林, 克利斯提安·威廉 (Weitling, Christian Wilhelm 1808—1871) ——裁缝, 正义者同盟的重要成员和理论家。在科学共产主义诞生以前, 他是空想的工人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 起过积极的作用。曾参加1848—1849年革命, 革命失败后, 于1849年流亡美国。晚年接近第一国际。——第80页。

魏迪希,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 (Weidig, Friedrich Ludwig 1791—1837) ——神学家, 民主主义政治学家。曾为争取德国资产阶级民主化的斗争而进行宣传鼓动, 因而三次被拘留审查(1819—20, 1833和1835年)。1835—1837年未经法律程序而一直被监禁, 最后在狱中自杀。——第32、33、41、68、74、84页。

魏迪希 (娘家姓李卜克内西) (Weidig (Liebknecht))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魏迪希的母亲。——第32页。

魏迪希 (Weidig) ——弗里德里

希·路德维希·魏迪希的侄儿，吉森的大学生。——第41页。

魏迪希(Weidig)——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魏迪希的儿子，吉森的大学生。——第41页。

韦尔夫(Welfen)——德国侯爵王室，1180年起权力限于不伦瑞克-吕内堡公国(Braunschweig-Lüneburg)。王室的汉诺威系在1714年取得英国王位，但在1866年失去了自1815年建立的汉诺威王国，把汉诺威王国让给了普鲁士人。——第56页。

韦尔凯尔(Welcker)——卡尔·泰奥多尔·韦尔凯尔的侄儿，吉森的大学生。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第47页。

韦尔凯尔，卡尔·泰奥多尔(Welcker, Karl Theodor 1790—1869)——巴登的法学家和政论家，自由主义者。1814年起任法学教授。1848—1849年任预备国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中间派右翼)。——第47页。

沃尔弗，斐迪南(人称“红色沃尔弗”)(Wolff, Ferdinand(“der rote Wolf”“der Rote”))1812

—1895)——新闻记者。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后来流亡巴黎和伦敦。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拥护者，后来脱离政治生活。——第194、333页。

乌特克，约翰·卡尔·亨利希(Wuttke, Johann Karl Heinrich 1818—1876)——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预备议会议员，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第301页。

席勒，弗里德里希·冯(Schiller, Friedrich von 1759—1805)——诗人，历史学家，是歌德以外德国古典文学最重要的代表。——第74页。

西格尔，弗朗茨(Sigel, Franz 1824—1902)——巴登的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年任巴登革命军总司令，以后任副总司令，后来流亡到瑞士和美国。1852年前往美国，在1861—1865年美国内战中站在北方各州一边参加战斗。——第145页。

锡菲尔斯 (Sievra)——不伦瑞克的印刷所主人。1870年与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们一起被捕，未被起诉而受到监禁。——第310页。

希尔, 罗兰 (Hill, Rowland 1795—1879) ——英国行政官员和教育家，英国邮政总局局长。1840年创立统一的一便士邮资制度，从而发行了历史上第一张邮票。——第213页。

谢林,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 (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1775—1854) ——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曾在进步的自然科学基础上提出一种自然哲学，以后把封建的普鲁士社会制度理想化，创立了神秘的“启示哲学”。——第36页。

选帝侯 (Kurfürst) ——见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

押沙龙 (Absalom) ——公元前十世纪上半叶以色列国王大卫的儿子，后反叛其父，在逃跑时因头发挂在一棵栎树的树枝上而被杀。(押沙龙系基督教《圣经》中人物——译注) ——第105页。

雅可比, 约翰 (Jacoby, Johann 1805—1877) ——医生，政论

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为预备国会和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德国人民党党员。1863—1866年为普鲁士下议院议员。1867—1870年为北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由于反对并吞亚尔萨斯-洛林，于1870年被捕入狱。1872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第310页。

雅恩,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 (Jahn, Friedrich Ludwig 1778—1852) ——作家和政论家，德国资产阶级体操和体育运动的创始人，曾参加反对拿破仑外来统治的解放斗争。1819—1825年因从事民族统一的斗争被投入监狱。1848年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第33页。

雅罗琴斯卡, 达娜 (Jaroszyńska, Dana) ——波兰女爱国者。——第37页。

耶尼 (Jenni) ——伯尔尼的书商。——第165页。

约尔丹 (Jordan) ——聚尔韦斯特·约尔丹的女儿。——第74页。

约尔丹, 聚尔韦斯特 (Jordan, Sylvester 1792—1861) ——自由派法学家，大学教授和政治

家。三十年代是黑森选帝侯国宪法与民主运动的领袖之一。1839年起由于政治原因被长期监禁。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第68、71、74、75、84页。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 (Sorge, Friedrich Adolph 1828—1906) ——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朋友和战友。曾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1852年移居美国。1867年为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纽约支部创建人之一。1868年为纽约地区社会党创建人之一。1869年为纽

约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1870年为国际工人协会北美中央委员会创建人之一，该协会总委员会迁往纽约后，于1872—1874年任总书记，生前一直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而工作。——第132、164、165、174、294、295页。

佐伊梅，约翰·高特弗里德 (Seume, Johann Gottfried 1763—1810) ——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民间通俗文学作家，尖锐抨击封建独裁的专制政体。——第74、75页。

佐尔姆斯-布劳恩费尔斯侯爵 (Solms-Braunfels, Fürst von) ——第43页。